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 衣俊卿
主编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

马克思主义史 (第三卷)

[南斯拉夫]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著
● 胡文建 李嘉恩 杨达洲 韩宗翊 吴仕康 刘晔星
贾泽林 译 衣俊卿 校



Historija marksizma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Historija marksizma

ISBN 978-7-81129-906-9



9 787811 299069 >
定价：66.00元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

● 衣俊卿
主编

马克思主义史 (第三卷)

[南斯拉夫]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著

● 胡文建 李嘉恩 杨达洲 韩宗翊 吴仕康 刘晔星
贾泽林 译 衣俊卿 校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史. 第3卷 / (南) 弗兰尼茨基著; 胡文建等译. --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5.6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 / 衣俊卿主编)

ISBN 978 - 7 - 81129 - 906 - 9

I. ①马… II. ①弗… ②胡… III. ①马克思主义 - 发展史 - 研究 IV.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1242 号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Naprijed, Zagreb, 1978

Copyright© Predrag Vranicki

This book's right of translation about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is deputized by China Written Works Copyright Society.

Telephone: 010 - 65978906, E - mail: wenzhuxie@126.com.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翻译权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代理。

电话:010 - 65978906, E - mail: wenzhuxie@126.com。

马克思主义史(第三卷)

MAKESI ZHUYI SHI (DI-SAN JUAN)

[南斯拉夫]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著

胡文建等 译 衣俊卿 校

责任编辑 张微微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74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343千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906 - 9
定 价 66.00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外
马克思主义
研究
文库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 ▶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 ▶ 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0AKS005
- ▶ 黑龙江省社科重大委托项目，08A-002

◀◀ Historija marksizma

目 录

第二篇 中国和马克思主义

- 第一章 毛泽东在革命时期的主张 3
- 第二章 武装革命胜利后的观念和实践 19

第三篇 马克思主义在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在西德 37
 - 一、恩斯特·布洛赫 39
 - 二、麦克斯·霍克海默、泰奥多尔·维森格伦德·阿多诺 ... 51
 - 三、于尔根·哈贝马斯 68
 - 四、赫伯特·马尔库塞 71
 - 五、埃里希·弗洛姆 88
 - 六、列奥·科夫勒 100
 - 七、恩斯特·费舍 103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在法国 110
 - 一、昂利·列菲伏尔 112
 - 二、让·保罗·萨特 128

三、路西安·哥德曼	140
四、罗歇·加罗迪	149
五、关于辩证法的讨论	155
六、其他理论争论	158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	174
安东尼奥·班菲	176
加尔万诺·德拉·沃尔佩	178
切扎雷·卢波里尼	182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184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美国和古巴	191
一、英国	191
二、美国	195
三、古巴	203

第四篇 马克思主义和南斯拉夫革命

第一章 革命以前的时期	219
第二章 革命的第一阶段(1941—1945)	228
第三章 革命的第二阶段(1945—1950)	236
第四章 革命的第三阶段(1950—1965)	248
一、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含义	248
二、理论上的进一步突破和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	260
三、其他理论关切	278
第五章 革命的第四阶段(1965—)	290
结语	302
参考文献	314
主要译名对照表	381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

书 目

- 1.《日常生活》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 2.《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
[南]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加约·彼得洛维奇 编
- 3.《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性的诞生》 [匈]费伦茨·费赫尔 编
- 4.《当代的马克思——论人道主义共产主义》
[南]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 著
- 5.《激进哲学》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 6.《自由、名誉、欺骗和背叛——日常生活札记》
[波]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 著
- 7.《卢卡奇再评价》 [匈]阿格妮丝·赫勒 主编
- 8.《超越正义》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 9.《后现代政治状况》 [匈]阿格妮丝·赫勒,费伦茨·费赫尔 著
- 10.《理性的异化——实证主义思想史》 [波]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 著
- 11.《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马克思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
[匈]乔治·马尔库什 著
- 12.《语言与生产——范式批判》 [匈]乔治·马尔库什 著
- 13.《现代性能够幸存吗?》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 14.《从富裕到实践——哲学与社会批判》 [南]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 著
- 15.《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 [波]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 著
- 16.《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关于当代左派的文集》
[波]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 著

- 17.《历史与真理》 [波]亚当·沙夫 著
- 18.《美学的重建——布达佩斯学派论文集》
[匈]阿格妮丝·赫勒,费伦茨·费赫尔 编
- 19.《人的哲学》 [波]亚当·沙夫 著
- 20.《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布达佩斯学派论文集》
[匈]安德拉什·赫格居什等 著
- 21.《被冻结的革命——论雅各宾主义》 [匈]费伦茨·费赫尔 著
- 22.《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南]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著
- 23.《道德哲学》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 24.《个性伦理学》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 25.《历史理论》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 26.《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 [匈]米哈伊·瓦伊达 著
- 27.《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
[捷]卡莱尔·科西克 著
- 28.《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 [波]亚当·沙夫 著
- 29.《现代性的危机——来自 1968 时代的评论与观察》
[捷]卡莱尔·科西克 著
- 30.《人和他的世界——一种马克思主义观》 [捷]伊凡·斯维塔克 著
- 31.《二十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一位南斯拉夫哲学家重释卡尔·马克思的著作》 [南]加约·彼得洛维奇 著
- 32.《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 [波]亚当·沙夫 著
- 33.《国家与社会主义——政治论文集》 [匈]米哈伊·瓦伊达 著
- 34.《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实践——实践派论文集》
[美]格尔森·舍尔 编
- 35.《碎片化的历史哲学》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 36.《一般伦理学》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37.《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关于社会主义及其未来的反思》

[南]斯维托扎尔·斯托扬诺维奇著

38.《文化、科学、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匈]乔治·马尔库什 著

39.《马克思主义史》(三卷本)

[南]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著

40.《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三卷本) [波]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 著

第二篇 中国和马克思主义

第一章 毛泽东在革命时期的主张

7

如果说,我们从俄国的事例已经能够证明,不存在抽象的历史决定论,因为只有如此,人的创造性才能够得到广泛的施展和表现,那么,中国的现代史更是错综复杂的历史情景和历史发展的夺目事例。

许多世纪以来的封建闭关自守和与世隔绝,加上民族资产阶级软弱,封建残余和军阀残余势力强大,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日益垂涎之地。20世纪初,它尚面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巨大问题,尚不知道何谓马克思主义。进步的资产阶级人士(当中也有后来的共产主义者)受着亚当·斯密(A. Smith)、达尔文(Ch. Darwin)、斯宾塞(H. Spencer)、穆勒(J. S. Mill)、海克尔(E. Haeckel)的自由主义思想、民主主义思想和进步的学术思想的熏陶,而在现代重要的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人物当中,他们则特别受罗素(Russell)、杜威(J. Dewey)、德里施(H. Driesch)等人的影响。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其中首先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伟大领袖孙中山,从欧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为自己的革命行动汲取经验。从阶级结构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关系来看,中国当时面临几项巨大任务,这就是使国家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影响,

推翻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及限制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权力。^①

8 在孙中山领导下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1911年结束了长达许多世纪的时期;而共和国的宣告成立,则开始了以往整个历史上从无先例的发展。要知道,揭开这部史诗的是寥寥可数的几位马克思主义者(在1921年党的成立大会上他们只有十二人),这就再一次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人的因素,即所谓的主观因素在改变历史中的威力和作用。

中国真正的革命热情高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但是中国革命的进程在这一时期必然要朝某种不同的方向发展。“古典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已成过去。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纪元,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国有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些国家里,正像列宁已经强调过的,已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① 后来,毛泽东(1893—1976)在自己的一篇论述中国社会阶级的文章中只把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排斥在中国革命的同盟者之外:“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O klasama kineskog društva, Izabrana djela* I. Beograd 1957, str. 8. [参见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译者注])

关于毛泽东个人和中国革命,参见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第一篇真实可靠的报道:《红星照耀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写于1937年,1968年英文版);此外还有下列图书:Jerome Chen, *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1965); Stuart R. Schra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New York 1963); Tilemann Grimm, *Mao Tse-tung in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 Reinbek bei Hamburg 1968(该书中有大量关于中国和毛泽东的书目)。

有关中国革命的新书,参见 C. P. Fitzgerald, *Revolution in China* (Frankfurt a. M. 1968); Han Suyin, *Das China Mao Tse-tung* (München 1968); C. Bettelheim, J. Charrière, H. Marchisio, *La construction du socialisme en Chine*, Paris 1965; A. Donnithorne, *Chinas Economics System*, London 1967。此外,还必须参见下列报刊:“Peking Review”, “China Quarterly” (London)。此外请参见 *Die chinesische Frage auf dem 8. Plenum der Exekutive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Mai 1927, Hamburg-Berlin 1928. god.。

此外,中国的特点是,孙中山这位重要的革命人物,并不是某一狭隘的资本主义阶层的代表,他从广大人民的立场出发,怀着谋求民族利益的崇高理想去对待革命的任务。他的著名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虽然不够明确并有着各种解释,但他后来的革命步骤和宣言明显地表明了它的广泛性和进步性。例如,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党人也出席了这次大会),孙中山宣布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政策。一年后,孙中山逝世,但他的巨大声誉、他的进步的和广泛的政治纲领,在许多方面曾有助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活动。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倡导者陈独秀教授和李大钊教授组织了第一批小组,并在1921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运动首先依靠当时人数尚少的中国无产阶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外,他们加入了第三国际,纪律上服从苏联的指令,认为俄国丰富的革命经验,足以保障这些指令的正确性。而这些指令基本上要求无条件地服从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一阶段的群众性组织和主要实现者的国民党。

但是,孙中山逝世后,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军阀上台领导国民党以及早在1926年就已经开始的反共(如在广州),预示着另一势力掌握了中国革命的主舵。当中国共产党人还在一心想同国民党联合、一心想首先在无产队伍中扩大影响的时候,蒋介石同大资产阶级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就已经准备好反革命了。

这时,在莫斯科,斯大林集团同党内和共产国际内的反对派正在进行尖锐的斗争。斯大林仍然一味主张同国民党保持巩固的联合,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则坚决反对这一主张,要求中国共产党独立活动。同后来按照1905年的榜样采取的工农革命专政的口号相反,托洛茨基认为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出路。托洛茨基的立场无疑是更彻底的,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来说更少痛苦的,但它同样是同十分复杂和纷乱的中国局势不相适应的。这也表明,革命既不能只靠某些

既定经验去指导,也不能从与群众和局势毫无直接联系的某个中心来指挥。

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的纠纷和斗争,给中国共产党人造成严重的后果。某一次革命的领导,如果听任这一派或那一派势力,而且是某个外国的这一派或那一派势力非常偶然的优势所左右,那么,失败几乎是无疑的。而如果这些势力(不管是其中的哪一派势力)越是固执地认为自己的革命道路是所有其他人的范例,那么,人们自然会越加不信任这种领导。

完全可以理解,无论共产国际,或者服从共产国际指令的中国领导,都不能理解中国具体情况产生的某些新提示。中国情况是特殊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当时主要还是个农业国家,而且还因为当时的中国革命推动了农民群众,他们已公开和牢靠地组织起来,建立了农民协会,并在农村从封建主和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毛泽东正是研究了这种情况,特别是湖南省的情况之后,在1927年3月写了报告,他在报告中肯定说:“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

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①

中央委员会否定了毛泽东的报告。从当时的革命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所处的范畴和范围来看,这是不奇怪的。报告提出的观点竟极其轻易地被说成是“农民倾向”和同小资产阶级意识有联系。

然而,这些认识成了推动中国革命的阿基米德支点。毛泽东以这些认识揭示了当时尚未为人所认识的革命路线,这条路线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并将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可以说,1927年也是中国革命的转折年,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进行四月反革命事变和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因而开始走自己的独立的道路,另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认识到必须在革命的农民群众当中和在建立自由根据地的游击斗争当中寻找革命的主要依靠。中央委员会八月全会(1927年)撤换了陈独秀,并派毛泽东到农业省份江西去建立军队和苏维埃。但是以新书记李立三为首的党的领导人认为,革命过程仍然是在总起义,特别是城市总起义和解放区苏维埃化的旧范围内的。他们不顾本国的具体情况,把毛泽东的组织游击战争、建立自由根据地、包围城市等观点看作是农民冒险主义,并且把毛泽东从政治局排除出去。

12

但毛泽东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他的一小支部队在湖南和江西交界处同朱德带领的队伍会合,建立起第一支革命军队,他任政治委员,朱德任司令。往后我们将看到,毛泽东由于自己的各种论述人民民主

^① Mao Ce-tung, *Referat o ispitivanju seljačkog pokreta u provinciji Hunan, Izabrana djela I*, str. 18. (参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3页。——译者注)毛泽东后来多次强调这一点。他在其名著《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没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Kineska nova demokracija, Govori i članci Mao Ce-tunga*, Beograd 1949, str. 120. [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页。——译者注])

等问题的理论著作而特别著名。但是,如果从中国革命的整个历史来看,毛泽东的天才恰恰在于认识和力行当时尚未为人所认识的革命实践,这就是:革命从城市转到中国农村的革命的、分散的和简直可以说是闭塞的广大地区,建立红军和解放区,在解放区推翻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政权,引导革命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走向社会主义,而在第一阶段是建立工农政权。

从中国革命后来的整个进程可以看到,这几项,即毛泽东这种非凡的创造性实践,是其他一切赖以建立起来的基础。

在这条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上,毛泽东既要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官方论点,又要反对党内其他许许多多从消极的到“极端革命的”思想和情绪。在这个时期的一篇著作中,毛泽东针对所有这些论点,特别是针对没有在全国赢得所有群众之前不应立即建立政权的论点,简述了自己的论点:“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

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①

正是在这些方面，毛泽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观点，并且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指出，只有一种革命经验和一种革命理论做指南，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和环境中的完全是不够的。应当立即强调指出，中国这个经验，共产国际实质上并没有接受，它仍然一直是苏联经验和观点的宣传中心。

在中国内部，领会毛泽东的这些观点的过程也长达许多年。当时不得不同夺取城市的李立三路线，同在红军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的其他各种观点进行斗争，因此毛泽东派没有能够击退蒋介石对解放区的第五次围剿，这就是著名的北上长征的原因。只是在这次长征途中，在1935年，有了沉痛的经验和损失之后，毛泽东的路线才取得了胜利，毛泽东成为党的书记。

这样，我们已经开始谈到革命第三阶段的直接事件了。日本在1931年占领了满洲，几年后又准备占领全中国。革命红军在北方各省推翻封建关系，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人民政权，并同时肩负起抗日的重担。在这同时，革命红军又一直不得不抗击国民党的进犯和围剿。只是1936年西安事变（当时蒋介石的生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之后，根据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十分有远见的政策，重新达成国共合作，以反对共同的、当时主要的敌人。

两党双方都做了让步和一定的妥协，如共产党人同意废除红军的名称和停止土地革命，国民党则承认中共地位和答应给予物质帮助等。但是，这次联合与1924—1927年的合作有着重大的差别，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有了巨大和沉痛的经验和有了10年游击战争的

^① Mao Ce-tung, *Iz iskre može da bukne požar*, *Izabrana djela I*, str. 101 - 102. (参见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译者注)

经验,并领导着独立强大的兵团和解放区。所有这一切,足以保证1927年不会重演。

与国民党实行抗日统一战线把一系列新的问题,首先是合作的性质、未来政权和国家结构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发表了论述当时革命的性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结构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和策略等意义极其重大的著作。

15 在1938年10月1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做了题为《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著名报告,他特别着重指出,当时国民党是最大最强的党,中国共产党人将支持它变成人民的革命联盟。“理由是抗日的友军越大越好。单单一个共产党的发展进步,是不够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处于第二党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发起并坚持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并在自己的组织上向着广大革命志士开门,用以力争抗日的胜利,但若处于第一党地位的国民党依然保持过去那样的老状态,那就对于抗战,对于统一战线,都非常不利。抗战将不能获胜,全民族将陷于危险之中。”^①

在这一著作中,毛泽东也把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任务概括如下:建立敌后游击队;建立地方人民抗日政权;争取广大群众参加抗战运动和进行群众的政治、文化和军事教育;官兵平等;重新划分敌后各地作战区域与行政区域,使之适合变化了的情况等。^②

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也提出了未来的社会制度问题,并对他关于中国的人民共和国的论点做了解释。“各民族在自愿原则下互相团

^① Mao Ce-tung, *Nova faza, Govori i članci*, str. 38. 毛泽东清楚地看到,国民党是一个混杂的党,内部的反动分子常常在威胁着它。他说道:“国民党中还存在着一些守旧分子,阻碍着国民党进步的速度和程度,由于这些分子的存在,并与社会上许多守旧分子相结合,就在民族革命战争的洪流中造成一股逆流。”(Mao Ce-tung, *Nova faza, Govori i članci*, str. 39)

^② 参见 Mao Ce-tung, *Nova faza, Govori i članci*, str. 48-50。毛泽东有关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的最著名著作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论持久战》(1938年)。

结,建立统一的政府。第二,中国将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设立人民代表会议的国会与地方议会……就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①

16

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阶段和建立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必经阶段的人民民主的直接任务的完整思想,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有最扼要的阐述。“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②

毛泽东是从中国具体的历史事实和情况出发的,他的主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摆脱一切根据事先规定的观点和经验去解决历史问题的教条主义做法。他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情况同1905年和1917年俄国的情况不同,并且提出了自己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整个第三国际革命法典的唯一著名命题相反,即与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点相反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论点。

正如在1927年和1928年独创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从而指导了当时尚未为人所了解的进程一样,在国共领导下的广泛的人民抗日运动的新情况下,毛泽东根据具体的条件解决了形势问题。中国的情况同其他以往的革命,特别是俄国的革命之所以有重大差别,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者压迫的,因而在一定时期应当考虑到他们。而在外国侵略时期,中国资产阶级也能够表现出革命性。

17

再一个特点是,处在当时阶段的中国革命在外国侵略时期得到了发展,有了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兵团和丰富的游击战经验。

① Mao Ce-tung, *Nova faza*, str. 70 - 71.

② Mao Ce-tung, *Kineska nova demokracija, Govori i članci*, str. 95. (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5页。——译者注)

因此,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以及后来写的许多文章里,都肯定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前途必然是独特的。“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这种革命,在其进行中,因为敌情和同盟军的变化,又分为若干的阶段,然而其基本性质是没有变化的。”^①

18 在经济上,毛泽东认为这种过渡性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是国家主义和私人占有的混合,认为在这个阶段不仅因为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而且还因为资本主义不够发达,因而不可能一般地反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大垄断资本必须国有化,但同时又必须使中小资本能够发展,因为没有它们,落后的中国的发展是不可思议的。在农村也是一样,根据孙中山的原则,耕者应有其田,也就是说,不剥夺富农,而只剥夺封

^① Mao Ce-tung, *Kineska nova demokracija, Govori i članci*, str. 98. (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页。——译者注)。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另一篇名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中,也做了同样的分析。他写道:“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因此,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Kineska revolucija i Komunistička partija Kine*,引自 V. Teslić, *Kineska revolucija i Moskva*, Beograd 1953, str. 358。[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译者注])

这些观点在《论联合政府》(1945年)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中一再重复。

建土地和大地主土地。“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①

19

我们看到，毛泽东考虑到孙中山的巨大声誉，在许多方面依据了孙中山的观点和口号，特别是他活动后期的观点和口号。但毛泽东也立即指出共产党人对革命的看法同国民党的纲领之间的区别，并且特别强调国民党纲领中缺少的革命后一阶段，即缺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观点。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观念是以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当时的阶级关系和革命发展所处的国际环境的结果。毛泽东创造性地对待当时的问题，并继续反对各种教条主义的和极左的观点，同样也反对斯大林低估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和支支持国民党的做法。

贯穿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路线，主要是同国民党联合抗日的路线，但在这当中，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军队承担了战争的主要重负。蒋介石采取少承担为上的策略，以便保存战争实力来同共产党

^① Mao Ce-tung, *Kineska nova demokracija, Govori i članci*, str. 106 – 107. (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译者注)。这些观点，毛泽东在1945年4月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也重复提到。

人做最后的清算。但是他的算盘打错了。经过几年战争,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恰恰在军事上和思想上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在人民中进一步赢得了声誉和建立了广泛的人民支持网。因此,蒋介石在日本被粉碎之后便开始了新的反革命行动,他虽然得到所有外国帝国主义的军事援助和外交援助(甚至得到苏联的外交援助),却年复一年地遭到接连的失败。

20 这是一次几百万军队的冲突。在这一冲突中,蒋介石军队占有数量上和物质上的优势,但没有道义上和经验上的优势。蒋介石为了中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即为了同外国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不仅威胁着中国广大工农群众,而且威胁着中小资产阶级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发动了反革命战争,这时,毛泽东立即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战士的巨大的道义资本和以团结中国一切进步的民族力量的广泛纲领——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参加了决战。

虽然局势已发生变化,只剩下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了,国民党领导已转入反革命,但革命依然是只有在新民主主义的纲领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到底的。因此,在冲突最激烈的一年,即1947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上做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再一次并且更明确地说明自己关于这一革命阶段的思想。他说道:“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①可见,毛泽东当时描绘的新中国的经济结构,依然符合他在30年代末的想法。按他的意见,这种结构应是:“(1)国营经济,这是

^① Mao Ce-tung, *Današnja situacija i naši zadaci, Govori i članci*, str. 232. (参见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4—1255页。——译者注)

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①

1949年年中，国内战争结束了，反革命被打垮了。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这时有一个明显的差别，那就是共产党人已不是同国民党联合，而是革命的主要领袖了。这就使中共有可能加快速度解决某些问题，有可能彻底消灭大资本和封建地产。为了庆祝这一历史性胜利并纪念中共成立28周年，毛泽东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不长的文章。他向当时尚未承认他的莫斯科伸出了手，从而同意日丹诺夫关于两个世界的集团观点，他基本上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上，而又有差别，那就是把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和农民提到第一位加以强调，并把制度更加明确地确定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

这也是可能的，因为在革命舞台上留下的首先是这些力量，因而有理由得出这样的——一个彻底的和唯一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始终是革命和抗日的主要力量。“‘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此处引文少了‘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一句——译者注）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

21

^① Mao Ce-tung, *Današnja situacija i naši zadaci, Govori i članci*, str. 233. (参见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5—1256页。——译者注)

乱说乱动。”^①

22 在这个公式里,虽然还有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他们已经不被算作主要力量,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特别强调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是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者,不能是主要国家机构的领导者,因为它的社会地位决定它的软弱、缺乏远见和勇气。因此,走过的整条革命道路的最终经验就是实现“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②。

于是,中国踏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但由于一系列困难和特殊的环境,这个过程也必须同样地按特殊的方式来理解。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发表了两篇名著——《实践论》和《矛盾论》。

这两篇著作,不是对这些十分复杂和困难的问题做细致的哲学分析,而是更多地从理论上阐明革命实践本身和把这些原则运用于实践。毛泽东当时提出的批评基本上是针对所谓的教条主义者的,他们是苏联斯大林主义的研究所的出口品,并且由于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地看待马克思主义而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

虽然这是毛泽东写这两篇著作的基本意图,但应当强调指出,在这两篇著作里,卓越的辩证思想家、无与伦比的革命实践家和战略家的思想是明显的,这对中国当时来说,不仅是首要的和最重大的,而且是最迫切的问题。因而,在《实践论》里,毛泽东的基本思想同斯大林的认识论不同,他把实践在极广的意义上理解为人的认识、历史和整个生活的源泉和基础。“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

^① Mao Ce-tung, *O diktature narodnoj demokratii*, Moskva 1949, str. 10. (参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译者注)

^② Mao Ce-tung, *O diktature narodnoj demokratii*, Moskva 1949, str. 16. (参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译者注)

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①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只会一再重复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背熟的思想和词句,而不懂得把深刻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运用到具体和特殊的环境中,他有根据地特别强调实践,强调认识始于实践,并通过理论知识回到实践。这样,毛泽东就能够比斯大林派马克思主义更深刻地理解这个问题,并驳倒对认识过程的静观的解释。“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②

毛泽东在对矛盾问题所做的分析中,也尖锐地反对教条主义和片面的经验主义。他在确定矛盾范畴时虽然不应如此片面地不加区别,把矛盾范畴和差异范畴混淆,但当他重申和特别坚决主张发现以及研究特殊矛盾和主要矛盾,认为每一个过程都是各种矛盾着的关系和趋向的综合时,却是正确的。毛泽东强调,我们的认识是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他写道:“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

23

^① Mao Ce-tung, *O praksi, Izabrana djela I*, str. 257. (参见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译者注)

^② Mao Ce-tung, *O praksi, Izabrana djela I*, str. 268. (参见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页。——译者注)

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①

毛泽东在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不同质的矛盾的同时,特别强调和提醒必须不仅懂得经常发现主要矛盾,而且还要寻找解决不同质的矛盾的特殊方法。

后来在武装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和在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时期,毛泽东又在这些认识和观点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革命经验,对人民内部矛盾做了著名的分析,提出用非行政方法解决各种矛盾,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矛盾。虽然这些分析是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批判性经验之后写出的,但这无疑并不降低其意义,因为这些分析比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任何其他分析要深远些。

^① Mao Ce-tung, *O protivrječnostima, Izabrana djela I*, str. 277 - 278. (参见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0页。——译者注)

第二章 武装革命胜利后的 观念和实践

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胜利,是我们世纪最有影响力和最具决定性的事件之一,革命胜利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在他们的进一步的实践和理论中常常清晰地表现出来。所有这一切意味着,这样特殊的问题和境遇是不可能完全按照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标准、范畴和经验来加以解决的。中国不仅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传统,而且民众对于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个性发展和个人主义都不熟悉,并且今天也是从半个世纪前俄国的不成熟的立场出发来开始社会主义实践的。但是,这也表明,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不可能传播和运用基于欧洲条件而形成的观念和经验,在这方面人们经常会犯错误。

中国是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完成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的,它是一个经历了几个世纪封建统治的,经济上和技术上落后的农业社会。无产阶级只由社会的极少部分构成,而 20 年代末的事态在相当程度上是由革命进程引起的。所有这一切都向我们表明,中国的革命的和民主的传统非常薄弱,因而只能通过革命中人民群众的解放高潮来加以培

26 养,考虑到无论是何种战争,也包括解放战争的军事条件,如此培养起来的民主传统就有局限性。如果一个持续了整个20年代的革命解放了千百万人的能量,那么就会发展起人民的觉悟,灌输一种对领导力量的信任——这没有任何疑问。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如此长时期的战争在领导干部之中发展了其一种战时的心理,行政命令式解决问题的习惯,以及对等级结构的敬意,这些都有助于形成后来的国家的和党的机构的官僚化。

中国遭遇的进一步的困难是帝国主义力量,首先是美国的封锁,它采取所有可能采取的措施去阻止这一革命进程,并期待使其已经落伍的代理人蒋介石或迟或早能够控制整个中国,它把蒋介石安置在台湾,却赋予他在联合国中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直到1971年才得以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如果我们对此再加以补充,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不正常的关系,即斯大林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带有霸权主义倾向的政策,最后还有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进一步增大而不是减少的巨大鸿沟——那么,我们就至少列举了审视和解释中国革命进一步发展所必须考虑的一些最重要的因素。

在上述复杂的条件下,党的领导也不可能考虑经济和思想的内在的逐步成熟的进程,而是不断地采取措施加快这一进程。在那样的努力中,很难看到一种主观的行为与急功近利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的分界线——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在5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的第一批措施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加快推进农业集体化。这种行政措施总是容易导致一些明显的矛盾,以及党和国家机关的官僚化,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在自己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中尝试着在理论上加以确定和解决。最具理论特色的是毛泽东强调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不仅存在着对抗性矛盾,也存

在着非对抗性矛盾。^①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关于社会主义结构本身的矛盾的学说。“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关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②

毛泽东强调,为了解决不适应性的因素,必须扫除官僚主义,加大力度改善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按照正确的和特殊的办法解决每一矛盾。考虑到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毛泽东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只通过行政决定让其他人相信他们的立场和理论,而且要进行思想斗争。“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③

依据这样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毛泽东在50年代后半期就表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理论。对此,毛泽东揭示了任何行政命令都无法展开的范围和理解。“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

^①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O ispravnom tretiranju suprotnosti u narodu*, Dodatak Tanjugovom biltenu od 19. VI 1957, str. 2.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译者注])

^② Mao Ce-tung, *O ispravnom tretiranju suprotnosti u narodu* (Govor Mao Ce-tunga na XI proširenom zasjedanju Vrhovne državne konferencije od 27. februara 1957.), Dodatak Tanjugovom biltenu od 19. VI 1957, str. 10.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译者注)

^③ Mao Ce-tung, *O ispravnom tretiranju suprotnosti u narodu*, Dodatak Tanjugovom biltenu od 19. VI 1957, str. 22.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译者注)

28 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①

正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宣布“百花齐放”的方针,目的是为了激发全体人民建设国家。然而,成果并不显著,在那不久之后,就开始了另一个措施,发动群众开始了“大跃进”(1958年)。全中国都为在农村(以及一些城市)彻底建立人民公社的战役而激动不已,这是通过消灭私有制、集体劳动和平等分配来实现的。这一运动具有非常鲜明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特征,这可能是有意识地追求整体发展的急躁病所导致的结果,但是,同时也是由于幻想可以在这种落后的国家实现马克思关于发达的共产主义的设想(而没有考虑到马克思是依据已经发展了的公民的个性,以及关于共产主义条件下个体的分化的设想而做出的构想),因此,整个运动遭遇了挫折。我们这里不去考虑由于这一努力而进一步加重的灾荒年,整个这一运动过分强调了主观因素,这种努力由于低估了客观的条件和可能性的制约而令人遗憾地转变为冒险。

在庐山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第八次会议(1959年9月)已经可以确证这样的结果,并且开始了“国民经济调整”的政策,在公社、私有财产等方面具有很多妥协性成分。由此毛泽东辞去了共和国主席的职务,而只是担任党的主席。所有这些事态,以及国际舞台矛盾的加剧,使得党的高层的旧有矛盾尖锐化,对此我们后面还要提及。两种不同思想的这一内在冲突成为后来几乎是出乎人们意料的事件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这些事件使得关于不断革命的命题获得了理论的合理性,在国际领域则是关于“贫穷的农村”和“富有的城市”的命题,

^① Mao Ce-tung, *O ispravnom tretiranju suprotnosti u narodu*, Dodatak Tanjugovom biltenu od 19. VI 1957, str. 21 - 22.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译者注)

指责积极的共处政策,同苏联展开激烈的冲突。^①

中国同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冲突由来已久,虽然最激烈的冲突是在赫鲁晓夫时代到来的。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与斯大林之间没有过特别积极的体验,但是在那些年中几乎每个人都感到奇怪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南斯拉夫抵抗苏联的斗争,以及南斯拉夫共产党观念表达出不友好的关系,并且在苏共二十大已经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了批判之后还对斯大林进行无理的辩护。然而,不考虑漫长的过去,可以确证,毛泽东和中国关于当代历史进程的理解在许多方面与斯大林的理解是一致的。并且,他们是世界的这一阵营的激进的代表,在社会主义阵营本身被视作社会主义的保证。他们甚至不仅是使由不发达国家争取解放的战争引发的矛盾尖锐化的代表,而且也是这些运动的激发者。他们首先把美国视作当代帝国主义的主要支柱,并且排除了任何与它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同样,在国内发展中,他们是国家权力的代表,拒斥各种关于经济激励的想法,因为他们担心会出现过大的经济差别,出现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导致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分化。正因为如此,当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批判地分析斯大林主义时,中国的领导者们站出来替斯大林辩护,主要不是因为这种批判在他们看来会导致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一种妥协,而是因为这在社会主

^① 关于在共处和战争问题上中国的立场问题,可以参见卡德尔(E. Kardelj)的成果《社会主义与战争》(*Socijalizam i rat*, 1960),在这里从多方面探讨了当代中国关于这些问题的立场。关于这一问题参见Stuart R. Schram, *Die permanente Revolution in China*(Frankfurt a. M. 1966)。我想强调的是,关于中国的最新事态很难得出更加确定的结论,因为文献还是不够充足。

义内部开始了一种与中国的理解完全不同的东西。^①

30 50年代初,南斯拉夫在不仅为了维护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为了维护民族的生存而进行的紧张的和戏剧性的斗争中宣布,积极的与和平的共处政策是当代世界能够使全世界避免总体性灾难的唯一道路,任何人都没有权力阻止任何民族采取任何手段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战斗。而当南斯拉夫首次宣布,结盟政治按其本身的存在和变化逻辑必然会导致不同阵营的冲突时,中国领导人毫无理由地把这种立场解释为是对社会主义的削弱,以及对历史的错误状况的满足。他们,以及社会主义阵营中所有其他追随者,都只是认为,其他国家的内部的革命力量已经不值得相信,这种观点显然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也正在那个时候,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处于困难的和不利的条件下,还是开始建立工人委员会,实行社会自治,就在这个时刻,中国领导人加剧了批判南斯拉夫的战役,宣称南斯拉夫成为一个

^① 参见《关于斯大林问题》(*Zur Stalinfrage*, 13. sept. 1963)。中国领导人站出来为几乎整个斯大林活动时期进行辩护。除了其他观点,这篇文章特别强调:“斯大林在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的一系列理论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Zur Stalinfrage*, 载论文集 *Die Polemik über die Generalinie der internationalen kommunistischen Bewegung*, Peking 1965, str. 136. [参见《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3年9月13日。——译者注])“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Zur Stalinfrage*, str. 137)而涉及30年代的问题时,文章也只是承认一些远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斯大林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1937年和1938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Zur Stalinfrage*, str. 137)并且最后强调:“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Zur Stalinfrage*, str. 138)

资本主义国家,而“铁托集团”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①

南斯拉夫问题的特别尖锐化是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领导人方面对于南斯拉夫政策的变化而引起的。尽管有1957年和1960年各国共产党的会议上对南斯拉夫的谴责,但是,在那不久之后,苏联领导人也无法再坚持在那以前的不可行的和不合理的立场。^②

由此,对积极的和平共处原则的采纳、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承认,以及努力把控冷战政治等,就与中国的立场的分歧越发明显和深刻。60年代初发生了苏联从中国撤走专家,中断了技术和经济援助,并相互发表公开信和相互指责。对中国人而言,苏联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是最主要的修正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主义者。由此,对中国领导人而言,革命和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中心已经由发达的

① 参见《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Ist Jugoslawien ein Sozialistischer Staat?* 26. sept. 1963)。(见《人民日报》,1963年9月26日。——译者注)这篇文章试图表明,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修正主义者,而且他们出卖了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因此南斯拉夫成为美帝国主义用来破坏俄国革命的特别舰队。不必说这种立场的滑稽可笑,也不用进行辩驳。只要说明这样一点就足够了,可以确切地和充分地想到,或者非常简单地说,南斯拉夫发展中存在着某些不合法的行为或者困难,对此南斯拉夫自己的出版物也加以描写剖析,把这些问题一般化到整个制度是幼稚的。这个小册子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说明在对于发生在不同的历史和民族条件下的特定历史事件的评价中,马克思主义研究可能限于窘境,这需要特别的谨慎。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条件中,蕴含着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同时也是它的困难和当前的局限性,可以看到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进展。

② 我们在这里无法深入分析这一变化所引发的所有情况。只要提及其中一些主要之点就足够了:南斯拉夫的自治和民主发展的进程,至少对于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而言,是不可掩盖的;众所周知,南斯拉夫奉行不结盟和独立自主的政策,同时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同南斯拉夫的敌对的政策自然会在与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引发困难;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的内部发展同样面临着经济改革和社会生活民主化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同样,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对于苏联而言意味着军备负担的明显减轻。

地区向不发达地区转移,而中国是革命的中心。^①

32

毫无疑问,在这20年中,不发达国家的阶级冲突加剧和剥削问题又进一步表现出来,这些国家或是从数世纪的殖民地的被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或是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直接的和残酷的封建的或资本主义的剥削。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命运在于这些革命运动,也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像一个阶级那样对抗发达国家。贫穷、社会歧视和无权力感总是革命的主要的不满;但是,对于发达的社会主义而言,前提是人的丰富性和发达的个性到达一定的水平。

国际层面上的这些冲突也会在国内的关系中留下痕迹。根据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中国领导人也主要依据关于斯大林个人的和阵营的政策的评价。然而,60年代中国由于过分的激进主义和关系紧张所导致的对外政策所遭受的挫折,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灾难,导致了中国党内分歧的加剧。这些分歧被很小心地掩饰住,尽管从国内战争和革命时期就一直存在。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所维护的流派一直倾向于妥协政策。这一点在战后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那时肯定是在苏联关于局势的评价的影响下,反对对抗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维护妥协政策,并对政权进行分割。由于毛泽东在那一历史时期的判断取得了革命的历史性胜利,因此内部反对派没有任何理由进行反对。但

^① 参见 *Brief des ZK der KPdSU an das ZK der KP Chinas* od 30. marta 1963; *Ein Vorschlag zur Generallinie der internationalen kommunistischen Bewegung* od 14. juna 1963. god。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探讨这些谴责。说明这一点就足够了:中国人指责赫鲁晓夫及苏联领导人背叛了社会主义运动,宣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堕落的资产阶级文化,打着和平共处的旗号与美帝国主义签署了条约,暗中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这样,中国人同时断定,在苏联人民与特权的官僚阶层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一官僚化的主要倡导者正是斯大林,他们竟然激烈地替他辩护。进而中国人断言,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矛盾”。关于中苏关系参见以下文献:D. S. Zagoria, *The Sino-Sowjet Conflict*, 1956 - 61, Princeton 1962; Heinz Brahm, *Pekings Griff nach der Vormacht, Der chiesisch-sowjetische Konflikt von Juli 1963 bis Marz 1965*, Köln 1966; J. Baby, *La grande Controverse sinosowjetique*, 1956 - 1966, Paris 1966。还有中国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献文集 *Die Polemik über die Generallinie der internationalen kommunistischen Bewegung*, Peking 1956(在这本文集中也发表了苏联的公开信)。

是,当毛泽东试图通过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政策重新加快革命变革时,当实践证明这样的做法具有一系列消极的后果时,党内的冲突就开始重新恢复起来。这些在我们上述所提到的中国在国际政治关系方面所受到的挫折时就出现了,这些挫折在那个时期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从其他共产党国家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中孤立出来。

33

同时也表明,战后赫鲁晓夫的新领导基本上依旧坚持自己的国际政治理念,这使毛泽东和他的团体面临着明显的两难:或者是放弃自己到那时为止与帝国主义对抗的立场,而主要通过使第三世界的国家进行革命,反对国内外帝国主义,首先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从而引导世界革命进行到底;或是始终不渝地坚持到那时为止的关于世界革命和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念。在国内的平台上,两难表现在:或是继续坚持推行国家的继续革命的变革,这将以群众为基础推动社会关系和政权的进一步重组;或是通过传统的工业化、国家的—官僚制的计划管理和发展,来转变到那时已经众所周知的发展状况,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抑制群众的积极性。

毛泽东的反对派集团的第一次失败是彭德怀被撤职(1959年),并由林彪接替他的位置,毛泽东对于林彪完全相信,通过他可以在进一步的党内斗争和社会变革中确保对军队的掌握。毛泽东为了继续坚持上述的政策,就不得不坚持反对自己的执政党内的大多数。因为,正如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国家的进程表明的那样,党已经逐渐与国家机器合一,成为强有力的官僚机构,成为所有的重要的,通常也包括不重要的决定集中的中心。这一机构,特别是在其顶层,直接受刘少奇主席、邓小平总书记的影响,并且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希望发动群众,特别是发动城市的和农村的青年人,以及一部分党的领导干部和部队干部作为最重要的依靠。整个那一革命表明,毛泽东是一个天才的军事家和战略家。这一点也表现在统治阶层的力量关系的建构,也表现在对于一种在建设国家的和平条件下尚

34

属空前的群众运动的引领中。开始于6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规模的群众串联，特别是年轻人的串联，展开了“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与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之间的冲突，并且经常出现对个人的迫害和强制性的自我批判，出现了对毛泽东的狂热的追随者和偶像崇拜——这一切经常导致濒临社会灾难的边缘。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而且事实表明，整个行动都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所掌控。^①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最重要的是1966年八月的会议，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委员会以“十六条”的形式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毛泽东的反对派被定性为鼓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对他们进行公开的批判，特别是在“大字报”上进行批判。基本的命题当然是依据毛泽东的观念，在他的立场中寻找问题的答案。因此，重心放在群众身上，而不是放在党和国家机构之上，依赖可以在那一革命实践中经受教育的群众。强调必须特别坚持党的阶级路线，毛泽东认为，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并且也不必担心会出现混乱。对于现存的矛盾，需要在人民当中来加以解决。在群众中存在各种不同的想法和分歧是十分正常的，这些分歧应当通过讨论加以解决，因此，不应当嘲笑少数人，他们有不同的想法，不能强制人们改变自己的思想。少数人可以维护自己的观点，因为真理常常在少数人手中。要特别强调领导干部以及他们对于正确的和错误的行为加以区分的重要性，特别强调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应该能够

^① 关于中国的最新的事态和“文化大革命”，可以参见以下文献：Joachim Schickel, *Dialektik in China. Mao Tse-tung und die Grosse Kulturrevolution*, Kursbuch 9, Frankfurt a. M. 1967; Giovanni Blumer, *Die chinesische Kulturrevolution 1965/67*, Frankfurt a. M. 1968; Klaus Mehnert, *Maos zweite Revolution* (包括1966年中国的有关文献), Stuttgart 1966; E. Collotti-Pischel, *La Cina rivoluzionaria*, Torino 1968; K. S. Karol, *La deuxième révolution chinoise*, Paris 1973; 以及1966和1967年在北京出版的一些小册子。 *Die Grosse sozialistische Kultur-revolution in China*。

不断地组织群众,应当实行选举制度,并以巴黎公社为榜样,拥有对官员进行批评和撤换的权利。只要引证一下《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第九条提纲就足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①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继续规定了关于教育体制、教

^① *Beschluss des ZK der KP Chinas über die Grasse Proletarische Kulturrevolution* (8 august 1966),引自 G. Blumer, *Die chinesische Kulturrevolution 1965/67*, Frankfurt, a. M., str. 181 - 182。(参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人民日报》1966年8月9日。——译者注)

学改革、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特别防止资产阶级对于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公职人员的影响,以及把“文化大革命”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问题。《决定》同样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并且使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而这意味着部队的革命进程不能放任自流,以防止意外情况出现。十六条决定强调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这样一来,十六条决定虽然是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通过的,但是,它的确构成了反对党和国家制度化的力量的行动的充足的基础,这些观点在根本上是毛泽东关于国际领域和国内领域的政治的理解。为了使群众对当时的政权的批判进程更加强有力,中央领导于1966年9月做出关于继续使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方法的决定。这样就为群众运动和通常具有无情的和粗暴的形式的公开批判的充分发展敞开了大门,这在根本上只是与一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相联系,这种社会结构和心理与我们欧洲的社会结构和心理完全不同。贬损一些当时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最重要作用的人物是经常的现象;同样,还对许多文化成就持粗暴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在一种盲目的狂热中把这些文化成就作为资产阶级的产物而抛弃。

37 对于“文化大革命”和社会变革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是发生在上海的事件。在1966年12月,上海的一个工人组织,即坚持十条规定的工人团体(Deset tačkaka radničke manjine)就发表公告,强调需要遵循十六条的纲领,特别涉及到促生产,要与大学生、中小學生、工人和农民联合,并且相互教育,禁止宣传资本主义观点。然而,除了十六条,还要求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意义上,警察可以禁止任何反对毛泽东、林彪和“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人。这样的要求无论如何是不同于1966年末党中央和政府的民主宣言的。

此后不久,1967年1月初,发表了《紧急通告》(*Hitni apel*),呼吁

所有到全国其他地方交流革命经验的工人、公务人员、学生立即返回上海,以保证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能够胜利进行,并且能够完成1967年的生产计划;在这个呼吁中,取缔了所有放弃工作岗位进行经验交流的做法;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充分强调和要求联合大学生、中小學生、工人和农民;禁止占领公共建筑,没收资本家的房屋,作为全体人民的财产,用于行政管理用房;强调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逮捕那些反对毛泽东和他的领导小组的人。公告最后强调,所有反对上述要求的人都被视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者,都将受到惩罚。^①

毛泽东当然宣布上述文件是进一步推进运动的样板。在上海本身,还总是展开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激进追随者与党的机构之间的斗争,通过“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的冲击,原有的政权垮台了,建立起新的政权,叫作上海市“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新的政权组织由来自革命造反派、党的领导干部和军队领导干部组成。此后不久,党中央报刊的社论就指出:“毛主席提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者缺一不可,忽视或者低估那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错误的。”^②

这样,最终创造出一种新政权的规范,这同时也意味着原有的党的权力形式被限制和不再存在。刘少奇的路线被摧毁了。虽然斗争还在继续进行,虽然还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使新的政权形势渗透到全国各地,毛泽东的反对派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

^① 参见 *Punkte der Arbeiterminderheit (Dezember Schanghai) i Dringende Bekanntmachung* (9. I 1967), in Giovanni Blumer, *Die chinesische Kulturrevolution 1965/67*, Frankfurt a. M. 1968, str. 254 - 259。

^② *Über die revolutionäre “Dreierverbindung”*, “Hongqi” br. 5, 1967, in Giovanni Blumer, *Die chinesische Kulturrevolution 1965/67*, Frankfurt a. M. 1968, str. 382. (参见《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译者注)

这些进程在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引发了各种极为不同的反响。尽管时至今日关于这些事件我们依旧很难更确切地表述些什么,因为许多方面的资料依旧不充分,但是,关于这些事件的一些反应和批评还是很有特点的。马克思主义者很难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而不依据某些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运动及进程的模式和观念来解释某些历史事件。同样,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评价一些与他们的经历和环境完全不同的欧洲事件时,也无法加以解释。再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在反对欧洲制度化的政权或者欧洲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的青年一代的骚动中,也有人认为,中国的革命方法可以原封不动地运用到我们的情境之中。

39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涉及到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水平上和不同的结构之中的非常不同的进程。由于这一点,不仅中国在这一阶段的一些我们不可接受的方法,而且这些进程的内涵,在今天都可能适合于他们的条件,但是,这些都尚未经受过历史的检验。

不应当忘记,这一运动并不是群众的自发的进程,更完全不是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虽然这一运动带有自主倡导和自发的特征),相反,这一进程一直是被发动的,而且在根本上是牢牢掌控在一部分领导人手中的,这一运动不仅具有开始的标志,而且在特定的时刻可以确切地结束,而不考虑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的想法和意愿。这一事实在中国的目前发展阶段无论如何无法减少。但是,不应当忽视的是,中国的这种进程只有在特定的前提下才会发生,而这对发达的欧洲而言是完全不适合的。狂热的群众运动方法、毛泽东的个人神化、在长达数小时的群众大会上对一些人物进行公开的羞辱并且要求他们做自我批判,或者让某个人带着侮辱性的招牌游街示众,等等,这些对于发达的欧洲的社会主义的或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而言,是不可想象的。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即使在最严酷的革命冲突中,也不可能否定欧洲数世纪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在这些成就中所包含的个性的

尊严和自由是未来每一个进步发展的基点和轴心。

从另一方面来看,不考虑关于中国的观点和方法的分歧,在关于这些事件的命运的评价方面,我们也不敢陷入中国人在评价我们的事件时所犯的那种错误。关于这样强调的理由,我们已经谈论过,在这里不必再加以强调。这是关于国际形势,以及他们的民族的进一步的革命进程的两种不同观念的冲突。毛泽东无法控制住自己的反对派(如果不愿意像斯大林所做的那样,对自己的反对派使用政治暴力和肉体消灭——在这种意义上,他们的方法存在很大的不同),而又不允许对党和国家权力的等级制的—官僚制的结构进行一般的打击。因此,那些运动的实质是要摧毁旧有的权力结构。因而,合乎逻辑的是认同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与此相反,反对的潮流主要依赖到那时为止的结构,而对于进一步的发展进程则更多的是按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验的精神来理解的,这些国家主要依赖于国家和党的机构,而不关心群众参与社会主义进程的直接管理。

40

然而,中国离消灭阶级结构和消灭分工还相差甚远。而只要存在着这样的条件,官僚制的和等级制的结构就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无法直接纠正官僚化问题,或者甚至无法参与直接的管理。这样,中国就应该,并且必须把下列事情放在第一位:进一步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关系,参与世界市场竞争,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生产力,改善自己的人民的生活条件,并且不得不发展主导性的专业化的和政治的机构,这一机构在依旧存在着劳动分工的条件下可以区别于那些依旧被束缚在体力活动中的团体和社会阶层而有效地行使主导的功能。而这构成了党和国家机构官僚化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人是否能在自己现有发展水平上,在尚不能消灭劳动分工,以及群众的文化和专业水平依旧比较低的情况下,通过新出现的权力机关,有效地抑制官僚化和等级制——这个问题不完全取决于中国革命力量的意愿。

但是,随着国家越来越发达,随着所有关系越来越复杂,关于“文

化大革命”最新的历史演化的看法将会越来越含糊不清,而且对整个体制而言会越来越危险。当现今的新关系进一步稳定,专业化队伍——既包括政治的也包括科学的——将掌控越来越复杂的社会进程的领导权。新的权力形式能否坚持住持久地改进制度化,纠正官僚化的蜕变——这些将会在未来几年的发展中很快地显示出来。

第三篇 马克思主义 在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在西德

西德战后的局势无论如何都不利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法西斯的现代野蛮行径使它最优秀的思想家们四散于世界各地,许多人甚至在集中营里死于非命。^① 这一虽然短暂,却是严峻和反理智的时期,在某些最重要的文化领域,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留下了一片真正的荒漠。但是,即使是战后时期,由于德国被划分两半,由于冷战和当时领导的明显的反共主义,以及由于恢复正常生活初期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也未曾为造就一代马克思主义的新人提供什么有利的条件,在大学里尤其是这样,在最初时期,马克思主义派出身的理论家根本不能在大学里活动。

这种情况甚至一直延续到最近时期,虽然局势已经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领域的重大成果是由战前就或多或少已经著名的思想家取得的,首先是由被称为法兰克福团体或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取得的(霍克海默[M.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 Adorno]在战后回到法兰克福并继续在大学和社会研究所工作),其次是由多半是在美

^① 正因为这个原因,尽管赫·马尔库塞和埃·弗洛姆时至今日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墨西哥,我们仍把他们归入本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原是德国人,并且早在1933年以前就在德国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

44 国和墨西哥活动的马尔库塞(H. Marcuse)和弗洛姆(E. Fromm),以及一度认为在东德的斯大林主义制度下自由的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也能得到发展的恩·布洛赫(E. Bloch)和列·科夫勒(L. Kofler)取得的。

然而,这些思想家们为他们的朋友和战友,马克思主义者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 - 1940)已不在人世而感伤。本雅明战前主要是在文化界小圈子里为人所知,在20世纪50年代特·维·阿多诺及其同事所编的书(《本雅明著作集》第1和第2卷,1955年德文版^①)出版以后才为广大的舆论界所熟悉。

本雅明是一位感情十分脆弱和细腻的思想家,他的广泛的文学爱好和精细入微的分析,对他的朋友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影响,在这些朋友当中也有布洛赫、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许多人。本雅明在一些通常论述文学艺术哲学的文章中(特别是在《德国悲剧的起源》[*Porijeklo njemačke tragedije*]、《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Umjetničko djelo u vremenu kad se može tehnički reproducirati*]或者《暴力的批判》[*Prilog Kritici sile*]等著作中)不仅在细节描述方面,在对个别现象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和做出意想不到的观察方面,而且在理解历史现象方面显示出巨大的才能。这种把一定现象同历史基础联系起来的才能,在他论述艺术作品的复制或论述总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感性观察时一贯得到表现。而这种才能同时又最好地说明他在分析文化历史现象时在何等程度上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历史赐给像本雅明这样的思想家的命运是无情的。起初,本雅明在法西斯上台之前流亡法国。后来他同一批流亡者打算经西班牙去美国,在西班牙的边境上,眼看有被送回到处在法西斯铁蹄下的法国

^① 后来又出版了两卷选集(也收入了第1版的许多著作):《启迪》(*Illuminationen*, Frankfurt a. M. 1962)和《新奉告祈祷者》(*Angelus Novus*, Frankfurt a. M. 1966)。参见《论瓦尔特·本雅明》(*Über Walter Benjamin*, Frankfurt a. M. 1968),该书收有泰·阿多诺、恩·布洛赫、M. 里舍尔(M. Rycher)、G. 朔莱姆(G. Scholem)、J. 泽尔茨(J. Selz)、汉·海·霍尔茨(H. H. Holz)和恩·费舍(E. Fischer)等人有关他的评论和回忆文章。

之虞,瓦·本雅明,这位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便自杀了。

一、恩斯特·布洛赫

45

从研究的课题、注意到的问题,以及哲学研究的风格和方式来看,恩·布洛赫(1885—1977)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从自己的第一部篇幅较大的著作《乌托邦精神》(*Duh utopije*, 1918年)起,布洛赫就已经注意到乌托邦现象、乌托邦和希望在人塑造自己的历史生活中的意义,因而这一直是布洛赫在哲学上最关注的课题。在《希望的原理》(*Princip nada*, 3卷本,1954—1959)这部巨著的论述中,这种关注获得最为全面的表现。

从最早的一些著作起,布洛赫就已经不仅批判地对待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而且也批判地对待经历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各种变形的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表现;此外,布洛赫还一贯致力于研究人,尽管他力图给人设定一个独特的实在范围。但是,人的课题(它在乌托邦现象中也特别地得到表现)仍然是基本的课题,正因为如此,他才如此明显地追求马克思的独创的人道主义思想。^①

乌托邦这个问题,是人的实质问题。在这当中,布洛赫并没有把

^① 《这一时代的遗产》(*Erbschaft dieser Zeit*, 1935)这部著作阐述了对资产阶级文化的继承和在方法论上应采取的态度。《作为革命的神学家的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 als Theologe der Revolution*, 1921)和《自由和秩序》(*Freiheit und Ordnung*, 1946)阐述了乌托邦的基本问题。至于“乌托邦的”这个概念,应当把它同“空想主义的”概念明确区别开来。“仍然应当把空想主义同乌托邦区别开来:前者只是直接抽象地设想可能情况,以便能完全在头脑里去修改这些可能情况;后者无论如何还从外部考虑一些可能情况。在这当中,空想主义本身,即凌驾于现实之上去把握的抽象,当然也不必在某种纯粹经验的东西面前,即在仅仅以另一种方法在现实之下去把握的抽象面前感到尴尬难堪。只能从适当的立足点上对乌托邦进行批评,而不能用事实上的爬行去衡量,更不能用事实上的爬行去代替凌空飞翔。‘某种乌托邦的东西’——这在自以为特别精明的商人的口中是贬义,但这表明他们本来完全是坐井观天或对未来怀有恐惧。但是,正因为如此,必须从根本上把抽象的乌托邦同那些正在变得具体的乌托邦区别开来。”(E. Bloch, *Tübingenski uvod u filozofiju*, Beograd 1966, str. 115)

乌托邦设想为“空中楼阁”，虽然这一因素在人“对未来的幻想”中也是经常出现的，而是设想为“具体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是历史的人的实质。乌托邦和希望是无所不包和包罗万象的，因此，布洛赫把自己的这个基本的哲学主旨贯穿在整部主要著作中，指明乌托邦现象存在于人们的一切表现形式之中，如政治乌托邦、艺术乌托邦、技术乌托邦等等之中。这部著作的价值正是在于：它只在一个方面——乌托邦方面，就能对人的创造性做出如此全面的分析。因此，“过去、现在以至将来也存在的哲学的基本命题，应当是尚未生成、尚未取得的诞生地，是在新旧事物之间的辩证的—唯物主义的斗争中建立和形成的”^①。

布洛赫首先关心的是揭示人的存在的时间结构，即人的存在的本质。布洛赫从人身上揭示本能的总和时，没有给任何一种本能以优先权，而认为人具有许多基本冲动，时而这些冲动，时而那些冲动得到更强烈的表现。而从消极的激情和积极的激情，即恐惧和希望来看，最重要、更为人所固有的期待激情是希望的激情，因为否定的期待激情，即苦闷和恐惧是消极的。“它们表现出来的恰恰是一些自我毁灭和虚无，其中，最后还掺有纯粹消极的激情。希望，即相反的一种期待激情，与苦闷和恐惧相反，是一切内心激动中最具有人性的、仅为人所固有的，从而同时又关联到最广阔、最明朗的地平线。”^②

布洛赫由于发现和分析了这一人的存在原则，就与海德格尔(M. Heidegger)的存在就是烦和忧郁的存在主义观点发生内在的对立。与存在主义者的人的忧郁的存在相反，布洛赫实际上发现了人的本质的

^① E. Bloch, *Das Prinzip Hoffnung*, I Bd., Berlin 1954, str. 19.

^② E. Bloch, *Das Prinzip Hoffnung*, I Bd., Berlin 1954, str. 88. 此外应该强调指出，布洛赫是以自己关于人和历史的观点对抗广为流行的人的本性不变的观点，因此，特别是在《自然权利和人的尊严》一书中，他同从古希腊的哲人到卢梭(J. J. Rousseau)的关于人的本性的形而上学的假定划清界限。他认为：“人就其素质和根据来说是一个X，就其历史的—道德的规定性来说总是社会关系的产物。”(*Naturrecht und menschliche Würde*, Frankfurt a. M. 1961, str. 219)

更为人性、更为根本的范畴,即这样的规定,这些规定恰恰也指出往往只是非人性的生活获得人性“表现”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希望,作为向未来开放的态度,作为 *docta spes*,即被理解了的希望,如果只是普通的自发的乐观主义,那是没有意义的。“自发的乐观主义,对于每个比较根本性的决定来说,所含的毒素并不亚于绝对的悲观主义。”^①这就是说,后者为公开的反动服务,目的是使人意志沮丧,前者为隐蔽的反动服务,目的是使人容忍和消极。实际上,希望是指“战斗的乐观主义”而言的,通过它,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不是去实现任何抽象的理想,而是去解放新的更富有人性的共同体的种种因素。在今天,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坚定性,是主观因素与经济物质趋向的客观因素相结合的坚定性。

正因为如此,实践这个范畴在布洛赫的著作中也占有中心的哲学地位,布洛赫同时也显示出他是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这个时期马克思的其他思想的最深刻的解释者之一。“这里,具体的决定始终处在反对静止的斗争中,但由于具体的决定不是暴动主义,而是战斗的,同样也是有根据的乐观主义,因此,它同那个破坏着僵死和静止的过程和平相处。人和过程,更确切些说,主体与客体,在辩证的物质的过程中因而也以同样的方式站在前沿(*front*)。同时,对战斗的乐观主义来说,除了前沿范畴所开辟的地方之外,不存在任何别的地方。这种乐观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地理解的希望的哲学本身,作为上述非熟思的东西的知识,研究历史最前列的片段,而且还是在研究过去的时候,也就是说还是在过去中研究尚未现实的未来的时候。因此,被理解的希望的哲学,按其规定来说,处于世界过程的前沿,也就是说,处于运动着的、乌托邦所揭示出来的物质很少被深思过的最前列的存在片段。”^②

主体,即人,是前沿中本质的东西;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

① E. Bloch, *Das Prinzip Hoffnung*, I Bd., Berlin 1954, str. 217.

② E. Bloch, *Das Prinzip Hoffnung*, I Bd., Berlin 1954, str. 218.

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社会化了的人类(马克思语)。因而布洛赫认为,“人性”在每个社会里并不是作为内在的、无声的共同性存在着,而是正处于艰难的过程中,只有到共产主义才能达到。人道主义这个珍贵概念,只有在无产阶级立脚点中才获得其真正的地位,并且,“社会主义愈科学,也就愈具体地把关心人当作中心,也就愈具体地把切实消灭自己的自我异化当作目的”^①。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过去(更不必说现在)并不是古董的排列,因为历史不是普通的博物馆。对过去的片面解释,使每门科学失去了未来,而在具体生活中则使资产阶级科学家产生最不科学的阶级意识形态的偏见。这种对待过去的片面态度,在现在中只看到疑团,在未来中只看到未定形。因此,辩证的-历史的、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是以行动为目标的、中介性的未来科学。“只有未来的地平线(如同马克思主义所占领的)同作为前庭的过去的地平线一起,才使现实具有它的实在的尺度。”^②

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的中心点是劳动的人,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全部十一条提纲就宣称,社会化了的人类连同中介的自然环境乃是作为诞生地的世界范围。世界是对某种东西的倾向,是对某种东西的趋向。只有抛弃了闭塞的、静止的存在概念,希望的真实的、原来的尺度才能显露。如果说存在可以从自己的“来路”去理解,那么它同样也可以从“去向”去理解。决定意识的存在和对存在加工的意识一样,归根到底只能从它的去向和目的去理解。“热望、期待和希望需要自己的释义学,在我们面前存在的东西的微明要求有其特有

^① E. Bloch, *Das Prinzip Hoffnung*, I Bd., Berlin 1954, str. 287. 布洛赫把人的异化已被消灭这种历史状况称为“诞生地”。布洛赫说明了马克思的著名原理,并以下述观点结束了自己的主要巨著:“真正的创生不是在开端,而是在终结,而只有当社会和存在发生根本变革时,也就是当涉及根基的时候,创生才开始。而历史的根基是改变和征服现状的、劳动的即创造的人。当他在没有外化、没有异化的真实民主制中认识了自己和创立了自己时,世界上就出现某种照耀着处于童年的整个人类和还没有人到过的地方:诞生地。”(*Das Prinzip Hoffnung*, III Bd., Berlin 1959, str. 489)

^② E. Bloch, *Das Prinzip Hoffnung*, I Bd., Berlin 1954, str. 310.

的概念,新奇性要求有自己的前沿概念。而这一切都服务于这样的一个目的:通过可能性的中介王国,使一条通向必然被想象到的东西的主要道路,终于能批判地铺设出来,并且目标明确,一往无前。被理解了的希望,恰恰明确表达了世界上不再离开这种希望的一个原则的概念。之所以不离开,是因为这个原则从来就存在于希望的过程之中,尽管它在哲学上是如此长久地被忽视了。既然根本不能自觉地创造历史,在历史的具有趋向的道路上,目的同样也不是一切,那么,乌托邦的—原则的概念,像希望和符合人的尊严的内容这些概念,从其最好的意义上说,在这里绝对是中心的概念。这个概念所表示的东西在已经展开,而且还继续展开的地平线中同正在产生的意识相适应。对尚未产生的可能性的期待、希望和向往,这不仅仅是人们意识的基本特点,而且,当它被具体而正确地提出和了解时,也是整个客观现实内部的基本规定。在马克思之后一直至今,根本没有对真理的任何可能有的探求,根本没有任何关于决定的现实主义态度,它能够回避世界希望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内容;有的只是陈词滥调和钻死胡同。哲学将具有关于明天的良心,对于未来的党性、希望的知识,或者将不再有任何知识。”^①

49

机械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即作为一种从世界本身来对世界所做的解释,是正确的。但是,当机械唯物主义把世界看成是不完整的和狭隘的世界,认为世界处于无目的的运动、循环的运动之中,处于始终被同一条必然性锁链所制约的产生和消灭中的时候,它就不正确了。这样的世界,就不是具有作为进步泉源的矛盾存在的世界了,就不是具有更美好的生活、具有人成为人的生成过程、具有对我们有益的物和具有发展与进步存在的世界了。因此,“如果辩证唯物主义不是哲学的,即跨进十分开阔的地平线的话,那么它将不成其为辩证唯物主义。这种跨进开阔地平线的活动,是反对异化的理论和实践活

^① E. Bloch, *Das Prinzip Hoffnung*, I Bd., Berlin 1954, str. 16 - 17.

动,也就是争取外化的外化、争取诞生地的出现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在诞生地,人和世界的内核或本质的东西终于能够开始表现出来。而且正是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方和我们的最终会产生自由内容的王国之中。迄今的史前史,虽然对事情并无意识,也导向这里,但是,自觉创造的历史,在经常被思索到的、间接预测到的自由王国的全部内容上,占有自己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主题”^①。

50 对布洛赫来说,存在着三个范畴:前沿、新奇性(novum)和物质,这些是辩证过程的中心范畴。前沿是接下来必将存在的那段时间。新奇性是尚未意识到、尚未产生,但却是哲学所指明的美好的新奇性,即自由王国的实在的可能性。物质不是机械的积木,而是辩证过程的现实可能性的培养基。这种现实可能性是与实在可能性相对而言的,它制约着历史上能够出现的一切。^② 后来,有人特别斥责布洛赫的物质概念的神秘性和他的唯心主义的目的论。然而,他在《希望的原理》最后一卷中曾逐字地解释道:“这种尚未,当然不是那种似乎在原子中或在次原子的物质‘分解’中,后来出现或将要出现的一切东西,都已按‘结构’化小,作为密包物存在着。这种对尚未的落后看法,正好掩盖或不理解向新奇性的辩证飞跃。同样,在物质过程辩证的、向新奇性开放的潜在倾向中,当然并无预先安排好的目的,也无按旧的目的论方式现成地规定好的目的,更无神话般地由上天对下界指引好的目的。但目的论的真正问题,当然并不因为那使人想到‘预知’的旧目的论而威信扫地,真正的目的、使命和意向范畴并不因此而完全地或教条地被排斥出世界。这种情况较少,因为倾向恰恰常常暗含有对目的的态度;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对目的的态度,进步就无法衡量,也不能成为客观的东西;因为如果在世界中没有对世界的能动的计划,没有能动的目的、使命和意向,世界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同时,目的论

^① E. Bloch, *Subjekt-Objekt*, Zagreb 1959, str. 388.

^②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见:*Philosophische Grundfragen I, Zur Ontologie des Noch-Nicht-Seins*, Frankfurt a. M. 1961, str. 31 - 33; 还可以参见已经提及的《图宾根哲学导论》。

的真理在任何地方都不是由现成的目的组成的,而是由那些只有在能动过程中才能实现的目的组成的,而在这个过程中,新的目的又总是出现和丰富起来。”^①

这样,我们就谈到布洛赫特别注意的另一个概念——进步概念了。布洛赫在一部关于这个问题的学术著作中,对这个概念做了敏锐机智的分析。这个概念用得很多,甚至可以说用得最多,但又从未得到明确确定。正因为如此,在理解上也就出现模棱两可和种种分歧。

布洛赫首先指出,成功的进步甚至同时也意味着某种东西的丧失,正如儿童在成长为青年人和成年人的同时,也在丧失无忧无虑、天真烂漫和纯洁无邪的本性,或如工业获得进步,而工人阶级却因此陷入非常困苦的境地一样。

51

因此,必须使进步概念摆脱那种把任何向前运动和向前发展都视为进步的“拜物教性质”。例如,疾病的进展只会给人带来害处,即损害健康;又如,朝向帝国主义的进步是一种“反常的进步”,因为它的运动不以人道为目的。这是一种虚假的进步,因为它追求不人道,追求否定性目的。

由此布洛赫考察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及在进步中已发现的差异和不协调。“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可能显出进步,而上层建筑在一定情况下不仅不去适应这一进步,而且以个别文化衰落与之相对立。”^②布洛赫以灯的发展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古老的红木桌上的古老烛台发出的光不仅比较柔和,而且比较庄严,正如马克思就已经指出过的,古希腊高度的艺术发展和落后的技术发展之间存在差异。

考虑到这个问题,布洛赫对于划定某些“文化圈”的做法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他把这种做法叫作“地理主义”,这种地理主义非常容易转变成为生物主义和种族主义,宣扬每种文明与生物机体相类似,具

^① E. Bloch, *Das Prinzip Hoffnung*, III Bd., Berlin 1959, str. 487 - 488. 另参见 *Zur Ontologie des Noch-Nicht-Seins*, str. 14 - 15。在那里布洛赫特别强调可能性范畴的重要性。

^② E. Bloch, *Differenzierungen im Begriff Fortschritt*, Berlin 1957. str. 13.

有三个自身完整的阶段(奥·斯宾格勒[O. Spengler]、阿·汤因比[A. Toynbee])。布洛赫由此得出另外的结论。文化的某种隔离即间断(而何处无间断?),并不否定,而恰恰证明一种向人性社会(无阶级社会)的运动的统一性,因为“在社会关系的全部总和中,处处存在着人性的东西——从人类学的到人道的——,这一方面使社会关系的总和千变万化、五光十色,另一方面又使之统一起来。毫无疑问,在包罗万象的历史描述中,多种多样而无所不包的论证,比分期困难得多,因为论证,至少作为包罗万象的、历史的论证,要求某种多样性——而且在时间上也这样”^①。进步概念丝毫也不会因此而受什么损失;相反,这一切向我们说明,这种文化的多样性表明,人性社会尚未找到,但到处都在寻找。而越多的民族走向社会主义,对于所有这些多样性来说,目的的统一也就愈广泛和愈有保障。

进步概念与时间概念有最紧密的联系。因此,对时间的分析,也是解释进步概念的前提。在这种分析中,布洛赫在区分出千篇一律的、量的、与内容漠不相关的、“浓度”到处一样的“钟表时间”时,特别强调不能用它来衡量历史过程。这就是说,历史时间是有倾向的、质的、浓度多种多样的,正如同各种音乐形式和文学形式(奏鸣曲、赋格曲、叙事诗、话剧)都有自己的时间一样。难道水流不断地、刻板地冲击着河岸的时间,真的与唯一浓缩的一年(1917年)同样“浓”吗?“一切时间序列(不仅是历史的时间序列),都必须结合历史物质事件及其倾向和内容的各种不同浓度的划分来理解。”^②

但是,虽然自然时间与历史时间有区别,就像自然时间和通常的物理时间有区别一样,能否把自然界仅仅了解为某种史前史、某种发生过的东西、某种如十字军东征一样已经过去的东西呢?不是不仅存在着人对人的经常关系,而且存在着人对自然界的经常关系吗?荷马时代的太阳,不也同样地照耀着我们这一代吗?这就是说,布洛赫认

① E. Bloch, *Differenzierungen im Begriff Fortschritt*, Berlin 1957, str. 23 - 24.

② E. Bloch, *Differenzierungen im Begriff Fortschritt*, Berlin 1957, str. 35.

为,有一种自然序列和自然进步不一定始终都表现在历史时间中。这样,我们不仅有“相对空虚的、缺乏未来的自然时间”,而且还有“实体的、充满未来的时间:两者不仅作为方法论上的两个方面,而且作为相互补充的两个实在的方面存在着”。^① 两者交织在一起,对它们来说也存在着多节奏,而后者特别与文化历史时间相联系。因此,历史的人类学的真正的“黄金时代”,如果没有新的人道主义的宇宙学的,同样是真正的“黄金时代”,它也就不可理解。

布洛赫论述的尾声,无论如何是有些奇特的。他认为人类历史的意义在于实现自由王国,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历史的革命力量的努力的基本意向,而在这当中,很清楚,不能对这种“自由王国”做静止的和非辩证的理解。

53

但是,布洛赫在这部著作中,并没有认为自由王国仅仅取决于人的能动性、人的创造性的历史实践,而是认为还取决于“一切历史事件最终汇入的整个宇宙学内的积极的 - 可能的和可能的 - 积极的意向”^②。因此,布洛赫的“人性”并不只是人类学的东西。“归根到底,没有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学,也就没有新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对人的深信和对世界的深信,这两者很久以来就在革命的历史中携手并进,并且不受机械论和与目的格格不入的态度所阻挠。而战斗的乐观主义,作为真正的进步的主观方面,也包含在整个客观方面对方向 and 目标的探讨,从而也包含对进步的存在性的探讨,而没有进步的存在也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的意识。”^③

布洛赫在《图宾根哲学导论》中也探讨了这同一个问题,他的考察最后得出如下几点:“1. 进步概念对我们来说是最宝贵最重要的概念之一。2. 因此,对进步概念,永远应当根据其社会使命,即根据其目标加以考察和研究,因为它也会被人滥用,并恰恰被殖民意识形态所歪

① E. Bloch, *Differenzierungen im Begriff Fortschritt*, Berlin 1957, str. 39.

② E. Bloch, *Differenzierungen im Begriff Fortschritt*, Berlin 1957, str. 41 - 42.

③ E. Bloch, *Differenzierungen im Begriff Fortschritt*, Berlin 1957, str. 42.

曲。3. 进步概念可以适用于生产力和基础,但相对地说不适用于,至少是不大适用于上层建筑,反过来说也一样。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在时间上相继的上层建筑(文化),尤其适用于艺术中的进步范畴。4. 进步概念根本不能容忍什么‘文化圈’,在‘文化圈’内,时间被逆转地钉在空间上,但进步概念不是要求单线性,而是要求广泛的、灵活的、充满生机的多样性,即要求一种对历史的声音的长久的、往往是交响的对位。要公正地对待欧洲以外的庞大的材料,再也不能单线地工作了,再也不能没有序列的延伸,再也不能没有错综复杂的新的时间多样性(一种‘黎曼’[G. Riemann]的时间问题)。5. 必须认识到,真正的进步所涉及、所促成的目标内容极其丰富和深刻,地球上各种不同的民族、社会和文化,尽管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自己的辩证规律是统一的,但在它里面,在朝向它的道路上,都占有自己的地位。因此,活生生的欧洲以外的文化,应当在没有欧洲对它们施加暴力压制,至少没有对它们的证明人类本性丰富的特有证据采取消灭措施的情况下,从哲学和历史方面得到描述。6. 这一目标内容不是已经最后决定了的,而是唯一的一个还没有显示的,即一个具体乌托邦的人性。只有这样,不同的历史进程据以规定的前进的深刻关系,才可以同时被描述成一种极其宽广的深度,以至——在一个结构丰富的时序中——整个世界的有过程的事件都能找到位置。根据人性,即根据最后的、最重要的进步标准(它应当是不断发展着的),地球上的全部文化,连同其继承下来的基础,是试验,是变化着的重要证据。也正因为如此,它们都没有与任何一个现存的文化趋同,哪怕这个现存的文化是‘占统治地位的’、极其‘经典的’、本身(本身仍然只是试验性的)已是‘规范的’也罢。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文化,只有与在任何地方都未充分表现过,但可以充分预知的人性趋同。7. 与此相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与世界‘含义’相联系的历史‘含义’这个已充分论述的现实问题。可是,起着统一作用的人性——进步目标之中的终极——在这里同已经表现出来的人类成果及其宇宙环境最不一致。它处在迄今

被推向极其遥远的前方的人—自然的目标之的的延长线上。这就是说,它处在人和自然的现实可能性极其遥远的,但并不是科学预见根本不能达到的内在性中。”^①

布洛赫在希望的现象中揭示了人的存在的深刻意义。他在分析这个现象时,以非凡的洞察力、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才能揭示了人们的各种不同表现所包含的,但经常被掩盖的意义。他由此对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探讨,对“人”的研究,对这个永恒的人的命题和任务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他的研究,根本反对和否定了荒谬的斯大林主义公式化,这种公式化似乎命定只知道一味重复,就像那海水一味冲击海岸一样。至于布洛赫力图在宇宙中不仅寻找人类运动的相似现象,而且寻找人类运动的某种基础,则是很不必要的。

55

在1956年的事件之前,布洛赫受到极高的评价,而在匈牙利和波兰发生一种批判非人道的、冷酷无情的官僚主义的反抗之后,人们对他的评价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布洛赫的思想,本质上是人道的,从而是反官僚主义的和反斯大林主义的。他鼓舞了很多感到政治垄断和文化垄断在现代欧洲文明和文化的条件下是不堪忍受的旧时代残迹的人们,这是毫不奇怪的。因此,德国党的领导于1957年4月4日和5日仓促举行了关于布洛赫哲学问题的讨论,讨论后还出版了一本批判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的书。^②

在布洛赫的这部巨著的论述中,可以找到各种至少可以有根据地对其提出批判性问题的因素。例如,从对希望现象所做的独特解释、

^① E. Bloch, *Tübingenski uvod u filozofiju*, str. 166 - 167. 布洛赫最近又发表了《基督教中的无神论》(*Atheismus im Christentum*, 1968)和《唯物主义问题、它的历史和实体》(*Das Materialismusproblem, seine Geschichte und Substanz*, 1972)。

^② *Ernst Blochs Revision des Marxismus*, Berlin 1957. 本书收有卢·奥·格罗普(R. O. Gropp)、罗·舒尔茨(R. Schulz)、鲁·罗赫豪森(R. Rochhausen)、迪·弥勒-赫格曼(D. Müller-Hegemann)、海·莱(H. Ley)、格·门德(G. Mende)、哥·汉德尔(G. Handel)、亨·施瓦策(H. Schwartze)、霍·恩格尔曼(H. Engelmann)、约·费尔斯特(J. Förster)、沃·费尔斯特(W. Förster)、鲁·赫罗尔德(R. Herold)、沃·舒巴特(W. Schubardt)和约·海·霍恩(J. H. Horn)的论文。

一定的心理说,直到上述的宇宙说。然而,这一切毕竟没有使一种真正生气勃勃的思想努力及其成果有所逊色。但是,如果某种批评按照旧的处方进行,追求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把一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而是人道主义者的对手宣布为修正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那么,这种批评的正确性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不能像格罗普那样非难某个马克思主义者从人出发而不从物质出发,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种种极其不同的看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更不用说在尚待分析的关于人的问题上了。同一位作者还非难布洛赫没有把共产主义理解成“物质的社会制度”(!),而是理解成“所谓的社会异化的消灭”^①,非难有些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只对异化和物化问题感兴趣^②,这是辩护士的口吻,这种辩护士仅仅从官僚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人道主义问题,并认为哲学的任务是论证和解释一定的政治实践。

从马克思主义原理出发去研究人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一片未经耕耘的田野。布洛赫的著作,尽管可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在这个领域内却犁出了一条意义重大的沟。

布洛赫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而且是整个当代哲学的独特人物,他处于普通的哲学潮流之外。哲学对于他来说是对人类和宇宙的理智认识,它并不是只局限于自己的时代,它如果极为深刻,就能看到一切时代。

尽管晚年多半是思维能力锐减,意志尤其衰退的年代,加上曾经几番流亡漂泊,经历过几次世界大残杀和在各种制度下遭受过许许多多的悲惨遭遇,布洛赫晚年依然矢忠于自己的基本观点,自己关于人

① R. O. Gropp, *Ernst Blochs Hoffnungsphilosophie — eine antimarxistische Welterlösungslehre*, in *Ernst Blochs Revision des Marxismus*, Berlin 1957, str. 21.

② R. O. Gropp, *Ernst Blochs Hoffnungsphilosophie — eine antimarxistische Welterlösungslehre*, in *Ernst Blochs Revision des Marxismus*, Berlin 1957, str. 29. 沃·费尔斯特尔也以同样的精神认为,把异化概念运用到社会主义的条件中去是荒谬的!(*Ernst Blochs Hoffnungsphilosophie — eine antimarxistische Welterlösungslehre*, in *Ernst Blochs Revision des Marxismus*, Berlin 1957, str. 217)

道化世界的基本预见。

这位战斗的乐观主义者在自己最后的一本著作中自豪地写道：“正在振作奋起的人和尚未完全限定的现实可能，对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学、哲学和实践的发展来说，无疑是最必要的范畴。”^①

人的命运掌握在人的手中。只是为此必须昂首阔步。这是人们应当永远思索的一个思想！

二、麦克斯·霍克海默、泰奥多尔·维森格伦德·阿多诺

麦·霍克海默(1895—1973)和泰·阿多诺(1903—1969)这两位思想家以自己的活动在欧洲和国际精神生活中留下了意义重大的痕迹。他们都是聚集在上述“社会研究所”和《社会研究杂志》周围的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人物。两位思想家合作撰写了一些极为著名的著作，因此，我们也就在同一章里来回顾一下他们的观点。然而，只要简单回顾一下战前出版的这份杂志就可以断定：无论如何，在当时给社会批判理论划定基本路线的人是霍克海默。

57

1933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流亡国外，并在国外建立了研究所的分支，先是在日内瓦，接着是在巴黎，最后是在美国，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霍克海默与自己的同事一起，出版有关权威和家庭问题的研究成果，而战后还立即出版研究偏见的论文，研究不同社会阶层中种族偏见的社会的、心理的和历史的原因和基础。

回到西德以后，霍克海默同阿多诺一起，重建了社会研究所(1950年)，而从1955年起，出版《法兰克福社会研究论丛》，继续坚持战前的

^① E. Bloch, *Tübingenski uvod u filozofiju*, str. 285. 参见拉西姆·穆米诺维奇(Rasim Muminović)关于布洛赫的研究文章《恩斯特·布洛赫的哲学》(*Filozofija Ernst Blocha*, Beograd 1973)。

那一杂志的传统。当时,公众,特别是大学生,首先是通过听他们在法兰克福大学的讲课而了解他们的观点和他们对当代文明的批判阐述的。公众过去基本上不知道《社会研究杂志》的论文,因为在法西斯统治时期,杂志几乎全都被销毁了。公众可以读到的第一部较大的著作是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这是他们两人合作的成果。在这部叫作《启蒙的辩证法》的著作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极其扼要地阐述了自己在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对当代文明的种种现象和问题所持的观点。

58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是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实质,这一文明从古希腊罗马时期以反对神话的斗争开始。作者同时认为,启蒙的自我毁灭正在进行中,神话本身就是启蒙,并且,启蒙正在重新变成神话学。^① 这个命题在《奥德赛》中的神话和启蒙的辩证法的第一个附录中得到了说明,《奥德赛》是古希腊罗马文明最早最典型的证明之一。而第二个附录是论述康德、萨德(M. de Sade)和尼采(F. Nietzsche)这些彻底的启蒙完成者的。这一分析首先表明,屈从于主体统治的一切自然的东西怎样最终变成盲目的客体的东西、自然的东西的统治。

启蒙的纲领就是用知识来消除关于世界的神话,消除偏见。知识就是力量,无论是在奴役造物方面,还是在讨好世界的统治者方面,它都不会有任何障碍。而技术是这种知识的实质。它追求的不是概念和图像,而是方法,是利用他人的劳动,是资本。“人们想从自然界那里学习的东西,就是利用自然界,以便完全统治自然界和人。不可能是别的。启蒙还无情地对待自身,把它自身的自我意识的最后残余也烧毁殆尽。”^②

西方哲学在其中规定了自己永恒的自然秩序的各个范畴,表明了昔日俄刻阿诺斯(Oknos)和珀耳塞福涅(Persefon)、阿里阿德涅(Ari-

① 参见 M. Horkheimer, Th.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Amsterdam 1947, str. 10.

② M. Horkheimer, Th.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Amsterdam 1947, str. 14.

jadne)和涅柔斯(Nerej)^①曾经有过的地位。苏格拉底以前的宇宙学坚持转化的要素。湿度、空气、火等作为自然界元素,实际上是神秘世界观的理性化了的创造物,于是神秘魔鬼的多义性在本体论的实体的纯形式中获得了精神生活。通过柏拉图的思想,奥林匹克的诸神也被哲学的逻各斯所掌握了。

对于启蒙来说,凡是未受到预见和利用的一切,似乎都是可疑的。启蒙总是假定神话的基础是人神同一论,主观的东西对自然的投射。俄狄甫斯解答斯芬克司的隐谜时回答说“这是人”。这句话成了启蒙到处重复的固定不变的解释。启蒙仅仅承认可以作为统一体把握的东西才是存在和发生过的东西。它的理想是一种派生出一切的体系。在其中,它的理性的解说和经验的解说彼此并无区别。形式的众多归结为状态和秩序,历史归结为事实,事物归结为物质。形式逻辑是启蒙的理性的范例,并给它提供世界的可预见性的公式。“柏拉图在其最后著作中神话般地把思想与数目等同起来,这表达了对一切非神话化的渴望:数成为启蒙的法则。”^②

59

同样的等同逐渐地也统治着资产阶级的正义和商品交换。等价统治着资产阶级社会。它把不等的东西还原为抽象的量而使之等同起来。在启蒙看来,一切不能还原为数的东西都是一种假象。统一依然是从巴门尼德到罗素的解决办法。人们坚持毁坏神和质量。“神话转变为启蒙,自然界转变为单纯的客观。人们增强着自己的权力,代价是使他们施加权力的对象异化。启蒙对待事物,犹如独裁者之对待人们。他承认他们,只要他能够操纵他们。科学的人承认事物,只要他能制造它们。因此,它们成为为他存在的自在物。”^③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竭力要深入认识资产阶级文化的实质,因而力图不是在许多人所设想的方面,即不是用分析的方法,不是通过穷究

① 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四个人物。——译者注

② M. Horkheimer, Th.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Amsterdam 1947, str. 17-18.

③ M. Horkheimer, Th.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Amsterdam 1947, str. 19-20.

最初的因素,不是通过沉思的猜解,而是在总体的性质上,在包罗万象的量中,在对预先已被决定了的(因为是数学化了的)过程的理解中,在作为对自然界从而也是对人的统治的基础的包罗万象的考虑中去探寻启蒙时代的实质和意义。在他们看来,在已获得启蒙的世界中,神话已转变为世俗。存在不仅是以人的异化为代价换来的,而且人们的关系,以及每个人对自身的关系也随着精神的物化而恶化了。正像他们所写的,人变成一种按惯例反应和运转方式的节点,这也是现实对人的要求。泛灵论使物精神化,工业主义使灵魂物化。商品统治着人,它通过无数批量生产的隐蔽机制和它的文化,把人们的行为的方式方法作为某种完全是自然的、合乎理性的和可以理解的东西强加给个人。个人还仅仅被规定为物,被规定为统计的因素。“启蒙的实质是抉择,它的不可避免性是统治权力。人总是必须在他屈服于自然界或自然界屈服于他这两者之间做出抉择。随着资产阶级商品经济的发展,神话的昏暗的地平线被思考着的理性的太阳照得雪亮,在这理性的冰冷的光柱之下,播下的新的野蛮种子走向成熟。”^①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拿康德、萨德和尼采作为说明启蒙的命运的第二例子。康德的概念是模棱两可的。理性作为先验的超个人的自我,包含有人的自由共同生活的观念,在自由的共同生活中,人们作为一般主体组织起来,并在整体的自觉团结中克服纯粹理性和经验理性之间的冲突。但是,理性同时又是思考着的思维机关,这一思维机关为了自我保存的目的使世界顺从,因而它只知道把对象从感性材料制作成征服的材料的职能。存在是从加工和支配的角度加以考察的。

^① M. Horkheimer, Th.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Amsterdam 1947, str. 19 - 20. 作者们在他们的这部著作的这一部分中解释了《奥德赛》的第12章。这一章讲的是奥德赛及其同伴们绕过塞壬(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海妖,以美妙歌声诱杀过往的海员。——译者注)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作者们已经看到了“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指出了启蒙辩证法的预兆:奥德赛被捆绑在桅杆上,木然地听着塞壬歌唱,但没有被歌声所诱惑。因此,他作为占有者,既没有参与劳动,也没有参与管理,而他的同伴们,尽管事到临头,却全无劳动的兴趣,因为劳动是被迫的,感官都被强行封住了。迄今没有任何统治能避免这一代价。(参见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Amsterdam 1947, str. 45 - 50; 58 - 100)

一切都成了自我重复和替代的过程,成了体系的概念模式的例子,甚至人本身也是这样。概念机关在感性达到感性经验之前就已经决定着感性;公民预先就把世界看作是他用以在那时构成世界的材料。康德曾经直观地假设过甚至好莱坞有意识地实现的东西;图像预先就已经在生产中根据理念的标准被审查过,在此之后才是可以让人们按照这一理念标准去看的。^①

有一种社会学的意见认为,在客观的宗教中获得的支持的丧失、前资本主义结构的最后的瓦解、技术的和社会的专业化,导致了文化的混乱。这种意见每时每刻都在表明自己是不正确的。今天,文化正在使一切都变得雷同。电话、电台、期刊等等构成一个体系,一切都异口同声、千篇一律。冠冕堂皇的管理机构和工业展览到处都一样,无论是在独裁国家还是在其他国家。整个大众文化因处在垄断之下而变得完全相同,这的确是人们不想隐瞒的事实。

替文化工业辩解的理由是工艺技术方面的,而标准似乎出自消费者的需求。实际上,这是操纵和起反馈作用的需求的循环,在这一循环中,体系的统一变得日益牢固了。而在这里,人们隐瞒了这样一个事实:技术赖以获得统治社会的权力的基础,是经济上的最强者的统治社会的权力。工艺技术上的合理性,是统治本身的合理性。^②

这种文化工业的风格,实际上是对风格的否定。在一般和特殊、常规和对象的特殊要求之间根本无须进行调解,因为各极之间的紧张对立根本不会发生:各极是相通的,并且转入一种模糊的同一之中。

^① M. Horkheimer, Th.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Amsterdam 1947, str. 103. 两位作者认为,只有马凯斯·德·萨德对这一切做过细致的描述。萨德在其《朱丽叶的历史》(1797年)一书中描述了一个放荡不羁的公民主体,一个我行我素的理念。按照作者们的意见,萨德的著作揭露了十诫、父权和财产这些在宗教看来是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的原则的神话性质。萨德所宣告的极端个人主义在公共统治、共和国中完结;他从而最终想到国家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采取的最初的措施,是消灭圣茹斯特(Saint-Juste)和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

^② 参见 M. Horkheimer, Th.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Amsterdam 1947, str. 144 - 145。

伟大的艺术家从来不是那些以最完善的方式表现风格的人。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把风格理解为对天主教徒式的痛苦的顽强抵抗,理解为否定的真理。甚至被称作古典的作品,例如莫扎特的音乐,也包含着追求与被它具体化的风格不同的东西的客观倾向。在勋伯格(A. Schönberg)和毕加索(P. Picasso)之前,伟大的艺术家对风格总是抱怀疑态度,而更多的是坚持事物的逻辑。表现主义者和达达主义者挑战性地认为,风格本身是非真实的。今天,他们的这种意见在走红的女影星的妖冶妩媚中,在因拍摄农村工人的可怜茅舍大出风头的摄影者的高超技巧中正大获成功。在任何艺术作品中,风格是一种许诺。^①

62 从自由主义时代就传下来的文化垄断,把艺术家完全俘获在手心之中。从前,康德和休谟虽然署名“最恭顺的仆人”,同时却在做着破坏王位和祭坛根基的工作,今天,人们虽然对统治的达官贵人直呼其名,却任凭目不识丁的老板去摆布自己的艺术活动,屈从其偏见。托克维尔(A. C. Tocqueville)一百年前所做的分析今天依然有效:在私人垄断之下,专制统治让你躯体自由,却控制你的心灵深处。统治者在这里不会这样说:你必须同我一样想,否则你要死。他会这样说:你可以是自由的,不必同我一样想,你可以有自由、有财富等等,但是从今天起你是我们当中的异己分子了。谁不顺应潮流,谁就穷极潦倒,一败涂地。^②

文化工业的总体性存在于重复之中。它不顾一切地总是追赶着娱乐。它的意识形态就是做娱乐生意。它的力量在于同已产生的需求一致。娱乐在晚近资本主义中是劳动的延长。寻求娱乐是希望逃脱一下机械的劳动过程,以便身心得以恢复,能再去经受这一过程。但是,机械化的威力是如此巨大,它完全决定着娱乐商品的生产,使个

^① 参见 M. Horkheimer, Th.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Amsterdam 1947, str. 155 - 156。

^② 参见 M. Horkheimer, Th.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Amsterdam 1947, str. 158 - 159。

人别无其他娱乐,只能是去模仿自己的劳动过程。娱乐变成了无聊,不值得为之花费精力。因此,娱乐必然是老的一套。“但是,生意和娱乐的原始亲和性表现在亲和性本身的含义之中,也就是社会辩护。满足意味着同意。要达到满足,唯一的可能办法是封闭自己,把整个社会过程拒之身外,使自己变得愚蠢,预先就放弃每一件作品,甚至是最微不足道的作品应具有不可避免的的要求——在自身的局限性中反映整体。满足意味着不要为此思索,即使有痛苦和烦恼,也要统统忘掉。这是彻头彻尾的无能。这实际上是一种逃避,但正如已经说过的,不是逃避恶劣的现实,而是逃避剩下的最后一点反抗思想。娱乐所许诺的解脱是抛却思想,是否定的解脱。”^①

两位作者对当代技术发达的文明,即一切皆已物化和变成商品的世界的文化工业进行了透彻和激烈的批判。经过分析,他们最后断言,整个制度的生活在不断复制,没头没脑地一味往前撞。正常健全的东西就是重复着的东西,就是自然界和工业中的循环。人们在报纸杂志上看到的,老是咧着嘴笑的一个样子的婴孩,人们听到的,老是吵吵闹闹的爵士器械的打击声。表演技术上的一切进展,统统是一个模子里刻出的一套。^②

两位作者还对反犹太主义问题进行了批判性考察,在一些写得很简明扼要的片断中还提出了一定数量的问题。在这部著作中,他们力图找出西欧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红线,考察了从西欧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初期直到当代消费的和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荒谬、平庸,但又可怕的极权的和敌视任何个性和个人特点的观点,从而使这一著作在内容和风格上都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丰富的著作。这一著作同他们的其他著作一起,给了新的一代莫大的帮助,使新的一代对整个意识形态化了的世界持批判立场,这个世界把一种标准化

63

① M. Horkheimer, Th.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Amsterdam 1947, str. 172.

② 参见 M. Horkheimer, Th.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Amsterdam 1947, str. 177.

了的廉价商品和一种同样廉价的娱乐当作人类存在的最高成就和最大意义拿来款待人们。

在出版这一著作的同一年,即1947年,麦·霍克海默发表了自己的一部巨著《理性的黯淡》。他在这一著作中再一次广泛探讨了当代资产阶级世界中理性的形式化,同时阐述了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现象、科学的作用等等批判性的社会理论的一些主要题目。霍克海默指出,启蒙哲学家以理性的名义攻击宗教,但到头来他们不是消灭了教会,而是消灭了理性本身的客观概念——他们的全部努力的力量源泉。休谟抛弃了最后的一些一般概念,从而成了当代实证主义的真正始祖。^①

“理性扬弃了自主性之后,就变成了一种工具。在主观理性的形式方面(实证主义所强调的方面),被强调的是它对客观内容的无联系性;在主观理性的工具方面(实用主义所强调的方面),被强调的是它对他律的内容的投降。理性完全被卷入社会过程。它的有效价值,它在统治人和自然界方面的作用变成了唯一的准则。”^②

64 于是产生了观念的自发化和工具主义,语言被归结为当代社会巨大的生产机构中的一种工具。同时,语言似乎自食恶果,倒退到自己的魔术阶段。“正如在魔术盛行的时代,任何语言都被看作是能够摧毁社会的可怕力量,说话者必须为之承担责任。与此相应,寻求真理被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从而也就被钳制了。思维和行动之间的差别被看作是毫无价值的,因而任何思想都被看作是行动,任何反思都是命题,而任何命题都是暗号。每一个人都得为自己所说或没说的话承担责任。一切的一切都分好类别和打上标记。”^③

理性的形式化的后果不是一目了然的。衡量有意义和无意义、真理和谬误的合理标准消失了。在当代智力平庸的哲学家们看来,只存

① 参见 M. Horkheimer, *Pomračenje uma*, Sarajevo 1963, str. 22.

② M. Horkheimer, *Pomračenje uma*, Sarajevo 1963, str. 24.

③ M. Horkheimer, *Pomračenje uma*, Sarajevo 1963, str. 25 - 26.

在一个权威：科学，而这个科学又被理解成事实的分类和可能性的计算。正义和自由总比非正义和压迫好这种说法在科学意义上是无法检验的，这与红色比蓝色好的说法一样毫无意义。^①

同样，在今天，这一观念大部分已丧失了自己的合理的基础，接受了一种完全不合理的外表。任何哲学观念、美学观念和政治观念，都力求成为一种新的神话学的核心，而这也就是启蒙的进步在一定的点上就力图转回到迷信和癫狂的原因之一。“多数原则以任何事情都经过普遍的裁决的形式出现，以各种形式的表决和借助于当代通信技术加以实施，从而成了思想必须服从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是新的上帝，但它不是伟大革命宣告者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上帝，即不是一种反抗现存的非正义的力量，而是抗拒一切不与之一致的力量。人们的裁决越是为各种利益所操纵，多数就越发充当文化生活的仲裁人，替各个领域的文化代用品，直至大宗大众文化艺术赝品辩护。科学宣传把公众舆论制造成黑暗势力的真正工具的规模越大，公众舆论就越表现为理性的代替物。民主进步的这种表面的胜利，使民主赖以生存的精神实质丧失殆尽。”^②

霍克海默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强调，哲学在其客观主义阶段，力图成为彻底理解人的行为的原因和理由的一种手段。与此相反，实用主义力图把任何理智重新转变为单纯的行为。“实用主义力图把实验物理学变成一切科学的范例，力图按照实验室的技术来塑造精神生活的一切领域，因而与当代工业主义是一对姐妹。工业主义认为，工厂是人的存在的范例。工业主义按照传送带式流水作业或按照合理化的办公室活动来塑造一切文化领域。为了证明自己有权被理解，任何思想都必须提供为自己辩护的理由，都必须提供关于自己的实用性的确证。”^③

65

① 参见 M. Horkheimer, *Pomračenje uma*, Sarajevo 1963, str. 27。

② M. Horkheimer, *Pomračenje uma*, Sarajevo 1963, str. 32。

③ M. Horkheimer, *Pomračenje uma*, Sarajevo 1963, str. 48。

霍克海默谈到杜威这样的思想，“要相信智力具有设想未来的力量，而未来就是对目前值得希望的东西的设计”，发现其实现的手段，我们就得救了。对此，霍克海默指出“对目前值得希望的东西的设计”根本不是什么解决办法。这是因为，第一，这里说的是人的希望。尽管人的希望实际存在着，却是受整个社会制度制约的。这就使人产生更大的怀疑：真的是自己的希望吗？如果这些希望是以非批判的方式被接受的，那么，市场调查和盖洛普(G. H. Gallup)的民意调查，就是比哲学更合适的确定这些希望的手段了。而如果杜威同意主观的希望与客观的希望可能性之间存在某种差别——而这意味着哲学分析的开始——，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实用主义是否愿意这样做呢？“今天，哲学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思想在这一抉择中是否还能自主，是否能准备好自己的理论决定；或者，思想是否必须满足于起着一种空洞的方法论的作用，起着一种耽于幻想的辩护士的作用，或者起着一种万应药方的作用，就像赫胥黎(A. L. Huxley)最新的广为流行的神秘主义一样，而这种神秘主义是像任何现成的意识形态一样好地适合这奇妙的新世界的。”^①

66 霍克海默抛弃了对科学所做的实证假设，因为人们在这当中忘记了，自然科学，不管人们如何构想它，首先是一种辅助的生产手段，是不可能预先确定它在社会的真正前进和后退中起什么作用的。实证主义哲学根本上就是哲学的技术至上主义，因为它把科学看作是进步

^① M. Horkheimer, *Pomračenje uma*, Sarajevo 1963, str. 53.

的自动的泉源,恰如柏拉图相信数学的威力一样。^①

在考察个人及个人的浮沉问题时,霍克海默根据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到现代的历史经验指出,如果个人退回到自身,脱离共同体及其问题和斗争,自由便是幻想,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将把一切个性的残余破坏殆尽。同样,个人的解放并不是摆脱社会的那种解放,而是把社会从自动化中拯救出来,因为自动化在集体化和大众文化的时期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回顾了个人在中世纪的各个时期和后来在社会发展的特别强调个性的自由主义阶段中的地位和特征,并指出,当前,巨大的垄断和强权左右一切,在这种形势下,个人采取功利主义的解决办法,仰仗垄断公司,迎合强权眼色。理性的个体主体日益枯萎凋谢,其未来日益不取决于自己的远见,而是取决于庞大势力集团之间在民族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的斗争。“从初学走路的时候起,个人就不得不看到,要想同这个社会和睦相处,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放弃完全的自我实现的希望。要同社会和睦相处,唯有模仿才有可能……屈从周围环境,模仿它,重复它,顺应自己可能隶属的一切强大集团,把人的本质变成组织的一个肢体,牺牲自己可能的机会,以便决心博取这一组织的满意和在这一组织中获得地位,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存活。他的存活,靠的是最古老的生物学的生存手段,这就是适应环境。”^②

67

今天,人们处于工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极权之中,个人意见和个

^① 我们在这里不必详细叙述霍克海默对实证主义所做的批判了,因为在这个方面,所有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是相同的。我们只需指出他针对常识哲学提出的批评意见:“许多专业科学家的过错不在于他们孤高自傲、不问政治,而在于他们为了所谓的常识的需要而牺牲思想的矛盾和复杂性。20世纪的人尽管训练有素,却保持着这种心态,这就是像洞穴人一样对外人持有敌意。这不仅表现为仇视不同肤色和不同服饰的人,而且表现为仇视异己的和异常的思想,更有甚者,仇视思想本身,仇视越出现存社会制度一定要求的界限去追求真理的那种思想。今天,思想不是以自己的真理性为自己辩护,更多的是被迫以自己对某一稳固集团的效用性为自己辩护。甚至在发现反抗贫困和紊乱是任何彻底的思维工作的一个因素的时候,思想在参与改革中的作用也不是真理的任何准绳。”(M. Horkheimer, *Pomračenje uma*, Sarajevo 1963, str. 78 - 79)

^② M. Horkheimer, *Pomračenje uma*, Sarajevo 1963, str. 125.

人反抗消失了,因此,朝人性进化越发困难了。霍克海默认为,尽管如此,这一切压迫并不是生产的纯技术要求造成的,而是一定的社会结构造成的。因此,在霍克海默的著作中,仍然存在着某种乐观的憧憬,他认为,当代所有这些过程,终会导致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终会导致个性的繁荣。^①

最后,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哲学的基本任务究竟是什么?霍克海默认为,哲学思维的第一个特征是:“相信哲学意味着绝不害怕思维能力会枯萎衰竭。”^②在这一意义上,霍克海默反对本体论的复活,反对当代文明的保守的批评家。哲学既不是工具,也不是技术方案。哲学只能描画进步进程的轮廓,而这一进程是由逻辑的必然性和事实的必然性决定的。“哲学没有定义。哲学的定义与哲学要说的话的明确表述是同一的。”^③如果以为能够提供几句所谓的无时态的句子作为定义(正像在逻辑经验主义那里常有的情况一样),那是最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把每一个概念看作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真理的片段,概念只有在真理之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含义;由这些片段构成的真理的结构,是哲学最关注的东西。

霍克海默既疏远哲学唯心主义,也疏远把精神和自然界等同起来的自然主义。理性的失败归因于它用自然界制造出真正的客体,而又没有能力在这样的客体化中发现自己的踪迹。“今天,集体的疯狂从集中营起一直蔓延到表面上完全无害的大众文化之中。这种集体的疯狂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已经存在于原始的客体化之中,其时的第一个

① 霍克海默强调指出,法西斯的压迫和恐怖在某种场合能锻造人们的反抗意志。这种反抗永远是真正的个性的核心。“当代真正的个人是那些为反抗奴役和压迫而奔赴痛苦和屈辱的地狱的殉难者,而绝不是那些自恃高傲的大众文化人物,绝不是因循守旧的显贵。没有得到讴歌的英雄自觉地把自已的生存变成被暴政消灭的个人展示出来,而其他人则不自觉地社会过程中遭受暴政的消灭。集中营里的无名殉难者是强烈求生的人类的象征。哲学的任务是把他们所做的一切译成一种听得见的语言,虽然暴政使他们最后的声音沉默了。”(M. Horkheimer, *Pomračenje uma*, Sarajevo 1963, str. 140)

② M. Horkheimer, *Pomračenje uma*, Sarajevo 1963, str. 143.

③ M. Horkheimer, *Pomračenje uma*, Sarajevo 1963, str. 145.

人就诡计多端地存心把整个世界视为猎获物。”^①

虽然存在着理性与自然界的对抗和普遍的异化,真理的观念依然总是是可达的。哲学不能是否认或逃避矛盾的顺应时势主义。否定在哲学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不可导致怀疑主义,怀疑主义只是形式上的、抽象的否定。另一方面,客观唯心主义和理性主义固执地坚持一般概念和标准的永恒意义,而全然不考虑它们的历史的可派生性。哲学理论本身没有能力促使野蛮倾向或是人道原则在未来取胜。但是,正确地对待这一观念,哲学就能够对历史起校正作用,就能够照亮人类目前的进程,就能够在执行这一功能时成为人类的记忆和良心,从而防止人类进程类同于疯人院里的毫无意义的兜圈子。“否定的方法,谴责一切摧残人类和阻碍人类自由发展的一切,这是基于相信人类……现在,科学已帮助我们克服了对自然界中未知的东西的恐惧,而我们却是我们自己制造的社会压迫的奴隶。当我们需要独立地行动的时候,我们却呼唤典范、制度和权威。如果我们理解的启蒙和精神进步就是人类从对恶势力、魔鬼和仙女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从对盲目的命运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一句话,就是从恐惧中解放出来,那么,公开谴责今天被称作理性的一切,那就是理性所能立下的最大的功绩。”^②

69

这位法兰克福学派最有影响的人物,以这样的信条结束了自己对当代文明的一些生命攸关的问题的思考。这些问题有:个人和个性的命运,非辩证的理性的历史悲剧;但同时还有:辩证理性,即唯一能够使人校正走入深渊的自发趋向的批判意识的日益黯淡的命运。在这一时期,在霍克海默的著作中,占上风的还是乐观地相信人类的进步力量,相信人类的批判意识和辩证意识的伟大力量。在他的生命的稍后时期,在当代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和极权主义的影响下,或者在社会主义冲动发生蜕变时期的官僚国家主义垄断的影响下,他越来越放弃

① M. Horkheimer, *Pomračenje uma*, Sarajevo 1963, str. 153 - 154.

② M. Horkheimer, *Pomračenje uma*, Sarajevo 1963, str. 161 - 162.

自己先前的著作中的革命语调,变得听天由命,甚至产生这样的错觉,似乎人类除了在所谓的“自由世界”和“希特勒式的、斯大林式的或其他形式的法西斯主义”二者之间择一之外,再无其他选择了。^① 确实,经历了纳粹的野蛮洗劫之后,世界并没有获得欧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泰斗们所说的那种解放;技术至上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世界的另一面,由于拥有迫害和限制自由的巨大可能性而越发可怕。但是,这还远不意味着“各个人以及各阶级已经融为一体”^②,还远不意味着由于有越来越大的个人表现自由(尤其是在思想自由领域),人们已经在维护资产阶级的世界,而只存有某些批判性保留了。今天,一切明智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清楚,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官僚主义根本不是解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办法,甚至还是一种倒退。但是,解决办法不存在于保守住这一“自由世界”的某种历史优势,这是因为经验明白无误地告知我们,这个“自由世界”动荡不定,不断地受到霍克海默清楚知道和甚至可以明确指出的那些势力的威胁。解决办法在于克服这个所谓的“自由世界”,它无非是资产阶级世界,充满自私自利,孕育着反动的倒退,它一旦处于严重危机之中,就会使法西斯主义或其他类似的主义死灰复燃。这种克服虽然会引起或大或小的震荡,却会实现直接的民主,也就是实现欧洲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欧洲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能够实现的那些马克思的主要梦想。

应当指出,这种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较直接的联系保持距离的态度,在霍克海默最亲密的同事泰·阿多诺那里,无论是在风格还是在题材方面,也都有所表现。阿多诺的理论活动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世界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同它们展开论战。同时,阿多诺的兴趣所在,首

^① 麦·霍克海默战前时期著作新版的《序言》,参见 A. Schmidt, *Kritische Theorie*, Frankfurt a. M., str. 13。

^② A. Schmidt, *Kritische Theorie*, Frankfurt a. M., str. 13。

先是他熟谙的音乐理论。^①

在考察音乐和一般艺术的实质时,阿多诺首先强调其认识性质。他为音乐的先锋主义辩护,同意勋伯格关于艺术必须真实的论断,同时认为,“音乐否定假象和游戏而追求认识”^②,“音乐意识到自己本身是认识,而伟大的音乐从来就是认识”^③。另一方面,他把音乐理解为要素,理解为物化世界的存在部分;音乐因而努力维护自己的完美性,同时又从自身产生出与自身实质对立的一些特征。“新音乐的外表尽管使脱离制作的听众感到格格不入,但它不加掩饰的奇形怪状来源于听众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前提和人类学前提。不和谐的音调令听众惊骇,但述说的是听众自身的状态,唯其如此,才使他们感到不堪忍受。相反,过分熟悉的作品的内容,是如此远离今天笼罩在人们头上的命运,以至于他们本身的体验与传统音乐显示的东西根本互不沟通。”^④ 听众在传统音乐中也只理解那些最粗俗的、“美的”地方,情调和联想。“在贝多芬的任何奏鸣曲中,在勋伯格的四部合奏中,都隐藏着构成作品内涵的音乐联系,但对于由电台训练出来的听众来说,在前者中隐藏着的,并不比在后者中隐藏的少,后者至少还提醒这些听众,尽管提

71

① 其中,我们可以举出他的如下著作:《新音乐的哲学》(*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 1949)、《不谐音。被操控的世界中的音乐》(*Dissonanzen. Musik in der verwalteten Welt*, 1956)、《乐音音形。音乐著作集》第一卷(*Klangfiguren. Musikalische Schriften I*, 1959)和《幻想曲。音乐著作集》第二卷(*Quasi una fantasia. Musikalische Schriften II*, 1963)。

② Th. Adorno, *Filozofija nove muzike*, Beograd 1968, str. 69.

③ Th. Adorno, *Filozofija nove muzike*, Beograd 1968, str. 141. 他在另一页上又写道:“所有的音乐形式,而不仅是表现主义的形式,都是沉淀下来的内容。以往被忘怀的东西和不再能直接说出的东西,都在这些形式里存活下来。以往在形式中寻找避难所的东西,由于形式继续存在下来,它也隐姓埋名地存在于形式中。艺术形式记录着人类的历史,比文件记录得更为真实。浩气凛然的形式,无不充满对严酷生活的否定。”(*Filozofija nove muzike*, Beograd 1968, str. 70)

④ Th. Adorno, *Filozofija nove muzike*, Beograd 1968, str. 38.

琴能够奏出甜蜜的音调,但实际奏出的并不是欢乐的歌曲。”^①

由此可以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阿多诺不可能把旧的音乐内容和形式纳入他和霍克海默如此清晰地揭示出其结构、矛盾和奇特现象的当代社会现实。阿多诺维护任何一个勋伯格、贝尔格(A. Berg)、韦伯恩(A. Webern)、雅纳契克(L. Janáček)或者巴尔托克(B. Bartok)的当代音乐表现,反对针对这种音乐表现提出的各种责难,特别是关于理智主义的责难;但他同时又指出,对传统的音乐频率的独特语言抱僵硬的不容态度是一种陋习,这种陋习背后隐藏着社会压力。“音乐频率的第二个特性是历史起源的表象。这一特性把自成一体和独一无二的体系的优点归功于嬗变的社会,这个社会自身的动力追求完整性,并且,一切音乐频率要素的完整性都极其深刻地与其可替代性相应。但是,新的音乐手段来源于旧音乐手段的内在发展,同时又通过质的飞跃从旧的音乐手段中独立出来。因此,断言新音乐的重要乐曲与传统音乐的乐曲相比,显得想象多些,感性少些,那纯粹是一种无知的推测。”^②

72 阿多诺认为,新音乐的认知力量不在于它回到革命时期英雄的古典主义。新音乐的主体是晚近资产阶级阶段孤独的、实在的主体;这种实在的主体性和音乐素材,为勋伯格提供了美学的具体化的圣典。由于所有这些原因,音乐直至今天也只是作为资产阶级的产品存在着。“封建主义从来也没有产生过‘自己的’音乐,音乐总是由城市市民阶级提供的。无产阶级则是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统治的简单客体,

^① Th. Adorno, *Filozofija nove muzike*, Beograd 1968, str. 38 - 39. 他在另一页上又写道:“它与社会过程有同样的起源,并且总是带有社会过程的痕迹。那些似乎是素材的纯粹自我运动的东西,在同一意义上与现实社会一样发展,甚至在两者已无任何联系或相互为敌的时候也是如此。因此,当作曲家研究分析素材的时候,他也研究分析社会,社会移入了作品之中,而不是作为纯粹的外在之物、他治之物,作为消费者或敌手来与制作相对立。”(*Filozofija nove muzike*, Beograd 1968, str. 61)或者:“任何和弦‘自身’都不是虚假的,因为不存在和弦自身,因为任何单体都包含整体,包含历史的整体。”(*Filozofija nove muzike*, Beograd 1968, str. 63)

^② Th. Adorno, *Filozofija nove muzike*, Beograd 1968, str. 40.

它由于本身受压迫而具有的特性和它在制度中所占的地位,被剥夺了构成音乐主体的资格;只有在自由得到实现和不再有任何操纵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才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主体。”^①

阿多诺认为,传统音乐的阶级性在于,它以恒久不变的内在性和令人畅快的外表宣告:根本没有阶级。新音乐则抛弃了这种和谐的外表。“激进的当代音乐的隔世孤立,不是由它的非社会的内涵,而是由它的社会的内涵造成的。它通过自己纯粹的质,而且是越鲜明就越显得纯粹的质,指出了社会的丑恶,而不是把社会的丑恶隐藏在某种似已存在的人性的幻象之中。它不再是意识形态。”^②阿多诺以此指出当代音乐的悲剧性的存在:它在阐明一个荒诞的世界。它承担了这一世界的全部悲剧,它为自己找到的全部幸福就是认识不幸,它为自己找到的全部美好就是否认美好的假象。阿多诺在分析勋伯格的创作时最后写道:“无人愿意与之相联系,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它正在消失,无人问津,无人反应。在被听过的音乐周围,时间凝结成透明的晶体,而未被听过的音乐犹如一颗空子弹坠入时间的真空。机械音乐每时每刻都有这后一种体验;新音乐也获得这种体验,它自动停泊在绝对忘怀之岸,它是被抛入茫茫大海的密封浮瓶中的藏信。”^③

在20世纪50和60年代,阿多诺写了各种著作和论文,对最重要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和人物做了批判性的评述,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问题以及康德、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做了许多细致机敏的分析。^④但是这些分析在解决问题方面并无任何重要贡献,甚至是毫无系统地、杂乱无章地围绕着人物和对象兜圈子,并充满某种晦涩的抽象议论。这种情况在最后一部著作《否定的辩证法》中尤为突出。

73

① Th. Adorno, *Filozofija nove muzike*, Beograd 1968, str. 152.

② Th. Adorno, *Filozofija nove muzike*, Beograd 1968, str. 153.

③ Th. Adorno, *Filozofija nove muzike*, Beograd 1968, str. 155.

④ 这类著作有:《道德的最低值》(*Minima Moralia*, 1951)、《认识论的批判之批判》(*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1956)、《真实性的行话》(*Jargon der Eigentlichkeit*, 1964)和《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 Dialektik*, 1966)。

在这部著作中,他越来越没有批判性理论曾经有过并希望具有的那种批判倾向和历史共鸣。

三、于尔根·哈贝马斯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年轻成员当中,应当首先提到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 -)。他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的哲学和社会学教授,一位富有批判精神和独立见解的英才。他以其具有创见的著述和对有关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的理论讨论的参与,成了最著名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之一。^①

最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系统地研究了公共领域结构的变化问题。他揭示了公共领域从其在封建社会中具有典型特征,经过其在17、18和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中发展出各种各样的形式(报纸、刊物和俱乐部等),直至其在当代瓦解的整个过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公共领域在反对僵化了的封建关系体系的斗争中具有批判职能,但是在19世纪中叶,其批判意向已经丧失,因为这时资产阶级已经感到自己的政权相当稳固了。一个世纪之后,知识分子已同社会融为一体,成了文化部门、经营管理机构和官僚机关的收入丰厚的职能人员。但作为一种体制,知识分子仍然是一支先锋队;与其相适应的是在少数富有创造性和批判精神的专家及其抽象的艺术、文学和哲学作品同受大众报道和宣传媒介控制的很大一部分公众之间出现日益加强的离异。^②

在当代,私人范围、私人垄断和国家结合在一起,公共领域结构的变化更为深刻,因为大众通信手段,不管其是否被私人掌握,预先就已

^① 在这一讨论中的最重要的内容,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研究,都发表在他的《理论与实践》(*Theorie und Praxis*, Neuwied am Rhein 1963)一书中。哈贝马斯现在在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研究所工作。

^② 参见 Jürgen Habermas,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Neuwied 1962, str. 192 - 193。

经由追求完全是一定的阶级目的和集团目的的公共领域所操纵。在自由主义的公共领域模式中,发牢骚的公众机构由于掌握在私人手中而免遭官方权力的侵犯。一百年之后,事情已完全改变了。这些媒介日益商业化,在经济上和技术上日益集中化,成了复杂的社会权力。这些媒介仍然掌握在私人手中,恰恰给政论的批判职能带来更大的危害。与自由主义时代的报刊不同,大众通信手段已经获得远为广阔的活动范围,公共领域范围因而也扩大了。这些体制甚至已从公共领域侵入商品关系的私人领域,并日益服从个人或集体的私人利益。以前是报刊通过转述或渲染的方式表达作为私人群体的公众的牢骚,现在则由大众媒介来表达了。^①“以前,新闻宣传必须反对专制君主的秘密政策:它竭力使个人或事物服从公众理智,从而使政治决策在公众舆论审定之前能够得到修正。而现在则相反,新闻宣传要借助于当事者的秘密政策才能实现:它使某一个人或事物获得公众威望,从而使之在非公众的舆论的气氛之中能获得一片喝彩声。”^②

重大政治事件的相互关联性发展了。公共领域丧失了自己对私人范围以及对“世界公共领域”的界限。阶级的党成了某种形式的“一体化的党”,它时不时地要求自己的选民替自己喝彩捧场。今天,党的这种类型已是党的主要类型。对于这种类型的党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谁拥有实力手段和教育手段,能在选举中通过明里炫示实力或暗中实行操纵影响民众的态度。这样,党就成了制造意志的工具,但这种工具并不掌握在公众手中,而是掌握在那些建立党的机构的人手中。这样,议会的作用自然也改变了。议会从一个进行辩论的实体变成炫示实力的实体。讨论的基本目的在于向公共领域炫示党的意志。“在议会的职能变化上,显然,公共领域的质疑性质已为国家制度的组织原则所取代:公开批判(由公众进行的批判)原则已改变为一体化指导(由炫示实力的机构——政权当局或联合会,首先是党进行指

75

① 参见 Jürgen Habermas,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Neuwied 1962, str. 207 - 208.

② Jürgen Habermas,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Neuwied 1962, str. 220 - 221.

导)的原则。”^①自由主义国家变成社会法治国家,这种变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改变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和职能及与之有联系的一切现象,致使批判性的公共领域同以操纵为目的的公共领域处于经常不断的矛盾之中。这样,哈贝马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性分析,在公共领域现象方面指出了这样的内部过程,这些过程导致个人和个别自由集团的真正自由和批判职能的日益消失,导致机构和国家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权力的日益增长。

76 哈贝马斯从事的另一部分研究是认识 and 兴趣问题。他的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激进的认识批判只有作为社会理论才是可能的。^②哈贝马斯以我们上面已经介绍过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位代表所特具的精神,考察了哲学的某些实质性问题,特别是考察了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意向。他在自己关于认识和兴趣的论述中分析了这些关系,并提出了如下几点观点。首先,先验主体的活动在人类的类的自然历史中具有自己的基础,因而认识同样也是自我保存的工具,如同它把纯粹的自我保存也先验化一样。^③作为出发点的第三命题是:认识引导的兴趣在劳动媒介、语言媒介和统治媒介中形成。其次,在自我反思的力量中,认识和兴趣是同一的。最后,“认识和兴趣的统一显示在一种辩证法之中,这种辩证法从被压抑的对话的历史轨迹中重建被压抑的东西”^④。

哈贝马斯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主要代表人物一样,以其对当代

① Jürgen Habermas,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Neuwied 1962, str. 227.

② 关于这个问题,哈贝马斯在《认识和兴趣》(*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Frankfurt a. M. 1968)一书中做了从康德和黑格尔起,经过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直至尼采和弗洛伊德的历史考察,而他在法兰克福就职后首次讲授《认识和兴趣》(1965年)时曾系统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关于社会理论问题,还可参见他和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合著的《社会的理论或社会技术》(*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 Frankfurt a. M. 1971)一书中他与尼·卢曼的讨论。

③ 参见 Jürgen Habermas,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in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Frankfurt a. M. 1968, str. 161 - 162.

④ Jürgen Habermas,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str. 164.

文明的分析,以其对当代操纵社会的非人化性质的批判性揭露,在促进青年一代批判地看待其自身地位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然而,近几年来,在左派运动的具体实践中出现了尖锐的分歧。这些尖锐分歧不仅存在于左派运动内部,而且存在于这一运动与其先锋部分和哈贝马斯之间。在估计革命时机、引起革命形势的可能性以及实行行动的手段方面,哈贝马斯针对学生运动提出了一系列批判性反思和责难,从而引起对话和或多或少的激烈反应。^①

在一些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当中,我们还可以指出一位较老的代表人物,这就是弗里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他专门研究自动化问题。其次,我们还可以指出阿尔弗雷德·施米特(Alfred Schmidt)和奥斯卡·内格特(Oskar Negt)。^②

四、赫伯特·马尔库塞

77

一位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以自己的哲学参与和理论参与,在20世纪60年代对一部分欧洲左派,特别是对大学生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① 哈贝马斯的观点和新左派一些代表人物的答复,参见《左派对于尔根·哈贝马斯的答复》(*Die Linke antwortet Jürgen Habermas*, Frankfurt a. M. 1968)。

② 弗·波洛克的主要著作是《自动化在美国。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考察》(*Automation in U. S. A. Betrachtungen zur zweiten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Frankfurt a. M. 1955)。阿尔弗雷德·施米特发表了令人瞩目的著作《马克思学说中的自然界概念》(*Der Begriff der Natur in der Lehre von Marx*, Frankfurt a. M. 1962)和《历史和结构》(*Geschichte und Struktur*, München 1971)。奥斯卡·内格特是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上述《左派对于尔根·哈贝马斯的答复》一书的出版者,他还出版了下面一些书:《暴力的复活。施普林格的封锁和在联邦德国的政治反动》(*Die Auferstehung der Gewalt. Springerblockade und politische Reaktion in der Bundesrepublik*, Hrsg. Von Heinz Grossmann und Oskar Negt, Frankfurt a. M. 1968)、《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民主。论政治、历史和道德的关系》(*Keine Demokratie ohne Sozialismus. Über den Zusammenhang von Politik, Geschichte und Moral*, Frankfurt a. M. 1976)。关于法兰克福派,可参见下列文献:Martin Jay, *Dialektische Phantasie. Die Geschichte der Frankfurter Schule und des Just. Für Sozialforschung 1923 - 1950*, Frankfurt a. M.; Gian Enrico Rusconi, *La teoria critica della società*, Bologna 1970; A. Schmidt, *Zur Idee der Kritischen Theorie*, München 1974。

这就是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①。他与他的法兰克福学派同事们有着相似的生活道路。他的思想在战后德国的环境(我们已有机会从各个方面介绍过这一环境)中发展起来。在欧洲唯心主义通过舍勒(M. Scheler)、狄尔泰(W. Dilthey)、雅斯贝尔斯(K. Jaspers)、海德格尔和稍后的存在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通过布洛赫、本雅明、卢卡奇和科尔施(K. Korsch)日益注意探讨的问题上,马尔库塞显示出敏锐的目光。这就是哲学史问题和人类学问题。要探讨这些问题,自然必须重新研究最深刻的理论传统,即研究黑格尔和马克思。

因此,马尔库塞的思想探索,直至他的“批判的社会理论”概念,或多或少带有上述思想家,特别是黑格尔、卢卡奇、海德格尔和马克思的痕迹。^② 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写的上述著作,以及稍后在《社会研究杂志》中写的文章都向我们表明,他是从掌握马克思的重要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转到独立分析当代文明的一位思想家。

78

马尔库塞的《理性和革命》(1941年)一书扼要地显示了他的研究成果。该书的初版在美国问世。他是1933年以后同其他人一样被迫流亡到这里的。^③ 当纳粹硬说黑格尔(还有尼采)是德意志主义思想(其最高的化身就是最野蛮的法西斯主义!)最重要的奠基人,而苏联

① 马尔库塞于1979年去世,弗兰尼茨基发表此书时马尔库塞还健在,因此,他只标注了马尔库塞的出生时间。类似的情况在本书中还有很多,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一律直接补充相关人物的去世时间。——译者注

② 马尔库塞如下的早期著作表明了这一点:《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现象学(哲学分册)》(*Beiträge zu einer Phänomenolog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Philosophische Hefte]*, 1928)、《黑格尔的本体论和一种历史性理论的基础的奠定》(*Hegels Ontologie und die Grundlegung einer Theorie der Geschichtlichkeit*, 1932)、《辩证法问题》(*Zum Problem der Dialektik, Gesellschaft* 1932)。同年发表的、上面已提到过的对当时刚刚发表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观点进行分析的文章《奠定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文献》(*Neue Quellen zur Grundlegung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Gesellschaft* 1932),以及《论经济科学的劳动概念的哲学基础》(*Über die philosophischen Grundlagen des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sbegriffs*, 1933),明显地说明他是一位在理论上、思想上和品质上有条件进行更彻底、更具有独创性的理论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③ 马尔库塞起初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所成员,随后,1942—1945年在华盛顿任国务院的一个室的主任,后任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布兰迪斯大学教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

的斯大林主义思想家又宣布黑格尔是一位贵族反动派的时候,马尔库塞却用这一著作的很大一部分篇幅去阐述这位思想家,因为不了解这位思想家,也就不能了解这位思想家的伟大的、历史性的否定者——卡尔·马克思。

马尔库塞站在黑格尔—马克思这一路线上,不仅试图说明马克思的理论探求的意义,而且试图说明当代的历史分歧。马尔库塞坚定地维护“批判的社会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哲学概念是社会经济学范畴,而黑格尔的社会经济学范畴则是哲学概念。因此,“甚至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也不是哲学著作。它们表现出对哲学的否定,尽管用的是哲学的语言”^①。马尔库塞的出发点是,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全部范畴完成于现存制度之中,而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全部范畴关系到对现存制度的否定。马克思的理论是这种意义上的批判:“一切概念表示着对现存制度的总体的指控。”^②

马尔库塞在阐述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分析的同时,断言辩证法永远是“否定的辩证法”。任何事实永远高于纯粹的事实,任何事实都是现实可能性的否定和限制。雇佣劳动是事实,但也是对似乎能满足人的需要的自由劳动的限制。因此,马克思认为消灭私有制不是目的自身,而是消灭异化劳动的手段。“生产资料社会化,与任何其他经济制度一样,纯粹是经济事实。它要开创新的社会制度的要求,取决于人与社会化了的生产资料的关系。如果社会化了的生产资料并没有被利用来发展自由的个人和满足他们的需要,就会仅仅是使个人屈从于物化了的共性的一种新形式。如果自由的个人而不是‘社会’成为社会化了的生产资料的主人,消灭私有制才会开创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③

79

^① H. Marcuse, *Um i revolucija*, Sarajevo 1966, str. 233. 但我们认为,只有在把哲学仅仅理解为传统哲学的某些极端的表現时,这一论点才是有道理的。

^② H. Marcuse, *Um i revolucija*, Sarajevo 1966, str. 233.

^③ H. Marcuse, *Um i revolucija*, Sarajevo 1966, str. 254.

马尔库塞认为,消灭了无产阶级,劳动也随之被消灭。这样,马尔库塞恢复了马克思特别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定的课题,认为共产主义不是解放“劳动”,而是消灭“劳动”。他认为,资本主义本身消灭了封建主义社会中把劳动的形式与阶级归属严格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社会强制,也就实现了自由劳动。

但是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设想未来的劳动形式与现有的劳动形式极不相同,因而在使用同一个‘劳动’术语去同等地表示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过程方面犹疑不决。他使用‘劳动’这个术语去表示他在最终的分析中实际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去表示在商品生产中创造剩余价值的活动,也就是‘生产资本’的活动”^①。另一种活动不是“生产劳动”,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可见,劳动意味着“不让从事劳动的个人获得自由的和全面的发展,因而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解放同时就是劳动的否定”^②。

80 基本问题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观念之中。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看来,真理存在于每个人按自己的方式所理解的否定的总体之中。在黑格尔看来,否定的总体是理性的总体,即最终与历史的理性体系同一的封闭的本体论体系。马克思则相反,他使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基础相分离。现实的否定性成为不能作为某种形而上学的状态实体化的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涉及的总体是阶级社会的总体,而作为阶级社会的矛盾的基础的否定性是阶级关系的否定性。“辩证的总体又包括自然界,但仅仅是在自然界进入社会再生产的历

① H. Marcuse, *Um i revolucija*, Sarajevo 1966, str. 262.

② H. Marcuse, *Um i revolucija*, Sarajevo 1966, str. 262. 马尔库塞的这种说明是以他在一篇论述劳动概念的文章中的思考为根据的。他在那篇文章中得出结论说,经济和社会的分工,以及分工造成的具体的存在整体划分成相对立的存在方式,是异化劳动的原因。克服这种划分,是人的存在能够重新获得自己真正的劳动的前提,是劳动能够从异化和物化中解放出来,重新成为按其本质应当成为的东西的前提,即“整体的人在其历史的世界的完全和自由的实现”的前提。(*Über die philosophischen Grundlagen des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sbegriffs*, Kultur und Gesellschaft 2, Frankfurt a. Main 1965, str. 47 - 48) 马尔库塞在这里论述“劳动”这个术语时坚持同样的主张。

史过程并决定着这一过程的范围内。在阶级社会的前进中,这一再生产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形式,而这些形式构成全部辩证概念的范围。这样,辩证的方法按其本性成了历史的方法。辩证的原则并不是可以同等地应用于任何对象的普遍的原则。当然,人们对任何一个事实进行辩证的分析,例如列宁在著名的讨论中对一杯水进行的分析那样。但是所有这样的分析是被导入历史社会过程的结构中去的,并表明,这一过程对于被分析的事实是决定性的。辩证法把这一事实理解为某一特定历史总体的因素。这些因素不能独立于某一特定历史总体之外。”^①

除了上述限制,即把辩证法限定为历史辩证法之外,马尔库塞还进一步限制辩证法的作用范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它涉及某一历史运动的特别阶段这个意义上才是历史的方法。黑格尔如此抽象地表述的发展仅仅是人类历史的某一特别阶段,即人类的产生史,阶级社会的历史,马克思称之为前史。“人类真正的历史将从这一社会被推翻的时候开始。黑格尔的辩证法提供前史发展的抽象的逻辑的形式,马克思的辩证法提供实在的具体运动。马克思的辩证法因此依然与前史阶段相联系。”^②

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特征的否定性是阶级社会中人的存在所固有的否定性,因此,在马尔库塞看来,它存在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之中,因为否定性是在无阶级社会中改变历史运动的整个结构的前提。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依然反映着盲目的经济力量对历史进程的统治,这一阶级的历史进程的运动是辩证的,因为这一运动还没有由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自觉活动来支配,辩证的规律是对社会的“自

81

① H. Marcuse, *Um i revolucija*, Sarajevo 1966, str. 280.

② H. Marcuse, *Um i revolucija*, Sarajevo 1966, str. 281 - 282.

然”规律的认识。^①

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同阶级社会的历史联系起来的概念是必然性的概念。尽管马克思的理论同宿命的决定论没有联系,但是的确,唯物史观本身包含决定论的原则:意识由社会存在决定。但是这种必然的依赖性在马尔库塞看来只适用于阶级社会。限制和扭曲人的可能性的生产关系,必然决定着人的意识,因为社会不是自由的自觉的主体。只要人还没有能力支配这些关系,这些关系就采取一种客观的独立的实体的形式,而这些关系所统治的意识就必然是意识形态的。“诚然,人的意识今后将仍由再生产着人类社会的物质过程来决定,甚至当人类已达到能够调节社会关系,使之能最好地促进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时候。但是,当这些物质过程变得合理,变成人的自觉的工作的时候,意识对社会关系的盲目依赖也就不复存在。当理性由合理的社会关系决定的时候,它就是自己决定自己了。社会主义的自由包含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的两个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导致本身的自我否定。”^②

由此可见,马尔库塞把马克思的辩证法构想为历史的辩证法,这种历史的辩证法只适用于阶级的历史。同时由此可见,马尔库塞还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看作是实现一个新的、没有阶级的和自由的人类共同体的可能性的假设。这特别表现在他论述弗洛伊德(S. Freud)的心理分析的内容十分丰富的著作中。在这一著作中,他不同意弗洛伊德那种不可能有“非压制性的文明”的论点。理由之一是他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本身容许有这种可能性。理由之二是压制性的文明的成就本身创造着逐渐取消压制的条件。马尔库塞试图证明,爱

^① 但是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辩证法仅仅与阶级社会时期相联系。马尔库塞在同一页上也假定说,在未来时期,否定性和矛盾性也将不会消失。只有在未来时期,当自由的主体成为这一斗争中的主角的时候,辩证法才将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存在,从而人们才不能把前史的辩证法结构强加给人类的未来历史。(Um i revolucija, Sarajevo 1966, str. 282)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同的辩证结构还要求新的理论的辩证的说明。

^② H. Marcuse, Um i revolucija, Sarajevo 1966, str. 284 - 285.

欲原则和现实原则(弗洛伊德)之间的对抗来自一定的社会关系。从一定的社会劳动组织中产生出来的统治和异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实原则加给爱欲的强制。“由于工作日的长短是现实原则压制爱欲原则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工作日缩短至一定的点,使劳动时间量本身不再妨碍人的发展,这是自由的第一个条件。工作日的缩短本身肯定会使最先进的工业国家现有的生活水平大大降低。但是,回到较低的生活水平(效率原则的破坏会导致这一状况),与自由的进步并不矛盾。那种认为越来越高的生活水平是自由的条件的说法很容易成为替压迫辩解的论据。用汽车、电视机、飞船和拖拉机给生活水平下的定义,是功效原则本身的定义。越出这一原则的支配范围之外,生活水平是用其他标准来衡量的;这些标准是:人的基本需要的普遍满足,无过无错,无忧无虑——不管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不管是本能的还是‘理性的’。”^①

从这些理论基础出发,马尔库塞对当代文明进行了批判的分析。他在为《理性和革命》1954年版而写的跋中,就已提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绝大部分与这个社会一体化的论点。在这一著作中,对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体系的批判,由于考虑到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依存,而包含有新的特色。马尔库塞认为,十月革命后众所周知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巩固。中欧的革命失败使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陷于孤立无援,并走上依靠自身资源实行恐怖的工业化的道路。^② 马尔库塞认为,后来高度合理化和工业化的苏维埃社会的发展,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总动员和联合,国际的协调一致又增强了民族的协调一致,使顺应时势不仅对于

83

^① H. Marcuse, *Eros i civilizacija*, Zagreb 1965, str. 124.

^② H. Marcuse, *Um i revolucija*, str. 379. 应当指出,马尔库塞在这里和以后,无保留地加以概括的只是某些历史现象,在这里概括了美国社会(大部分是美国工人阶级)和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看法。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对斯大林主义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意识形态上的成见,但也有许多本能的社会主义要求。马尔库塞稍后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Soviet Marxism*, New York 1958)一书中尖锐地批判了苏联的意识形态及其马克思主义的变种。

个人,而且对于民族成了生死存亡的问题。辩证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所设想的另外的理性和自由的形式观念又显得是一种空想。然而,“构成现今时期的历史内容的反对个人最终解放的总动员表明,这一解放的可能性是何等现实”^①。

84

马尔库塞在其影响极大的《单向度的人》(1964年)一书中概括地论述了他关于现代文明的理论分析和看法。马尔库塞从分析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批判的基础今天已经改变了。虽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阶级,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改变了“这两个阶级的结构和职能,致使它们不再是历史改革的荷负者。在现代社会最发达的部门,维护和改善制度化的现状这种超越一切的利益,使先前的对抗者一致起来。随着技术进步保证着共产主义社会的生长和巩固,质变的观念在非爆发性的进化这一现实主义概念面前让路了”^②。

然而,马尔库塞认为,这并不是反驳质变比其他一切变化更必要这一此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考虑到实现发达工业社会的总的性质,在19世纪得到阐述的批判理论不再充当这一社会超验化的基础了。阶级、个人、私有等等范畴丧失其批判的内涵并倾向于变成描述性的和作业性的术语。马尔库塞以前主张在批判的理论中克服哲学的观点,根据自己的这一观点,他认为,那种要使这些范畴重新获得批判意图的尝试,是一种从与历史实践相联系的理论向抽象的思辨的倒退,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向哲学的倒退。

虽然我们只能部分地同意马尔库塞的这一观点,但我们要指出,

^① H. Marcuse, *Um i revolucija*, str. 380.

^② H. Marcuse, *Čovjek jedne dimenzije*, Sarajevo 1968, str. 13. 马尔库塞在另一个地方主张所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共有的关于自由生产者联合的论点。马尔库塞同意苏联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观点:苏维埃制度可以不必经过社会的基本制度的爆炸而进化,同时他指出,真理的另外一半在于:“量变会不断地变为质变,变为国家、党、计划等等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独立的力量的消失。只要这一变化不触动社会的物质基础(国家化的生产过程),它就只限于是一种政治革命。如果这一变化能导致在人的生存基础本身中,即在必要劳动范围内自我规定,它就会是历史上最激进和最完全的革命。”(*Čovjek jedne dimenzije*, str. 57)

马尔库塞承认,整个当代含糊不清的形势包含着更为根本的含糊不清。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从开始到结尾,正如他在导言中所说的,都在两个相互矛盾的假设之间摇摆:1. 发达的社会能够阻碍质变,阻碍可预见的未来的形成;2. 存在着能够破坏这种障碍并使社会革命化的力量和倾向。^①

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盛行的是舒适的、宽容的、合理的、民主的不自由。这是技术进步的表现和后果,因为在技术进步之中,批判的思想和持反对派的态度权利丧失了自己的活动基础,并且,社会看来日益能够满足个人的需要,这固然要根据社会如何组织而定。但是自由的主动性从整体上说从来都不曾是天赐之福。“如果是劳动或饥饿的自由,那么自由对于绝大多数居民来说就是辛苦劳累、朝不保夕和忧虑恐惧。如果个人不再被迫在市场上以一个自由的经济主体表现自己,那么,这种自由的消失便是文明的一个巨大的成就了。工艺的机器化和标准化过程能够把个人的能力释放出来,越过那必然性达到前所未见的自由王国。人的存在的内部结构就会发生变化;个人就会摆脱异己的需求和异己的可能强加于他的劳动世界,就会自由地在生活中运用独立自主,生活成了他自己的。如果对生产机构的组织和指挥能够从满足必要的需要出发加以考虑,那么,这一生产机构可以是极端集中化的;这样的一种监督并不会妨碍个人的独立自主,而会使个人的独立自主成为可能。”^②

这是发达工业文明的可能条件,技术合理性的“目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倾向。这个社会随着它的技术基础的建立而趋向极权主义。“因为‘极权主义’并不只是一种社会的恐怖主义的政治一体化,而且是一种社会非恐怖主义的经济技术一体化,这种一体化通过传统的利益对需求的操纵产生作用。它这样防止着一种与整体对抗的有效的反对派的兴起。助长着极权主义的不只是一种特殊的政府形式或政

^① 参见 H. Marcuse, *Čovjek jedne dimenzije*, str. 15.

^② H. Marcuse, *Čovjek jedne dimenzije*, str. 22.

党统治,而且还有一种特殊的,完全可以同党派、报刊和‘调解权力’的‘多元主义’相安共存的生产制度和分配制度。”^①

86

这是十分重要的观点和论断,许许多多的所谓“自由世界”的代言人对此还不明白。马尔库塞甚至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引起对新的经济、政治和理智自由观念的需要,因为与社会新的可能条件相适应的实现形式是必需的。而反对这种进步努力的最有效的武器是强迫人们接受使旧的生存斗争观念和形式永存的物质需求和理智需求。

这样,马尔库塞也论述到人的需求这个十分困难,同时又是根本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一定的意义上,人的需求是历史的需求,于是,区别真伪历史需求的标准问题也被提出来了:“对压迫感兴趣的一部分社会势力强加给个人的那些需求是虚假的,因为这些需求使艰苦的劳动、侵略、贫困和不公正永久化。”^②满足这些需求,对于人来说令人愉快的,但是我们不应当维护这些需求,因为这些需求会抑制人的能力,使他不能认识整体的疾病,不能把握时机医治这些疾病。“绝大多数广为流行的、与广告上大吹大擂的宣传相一致的放松、消遣、修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恨等等需求,都属于虚假需求的范畴。”^③

什么是真正的和虚假的需求,这只能由个人自己去回答,但是他只有在自己是自由人的时候才能做出自己的回答:如果他受到阻碍——他受人操纵时就受到阻碍——,他的回答就不可能是标准的,人们也就不应当把他的回答理解为他自己的回答。在现代社会中,形势非同平常:人与强加于他的存在同一,并在这存在之中找到自身的满足。异化已成为客观的,异化的主体消失在自己异化的存在之中。在这种形势下,意识形态的终结,如一些人所期待的,纯是幻想。发达的社会在一定意义上是比先前的社会更为意识形态的,因为意识形态存在于生产过程本身之中。技术的合理性、大批商品的生产、娱乐和

① H. Marcuse, *Čovjek jedne dimenzije*, str. 22 - 23.

② H. Marcuse, *Čovjek jedne dimenzije*, str. 24.

③ H. Marcuse, *Čovjek jedne dimenzije*, str. 24.

信息的生产等等,使那些把消费者和生产者联系起来的规定的准则以及习惯、情感上和理智上的反应显露出来。“产品教训人和操纵人,产生一种不受人的错误影响的错误意识。当这些有利的产品到达更多的社会阶层中更多的个人的手里时,它们带来的教训就不再是广告;教训成了生活方式。这是好的生活方式——比以前的好得多——,并且,它作为一种好的生活方式而抗拒质变。于是产生一种单向度的思维和行为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那些就其自身内容来说使现存的言论和行动的宇宙超验化的观念、追求和目标,不是被拒绝,就是被贬低为这个宇宙的概念。这些观念、追求和目标则由现有制度的合理性及其量的增长来重新决定。”^①

科学的方法论只局限在物理学的操作主义、社会科学的行为主义这些过程的范围内。完全的经验主义是一般的特征。坚持这种方法,势必竭力去使思想和行为摆脱既定的现实。^②批判的思维与现代新实证主义、语言哲学等等相反,竭力表明现有的合理性的不合理的性质,规定改变这同一个合理性的倾向。批判的思维本身为此发展了力量和可能,而这首先是日益增多的技术合理性的可能。“技术的变革同时是政治的变革,但政治变革只有在它改变技术进步的方向,就是说发展新的技术时才会转变为社会的质变。这是因为现有的技术已成为破坏性的政治的工具。”^③

技术的主宰地位从个别的集团转移到新的国家和中央计划,这不是一种解决办法。技术依赖于内在地不是工艺学的目的。“工艺学的合理性越是摆脱自己的剥削者的特征,越是规定着社会生产,它就越依赖于政治指引,依赖于这样的集体的努力——争取太平的生存,

① H. Marcuse, *Čovjek jedne dimenzije*, str. 30.

② 在这里我们将略而不谈对形式逻辑、对同一而不是否定的思维、对矛盾的十分彻底的批判,略而不谈对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批判。我们已经看到过,所有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共同进行了这种批判。

③ H. Marcuse, *Čovjek jedne dimenzije*, str. 211.

88

连同达到自由的个人自己给自己所定的目标。”^①从太平出发改建社会基础,这意味着权力在量上和质上的缩减。这是不能以“废除劳动”的浪漫解释或“劳动成了游戏”的论点去达到的。富裕这个观念,在发达的文明中如同在中世纪那样,也是意识形态的。“因为人与自然界的斗争越来越是人与其社会的斗争,社会对个人的强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合理’,并因而更必要。只要必然性的王国继续存在,从性质不同的目的去考虑建立这个王国,不仅会改变社会必要生产的方式,而且会改变社会必要生产的规模。”^②

马尔库塞认为,这一质变的前提是发达的生活水平中的量变、过度发达的缩减,因为这样的生活水平不是实现太平的生存的适宜的模式。今天的这种生活水平和富裕社会,人们是不值得为之做这么大的牺牲的。这种生活水平和富裕社会的实现,给人们带来的是使人迟钝的劳动的永久化,是意识的受操纵,是各种各样的沮丧。要达到人的真正的自我规定,取决于对生产和财富分配的有效社会监督。而这在各种利益对立的社会自然是做不到的。除了社会基础的根本改变之外,“自我决定的实现要看群众在多大程度上溶解为个人,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一切宣传、训练和操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认识和掌握事实、能够决断选择。换句话说,社会的合理和自由,要看社会在多大程度上由一个崭新的历史主体来组织、维持和再生产”^③。

89

然而,仅仅有这一根本变革的必要性的意识还是不够的。没有物质的力量,即使最敏锐的意识也是无能为力的。“批判的理论的弱点恰恰就在于它没有能力在现存社会内部揭示解放的倾向。”^④批判的理论产生于19世纪。在自己产生的时候,它面前曾存在这样的力量。今天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单向度社会的总体倾向使传统的道路和手

① H. Marcuse, *Čovjek jedne dimenzije*, str. 218.

② H. Marcuse, *Čovjek jedne dimenzije*, str. 222.

③ H. Marcuse, *Čovjek jedne dimenzije*, str. 232.

④ H. Marcuse, *Čovjek jedne dimenzije*, str. 234.

段不起作用,甚至变得危险了,因为它抱住人民主权的幻想不放。这里面有某些真理,因为人民先前是社会变革的酵母,现在已变成社会统一的酵母了。“说实在的,在人民的保守基础的表面之下有被唾弃者和被排斥者——其他种族和其他肤色的被剥削者和被迫害者、失业者和丧失劳动能力者的培养基。他们生存于民主过程之外;他们的生活最迫切最实在地要求消灭不堪忍受的关系和制度。因此,他们的反对派立场是革命的,哪怕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的。他们的反对派立场从外部去攻击制度,因而不为制度所左右;他们的反对派立场是一种原始的力量,它破坏游戏规则,从而揭穿这是一种经过巧妙伪装的游戏……他们开始拒绝参加这一游戏这一事实,可能意味着一个时期结束的开始。”^①

在这一著作中,马尔库塞还论述了否定,同时完全坦率地承认批判的理论没有找到解决目前形势的办法。在上述力量的冲突中,他既看到可能性,也看到悲剧性,因为社会的力量是强大的,但是他同时还看到历史的极端——人类最进步的意识 and 人类最受剥削的力量——重新结合的希望。“批判的社会理论并不拥有能够填平今天和未来之间的鸿沟的概念;它不做任何许诺,不显示成功,它依然是否定的。因此,它希望依然忠实于那些过去和现在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伟大的拒绝的人们。”^②

马尔库塞在发表了这一著作之后不久,又发表了一部篇幅不大,但十分重要和受人欢迎的著作,一部献给他的布兰迪斯大学学生们的关于压抑的宽容的著作。在这一著作中,马尔库塞表明对目前形势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宽容概念如果与反对压制思想自由和政治解放实践有关,就可以成为党派性的、破坏性的和解放性的概念,另一方面,宽容概念也可以为征服的利益服务。

宽容是自我目的,因为尽可能地限制暴力和征服,使人免受侵略

^① H. Marcuse, *Čovjek jedne dimenzije*, str. 236.

^② H. Marcuse, *Čovjek jedne dimenzije*, str. 236.

90 乃是人之常情。然而,在今天占统治地位的压迫社会中,进步运动在争取比较宽容的关系或争取始终利用现有的民主权利的斗争中也会招致相反的后果。它会给总体的统治造成有民主自由存在的假象,而实际上这种民主自由早已改变了自身的内容和失去了自身的作用。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自由的存在和利用,仍然是恢复其原先的反对派职能的前提条件。换句话说:“只有在宽容确实是全面的,并且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主人和仆人、追捕者和追捕者的牺牲品都利用宽容的时候,宽容才是自我目的。只有任何真正的或所谓的敌人都不需要教育和培养人民进行侵略和残暴活动的时候,这种全面的宽容才是可能的。只要这些条件不具备,宽容的条件是‘有沉重负担的’,是由制度化了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自然与宪法的平等相一致)打上烙印和规定的,就是说是由社会的阶级结构打上烙印和规定的。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宽容实际上只限于在合法的暴力或压迫(警察、军队、形形色色的监督者)的基础之上,只限于在占统治地位的利益及其‘靠山’占据关键地位的基础之上。”^①

尽管宽容是进一步解放的前提条件,但从言行中表现出来的内容看,它并不是毫无差别地相等同的。它绝不能维护捏造的谎言和不公正的行为。这样的宽容在并无恶意的争论中,在学术辩论中,在科学和私人信仰中固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社会不能在太平盛世的地方和在自由幸福尚成问题的地方同样行事,因为在后一种地方,某些事情不能说,某些思想不能表露,某些政治措施不能提出,某些行为不可能得到允许,宽容也就成了继续实行奴役的一种工具”^②。

91 在这种社会里并不存在真正的宽容的条件。必须创造这样的条

^① H. Marcuse, *Repressive Toleranz*, in R. P. Wolff, B. Moore, H. Marcuse, *Kritik der reinen Toleranz*, Frankfurt a. M. 1968, str. 96.

^② H. Marcuse, *Repressive Toleranz*, str. 99 - 100.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市场对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在其中,激进的冲动和对现实的抗议已丧失殆尽)的宽容,马尔库塞接着说道:“同样,对文学艺术的检查无论如何是倒行逆施。真正的艺术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是压迫的支柱,而假艺术(它可以是压迫的支柱)并不是艺术。”(*Repressive Toleranz*, str. 100)

件,使宽容能够成为解放的和实行人道的力量。如果宽容首先用来维护和支持压制性的社会,如果宽容用来消除反对派和消除人们对其他的较好的生活方式的向往,那么,宽容就变得反常。在这种情况下,冲破错误的、意识形态化了的意识就成了关键。这种冲破是不可能立即在广泛的战线实现的,而首先只能在有限的地方实现。今天,解放的力量并不等同于某一社会阶级。这一力量分散于整个社会,进行斗争的少数或孤立的集团往往存在于反对自身领导的反对派之中。这样,马尔库塞再一次鼓励那些小集团,特别是大学生增强自己的历史参与的明确意识,增强革命行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明确意识。

马尔库塞在这一著作中力图指出发达的民主社会出现的变化,在这样的社会中,宽容的自由化功能也改变了。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力图削弱对反对派运动实行宽容的范围及加强保守和反动的势力。这样,他认为,被压迫的少数具有反抗的“自然权利”,具有采取法律之外的手段的“自然权利”,因此,合法的手段已经显得不够了。“法律和秩序到处是、永远是维护现有等级制的人的法律和秩序;对那些在这种法律和秩序下呻吟并反抗(不是为了私人利益和出于私人仇恨,而是为了成为人)的人诉诸这种法律和秩序的绝对权威,那是荒谬的。除了指定的当局、警察及其自身良心之外,没有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任何法官。当他们使用暴力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开始锻造任何新的暴行链条,而是打碎现有的暴行链条。这是因为他们会受到惩罚,他们知道这一风险,而如果他们愿意承担这一风险,任何第三者,至少是教育者和智者都无权训导他们节制。”^①

由于这些著作和在欧美学生集会上的众多表现,马尔库塞成了学生运动的主要思想家之一。他对福利社会、对发达社会的资产阶级民主(他揭露它的反面是全面的压制、不自由和操纵)的分析和批判,给新左派的某些主张提供的要素是最多的。

92

^① H. Marcuse, *Repressive Toleranz*, str. 127 - 128.

马尔库塞的批判,正如我们在他的著作《单向度的人》中所看到的,仍然主要是否定的。他没有提供解决办法。这种结果与革命运动出现某种危机相适应。正如我们往后将看到的,这种危机不仅表现在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上已同现存社会一体化(虽然这种一体化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是附带很多条件的、暂时的和各不相同的)中,表现在新的社会结构的产生中,而且由此也表现在各个社会阶层的作用已经发生的变化中,表现在旧的斗争形式,特别是通过传统的党派进行斗争的形式的不再适用中;另一方面,危机也是对十月革命带来的革命激情的背叛的表现。

马尔库塞观点的许多解释者竭力指出,马尔库塞抛弃了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是革命运动的基础的思想,并且把历史行动的重心转移到尚未与发达社会融为一体的集团——学生、各种种族集团,甚至流氓无产阶级。人们从他的《单向度的人》这一著作中也可以得出这一结论。但是,马尔库塞在往后的一些著作中,根据革命运动,特别是欧洲的革命运动的一些经验,一再鲜明地与这种解释划清界限。1968年他在科尔丘拉夏令学园(Korčulanska ljetna škola)^①的一次集会上说道:“首先,我不认为学生本身就是这样的一种革命力量。我从未断言,学生今天可以取代工人阶级这一革命力量。这种说法是愚蠢的。今天的学生运动表现得根本不是一支背后有革命群众跟着迈进的先锋队,而是一个领先的少数派,一个斗争着的少数派,它清楚地表达了尚未表达的和绝大多数居民感到受压抑的东西。在这一意义上,今天,学生运动比任何一个孤立的运动,更是一种智力上的,并且不仅是智力上的先锋队;它首先是这样的一种历史力量,这种历史力量也许(我但愿它能如此)能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把被剥削的群众的需求和意愿清

93

^① 科尔丘拉(Korčula)是原南斯拉夫,现克罗地亚的一个位于亚得里亚海滨的小岛,是一个著名的旅游胜地,1963—1974年南斯拉夫实践派在这里连续举办了10次国际新马克思主义的论坛,称之为“科尔丘拉夏令学园”。——译者注

楚地表达出来。”^①

同样,在一篇论述学生反对派和革命的文章中,马尔库塞重申:学生反对派运动今天只是在为能够摆脱机构化了的制度的普遍危机做准备,只是当代工业无产阶级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代工业无产阶级在提出革命总号召方面根本未减本色。马尔库塞的深邃的思想,以其尖锐辛辣和毫不留情的批判,完全按照马克思辩证的和革命人道主义的意向,揭露了当代压制性的和国家主义的阶级社会的实质,认为这个社会的实质是一种敌视人类的文明。他揭穿了所谓的自由世界的回光返照式的幻觉,同时又指出了今天人类的现实的历史可能性。关于他对这一可能性所持的信念,他下面的话表达得最清楚不过了:“不,如果依然恭顺地甘愿受总体化了的、制度化了的对人的统治的束缚,那是不会幸福的,那是实现不了人的使命的,那是不可能完成真正的人的工作的。学生反对派是当今世界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它固然不是直接的革命力量,但它表现出的是一种动力,这种动力能够转变成为一种革命力量。由此,这些年的战略的最大必然性之一就在于国际大学生反对派的联合。但与此同时,又必然面临一个困难和复杂的任务——重新把理性同革命联结起来。智力无产阶级必须同今天的工业无产阶级在行动方面团结一致,具有共同的精神分母,必须使工人阶级恢复自己作为革命阶级的自信心。否则谈不上彻底实现社会主义,即人的精神、经济和政治的总体解放。”^②

当今复杂的形势要求像马尔库塞那样,不仅要做出异常的理论努力,而且有时还要提出暂时的解决办法,甚至招致危险和犯错误。但

94

^① H. Marcuse, *Carstvo slobode i carstvo nužnosti. Jedno preispitivanje*, “Praxis” 1/2, Zagreb 1969, str. 20.

^② H. Marcuse, *Studentska opozicija i revolucija*, “Razlog” 57, br. 1/1968 - 69, Zagreb, str. 11. 参见《答赫伯特·马尔库塞》(*Antworten auf Herbert Marcuse*, Ffm. 1968)一书同马尔库塞的最近的一场辩论,该书是于·哈贝马斯及其同事在纪念马尔库塞诞生70周年时出版的,并参见下列文献:Jean-Michel Palmier, *Marcuse et la nouvelle gauche*, Paris 1973; John Fry, *Marcuse Dilemma and Liberation*, Upsala 1974。

有一点是肯定的：革命地改变各种形式的垄断性的和国家主义的统治这一需要绝不会由于当今时代而成为多余的。

五、埃里希·弗洛姆

从弗洛姆(1900—1980)发表在《社会研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就已经可以看出,论文作者研究的主要是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研究同马克思的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之间的紧张地带上的社会心理学问题。“人的本性”的问题是这些研究的中心。在弗洛伊德分析了人的本能的本性以后,人们必须对有关人的存在,无论是个人存在还是社会存在的各种规定的许多问题做出回答,而这就在今天也仍然是科学和哲学的头等重要的任务。

弗洛姆早在德国就在柏林心理分析研究所开始从事心理分析研究和社会心理学研究。流亡国外以后,他在纽约和墨西哥市的大学里继续自己的工作,在那里他表现得同卡·霍尼(Karen Horney)和哈·斯·沙利文(H. S. Sullivan)的新弗洛伊德派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但是,他由于接受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人道社会主义的观念,同他们又有显著的差别。

关于人的本性这个中心问题(进步的历史行动的可能性和意向性的观点无疑也取决于这个问题),弗洛姆主要是依靠弗洛伊德的成果,同时,他又力图避免弗洛伊德的生物学主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把弗洛伊德的成果同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解释联系起来。弗洛姆认为,这两位著名思想家的根本差别在于“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决定人的力量的本性本质上是生理学本性(力比多)或者生物学本性(死亡本能和生的本能)。对于马克思来说,这种力量是在人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

中演变出来的历史力量”^①。

从这种看法中已经可以看出,弗洛姆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相一致,不是把人的本性设想为一种不变的东西;但是,他不同意人的本性有无限变化能力的论点。“如果人确实是有无限的变化能力的话,那么他事实上就可能不断被同他的幸福相对立的规范和设施所改变,而不会有调动人的本性所固有的力量去达到改变类型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人就只不过成为某种社会协议的傀儡,但是永远不会成为一种能动的存在物,这种存在物在其历史进程中提供了证明,他要不断同不符合他的资质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关系的极其强大的压力做斗争。因此,如果人只不过是文化类型的反映的话,那么从人的幸福的观点来看,事实上任何社会秩序都不能受到批判或者谴责,因为不会有‘人’的观念。”^②

弗洛姆承认,尽管人类学和心理学向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事实,但是我们只有一个“人的本性的样图”;不过,他同样认为,对人的历史和人的行为的分析给我们提供的材料,足以在今天就能确定许多东西。如果我们把人的本性不会改变以及关于人的本性有无限的变化能力这种无法证明的论点全都加以拒绝,那么剩下的就是如下的事实,即人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历史状况和自然状况,比如说,也能适应奴隶制。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就将用削弱自己的智力素质和道德素质来做出反应。人能够“适应浸透着自己成员的相互不信任和敌视态度

96

^① Erich Fromm, *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 New York 1962, str. 112. 我们再援引弗洛姆关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差别(他在其他著作的许多地方也谈到这些差别)的另一段话。他在这里指出了两个本质的差别:“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的存在及其意识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人本身是社会的一部分;而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社会只是由于人所固有的生理学器官和生物学器官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才对人的存在产生影响。从这第一个差别又产生第二个差别:弗洛伊德认为,人能够克服压抑,而不必先发生社会变化。而马克思是第一个认识到普遍的和有充分意识的人只能与社会变化一起实现,而社会变化会导致人的新的和真正人道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思想家。”(E. Fromm, *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 New York 1962, str. 113)

^② E. Fromm, *Čovjek za sebe*, Zagreb 1966, str. 31 - 32.

的文化,但他对这种适应的反应是他变得衰弱和精神创造枯萎。人可以使自己适应要求他抑制性欲的社会关系,但是,他的这种适应的结果是弗洛伊德所指出的神经官能症症状的发展。人能够适应几乎一切文化类型;但是,如果这些文化类型同他的本性相矛盾的话,那么就会产生精神的和感情的干扰,这种干扰会逐渐强迫他去改变这些关系,因为他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本性”^①。

在分析动物的存在和人的存在之间的差别时,弗洛姆强调指出了人的存在的矛盾性质。他认为,人并没有适应自然情况,因为人不仅生活在自然中,而且也生活在社会中。人用自己的社会性格超越了自己的自然存在。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又超越自然,通过自己的意识,他认识了自己的力量和无能、自己的社会界限和自然界限。弗洛姆在稍后的一部著作中写道:“我认为,当人们不是把人的本质定义为既有的质或者实体,而是把它定义为人的存在所固有的矛盾时,这种两难推论就会得到解决。”^②弗洛姆认为,这种矛盾就在于,人是一种动物,而同其他动物相比,这种动物的本能是极其不充分的;但是,同时人又是一种对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具有自我意识和意识,从而也不是像动物那样被束缚于自然的存在物。这样一来,人就经常处于一种存在的矛盾之中,他被迫面对一种必然性,即必须找到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不断创造同自然、周围的人和他自己协调一致的更高形式;这种必然性“是推动人前进的全部心理力量以及他的全部情欲、感应和恐惧的源泉”^③。所以,对于了解人的本性来说,分析从人的存在的条件中产生的人的需要是首要的前提。因此,弗洛姆以弗洛伊德的分析为出发点,首先着重分析了人的性格。正如弗洛姆自己所说,他的观点和弗洛伊德的观点之间的本质差别就是,他认为,性格的根本基础不

97

① E. Fromm, *Čovjek za sebe*, Zagreb 1966, str. 33.

② E. Fromm, *The Heart of Man*, New York 1964, str. 116. 参见 *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 str. 174 - 175; *Zdravo društvo*, Beograd 1963, str. 45 - 50.

③ E. Fromm, *Zdravo društvo*, Beograd 1963, str. 48.

在于组织的不同类型,“而在于人同世界发生关系的不同种类。人以下列方式同世界发生关系:一、通过占有和同化物;二、通过他同人(也同他自己)发生关系。第一种关系称为同化过程,第二种称为社会化过程。两者都是‘开放的’,而不像在动物那里那样,是由本能规定的”^①。

弗洛姆把这种人的关系的性格区分为非生产性取向(neproduktivna orijentacija)和生产性取向(produktivna orijentacija)的性格,他在这里把这些概念理解为“理想的类型”,这些类型在单个人那里从来不会以这种纯粹的形式,而总是以复合的形式出现。^②弗洛姆认为,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人身上存在各种不同的爱好:有一些爱好构成人的取向的危险形式的基础,从而构成“衰落的症候群”,而另一些为生活所肯定的爱好,则构成“生长的症候群”。弗洛姆在他的著作《人的心脏》中对他的分析和叙述的方向做了如下的概述:“我将举出三种现象,在我看来,这些现象是人的最恶劣、最危险的取向形式的基础;这就是死亡欲、恶性自恋癖和共生乱伦欲。这三种取向如果汇合在一起,就会形成‘衰落的症候群’,它促使人为消灭而消灭,为憎恨而憎恨。同‘衰落的症候群’相反,我将谈一谈‘生长的症候群’;这种症候群由对生活的爱(同死亡欲相反)、对人的爱(同自恋癖相反)和独立性(同共生乱伦欲相反)组成。只是在少数人身上,这种或那种症候群得到了充分的发展。”^③

弗洛姆认为,从对我们在这里必须加以探讨的这个问题的详细分析中,可以令人信服地得出结论说,人的本性有它自己的机制和规律。98
“人的本性的某些因素被确定下来,并且被看作是不可变的:满足受生

① E. Fromm, *Čovjek za sebe*, str. 63 - 64.

② 弗洛姆把性格分为两种主要类别:生产性的取向和非生产性的取向。他把积极的爱和思维算作生产性的取向,而把索取的、剥削的、积聚的和市场的取向算作非生产性的取向。参见 *Čovjek za sebe*, str. 67 - 115。

③ E. Fromm, *The Heart of Man*, str. 23.

理制约的欲望的需要以及避免孤立和道义上孤独的需要。”^①因此,他认为,人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要求发展、扩大、实现各种可能性的意愿是人所固有的,从一定的社会形式和关系以及人在这些形式和关系中的地位来看,这种意愿可能表现为社会的(创造的或者破坏的)形式,表现为追求权力,或者,当他孤立、孤独的时候,则可能表现为卑躬屈膝。在弗洛姆看来,人的本性的这一切特性中最重要的特性就是“要求生长,要求发展自己和运用他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获得的各种能力,比如说,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有区别的感觉和感官知觉的能力的愿望”^②。这些可能性中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动力,只要它在进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发展,它就会力求表现出来。人们也可能抑制和妨碍这种愿望,这就会导致新的反应,导致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压迫的憎恨,因为自由是实现一切成长和一切进步的极其重要的前提。弗洛姆就是这样企图避开生物学的和形而上学的概念以及社会学的相对主义的,因为社会学的相对主义把全部社会性格和个人性格都归因于社会环境。“人对自由和幸福享有的不可转让的权利,是建立在人的本质特性的基础上的,这些特性就是:生的欲望、扩大和发挥在历史进化过程中在他身上发展起来的能力的欲望。”^③

弗洛姆考察了人的本性的性质,认为人的发展、扩大、创造的欲望是人的本性的最本质最重要的特性,同时在这些基础上把人的自由理解为人的存在的本体论的向度;人之成为人和自由从一开始就是不可

① E. Fromm, *Bekstvo od slobode*, Beograd 1964, str. 38.

② E. Fromm, *Bekstvo od slobode*, Beograd 1964, str. 262.

③ E. Fromm, *Bekstvo od slobode*, Beograd 1964, str. 263.

分割的。^① 这些认识是理解人的存在和历史发展的推动力的重要前提,是更充分地理解那种特殊的人的东西的必要前提,而特殊的人的东西有其历史,而且它本身就是历史,对于阐明这一历史,卡·马克思做了最大的贡献。

特别是在《逃避自由》这一著作中,弗洛姆对人的发展的一些时期做了更加详细的分析;他研究人的本性的上述特征在特定的历史形势中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就是说,人对社会关系的一定变化是怎样做出反应的。他的首要前提是,人们能够从分析单个的个人中获得的结论也运用于对群体的心理学理解。根据这个前提,他在分析宗教改革时期和稍后的资本主义时期时确定,摆脱了中世纪社会的传统束缚的自由,给个人提供了独立的新鲜感觉,但是同时也在同等程度上提供了孤独的感觉,这后一感觉就是各种不同的新的非理性活动的原因。弗洛姆写道:“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指出,现代社会的结构同时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对人产生影响:人既是比较独立的、比较自信的、比较批判的,同时又是比较孤立的、比较孤独的、比较惊恐不安的。对整个自由问题的理解取决于看到事情的两个方面的能力,当人们密切注视一种迹象时,不要看不见另一种迹象。”^②

弗洛姆关心的是,对近代历史上的一系列历史现象,特别是法西斯主义现象做出回答。在法西斯主义下,大家知道,人放弃了自己的个性,放弃了自己的自我的完整性。弗洛姆所持的观点是,个人在上述情况下感到孤独,面对着作为完全被分割的实体的外部世界,就必

^①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写道:“只有当缺乏由本能规定行动的情况超过一定点的时候,当对自然的适应失去其强制性质,而行为不再由遗传机制所确定的时候,人才开始成为人。换句话说,人之成为人和自由,从一开始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这里,自由一词我们不是在其积极的意义上即‘去做什么的自由’来使用的,而是在其消极的意义上即‘摆脱什么的自由’,就是说,人的摆脱是由本能来规定行为的自由来使用的。”(*Bekstvo od slobode*, str. 47)在《人的心脏》一书中他又写道:“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不能被定义为‘按照对必然的东西的认识去行动’,而只能被定义为根据对可能的选择及其后果的认识去行动。”(*The Heart of Man*, str. 143)

^② E. Fromm, *Bekstvo od slobode*, Beograd 1964, str. 106 - 107.

定试图克服这种无法忍受的无能和孤独的状态。有一种克服的方式是获得一种“积极的自由”，用爱和劳动，通过切实实现自己感情上和智力上的能力，去达到同世界的结合。另一种方式是放弃自由，从无法忍受的状态中逃走，一句话，逃避自由，这是人的异化的一种重要的形式。这种逃避是通过各种不同的逃避机制进行的。“第一种逃避自由的机制是放弃自己的自我的独立性，同某种身外的人或物相融合，以便获得个体的自我所缺少的力量；或者换句话说，接受‘次要的条件’以权充已失去的首要条件。这种机制的比较明显的形式[弗洛姆称之为极权主义]表现为对屈服的追求和对统治的追求，或者如我们说过的，受虐狂的和施虐狂的追求，正如人们在正常人和患神经官能症的人身上不同程度地会碰到的那样。”^①

弗洛姆对施虐狂和受虐狂现象的说明不同于弗洛伊德的解释，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与威·赖希(W. Reich)和卡·霍尼的说明相一致，后面两个人把这种个人的追求归结为个人回避无法忍受的孤独和无能的感觉的努力。在某种条件下，这种受虐狂的追求相对地是卓有成效的解决办法，虽然在几乎任何一点上都不会比任何一种神经官能症的反应更好些。如果个人找到了满足这种受虐狂的追求的某种模式，比如说，屈服于元首的法西斯意识形态，那么他就会在与数以百万计的其他具有同样感觉的人的融合中获得一定的安全。^②

弗洛姆认为，另一种逃避自由的机制就是破坏，它同施虐狂和受虐狂的追求的差别在于，它既不倾向于积极的共生现象，也不倾向于消极的共生现象，而是追求消除客体。弗洛伊德认为，人身上有两种欲望：在很大程度上与性的力比多相同的求生欲望，和以消灭生命为目的的死亡欲望。与弗洛伊德的观点相反，弗洛姆认为，人们能够用

^① E. Fromm, *Bekstvo od slobode*, Beograd 1964, str. 138.

^② 参见 E. Fromm, *Bekstvo od slobode*, Beograd 1964, str. 150 - 151。弗洛姆也对施虐狂的欲望做了类似的解释。此外，他把共生现象说成是存在于施虐狂和受虐狂的本质之中的目的。

前面提到的观点来解决这个问题,按照那个观点,生活具有它自己的动力,就是说,倾向于自己的发展和实现。此后,以肯定和展现生活为目的的能力就会转化为以破坏为目的的能力。“换言之,求生的欲望和破坏的欲望并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彼此成反比的:生的欲望越是遭挫折和被禁止,破坏的欲望就越强大;人的定在越是能够展现出来,破坏的力量就越小和越稀少。”^①

101

弗洛姆更加详细地着重谈到另一个逃避机制,他认为,这一机制首先在现代文明中具有很大的社会意义:个人适应文明向他提供的一切。个人将像其他一切人那样存在,他的“自我”和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消失,而对孤独和无能的恐惧也随之消失。这种表面上的安全是从一定的行为机制中产生的,做这种适应的代价是很高的:它意味着失去个人的自我。

以前,西方各国的文化是朝着使个性的全面实现成为可能的方向发展的。有关于人身自由的哲学理论和政治理论相伴随的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创造了个人的彻底自由的幻想,也创造了关于这种自由的意识和感觉的幻想。但是,这只是适用于少数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个人主义无非是一种外表,其后面隐藏着想要赢得个人的身份感的意图的失败。这种无能为力用真正的个人的身份感的各种代替手

102

^① 参见 E. Fromm, *Bekstvo od slobode*, Beograd 1964, str. 172。在《健全的社会》中,弗洛姆写道:“因此,就他感觉到要超越自己的渴望而言,他终于面临这样的选择:创造生活或者破坏生活——热爱或者憎恨。我们看到,破坏意志的巨大力量贯穿着整个人类的历史,而我们在当代又以如此可怕的方式成了这种力量的见证人。这种巨大的力量完全像创造的渴望一样扎根于人的本性之中。当我们说人有能力发展自己的爱和理性的首要禀赋时,这并不意味着天真的信念:‘人是善的’。破坏的癖好是一种次要的禀赋,同样扎根于真正的人的存在之中,它具有和我们的其他任何激情同样的强度和力度。但是——这是我们的论证的本质之点——它只不过是创造的选择。创造力和破坏、爱和恨,它们并不是两种彼此独立的欲望。它们二者都是对想超越、想在生长发育方面超过简单的生物的同样的要求的回答,如果创造的渴望得不到满足,破坏的意志就必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创造兴趣的实现会产生幸福感;相反,破坏精神则导致痛苦,无论对破坏者还是对被破坏者都是如此。”(*Zdravo društvo*, str. 59) 还可参见弗洛姆最新的著作《人的破坏欲望分析》(*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 N. York, Chicago, S. Francisco 1973)。

段做了补偿；民族、宗教、种族、阶级和职业就是用来确保这种身份感的。^①

所有这些使个人机械般地活动的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加剧了普通人的无能为力和不安全状况，因此，普通人就情愿服从能给他提供安全并且解除他的疑惑的新权威。弗洛姆认为，正是这种权威的机制对于纳粹运动的大多数人——即德国的下层中产阶级——来说是典型的，因此，他们渴望并且甘愿接受纳粹的侵略政策和种族自大狂。弗洛姆分析了使法西斯主义的现象能够出现的这些心理学因素，进而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提出了自己对纳粹心理学的看法。他得出结论说：“可以把一种极权的意识形态和实践的功能同神经官能症的症候群加以比较。这些症候群是从无法忍受的心理学条件中产生出来的，同时它们又提供了使人能生活下去的解决办法。但是，这绝不是有助于人成为幸福的人、有助于个性健康发育的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使那些招致神经官能症的条件保持不变。单是人的本性的动力论就是一种重要的动力；只要存在和一旦存在可能，这种动力就会要求寻找并谋求其他的、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个人的孤独和无能为力、个人对实现自身具有的可能性的渴求、现代工业生产能力增长的客观事实，都是构成对幸福和自由的不断增长的要求的基础的动力。遁入共生现象也许能够暂时缓解，但是不可能祛除现代的疾病。人类的历史是日益增强的个性化的历史，同时也是自由日益增长的历史。对自由的追求不是形而上学的力量，它不需要用自然规律来说明。它是个性化过程以及文化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极权制度不可能消灭不断产生对自由的渴望的基本条件，不可能根除从这些条件中产生的对自由的渴望。”^②

103 从前面所做的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出，弗洛姆感兴趣的首先是对人的本性即个人的生理学和心理学特征问题做出尽可能合理的回

① 参见 E. Fromm, *Zdravo društvo*, str. 80。

② E. Fromm, *Bekstvo od slobode*, str. 217 - 218.

答,个人的生理学和心理学特征虽然不能为我们对历史运动 and 发展的根本杠杆的问题做出回答,但是肯定能够对在一定历史情况中人的反应和行为的性质的问题做出回答。他认为,人是作为历史的存在物带着自己的欲望、愿望、利益、动力去行动的,因此,了解他的这种首要结构是对单个的历史时代及其各种不同的现象做综合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重要因素。从这种意义上说,弗洛姆的分析及其结果既对完善马克思对人和历史的解释,也对进一步的研究和认识提供了很重要的材料。

但是,弗洛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不仅详细地探讨了这些问题,而且还从这种立场出发,特别是在他的《健全的社会》一书中,批判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任何现代的异化制度。他的分析和论断在不少方面同我们已经熟悉的许多有名望的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相一致;因此,我们只着重谈一谈他的分析的一些较有趣的因素。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是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观点出发进行的。弗洛姆揭露了现代消费社会的自我满足状态是幸福的假象,这种幸福实质上局限于全面异化了的和受资本的利益所操纵的相对美好的生活。对于消费,弗洛姆也发现了这种异化的态度,发现这种异化态度也存在于设想不到的地方:在自由时间的利用方面。“如果一个人劳动而与自己的行动没有真正的联系,如果他以一种抽象的和异化的方式购买并消费商品,那么他怎样才能以积极的和有意义的方式度过自己的闲暇时间呢?他始终仍然是消极的和异化的消费者。他‘消费着’体育比赛、电影、报纸和画报、书籍、报告、风景,以异化的和抽象的方式,即以他消费他买到的商品的方式。他不是积极地参与,他要求‘占有’任何能够占有的东西,以占有尽可能多的东西为乐,占有文化和不能全部吞食掉的东西。其实,他没有空去利用‘自己的’自由时间;他的自由时间的利用,完全像他所购买的商品的消费一样,是由工业决定的;他的爱好是受他人操纵的,他希望看和听的,无非是人们预先规定好给他看和听的东西。娱乐工业是一种买

卖,就像其他任何诱使顾客去买他所要买的东西比如衣服和鞋子的买卖一样。娱乐的价值取决于市场上的效益,而不取决于某种用人的尺度来衡量的东西。”^①

弗洛姆认为,无论是现代的垄断资本主义还是斯大林主义,无论是国家社会主义还是官僚社会主义,都不是解决这种全面异化的办法。计划经济和每个个人的积极参与虽然是一种矛盾,但也是解决当今世界根本问题的必要前提。但是,计划经济要求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同时也要求有领导这种中央集权制的大规模的官僚机构。相反,个人的积极的监督和参与则需要有强有力的分权制:“如果来自上层的计划不同来自下层的积极参加相结合,如果社会生活的洪流不是不断地从下层涌流出来的,那么计划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人操纵的复活。”^②

弗洛姆认为,人类面临着决定性的选择并且处在十字路口。在当今的两种制度中,对人的操纵、异化和自动化的过程正在继续发展。因此,两种制度今天都正在变为经理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们吃得好、穿得好,他们的许多愿望都得到满足,但是,他们自己却越来越变成自动机;他们制造机器,而机器扮演人的角色,他们生产人,而人作为机器进行劳动。这种异化和自动化导致了日益增长的病态,导致了没有意义和没有真正欢乐的生活。如果说在19世纪,问题曾经是上帝死了,那么今天的问题则是人死了。^③

弗洛姆维护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伦理学的原则,同时在个人的层次上维护这样的意见:“如果人活着,那么他知道什么可以做。活着就意味着成为创造性的人,不是要致力于达到一种超越人的目的,而是要在自己身上下功夫,使实际的存在具有成为人的意义。只要一个人以为,他的理想和他的存在目的在他的自我之外,那么他的这种理想

105

① E. Fromm, *Zdravo društvo*, str. 143.

② E. Fromm, *Bekstvo od slobode*, str. 248.

③ 参见 E. Fromm, *Zdravo društvo*, str. 335 - 336。

和存在目的就是在过去或未来的云雾之中,他就生活在他的自我之外,并且将在永远不可能得到实现的地方寻求实现。他到处都将寻求解决办法和答案,只不过不是在能够找到解决办法和答案的地方——在他自己的自我身上。”^①因此,积极的自由存在于整个个性的自发活动之中,存在于同世界结合的需要之中,为的是同时获得完整性和个性的感觉。这种激情和这种需要就是爱。“爱就是在保持自己的自我的独特性和完整性的条件下同自我之外的某个人或者某个物的结合。它是相互参与、共享圣餐的感受,它允许自己的内心活动充分展现。”^②对于弗洛姆来说,爱是生产性的取向的一种根本形式,是人同其他人、同自己和同自然界的一种积极的和创造性的关系。^③

在比较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弗洛姆主张建立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既能克服资本主义的追求利润的现象及其主要是消极的和悲剧性的后果,又能克服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劳动领域和统治领域仍然作为同一种异化的两个因素继续存在。对于弗洛姆来说,不存在在这两种社会形式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因为它们两者都把人变成机器人。二者择一就是在机器人制度和“人道主义的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之间做抉择。^④虽然弗洛姆认为,有许多

106

① E. Fromm, *Čovjek za sebe*, str. 228.

② E. Fromm, *Zdravo društvo*, str. 53.

③ 弗洛姆为了论述爱的问题,甚至写了整整一本书(《爱的艺术》[*Umijeće ljubavi*], 1962),他在书中写道:“经济机器必须为他〔指人〕服务,而不是他为经济机器服务。他必须有能力参加分享经验、分享劳动,但不参加分享利润。社会必须这样被组成,以至人的能够去爱的社会本性不同人的社会存在相分离,而是人的这种社会本性和人的社会存在形成一个统一体。如果爱是对人的存在问题的唯一健全的和令人满意的回答这个观点,正如我试图证明的那样,是正确的,那么任何在一定程度上排除爱的发展的社会,由于它同人的本性的根本需要相矛盾,在较长时期内必定要落下去。谈论爱,并不是单纯为了谈论每个人的存在的最高的和现实的需要而‘胡扯充满幻想的故事’。即使这种需要被掩盖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分析爱的本性在今天意味着揭露爱的普遍不存在并且批判对不存在爱要承担责任的社会制度。相信爱作为社会的而不仅是个人的罕见的现象的可能性,这是建立在对人的本性本身的认识之上的一种合乎理性的信念。”(E. Fromm, *Umijeće ljubavi*, Zagreb 1965, str. 165 - 166)

④ 参见 E. Fromm, *Zdravo društvo*, str. 338。

事实说明,人将要选择的大概正是这条把人变成机器的道路,而这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可以称为不正常现象,或者甚至可以称为破坏行为,但是,这一切并不能动摇对人的理性的信念:只要我们能够考虑别的抉择,只要我们能够共同商定,那么就还存在希望。

在个性上,埃里希·弗洛姆是一个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的人道主义思想家,他试图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人的本性的一些规定是否符合马克思以及其他许多人道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设想为解决现代历史矛盾、愚蠢行为和荒唐现象的办法的人道意图。弗洛姆是那种把这个问题作为以马克思的理论成果为基础的历史观念内部的一个中心问题提出来的罕见思想家之一。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这毕竟是一种开拓性的工作,这样说并不算过分。因此,弗洛姆的许多论点肯定是暂时性的,同样确定无疑的是,这些论点作为进一步更加深入地理解人和历史问题的重要认识和推动,是有意义的。

六、列奥·科夫勒

在比较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中,还必须提到列奥·科夫勒(1907—1995)。他在流亡瑞士时用斯坦尼斯拉夫·瓦林斯基(Stanislav Warinski)的笔名发表了《关于社会的科学》(*Die Wissenschaft von der Gesellschaft*, Bern 1944)这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的一些基本思想受到卢卡奇的影响,他讨论了历史性问题,对20世纪头几十年研究这个问题的许多作者(例如李凯尔特[H. Rickert]、麦·阿德勒[M. Adler]、S. 马尔克[S. Marck]、威·桑巴特[W. Sombart]等人)持批判态度。

科夫勒在他的著作中继承了那种认为人和历史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批判的真正领地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因此,他有一部分研

究专门用于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和论述历史研究的方法论。^① 而另一部分研究他则专门用于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以及一些与此有关的现象。^② 在这些著作中,他研究了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的起源和产生,在这里,他不同意那种认为计划经济必然导致中央集权制专政和官僚制的意见。科夫勒属于那样一类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持这样的观点,即在社会主义的这个发展阶段,计划经济仍然必须同自由市场和企业内的民主自治结合起来。^③

在说明有利于形成官僚专政的苏联在革命后发展的许多情况和原因时,科夫勒把斯大林主义的精神官僚机构说成是“斯大林主义的异端裁判所”^④。他特别强调指出了那些取消辩证法、奉行肤浅的经济主义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做出非人化和庸俗化解释的做法。^⑤

科夫勒所持的观点是,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状况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悲惨的^⑥,因此,他主张革命的人道主义,认为这是解决当代问题的唯一办法。他以此激烈地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庸俗马克思主义以及经验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同时,总体性的辩证思维(科夫勒认为,这是马克思的思维)也必须有一个经过认真拟制的人

① 这首先是下列两部著作: *Zur Geschicht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Halle/Saale 1948); *Geschichte und Dialektik* (Hamburg 1955)。

② 科夫勒在下列著作以及上述其他著作中对斯大林主义做了全面的探讨: *Das Wesen und die Rolle der stalinistischen Bürokratie* (Köln 1952); *Marxismus und Sprache* (Köln 1952)。

③ 参见 Leo Kofler, *Das Wesen und die Rolle der stalinistischen Bürokratie*, Köln 1952, str. 19。

④ 参见 Leo Kofler, *Das Wesen und die Rolle der stalinistischen Bürokratie*, Köln 1952, str. 51。

⑤ 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著作以外,还可以参见: *Marxistischer oder ethischer Sozialismus?* (Bovenden bei Göttingen 1955); *Perspektiven des revolutionären Humanismus* (Reinbek bei Hamburg 1968)。

⑥ 科夫勒在他那本关于20世纪三个人间悲剧的小册子中提出一种观点,认为工人和小资产者的人间悲剧在于:一、人的总体性失去优良特性,二、必须用社会立法来保护,三、受本身什么也不是的财产的束缚,四、同工人的时代几乎没有差别的垂死的时代,五、自由时间的物化了的的功能(参见 *Die drei menschlichen Tragödien des XX Jahrhunderts*, Dortmund 1960, str. 21)。

的图景,有一种作为“关于人的可变性的不可变前提的科学”的人类学。^① 科夫勒在上述这本书中研究了这些问题,他以马克思、卢卡奇、马尔库塞和布洛赫的观点为依据进行研究,并同意这些人的观点,认为发展人的存在的总体性的唯一现实的前景就是克服实行私有制的压制性的现代社会,以及克服压制性的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在这种意义上,他提出一种观点,认为人们必须既克服工人阶级和辛迪加组织的狭隘的事务主义,又克服知识分子的抽象主义和理论孤立状态。人的非物化(就是说,把人从屈从于满足需要的经济因素的状况下解放出来)和人的物化,是人的进一步解放的基本前景。

除了这些我们已经看到的多半在战前就已崭露头角的思想家以外,德国现实并没有产生具有国际意义的其他思想家。德国东部由于基本上是斯大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受到阻碍,在德国西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多半是斯大林主义的变种和实践)却主要是批判的靶子。但是,人们不应该忘记,斯大林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为轻而易举地清算各种片面性、本体论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世界的一些重大问题庸俗化并加以忽视的现象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②

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国公众已经熟悉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领域内的一些问题的研究已经认真得多了,整个争论,首先由于有年青一代的登场,也更激烈、

^① Leo Kofler, *Perspektiven des revolutionären Humanismus*, Reinbek bei Hamburg 1968, str. 10.

^② 在价值各不相同和对马克思主义态度各不相同的其他著作中,对于这个时期我们可以提到两本关于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大部头著作,以及其他一些著作:J. M. Bochenski, *Der Sowjetrussische Dialektische Materialismus* (1950); G. Wetter, *Der dialektische Materialismus* (1952); Walter Theimer, *Der Marxismus* (1950); E. Thier, *Anthropologie des jungen Marx* (1950); Heinrich Popitz, *Der entfremdete Mensch* (1953); Max G. Lange, *Marxismus, Leninismus, Stalinsimus* (1955); Jakob Hommes, *Der technische Eros* (1955); Iring Fetscher, *Stalin über den Diamat* (1956); Iring Fetscher, *Von Marx zur Sowjetideologie* (1957); J. Bochenski, G. Niemeyer, *Handbuch des Welt-Kommunismus* (1958)。

更客观了。^① 同样,在最近时期,在各个宗教团体内部也产生了重大的骚动,出现了一种强大的倾向:要求宗教教义的解释具有激进人道主义意义,要求不应该对现代各种命运攸关的问题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样一来,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也变得越来越接近实际,并且摆脱了旧的偏见。但是,这反过来又要求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各个宗教团体、教区和个人的状况,已经不再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状况了。^②

七、恩斯特·费舍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提到,当代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也产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人物,他们的特点是既对教条式的和制度化的马克思主

^① 为了使更广大的公众熟悉马克思主义,伊林·费切尔用他编辑的《马克思主义。它的历史文献汇编》(Iring Fetscher, *Der Marxismus. Seine Geschichte in Dokumenten I - III*, München 1962 - 1965)对此做了很大的贡献。除了这个时期的前面已引用的著作以外,我们还可指出下列一些论述马克思主义各种不同问题的成功的成果:Manfred Friedrich, *Philosophie und Ökonomie beim jungen Marx*, Frankfurt a. M. 1960; H. Klages, *Technischer Humanismus, Philosophie und Sociologie der Arbeit bei K. Marx*, Stuttgart 1964; I. Fetscher, *Karl Marx und der Marxismus*, München 1967。为了纪念卡·马克思诞辰150周年,《马克思主义丛刊》(*Marxistische Blätter*)杂志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特刊(*Marxismus in unserer Zeit*),收录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除了上面提到过的积极参加当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的其他人物之外,还应该指出沃·阿本德罗特(W. Abendroth)、W. 列昂哈尔德(W. Leonhard)、威·霍夫曼(W. Hofmann)、K. 连克(K. Lenk)、赫·弗赖舍尔(H. Fleischer);许多更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也已经脱颖而出。还有稍微年长一点的马克思主义者保尔·马提克(Paul Mattick)的成果,如 *Kritik der Neomarxisten*, Frankfurt a. M. 1974。

这些年轻人的作品主要有:W. Leonhard, *Die Dreispaltung des Marxismus; Ursprung und Entwicklung des Sowjetmarxismus, Maoismus und Reformkommunismus*, Düsseldorf 1970; W. Leonhard, *Am Vorabend einer neuen Revolution*, München 1975; Helmut Fleischer, *Marx und Engels*, Freiburg-München 1970; Rudi Dutschke, *Versuch, Lenin auf die Füße zu stellen*, Berlin 1974; Alfred Oppolzer, *Entfremdung und Industriearbeit*, Köln 1974。赫尔穆特·赖歇耳特(Helmut Reichelt)、君特·巴尔奇(Günter Bartsch)等年轻人也以自己的著作崭露头角。

^② 例如,可参见 Trutz Rendtorff, Eduard Tödt, *Theologie der Revolution, Analysen und Materialien*, Frankfurt a. M. 1968。又如,在福音教会的马克思主义委员会内部以及它的出版物《马克思主义研究》内部,也开展了一场内容非常丰富和富有成果的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已经参加了这场对话。

义持批判态度,又力求对特定的问题有独立的解决办法。^① 其中恩斯特·费舍(Ernst Fischer, 1899 - 1972)在艺术问题研究领域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果。费舍属于当今这样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者之列,他们不可能轻率地容忍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那些无论如何不是有根据的和无论如何不是必然的变形、缺陷以及反社会主义的结构和行为方式,费舍指责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谨小慎微的尝试,他们在关于异化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争论的压力下虽然接受了这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范畴,但为的是要在以后断言,社会主义中的异化只是作为过去的残余而存在的。在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的当代过程时,费舍不是停留在弄清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上,这种异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做了充分的研究,相反,他断言,作为官僚制度和国家主义的结构的后果,在社会主义发展中也会存在和产生新的异化形式。因此,他彻底批判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国家主义关系及其对个性和人际关系的形成与艺术的发展的极坏影响,并且提出如下的看法,即克服这些结构,实行全体劳动者的自治和自决,是解决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的唯一可行的办法。^②

至于谈到艺术问题,费舍赞同那些认为劳动、实践不仅是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艺术产生的根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人用自己的劳动改变着、神奇地改变着周围世界:他模仿某一式样把一块木头、一根骨头、一块燧石变成正是这一式样,变成所希望的工具;把各种物质

^① 其中最著名的有:Eduard März, *Die Marxsche Wirtschaftslehre im Widerstreit der Meinungen* (1959); Theodor Prager, *Wirtschaftswunder oder keines* (1963); Franz Marek, *Philosophie der Weltrevolution* (1966), Norbert Leser。

^② 费舍在关于艺术和共处的著作中写道:“不仅有带到新社会中来的旧的自我异化,而且由于权力从革命民主主义的机关转入中央主管机关,由于制度化和官僚主义化,也会产生新的异化。克服这种新的异化的第一步,就是要承认存在新的异化,承认‘人民企业’、‘工农国家’是有魅力的名称,必须用实际的东西充实它,因为其前提是客观给定的。只有随着自治、共同决定,从而共同负责在生产单位乃至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不断增加,异化才可能消除。只有随着意识成为社会的意识,就是说成为受民主监督的,因而需要不断发展、修正和更新意识,意识才能获得效力。”(E. Fischer, *Kunst und Koexistenz*, Reinbek bei Hamburg 1966, str. 103 - 104)

对象变成符号、名称、概念；把人本身从动物变成人。这种存在于人的存在的根源之中，既产生力量意识又产生无能为力的感觉、既产生对自然的驯服又产生对自然的恐惧的魔术，就是艺术的本质。第一个使石头具有为人服务的形式的工具制造者就是第一个艺术家。第一个从巨大的自然界中抽出一个对象，用符号去标出它并把语言这种造物交给人们的第一个给事物命名的人，也是伟大的艺术家。”^① 111

费舍虽然在许多方面同卢卡奇相一致，但他更有力得多地强调艺术的这一本体论方面，而较少强调认识论方面。根据艺术的这种本体论观点，费舍就有更多的可能去理解和解释比如说现代艺术，这种现代艺术并不打算反映现实，而是打算改变现实，成为现实的一种模式和象征，并且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因此，他反对对艺术的控制（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从而也反对一种艺术方法的排他性。社会主义的作家不能迷恋于任何一种风格，而是必须在艺术作品中把各种不同的形式要素和表现要素融合起来，使艺术作品成为一种实际上无限多样的整体。任何教条式地束缚于某种艺术方式，不管这是什么样的艺术方式，都是同创造几千年人类发展的综合并以各种新的形式表现新的内容的任务相矛盾的。^②

根据这种观点，特别是最近十年来，费舍积极主张克服当今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艺术所持的教条主义的和片面的态度以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在布拉格举行的卡夫卡讨论会（1963年）上，他同罗·加罗迪（R. Garaudy）、E. 戈尔德施蒂克尔（E. Goldstücker）、J. 哈耶克（J. Hajek）、R. 卡尔斯特（R. Karst）等人一道，坚决主张消除对欧洲现代派的这位著名作家以 112

① Ernst Fišer, *O potrebi umetnosti*, Subotica-Beograd 1966, str. 35.

② Ernst Fišer, *O potrebi umetnosti*, Subotica-Beograd 1966, str. 127 - 128. 在前面提到的那部著作中，他写道：“不存在资产阶级的或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段，但存在社会主义伦理学立场。从这种伦理学立场中产生艺术家在决定性情况中的态度，但是不会产生他对这个或那个艺术流派的归属感，不会产生对现实的被偶像化了的意识形态扭曲了的看法。”（E. Fischer, *Kunst und Koexistenz*, str. 62）

及对被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及其辩护士们谴责的其他许多艺术家所持的荒谬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由于这一切,费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左派不仅想提出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主张,而且想从这种立场出发独立地并且独特地解决现代世界的错综复杂的现象的努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本身具有不同结构的新左派运动内部,有一种以前所未见的规模出现的历史现象特别值得注意,这就是大学生和青年运动。反对国家和整个社会制度的各种不同的过时的机构的群众示威游行和行动,这一切意愿的强烈程度以及迄今已达到的合理程度,人们是不能只用年青一代的浪漫的行动主义或者青年的失意来解释的。假如青年人的革命行动的对象不是当代文明的基本结构以及由这些结构所产生的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大量现象,那样的解释才会有说服力。

这种运动首先是在那些发达社会中和在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况中发生的。我们已经看到并且以后还将看到,今天历史舞台已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和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做出什么样的努力,以便寻找新的出路。因此,人们用不着惊奇,没有特殊的政治经验和革命经验的年青一代不仅是参差不齐的,而且在行动中会陷入各种不同的毫无出路的情况和危机之中去。他们的危机只不过是现代世界的总危机的征兆罢了。

最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已经指出了把异化劳动永恒化的消费社会、国家垄断和资本主义垄断、普遍实行控制以及短暂而毫无价值的生活方式的荒谬。由于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缺乏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变化了的生活条件相适应的革命政策,这种情况还会加剧。有很大一部分共产党在最近那次战争以后的头20年中还受到斯大林主义的观点的拖累,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官僚化,没有能力独特地、创造性地处理各种新问题,没有能力对许多新产生的情况做出适当的反应,而旧的处方又已经不灵验了。

但是,这种危机并不是单方面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官僚主义

和国家主义结构顽固地推行斯大林主义的心理学,顽固地奉行官僚主义精神及其有名的对一切有理智的和批判性的东西不能容忍的态度,根本不能对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发展的新情况和特点以及解放运动的性质做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因此,完全可以理解,这种对自身的状况和其他许多运动的态度,必然不仅经常产生冲突的形势,而且产生上述戏剧性的和悲剧性的冲突。

当今发达社会的这种危机的反面就是第三世界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革命斗争。从这种危机中就产生了青年的反抗,在还承受着战争、法西斯主义、集中营、顺从、重建正常生活条件等重负并且相应地感到失望的那一代人之后,新的一代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新的一代不再遭受这种梦魇,同时对于自己的神秘化的和异化的状况非常敏感。最初的比较公开一点的反应和要求就已经揭露出这些社会的许多已属时代错误和禁忌的沉积,而所有进一步的要求则揭露出一种基本上是压制性的宽容和用甜蜜的自由口号掩饰着的压制。

运动是在1964年由伯克利大学的美国大学生发动起来的,他们要求有在大学内进行政治活动,首先是同越南战争有关的政治活动的权利。这一运动逐渐在西方阵营和东方阵营的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中扩展开来。完全可以理解,一种像学生团体这样的成员参差不齐的团体,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下,在进行第一次反抗时,必定会表现出形形色色的方面。关于斗争目的和方法的观点的光谱过去和现在都是很广的:从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到共产主义的各种不同色彩直到无政府主义的,从极左派的直到改良主义的和妥协折中的。但是,这一运动的思想中最自觉的和最发达的先锋部分,利用对当今文明(既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包括国家主义的官僚式的“社会主义”)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分析,又掌握了左派运动的若干历史经验,因此能够拟定他们活

动的一些方针,虽然在不少问题上仍无把握。^①

在批判并力图改变当今社会方面,老式的大学首先招致攻击,因为这种大学具有固定不变的等级结构,并把大学生看作只是科学的模型设计的对象。但是,大学也是总体形势的一个标志,所以,争取变革大学的斗争必然导致要求消除一切形式的垄断和压制,消除控制性的学校制度和舆论工具,以及消除各种不同的官僚主义结构,不管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开始到那些同自由生产者联合体、俄国的苏维埃、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以及类似的东西相联系的历史命题和经验中寻找出路,这同样是合乎逻辑的。总而言之,人们可以说,运动的最自觉的和最革命的部分到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寻找解决办法,这些观点应当是一种以克服首先是经济社会结构和关系中的异化的本质形式为主要目的的历史实践的理论基础。

运动在其实践和活动中从一开始就试图发现不同于古典政党斗争形式的斗争形式,在这里,同时认为,经验已经说明在以前的所有政党中官僚化和建立等级制的关系是不可避免的。运动以这种方式指出了攻击现存制度的伤口处的巨大可能性,但是由于缺乏比较固定的组织,尤其是由于没有得到各个劳动阶层的必要的更加广泛的支持,很容易产生组织涣散和分崩离析的现象,产生倒退现象或者甚至无政府主义的破坏社会治安的行为和暴行,这一切也使那些现实的同盟者最终脱离这种努力。

任何新的运动,尤其是当问题涉及没有直接拥有大量历史经验和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的著作,也是外国出版的著作有:U. Bergmann, R. Dutschke, L. Lefevre, B. Rabehl, *Rebellion der Studenten oder Die neue Opposition*, Reinbek bei Hamburg 1968; G. und D. Cohn-Bendit, *Le gauchisme - remède à la maladie sénile du communisme*, Paris 1968; J. Sauvageot, A. Geismar, D. Cohn-Bendit, J. P. Duteuil, *La révolte étudiante, Les animateurs parlent*, Paris 1968; *Revolution gegen den Staat? (Die ausserparlamentarische Opposition - die neue Linke)*, hrsg. von Hans Dollinger, Bern-München-Wien 1968; Kursbuch br. 13, Frankfurt a. M. 1968。

革命经验,并且处于一种可以说是意气消沉、思想偏执和不理智的状态中的青年的时候,必定要与自己的队伍中的唯意志论的和主观主义的意见发生冲突,与那种轻率地假定现代国家的镇压机构只是一种徒有其表的東西,只要有良好的愿望和坚定的决心,就能够创造出革命的形势的观点发生冲突。同样,那种把未经检验的特殊历史经验运用于完全不同的历史情况的倾向(例如,对中国文化革命或者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革命的向往,虽然后者通常更多的是人的意愿、牺牲精神和自我献身的象征),也令人迷惑。

但是,尽管有这种“左派幼稚病”,人们还是可以说,那些不是只具有短暂性质的特定行动,这些行动在20世纪60年代,在各个发达国家,是唯一重要的历史性革命的表现,是争取建立真正人的共同体的历史意识和兴趣的唯一表现,这些国家今天至少已经具备建立这种共同体的几乎一切物质前提了。争取取消大学现有等级制度结构的行动、反对在越南所犯的残暴的帝国主义罪行、反对施普林格爾的新闻垄断、反对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和扼杀下一阶段的革命的示威游行、反对西德实行紧急状态法的斗争等等,是把沉睡的一代代人从政治昏睡中唤醒的行动。运动的结果尚不是轰轰烈烈的。运动的未来也还不明朗。肯定会有不可避免的潮涨潮落。它的一部分很有可能将试图与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中不能容忍现存的各种历史荒谬现象的那部分人结成紧密的联盟。即使运动不转而采取它目前还要避免采取的更加固定的组织形式,它的行动也可能像火花一样在一个充满紧张气氛的世界产生影响。在制度发生更加尖锐而深刻的危机时,这些火花也许甚至可能引起历史上一场更大的熊熊烈火。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在法国

在西欧各国当中,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仅成为主要思潮之一,而且以自己旺盛的活力和各个重要的思想家,粉碎了官方的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僵硬而烦琐的观点。对这种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根本不是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恰恰是先后同这个党发生公开冲突的马克思主义者。战后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史甚至可以证明这样一种有代表性的、几乎是普遍的现象——法国共产党(和战后头十五年内世界各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不适应形势和那些历史向它提出的任务,而形势和任务一天天经常在变动,这种变动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行动完全不能安逸懒散地坐享自己的进步性和自恃无所不知。

与此相反,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活力,比其他国家的大得多。这是一系列因素造成的,我们可以举出其中几个最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战前法国工人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法国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一点我们先前已简单地指出过),社会主义运动参加了粉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法国在政治和思想方面的吸引力使别国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聚集在法国,他们的活动或多或少地促进了这一思想运动的加强。同时不应忽视,资本主义史无前例的非人道行为给人造成

的历史“教训”也使许多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倾向于马克思的某些重要原理和思想。 118

因此,战后的形势十分有利于在哲学方面和整个意识形态方面进行创造性的有成果的讨论。在基本哲学流派——人格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当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增强了。这不是说他们根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说他们不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它抱批判的态度了。但可以说,法国某些最杰出的思想家采纳和研究了马克思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异化、实践),而斯大林主义不仅把这些基本概念忘掉了,而且把这些基本概念抛弃掉或弄得庸俗了。

这里自然不是指托马斯主义或右派人格主义。但是,当一位激进的基督教人格主义者穆尼埃(E. Mounier)同基督教正统教理,同基督教教会发生冲突,或者无神论存在主义者萨特(J. P. Sartre)也达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这种努力是不能低估的。

例如,穆尼埃几乎完整地接受了实践概念,认为实践有四种活动范围:改变外界现实,塑造我们自身,使我们接近人和丰富我们的价值世界。^①

与必须承担义务的论点相反,穆尼埃正确地指出,这不取决于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是承担义务和参与的人了。尽管他对世界的理解有其唯心主义的局限性,但是,在他从个人的前景考虑得出的社会政治论断中,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找到共同解决人和历史的具体问题的基础。这才是最重要的。具体的历史行动的计划、现代人的生存问题的解决,在人的解放道路上共同劳动,必须优先于哲学的一般问题,尤其是自然哲学问题。

穆尼埃在维护关于现代人的异化的思想时认为,资本主义气数已尽,如果社会主义指的是无产阶级的消失,以个人全面的前景为基础组织的计划经济取代无政府状态的经济,生产部门社会化,而不是国 119

^① 参见 E. Mounier, *Le Personalisme*(1949 年第一版)。

家主义化,因为国家主义化会加深异化,以及工会运动发展,劳动重新得到尊重,劳动者个人进步,等等,那么资本主义内部正在出现社会主义新世界的轮廓。

穆尼埃看到,在这个前景里面,组织问题和人的问题是分不开的。他认为当代的基本问题之一是要避免技术至上主义者专政,因为这种专政无论是左是右,都是只见机构不见人。穆尼埃同时也清楚地看到,议会民主在解决人类现代问题时显得无能,社会主义必须首先是劳动者本身的事业。他对形式民主所做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总的说来是中肯的。“政治民主必须完全调整为与现代生产结构相适应的真正经济民主。”^①难道还能有进行富有成果的对话的更好的基础吗?难道穆尼埃对当代基本问题的认识不是比整个斯大林主义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更胜一筹吗?

就在战后不久的这一时期,加·卡桑诺瓦(G. Casanova)发表了几乎是目前马克思主义关于数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唯一著作,而在著作界则出现了穆任(H. Mougín)、加罗迪和列菲伏尔(Henri Lefebvre),特别是列菲伏尔,他在探讨哲学问题方面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富于独创性。^②

一、昂利·列菲伏尔

大家知道,列菲伏尔(1901—1991)^③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加入了一个团体,加入这个团体的还有若·波利泽尔(G. Politzer)、P. 莫昂热(P. Morhange)、N. 古特曼(N. Guterman),这个团体企图从反抗过去和反抗非人道化中寻求某种出路。1928年以后,随着著名的世界经

① E. Mounier, *Le Personalisme*, Paris 1957, str. 128.

② G. Casanova, *Mathématiques et 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 Paris 1947; H. Mougín, *La Sainte famille existentialiste*, Paris 1947. itd.

③ 列菲伏尔生于1901年,弗兰尼茨基在本书中误写为“生于1905年”,特此更正。——译者注

济危机的爆发,列菲伏尔加入的这个团体的许多人都准备研究马克思主义。从翻译谢林的《人的自由》一书时期(1925—1926年)起,列菲伏尔已感到存在主义和神秘主义观点的不足,对于莫·勃龙德尔(M. Blondel)这位天主教徒的恭顺“行为”和L. 布伦希维克(L. Brunschvicg)的抽象的理智主义也有同样的感觉,虽然这两人曾是他的教授。列菲伏尔当时已是共产党员,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研究理论问题和法国马克思主义界围绕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争论。他认为必须明确地坚持最优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使马克思主义摆脱政治主义和经济主义。^①

列菲伏尔同古特曼一起出版了马克思、黑格尔和列宁的文选,试图指出必须坚持的那些思想。整个这一活动是在直接面临已经到来的严峻事件的情况下进行的。希特勒主义当时正飞扬跋扈。自由世界同这种资产阶级黑暗势力的斗争进入了惊心动魄的紧张阶段。在这种形势下,列菲伏尔写了自己最好的小册子之一《辩证唯物主义》(*Le 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 1939),同时写了两本论述当时局势问题的著作:《民族主义反对民族》(*Le Nationalisme contre les Nations*, 1937)和《希特勒上台。德国法西斯五年总结》(*Hitler ou pouvoir. Bilan de cinq années de fascisme en Allemagne*, 1938)。

列菲伏尔那时已经表现出自己在思考问题时不仅有独立性,而且有灵活性和创见。不管他是否一直是这样,反对教条主义和坚持辩证态度都是他的思想活动的本质特征。至于列菲伏尔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清楚地看到法西斯主义对整个民主人类和对人类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正常进步的巨大危险性,就不必多说了。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列菲伏尔在论述民族主义的著作中已经出现

^① 列菲伏尔在他著的《存在主义》(*L'existentialisme*, Paris 1946, str. 10 - 66)一书和他后来的著作《总结及其他》(*La Somme et le reste*, Paris 1959)中,对这一时期做了较详尽的阐述。关于法国马克思主义,参见 George Lichtheim, *Marxism in Modern France*, New York and London 1966。

了某种不同的音调。这种音调成了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究的几乎是一贯的主调。他清楚地看到,任何抽象的国际主义、清一色的共产主义以及片面抽象的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共同之处。“一方面民族不能是目的自身。它是既定的,是行动范围。民族感情是行动范围。民族感情是这样的一种事实,它的意义必须永远加以研究,以便考虑到它,对它和通过它进行活动。某种教条主义的和绝对的原则(例如一味赞扬或一味斥责民族感情)是不值一谈的。只有全部具体条件才能决定应当采取何种立场。没有原则上的民族主义,也没有原则上的反民族主义。民族是一个必然的阶段——至少根据欧洲所具有的一些条件来看是这样。”^①

另一方面,抽象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普遍平均主义等等,通常使人们把社会主义世界设想成这样的一番景象:禁欲主义、兵营、一律拉平、绝顶平庸等等。“真是奇特的颠倒,这番景象越来越适合于法西斯主义,因为法西斯主义把一切趋向都引向原始主义、禁欲主义和自然主义,正式把个人对集体的牺牲,把个人在普遍贫乏中的一律和个人的清一色化称为‘社会主义’。这种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丰富的理论,它反对一切类型的自然主义和原始主义而恢复多种多样的需要。”^②

也应该大致根据列菲伏尔的这种思维线索来研究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就在这一著作之前不久,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被找到并第一次发表。列菲伏尔看出这些手稿对于马克思主义在解释人的方面的意义,于是异化概念(这个概念在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至今未被认识)重新出现在哲学领域。

于是,列菲伏尔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当代哲学中显然是人道主义的问题。根据马克思的“这些”主义的,同时又几乎是中心的问题之间的中介的思想,关于人在“他”基本思想,如关于实践是人与自然界

ations, Paris 1937, str. 212.

ations, str. 38.

① H. Lefebvre, *Le Nationalisme contre les N*

② H. Lefebvre, *Le Nationalisme contre les N*

物”的物中,在一种否定人但又促成人的物中,即在自然界中实在化的思想,列菲伏尔在马克思主义中重新提出其他一些哲学家和青年马克思所认识了的概念,即总体的人的概念。

不过,从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来说,对总体的人这一概念不应当静止地,而应当变动地加以理解。就是说,人不是某种绝对的实质,不是先天地、形而上学地存在的。这局棋并非早就已经赢定,因为人们也可能失去一切;克服局限性,即克服异化,从来不是命定的。

122

从社会的现今结构和关系来看,人“尚处在分娩阵痛阶段;他尚未诞生;人们还难于预料他是一种统一体和解决,他还只是在自己的对立物中并通过自己的对立物存在着,这个对立物就是:人中的非人的东西。他还总是被分散在许许多多的活动和专门化了的生产之中,实在性和有关人的本性的日益增强的意识因而破碎了。他还只是在有别于自己的他者中,即在意识形态中意识到自身”^①。

意识形态是人的全面异化的一种形式。所有这些异化的形式只不过是歪曲了的人类能力。神话和偶像似乎具有实在的力量,实际上这种力量是由人赋予并转过来反对人的。甚至在今天,人征服自然的能力十分强大的时候,人比任何时候更是偶像的牺牲品。为了揭穿这些偶像,就必须有新的意识。辩证唯物主义应当成为这种意识的表现和工具,辩证的异化概念支配和概括这种对存在着的人的描述。它描述人的现代悲剧和历史悲剧。列菲伏尔得出结论说:“异化是这样扩展至整个生活中去的。个人是无法摆脱它的。当他力图摆脱它的时候,他就自我孤立起来,这正是严重的异化形式。人的本质来自社会过程的总和。个人只有在与共同体的牢固和明确的关系中才能获得它。他不应当与共同体分离,也不应当在共同体中消失。但是在我们的社会,关系似乎是颠倒的,个人可能认为他自我孤立起来就可以使自己实在化。这样他就更加彻底地‘丧失了’、脱离了自己的基础,脱

^① H. Lefebvre, *Le 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 Paris 1949, str. 137 - 138.

离了自己的社会根基。他把自己看作只是理论抽象(心灵、内在生活、理想),或生物存在(躯体、性欲)。他在自身中助长和更加严重地再造共同体的解体。在他自身中的矛盾是多种多样的:无意识与意识之间的矛盾、自然界与人之间的矛盾、社会与个人之间的矛盾、本能与理智之间的矛盾、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实践与理论之间的矛盾。”^①

解决办法是在争取实现人的存在的总体,争取克服人的存在的分散性、片面性和神秘性的努力和斗争中。“总体的人是生成的主体和客体。他是与客体对立并克服这种对立的有生命的主体。他是在零碎的活动和分散的使命中被粉碎而又能够克服这种分散的主体。他是行动的主体——与此同时,他又是行动的最后的客体,即行动的产

物。其物,在运动中亦即是其产物的客体的时候。总体的人是有生命的主体-客体,这个主体-客体起初是被破碎、分解和被禁锢在必然与抽象之中的。他通过这种碎散性走向自由;他变成自然界,但这是自由的自然界。他成为总体,像自然界一样,但这是在他驾驭着自然界的时候。总体的人是‘消除了异化的’人。”^②

人类共同体的这种组织将揭示真正是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人将最终力图解决人类特有的问题:幸福、认识、爱情和死亡问题。总体的人的概念在列菲伏尔看来具有“绝对”概念的性质。没有绝对,相对就丧失任何意义,我们就陷入片面的相对论。绝对寓于相对之中,但又不能同它相替换。绝对是相对的界限、意义和前景。^③

① H. Lefebvre, *Le 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 Paris 1949, str. 144 - 145.

② H. Lefebvre, *Le 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 Paris 1949, str. 147.

③ 列菲伏尔后来在《日常生活批判》第2版前言中这样表述这一想法:“人的问题也是这样。或者是想按哲学方式思考和建立人道主义,或者是忽视和抛弃这种深刻的反思,从而对入道主义听其湮没,听其生灭。人方面的前进、进步,只有通过总体的人的概念才能获得意义(这个词同时作意义和方向解)。每一个历史因素,每一个历史所达到的阶段都组成一个整体;同样,每一个部分活动,每一个实际掌握了的能力,每一个因素也都包含有自己的人类现实内核,这个内核在后来的发展的进程中显示和出现。同时,总体的人是在无限中的一个界限。”(*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aris 1958, str. 78)

“对于这种人道主义来说,最高阶段不是社会,而是总体的人。总体的人是自由共同体中的自由个人。他是在差别无穷的各种可能的个性中繁荣的个性。人的史前史的这种结局不是命定的。这不是经济的命运,不是历史神秘的目的性所能导致的,也不是‘社会’的指令所能导致的。为这种结局奋斗的有生命的个人可能被打败。人类可能会陷入混沌和紊乱之中。解决办法已显示在总体运动之中,它指引预感、活动和意识,它不取消这些。经济和社会的自动作用的结束怎能自动完成呢?”^①

124

混沌和紊乱加速来临了。但是法西斯的恐怖舞蹈结束后还不到十年,人类又处于二者必须择一的困境,这再不仅仅是使人类全部珍品和巨大成就有遭毁灭的威胁,而且是使人类整个文明和文化有遭到毁灭的威胁。

战后,列菲伏尔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其中,《日常生活批判》(*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因独创性而特别突出。但是这个自由运动为时不长。斯大林 1947—1948 年的政策,暴露出要垄断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行动的极端倾向,粗暴地和荒谬地排斥不是与马克思主义,而是与斯大林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不一致的一切,这种政策的大转折本身不仅在政治中,而且在其他一切方面都是坚持冷战的一个重要因素。讨论、分析、创造性的批判被荒谬的教条主义代替了。列菲伏尔这样评论法国这一时期:“当时应当把哲学和思想意识同政治区别开来(当然不是把它们割裂开来)。不应当把舌战同广泛的讨论和对话混淆起来,应当善于适可而止,不要给辩论火上加油,不要硬邦邦地

在一起;不要把辱骂当作论据。不应当把革命的政策有理由地消灭阶级敌人的目标扯到思想意识和哲学领域上去,如果已经这样做了,就应当做得谨慎小心。不应当把用辱骂虚假和幻想地消灭敌人混同于用论据真正消灭敌人。最后,特别重要的,就是应当劳动、

同政治扯
提出的消
这样做了
敌人混同

Lefebvre, *Le 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 str. 49.

① H.

125 创造、强迫自己去认真研究一定的对象,这将要求马克思主义者付出不能立即赢利的长期政治投资和努力,要求多去著书立说,少写论战文章,多做艰苦的工作,少发即兴议论,多搞深入的理论建设,少做充满庸俗观点的轻率论断。”^①

在这一时期,列菲伏尔出版了几部著作:《存在主义》(1946年)、《日常生活批判》(1947年)、《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1947年)、《卡尔·马克思的思想》(1948年),以及论述笛卡儿、巴斯卡耳和狄德罗,再后是缪塞、拉伯雷等人的文章。

上述形势必然也在列菲伏尔的活动中留下痕迹。由于某些基本的危机还没有被克服,由于在那最后几年过程中某些重要认识还没有获得,他的著作也遭受这种教条主义压力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列菲伏尔竭力冲破公式主义的框子,从分析对象本身中提出解决办法,因而越来越同官方的观点发生冲突。他在论述逻辑问题的书中就是如此,在书中,虽然是片断地,但坚持把逻辑问题和认识问题理解为统一的问题,沿着列宁的足迹走,并把当时遭官方斥责的黑格尔的论著当作解决这些问题所应依据的辩证基础。

在当时的著作中,《日常生活批判》无论如何是最值得注意的著作之一。这本书在1958年再版,并加上一篇很长的序言。虽然这本书仍是由片段构成的,但却是一种有价值的和机敏的尝试,试图在人类的关系和表现(从艺术到人类日常生活的其他各种不同现象)的现实土壤上细致地研究和具体地阐述异化问题。

特别是在他后来加上的序言中,他进一步具体地阐述异化的概念,这个概念,正如他本人讲的那样,被共产主义的官方代表人物轻蔑地抛弃了,好像革命后异化就会消失似的,好像这个问题不是伴随着过渡时期的整个阶段似的,好像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对异化有免疫力似的。

^① H. Lefebvre, *Marksizam i francuska misao*, “Jugoslavenski časopis za filozofiju in sociologiju”, br. 1/1957, Beograd, str. 27.

根据人的异化的这些不同形式,列菲伏尔按照自己的意见,强调了一种批判的思想,这种批判的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不是陌生的,但他第一次做了更清楚的阐明。这里指的是这样的论点: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形式在历史上和理论上是脱离内容的、偶像化了的和与内容对立的。他在上述序言中概括地叙述了这一点,他说:“内容和形式的任何脱离,都包含着一个幻想和表面现象部分;这种脱离对形式来说意味着内容的丧失,而不是内容的缺乏和形式的纯粹。反过来说,对内容本身加以规定,那是教条主义的妄求和常常是对信任的滥用。这就是说,表面看来是纯粹的和纯形式的形式,今天竭力(在‘思想家’和著作家的笔下和口中,这是不言而喻的)成为自满自足的东西,竭力排斥内容,取代内容的位置。这表现在内容的毁灭中。这种能动的形式化,转而反对由于变得空虚而自我毁灭的形式,除非它是用来表示一个外在于它的、与形式无关的‘内容’,除非它为了存在而需要一种虚幻的术语。

让我们来列举一下(不完全地、暂时地)这些冲突:

(1) **理性主义反对理性**(形式主义的唯理论,即资产阶级的理智主义,它停留在理性上,反对活生生的、具体的、辩证的理智);

(2) **民族主义**(旧右派的‘古典’民族主义)反对各民族并反对在民主化和社会主义进程中即道路上的自己本身的活生生的民族;

(3) **个人主义**(孤独地沉湎于自己私人的意识和自尊感中的孤独的资产阶级个人的个人主义)反对能够解决问题,首先是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的真正的、能动的、有生命的个人;

(4) **客观主义**(‘中立的’和‘不偏不倚’的思想的客观主义,无休无止地既可用来赞成又可用来反对,或从这一观点跳到另一观点的客观主义,孤立地列举事实和彼此毫不相关的资料的客观主义)反对深化了的客观性,即反对这样的思维客观性,这种客观性在同实践的联系中把握住相矛盾的现实的一切方面,即它的错综复杂的存在、它的隐藏着的趋向[……];

(5) 纯粹形式的唯美主义(艺术中的技巧主义、对纯粹风格和造型的追求),即完全自由的抽象或形式主义反对形式。

等等……

127 本可以列出一大串这样的‘主义’。但这里列举的已经足以表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现代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的一般倾向了。这种倾向为技术主义和技术统治主义(在一定领域的许多活动中存在着这类主义)所掩盖,但也由于各种互相对立的发现或创造某种新内容的愿望、探求和努力的存在而得到显示。

这种一般的形式主义不正是符合人类的活动和能力的多种多样的、形形色色而又单调的异化吗?不正是符合人类的活动和能力的伴随着以彼此外在的和外在于活的人的形式表现的脱离吗?这是一般的异化,这种异化是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突然出现的,从这些结构的运动中产生出来的,但又经常重新转向生活和返回日常生活中去。我们在那里不是抓住了日常生活批判中一条可能的引导线索吗?”^①

完全可以理解,列菲伏尔作为一个在许多方面坚持(仍然是片断地、格言式地)法国精神和风格的光辉传统的思想家,必然会同现代使马克思主义思想教条化和简单化的倾向发生冲突。1957年他出版了一部名为《弗·伊·列宁的思想》的著作,这以后又发表了上面提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法国思想的文章,最后是《马克思主义的迫切问题》(1958年)这本小册子,这以后,他被开除出党。

于是,批判从四面八方纷纷而来。首先出现的是路西安·塞维(Lucien Sève)的尖刻而又勉强的批判,然后是让·苏勒-卡纳累(J. Suret-Canale)的批判,而加罗迪在官方的党刊上发表的文章,则按照人人皆知的俄国处方而集这一切之大成。^②

^① H. Lefebvre, *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II izd., Paris 1958, str. 92-94.

^② L. Sève, *H. Lefebvre et la dialectique chez Marx* (“La nouvelle critique”, mart 1958), J. Suret-Canale, *La méthode de H. Lefebvre* (“La nouvelle critique”, april 1958), Roger Caraudy, *A propos d'un livre d'Henri Lefebvre: Initiation au marxisme ou initiation au revisionisme?* (“Cahiers du communisme”, br. 4/1958)

如果我们扼要地叙述一下加罗迪对列菲伏尔的观点的批评,我们只要列举一下标题就行了。在他看来,列菲伏尔抛弃了唯物主义,抛弃了自然辩证法,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并成为修正主义者和失败主义者。

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真是耐人寻味,一个实行了极其深刻的变革和真正地已经开创了社会主义的(不是国家主义的)社会关系的国家(南斯拉夫),竟被宣布为修正主义的、可疑的等等。这个国家的所有理论家则被宣布为修正主义者。在其他国家,所有那些以自己的独创性真正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声誉,实际上有效地维护了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思想家们,首先是卢卡奇、布洛赫、马尔库塞和列菲伏尔,竟被说成有修正主义和敌对活动而遭到攻击。^① 128

“领导思想”的代表人物也立即加入了法国批评家的行列,他们从来就认为给每个问题下最后结论是他们的历史特权。他们除了重复

① 列菲伏尔在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迫切问题》一书中力图批判地说明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在解释历史的人的时候,列菲伏尔指出,现实和思维之间没有机械的和简单的反映关系。“没有什么比一方面是‘实在’而另一方面是实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这一提法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更矛盾的了。实在是复杂和矛盾的,面对实在的反映又给这些实在的矛盾添加上自己的矛盾、自己的不确定性,有时甚至是自己对联系性的徒然追求。”(*Problèmes actuels du marxisme*, Paris 1958, str. 75)加罗迪简单地把这宣布为抛弃反映论。同样,在论述历史和人时,列菲伏尔力图特别强调实践因素,由此得出结论说:“没有无主体的客体,没有无客体的主体,如果从实践的(社会的)活动,而不是从纯意识来理解这个观点的话。不在客体中和事物中实现的能动性是没有的……”(*Problèmes actuels du marxisme*, Paris 1958, str. 42)加罗迪和其他批评家割裂第一句话,以达到把列菲伏尔宣布为唯心主义者的目的。(Roger Caraudy, *A propos d'un livre d'Henri Lefebvre: Initiation au marxisme ou initiation au revisionisme?* “Cahiers du communisme”, br. 4/1958. str. 565)同样,列菲伏尔有时在异化问题范围内解释社会主义中国家的消亡问题,而加罗迪就反驳他说:“国家消亡的基础不是一种经济的和社会的管理形式。”(*A propos d'un livre d'Henri Lefebvre: Initiation au marxisme ou initiation au revisionisme?* “Cahiers du communisme”, br. 4/1958. str. 565, str. 570)在加罗迪看来,重要的是消灭敌对阶级的反抗,而“专政和民主是齐步并进的,因为专政和镇压是对付敌对阶级(大地主和资本家)的,民主是给予劳动阶级及其同盟者的”。(*A propos d'un livre d'Henri Lefebvre: Initiation au marxisme ou initiation au revisionisme?* “Cahiers du communisme”, br. 4/1958. str. 565, str. 571)好像斯大林主义30年的历史,实际上没有提出任何一个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有关的问题似的!好像社会主义革命后,民主的发展已是注定的必然,不会有任何变化的危险似的!

上面提到的那些批评外还加上一条,那就是激烈指责列菲伏尔竟认为“辩证逻辑、异化理论和商品拜物教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而他们则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但是,某人把什么东西当作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之点,这丝毫不能分辨出他是修正主义者还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最有意思的是,苏联的思想家们没有看到,如果无产阶级专政被理解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就是说在整整一个过渡性历史时期中的政权的实质,那么,异化和克服异化问题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心问题。

在自己的另一部巨著中,列菲伏尔试图回顾已走过的道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直至今天这整整一个历史时期。有两个基本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自始至终贯穿在这部确实是特种形式的时代纪实的著作中。这两个基本问题是:哲学和哲学家的地位和任务问题以及用什么方式克服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斯大林主义中的庸俗化和僵化的问题。他早在以前就得出结论,认为哲学家的任务是要成为自己时代的批判者,要无情地反对一切异化形式,不管它们在何处出现;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直接任务首先是克服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抛弃斯大林的本体论,其次是恢复“克服”这个命题(它自然也包括否定这个如此重要的问题)的意义和价值。同这个问题有关,依然存在着异化的整整一个始终尚未弄清的巨大领域。列菲伏尔还特别要求建立一种“总体的存在”的哲学(列菲伏尔认为这意味着恢复主动性),认为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任務还包括研究文明理论,因为经济学和社会学并没有全部包括整个社会实践。^①

列菲伏尔也朝着这一方向继续进行他的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并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了他的一些重要的著作。列菲伏尔把注意力首先放在现代文明及其矛盾和缺陷的问题上,放在这一复杂对象的研究方法上。他在自己的第二部对日常生活批判的著作中给自己提出

^① H. Lefebvre, *La Somme et le reste*, Paris 1959, str. 707 - 715.

了进行经验的和理论的研究和制定需求理论的任务。他分析了需求(*besoins*)和愿望(*désirs*)之间的关系,同时确定日常生活是这样的一个平面,真正的创造在这个平面上出现并得到验证和证实。“在较高社会实践领域中产生或创造出来的东西,必然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出其真理性,不管是艺术、哲学还是政治,无不如此。只有在这个平面上才能进行验证。”^①

与此相联系,列菲伏尔提出了周期性时间和直线性时间问题。前者直接地隐匿入自然的旋律,隐匿入宇宙时间之中,从而长久地统治着人类生活,直至今日仍未在当代人类中完全消逝。直线性时代是当代工业社会的时代,这个时代并不是由自然现象来规定的。这样,日常生活的批判“在直线性时代中,即在当代工业社会的时代中探究周期性时代的持久性。它探究周期性时代(自然的、在一定意义上非理性的、具体的时代)与直线性时代(后天性的、理性的、抽象的、在一定意义上反自然的时代)之间的干扰。它探究从尚鲜为人知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出来的缺陷和匮乏。它最后还探究日常生活中从这相互作用中产生出来的可能的变态”^②。

列菲伏尔赞同马克思与许多当代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异化劳动以及对生活分裂为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现象的批判,同时认为日常生活已经丧失了自身的一个向度——深度。书籍的文明因电视而消失泯灭,新住宅无非是供人栖身的机器,新城市里的日常生活犹如一片光秃秃的土地一样贫乏,原始的自发性丧失殆尽。重新私有化在贬低集体的威信,因此,作为日常生活的变压器的集体化的失败,技术因素及其问题的增长,这不仅是资本主义的标志,也是迄今的社会主义的标志。^③

尽管这个问题比列菲伏尔所说的要复杂一些,但是可以肯定,日

① H. Lefebvre, *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II, Paris 1961, str. 50.

② H. Lefebvre, *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II, Paris 1961, str. 54 - 55.

③ 参见 H. Lefebvre, *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II, Paris 1961, str. 83 - 97。

常生活丧失了深度,这是当代文明的一个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来说,这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社会主义最好是必须竭力阻止人的可能是灾难性的消极状态。

131 在分析复杂的社会现实时,列菲伏尔非常注意“形式的工具”和范畴,并特别强调总体范畴和否定范畴的意义。^① 萨特认为总体范畴是根本的辩证范畴,而列菲伏尔却正确地强调否定范畴的重要性,尽管相当虚构地把辩证法的实质归结为某个范畴。同样,他试图通过引入可能这个概念使实在范畴辩证化。只是这时范畴才使认识的深化了的客观性得到保障,并避免浅薄的客观主义和幻想深刻的本体论。为此目的,列菲伏尔还主张对异化范畴做更辩证的理解,认为只有做历史的和相对的理解,才能看到它的复杂性。绝对的异化和异化的绝对扬弃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只有考虑到异化的扬弃有可能达到何种程度,才能理解实际的异化。^②

列菲伏尔还把新的因素引入实践。他指出,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最多只是看到了作为生产力的实践,即作为人对外在自然界的行动的实践这一个方面,并由此立即转到生产力的计划和政治实践方面去。他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是实践的一部分。因此,实践的概念具有不同的层次:从生物物理学的层面(它除了包含有对自然界的关系到还包含有其他关系——比如在家庭中,在乡村和城市,在民族中)到象征、文化和意识形态等等的抽象的和形式上的层面。对实践的分析可以使我们能够区分:一、整体的革命实践(例如马克思的哲学著作所论述的实践),二、部分的革命实践(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生产的增长等),三、作为实践的认识,它以实践为基础,同时它又是作为认识的体现物的实践,四、政治实

^① 列菲伏尔探讨公理方法和公理化方法,探讨了假设、推论(从既定的实在到可能),探讨了水平、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微观和宏观概念、证据、规范和变元、向度和结构,认为模式概念是动态的,较少服从于偶像化(参见 *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II*, Paris 1961, str. 104-183)。

^② 参见 H. Lefebvre, *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II*, Paris 1961, str. 209。

践——实践的一个特定的部分,它不应偶像化,五、重复的实践,六、发明创造的实践,它从重复的实践中产生,而它既存在于物质化了的活动中,也存在于人的关系之中,七、专业的实践——特别的手工艺和职业。^①

列菲伏尔最后探讨了他自己很早就关心的一个理论——契机(moment)理论。与时刻(instant)不同,时机通过一种确定契机的选择,从一种混沌和混乱中,即从意义双关中脱离出来,从而具有自己的时间持续性、自己的记忆、自己的内容和形式。每一个契机(爱情、游戏、休息、认识等)都是绝对的,同时,从日常生活的平凡来考虑又是扬弃异化的,但它同样会变成异化。如果我们想要给契机下一个定义,我们就必须把它称为“对一种可能性的总体实现的追求”^②。

在这当中,列菲伏尔并不主张确立某种绝对的自发性,因为自发性最终会导致混乱和不确定性。有教养的人竭力分析一定的因素,以便确定契机,同样又竭力综合显得散乱的东西的自发的意识。“因此,根据契机的理论,文化并没有同自然界相脱离,也没有凌驾于自然界之上。文化是被选择出来的;它在进行区分(有时甚至过分了:到了分离和孤立它所需要的因素本身的地步,这阻碍着任何较高形态的产生);它在进行融合。这一缓慢的选择和统一的工作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契机的种子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己肥沃的土壤。”^③

从列菲伏尔在哲学方面的整个努力方向中可以看出,他研究人和人的问题,并且竭力在马克思主义中建立起某些重要的范围,首先是批判性^④,因此,在围绕结构主义和阿尔都塞企图以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烦琐哲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做法而展开的讨论中,列菲伏

① 参见 H. Lefebvre, *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II, Paris 1961, str. 242 - 245。

② H. Lefebvre, *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II, Paris 1961, str. 343。

③ 参见 H. Lefebvre, *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II, Paris 1961, str. 356。

④ 关于这个问题,关于当代和现代化的问题,以及关于斯大林主义时代的艺术和社会主义新古典主义的问题,参见列菲伏尔的《现代性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Modernité*, Paris 1962)。

133 尔的反应颇为激烈。^① 列菲伏尔坚持辩证法及其革命性,坚持否定性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意向——克服当代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异化结构。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这个问题成了他经常研究的题目。他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克服当代的异化结构这个过程是作为官僚主义和当代技术至上主义的政治基础的机构的必然消亡的过程。在上述著作中,列菲伏尔主张一种自治的社会主义,对迄今存在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提出警告,指出他们把国家的革命变革同社会主义的变革本身混为一谈。^② 他说道:从社会主义的当代过程来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那些自称‘革命的’或‘共产主义的’左派,没有能力去避免技术至上的神话。由于受苏联的影响,他们甚至十分注重权威性计划的威望和某种‘意识形态的凌驾一切的决定作用’(在解释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教条主义)”^③。当代日常生活的变化必然通过所有有利害关系的人们的干预才能发生,而不只是按照政治民主的各种形式和规范行事的结果。“在这方面,利益和有利害关系的人们的协作具有自己的名称,它就叫作自治。”^④

然而,技术至上主义的意识 and 实践日甚一日地阻挠这种民主的发展,在自己的代表者,即“智能控制的人”(cybernanthrop)和“人”(anthrop)之间不断地制造对立和矛盾。人接受冲突并忍受着从这些冲突中产生的痛苦。他不怕矛盾变得激烈尖锐,不怕把矛盾公布于众,他

^① 关于语言和社会问题,参见《语言和社会》(*Le langage et la société*, Paris 1966);关于结构主义,参见论战性著作《立场:反对技术至上主义》(*Position: contre les technocrates*, Paris 1967)和文章《评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解释》(*Sur une interprétation du marxisme, L'Homme et la société*, br. 4/1967)。

^② 参见 H. Lefebvre, *Position: contre les technocrates*, Paris 1967, str. 44。最近,列菲伏尔开始发表广泛论证的著作《国家》(*De l'État*),此书的第一部分——《当今世界中的国家》(*L'État dans le Monde moderne*)已于1976年在巴黎问世。

^③ H. Lefebvre, *Position: contre les technocrates*, str. 21。

^④ H. Lefebvre, *Position: contre les technocrates*, str. 48。有一次,列菲伏尔参加了科尔丘拉夏令学园的讨论,他机智地和意味深长地把列宁的公式(社会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改写为社会主义是自治加现代信息系统。

不去掩盖矛盾。而智能控制的人却相反,他竭力抹杀矛盾;这是他的思维方法和行动方式。“他根本不相信冲突会带来成果。他顽固地拒绝可能产生矛盾的‘第三种术语’(事业、高兴、悲剧、革命的创造等)。他不大相信(且不说根本不相信)矛盾能得到克服。他拒绝其他任何可能性,而只要求对他自身的信奉、他自身的牢固和他自身的均衡。这是被委任的人(在日常生活和日常谈话中)。这是被指定的、被任命的、职能的、结构的人。这不再是人,因此他的思想家完全有权在理论上否认人道主义,因为在实践中他不再有人道主义了!”^①

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昂利·列菲伏尔是法国迄今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个学识广博、才智敏锐的思想家,法国文化界的典型代表。法国的哲学短评,从蒙台涅(M. E. Montaigne)和培尔(P. Bayle),经过法国的大百科全书派(我们且不管霍尔巴赫[Holbach]从自己的德国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风格上的惰性),直至列菲伏尔的哲学短评,是法国文化的特产。当然这不仅仅在于出色的哲学散文(这些散文自然缺乏系统性,缺乏穷根究底的分析韧性),而且在于哲学和文学的融为一体。这种独特的想象力是其他许多国家的哲学家们所没有的,在这个人身上,非凡的艺术家和哲学思想家合而为一。从伏尔泰(Voltaire)、卢梭和狄德罗(D. Diderot)到萨特、加缪(A. Camus),在一定意义上还有列菲伏尔,这样的例子在法国数不胜数。如果说他们的某些成果有时也是短暂的,那么,这些法国伟大的思想家们由于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参加了自己所处时代的进步斗争,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自己时代的良心。

^① H. Lefebvre, *Position: contre les technocrates*, str. 222 - 223. 这里列菲伏尔同样对马克思主义暗中做了结构主义的解释。最近一个时期列菲伏尔还发表了一系列著作——特别是关于现代文明问题(关于空间生产和都市问题。——译者注)的著作:*Le Droit à la ville*, Paris I 1968, II 1973; *Révolution urbaine*, Paris 1970; *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Paris 1972;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Paris 1974 isl。

二、让·保罗·萨特

135 在当代法国文化的最卓越的人物和思想家当中,萨特(1905—1980)不仅以他的发展、地位和非凡的智力、文化和道德政治活动,彻底否定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当代问题和当代人物所采取的顽固的公式主义的程度,而且还指出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者应做出更大的努力和具有更广阔的眼界。

像法国具有的这种如此丰富的文化和哲学传统,加上在信息传播和文化创造方面拥有的如此优越的现代条件,是同不动脑筋地宣传另一种文化,同搬用僵硬的教条主义的一般哲学原理和一般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做法互不相容的。至于法国的官方马克思主义一意孤行地进行的各种政治行动和一味顽固地坚持的各种政治评价,就更不用说了。

所有这一切,都在败坏一种伟大的思想和事业,因为这种做法使这一伟大的思想和事业不能得到相应的历史共鸣。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坚定有力和勇敢无畏的人物成为自己时代的见证人和良心,他的许多观点、评价以至行动在某些方面胜过整整一个党,那是毫不奇怪的。

萨特生于1905年。他的思想理论发展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主要是在与列菲伏尔和上述经过各种弯路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那群法国青年知识分子相同的时期。萨特自己也强调说(特别是在他最近的巨著《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中),当时处在诅咒马克思,而且诅咒黑格尔,一句话,诅咒辩证法的思想气氛之中,他对马克思的兴趣是冷淡的。原因很简单,当时在所有那样的思想前提下,他不可能理解马克思。这就是说,要理解马克思,这些影响也必须有所变化,而在当时,他接触的是那样的读物,这是不可能的事。

人,不仅是抽象的人,而且是活生生的、历史的、当代的人的问题,

特别吸引萨特及其同期的其他许多知识分子,萨特沿着这个问题上的合乎逻辑的道路发展。资产阶级哲学,特别是德国的资产阶级哲学,当时以现象学为标志,而现象学在德国本土已经在哈特曼(N. Hartman)的本体论、舍勒的人本主义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中历经浮沉盛衰了。

萨特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影响下接受了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的更强烈的影响,因为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先验自我已不能使萨特所具有的那种历史制约思想完全令人满足了。人的状况,人对他人的关系,人的物化、异化和自由等等问题(虽然是在抽象的存在主义意义上的),不容许他蛰居起来,仅仅沉溺于意识、存在和意向之中。萨特意识到人类的存在的矛盾和不人道状况,便力图越出自己的存在主义(依然是唯心主义地),不仅去抗议使人类全面非人道化的社会,而且抗议唯心主义本身。

《存在与虚无》(*L'Être et le néant*)的阶段对萨特本人和对法国哲学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阶段,但依然是在抽象范围内的抗议阶段,虽然在这里面已有活生生的个人的生命在搏动。

萨特对人和现代历史运动中人的问题的关心和密切注视、他对历史事件的异常敏感(他在自己的文学著作中也刻画了这些事件^①)、他不蛰居在永远意味着智力上或历史实践上的真正无能的思想象牙之塔,——这一切必然使萨特获得关于现代历史及其运动的结构和意义的最后认识和结论。

我们这个世纪的整个血淋淋的历史,正如萨特本人后来写的那样,要求理解现实;而工人阶级的斗争和所有当代的事件,促使萨特放眼探求这些历史具体事实的基础。

萨特在这方面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必然也同马克思主义本身,即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的,特别是官方的一种变形发生冲突,这是完

^① 特别参见他的《恶心》(*La Nausée*, 1939)、《自由之路》(*Les Chemins de la Liberté*, 1948)和许多剧作。

全可以理解的。他对人和历史的孜孜不倦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中碰到的是一个人的真空,因为在斯大林主义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中,人的问题不仅被忽视了,而且被歪曲了。萨特在这里碰到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对若干辩证法特征的毫无意义的重复,而这些辩证法特征,同关于现代科学的各种成果如何证实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的学术论证一样,对人的问题谈得很少。

如果在这里再加上他还碰到公式主义的和有局限性的政治实践,那么可以理解,萨特的转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是浪子回头,而是一个重要的独立思想家非凡的历史经验和思想经验的结果。因此,他必然也给只懂得一种乐谱的清一色的马克思主义乐队带进一定的批判性的和不和谐的旋律。

萨特虽然认为共产主义是体现一定的社会主义希望的唯一运动,但并不随随便便地去赞同这一共产主义运动要服从另一共产主义运动的做法,也不赞同盲目地袒护那种特别是在1948年到1957年期间造成震撼当时整个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体系的事件的政策。他就匈牙利事件发表了一篇重要的特写,描绘了这一事件,并与一味公然抹杀事件真实原因的法国共产党的官方立场相反,指出事件的根源在于荒谬地和粗暴地坚持陈腐的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实践。在萨特看来,拉科西主义既不是法西斯专政,也不是暴政,“与所有这些相反,它是一种社会主义化;只不过这是一种恶劣的社会主义化,这比它什么也不是还坏”^①。

萨特认为不必谴责“敌人,不必抛弃一种体系(指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弗兰尼茨基注),应当谴责一种方法和运用这种方法的领导人”^②,因为是这种方法使党和人民之间发生总失调,使人民的观点和

^① J. P. Sartre, *Le Fantôme de Staline*, “Les Temps Modernes”, br. 129 - 131, 1956 - 1957, str. 616.

^② J. P. Sartre, *Le Fantôme de Staline*, “Les Temps Modernes”, br. 129 - 131, 1956 - 1957, str. 677.

利益同官僚主义的观点和利益发生对抗,结果,只有在另一个国家的军队中才找到了出路,而这个国家的军队的铁甲车便“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向整个世界无产阶级开火”^①。

萨特反对法国共产党对这些事件,对由于攻击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者而造成的当代社会主义最严重事件所做的轻浮和诡秘的解释,并且认为能够帮助法国共产党的唯一方法,就是用真理与它的谎言对抗,直到它的全体党员不再相信这些谎言为止。萨特说,他理解法国的领导人同俄国人的亲密友谊。但是归根到底“他们只是对本国劳动群众负责”^②。

萨特认为,在现代法国生活中左派进步力量涣散(法国共产党作为最强大的、在工人阶级中扎根最深的组织,对此负有特别的责任),只有新的人民阵线和一切左派力量的联合才能拯救国家。“至于我们,我们同共产党人已辩论了12年。起初是尖刻地,后来是友好地。但我们的目的始终一样:为实现唯一能拯救我国的左派人士的团结,贡献出我们微薄的力量。”^③

我们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这些,目的是要指出,在关于现代历史的许多与通常的论点相反的论点中还有这样的论点:现代历史的最先进的力量再也不能按老办法行事了,再也不能根据外来指令,根据宗派主义的、狭隘的、有局限性的和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政治、哲学和文化问题了。当代共产主义运动在其所有阶段,不仅要允许,而且要促进和实现广泛的文化高涨,在这个文化高涨中,将不以官僚主义的狭窄心胸拿药房的戥子去衡量任何思想,不心惊胆战地害怕在文化复兴中会出现尚不知其结果为何的新思想。思想运动的结果是不能

^① J. P. Sartre, *Le Fantôme de Staline*, “Les Temps Modernes”, br. 129 - 131, 1956 - 1957, str. 674.

^② J. P. Sartre, *Le Fantôme de Staline*, “Les Temps Modernes”, br. 129 - 131, 1956 - 1957, str. 682.

^③ J. P. Sartre, *Le Fantôme de Staline*, “Les Temps Modernes”, br. 129 - 131, 1956 - 1957, str. 696.

够预见和由官方规定的。只有自由的丰富的文化和思想实践才能最终使一切事物各得其所。

当我们要评价萨特在理论和哲学领域促进哲学问题的发展的努力时,所有这一切都是必须加以考虑的。

139 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这部尚未完成的著作中认为,任何一种哲学,甚至乍一看来是最思辨的哲学,也都是实践的哲学。方法是社会和政治的武器,因此,伟大的笛卡儿主义者的分析和批判的唯理论比他们本人活得更长久。哲学,只要生它育它和被它阐明的活生生的实践仍然存在时,它就仍然是有效的。“如果哲学应当既是知识的总体化、方法、调节的观念,又是进攻的武器和语言共同体,如果这一‘世界观’也是摧毁腐败的社会的工具,如果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这一个别观念会成为整整一个阶级的文化和往往成为整整一个阶级的本性,那么,十分清楚,哲学创造的时代是罕有的。在17世纪和20世纪之间,我看到三个可以用一些名人的名字来表示的时代:笛卡儿和洛克的年代,康德和黑格尔的年代,最后是马克思的年代。这三种哲学,每一种都在自己的时代成为全部特殊思想的肥沃土壤和整个文化的水平线,当它们所表现的历史时代还没有被超越时,它们是不可超越的。”^①

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哲学活动范围,并强调指出,即使从克尔凯郭尔和黑格尔来考虑,马克思也是正确的,因为从克尔凯郭尔来考虑,马克思强调了人的存在的特殊性,而从黑格尔来考虑,马克思则研究了人的客观实在中的具体的人。萨特自己写道,马克思主义之吸引他,犹如月亮之吸引潮水,马克思主义改造了一切旧观念和消灭了资产阶级思维的各个范畴,然而,自此之后,当代马克思主义违背了认识具体的人这个主张。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力和丰富,是因为它最彻底地坚持在历史过程的总体上解释历史过程。但是它已停滞了20年,竭力以自己的官僚主义的保守主义把变化归结为同一,以一般公

^① J. P. Sartre,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Paris, 1960, str. 17.

式解释个别。萨特具体说明自己的批判意见道：“瓦勒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不是每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是瓦勒里。当代马克思主义之缺乏开拓性就包括在这两句话里。马克思主义缺乏一个中介的阶梯来理解一定历史时期在一个阶级内部和一定社会内部产生着个人及其产物的过程。”^① 140

正因为如此，萨特认为，他的无神论存在主义根本不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反题而产生的，它由于分析人，分析人的关系，因而仍然具有意义。这不是为了某一条第三种道路和某种唯心主义的人道主义而摈弃马克思主义，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重新掌握人，是研究一种具体的人类学。“存在主义（萨特指自己的存在主义。——弗兰尼茨基）的对象（马克思主义者缺乏研究的对象），是社会领域的、在集体对象和其他单个的人们当中属于某一阶级的单个的人，这是异化了的、物化了的、神秘化了的个人，即分工和剥削所造成的，但又以各种错误手段与异化斗争，而无论如何总是耐心向前的个人。因为辩证的总体化必须像包括各个经济范畴一样，包括行为、欲念、劳动和需求，必须把行动者和事件同时放进历史的整体，限定历史整体的生成方向和准确地规定现状本身的意义。马克思的方法是累进法，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这是一长串的分析的结果；今天，综合的累进法是危险的，因为懒惰的马克思主义者利用它去先验地构造现实，政治家则利用它来证明发生了的事必然这样发生，他们用这一纯粹的诠释的方法不能发现任何东西。证据就是他们事先知道所要寻求的东西。我们的方法是启发式的，它教给我们新东西，因为这一方法既是后溯法，又是累进法。”^②

萨特认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范围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没有另一种哲学能够提供更大和更有效的可能来理解历史和人，同时他又认为，他关于对人的问题进行具体考察的方法，他今天已“马克思主义

① J. P. Sartre,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Paris, 1960, str. 44.

② J. P. Sartre,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Paris, 1960, str. 86.

化了的”存在主义的分析综合的考察方法(而不是综合的考察方法),一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所缺乏的东西,是说明有理由特别强调他的存在主义方法的东西。如果这些考察方法的基本差别在于“生存意识形态”的真正作用不是描写从不存在的抽象的人类现实,而是在人类学分析中经常强调这个生存范围,那么我们只能说:这也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萨特在这方面的主张之所以有道理,只是因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忘掉具体的分析和陷入公式主义的一般化之中。

萨特不想修正马克思主义,因为他认为那是荒谬的。他也不想超越马克思主义,而只想填补一个重要的空白点。“这些看法使人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一方面说我们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极为一致,而又暂时保留存在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自治。确实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是今天唯一可能的,必然同时既是历史的又是结构的人类学。这同时是在人的总体中,即从人的物质状况出发去研究人的唯一的哲学。谁也不能向它建议另一个出发点,因为那就是要它把某种另外的人作为它的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越是违背自身原有的倾向而竭力把提问者排除在探求之外,而把被提问者变成绝对知识的对象,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内部就越会发现裂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用来描述我们历史社会的概念(剥削、异化、拜物教化、物化等)本身,正是最直接导致存在主义结构的概念。实践和辩证法概念(不可分离的两个概念)本身,是同认识的理智主义思想相矛盾的。同时,我们还要谈谈主要之点:作为人的本身生活的再生产的劳动,如果它的基础结构不是设计,就不能有任何意义。”^①

如果我们知道萨特通过怎样的道路达到马克思主义,知道他首先密切关心的是人的生存的意义和前景,如果我们同时还知道斯大林主

^① J. P. Sartre,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Paris, 1960, str. 107 - 108. 萨特强调说:“一旦马克思主义转而探索人的范围(就是说探索生存设计),并以人类学认识为基础,存在主义就将不再有存在的理由,因为它被哲学的总体化运动所吸收、超越和保存,不再是一种专门的研究,而将成为一切研究的基础。”(*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Paris, 1960, str. 111)

义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在所有这些不仅是错综复杂的,而且是最重要和最有决定性的问题——人的问题上的贫乏无能,那么我们就不会不理解萨特为什么厌恶当代辩证唯物主义所特有的抽象的本体论,这一本体论对物理、生物等范畴和现象的关心远远超过对人本身的关心。

萨特完全专心致志于人的问题,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实际上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同时至今还拒绝对自然辩证法做任何肯定。虽然他比较趋向于否定自然辩证法(因为他认为辩证法的来源是实践,而实践是人的实践),但没有明确否定,而是认为我们不能肯定这方面的任何东西。

加罗迪最近的一部著作附有萨特的一封信,萨特在这封信中这样阐述自己的观点:“我们明白,马克思主义是整个现今哲学思想的明确的范围,不能超越。我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的内在辩证法为前提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如果辩证唯物主义指的是要揭示自然辩证法这种形而上学的幻想的话。这种自然辩证法可能确实存在,但必须承认,就连证明这一点的最小的苗头我们也没有。这样,辩证唯物主义只不过是关于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充满侈谈和懒惰的徒劳无益的讨论而已。它掩盖着(至少在法国是如此)最墨守成规的分析的机械论。相反,历史唯物主义——他把一切辩证法的来源直接理解为受人本身的物质性支配的人的实践,——是任何人能够具有(和确实具有)的关于自身实践和自身异化的经验,同时也是能够把人的历史理解为总体化运动的一种改造和建设的方法。”^①

如果有人把自然辩证法理解为自然界(总而言之宇宙)向更高的阶段的前进运动和发展,那么,这种理解是毫无意义的。但同样地不能认为辩证法的来源只是实践,因为从这个立足点出发,我们必然会走向否定自然辩证法。这等于是用人的因素代替自然界的关系和运

143

^① 萨特谈论马克思和存在哲学的信,参见罗·加罗迪《人的前景》(R. Garaudy, *Perspectives de l'homme*, Paris 1960, str. 112)。在《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Paris, 1960, str. 125 - 129)也可以找到近似的观点。

动。在这个问题上,这关系到一些一般的辩证法因素,这些因素我们今天是在存在中,即在自然界中验证的,至于它们在自然界的物质或社会的物质中如何表现,则是另一个问题。确切些说,完全可以理解,社会的辩证法具有一些使社会辩证法成为社会特有的辩证法因素(例如实践),但这不是说这些因素必然是一切辩证法的前提。同样,只要我们去分析范畴的和逻辑的一般问题,就不可避免地碰到自然辩证法问题。我们思想结构和过程的辩证性,从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不能是一个单独的过程的结果。

此外,完全正确,历史领域向分析提供着最丰富最错综复杂的结构和过程,而萨特恰恰是对这些结构和过程最感兴趣的,因为它们对于人来说也是最为重要的。萨特在自己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只能举出一部分)中试图实现自己的哲学纲领。对于整个人物,即历史事物,他首先透过实践进行观察,因此,无论是总体或总体化(总体化是一个过程,因而当然也包括暂时性),离开实践这个基本范畴就无法加以理解。《辩证理性批判》第1卷力图确定“历史地位”,即一种结构人类学的基础,而第2卷的任务,将是描绘和确证,存在着一种具有一种真理和一种理性的人的历史。^①

144 辩证经验揭示历史事物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物愈被人“中介”,人就愈被物“中介”。历史的整个辩证法建立在个人的实践上,而任何的和部分的总体化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个人自身就是在总体化的个人。

实践由孤立的行动者发出,被揭示为真正的理性,即辩证运动的

^① 我们在这里只能举出一些基本思想,而略去萨特对各个历史事件的许多观察和分析。从他的中心概念之一的总体和总体化来看,必须指出,他把总体这个概念理解为整体,这个整体不同于它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但又寓于其中的每一个部分之中。总体化概念同样是整体借助于各个部分对自身的关系,但这是过程中的关系。这是在进程中的描述一种实践领域的行动(*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str. 128)。“只是总体化不同于总体,因为总体是被总体化了的,而总体化是自身在总体化。在这个意义上,不言而喻,自身在总体化就是自身在暂时化。”(*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str. 143)

意义。此外,萨特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分析得出结论说:人们自身之间最初的实在化,是一些人们与另一些人们的无穷无尽的依赖。整个历史的这些条件在我们的面前表现为受无机物质制约的条件。因此,“如果存在着作为历史过程的总体化,它是通过物质达到人们那里的。换句话说,作为有机体的自由发展的实践,在实践领域范围内使物质环境总体化;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作为人类关系的第一次总体化的物质环境”^①。

在这方面,萨特正确地给以特别注意的第一个因素,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周围物质以特殊形式在我们的个人历史中表现出来,因为全部人类历史,至少是迄今的人类历史,都是针对匮乏的艰苦斗争。这样,在劳动使之形成和使之社会化了的物质的全部水平上,我们发现,一切能动的基础,是作为从人到物质又通过物质回到人的最初统一体的匮乏(不足)结构。匮乏,作为一个量的事实的表现(这种和那种自然实体或工场手工业产品是否存在,对所有的人是否足够),是我们的历史的基础关系之一。这同时是人被确定为另一种东西而不是人的基础,即对每个人来说,他作为非人的人,作为某种异类而存在的基础。人的非人性质不是来自他的本性,而是来自上述基础上的那种关系。暴力并不必然是每一过程中的行动,并不是本性的特征,实际上是“人的行为经常的不人道性即如此内化了的匮乏,以致简直是每个人都在他人那里看到恶的原则”^②。

萨特同意马克思关于劳动是建立人们关系的现实基础这一发现, 145
并希图通过匮乏这个因素,即否定性因素指出在这些关系中产生的矛盾的条件和根源。通过人的实践,这个物质性“进入”历史,成为历史,成为实际-内在之物,即加工过的物质,这加工过的物质又通过自身矛盾(它自身含有这些矛盾)成为历史中的重要推动力。人对自然界

① J. P. Sartre,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str. 199.

② J. P. Sartre,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str. 221.

的关系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产生。自然界对人的关系也是如此。^①

在该书第1卷第2篇,萨特研究集团和历史的问题时,同时借助实践范畴去解决问题,认为实践是在联合中的集团的唯一实在的统一,因为实践创造它、反映它和改变它。在这里以及在其他许多地方,我们不得不略去从那些实际上是在阐明历史运动和结构方面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所做的丰富的观察了。通过实践,有机的个人也作为集体的个人被产生和被认识。这首先是由于客体将集团作为实践和实际的认识反映给他,即既从实践领域向他揭示现状的客观性出发,又同时从把自己对客体的劳动理解为集体的客体化的单个部分出发;其次是由于作为也通过他实现的实际总体化的整体,强使他把先验的客体实际理解为集体的客体,并把实践的领域实际理解为有待改变的集体的实际领域。^②

146

在这种关系中,辩证法表现为双循环。第一个循环是静态的循环:一定集团的结构和行动方针由集体的性质来决定,同时,集团表现为被控制的他者,这种他者成为机械的运动和生产的节拍。第二个循环是不断的运动,这种运动迟早要使集团退化,并使之消融在集体之中。^③

从萨特的广泛详细的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可以表述如下:辩证经

① 根据匮乏、实践(劳动)、暴力这个关系,萨特还解释另外一些范畴,如利益(*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str. 261 - 279)和有趣的序列问题(*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str. 303 - 377)。根据这些分析,萨特在一个注释中对上层建筑问题提出如下珍贵意见:“我们在这里试图指出这样的—个事实:一切所谓的上层建筑已经包括在基础,即人对加工过的物质和对他人的根本关系的结构之中。如果我们看见它们后来作为抽象的因素和作为上层建筑出现和自行建立起来,那是因为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通过其他一些领域和特别是通过语言领域折射出它们。但是,无论一种观念、一种价值和一种体系,如果不是已经包含在全部经验水平上、在可变的形式中、在能动和异化的全部因素之中,同时作为符号,作为对工具的需要和作为借助于这一工具进行的劳动对世界的揭露等等,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str. 303)

② 参见 J. P. Sartre,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str. 550。

③ 参见《辩证理性批判》的“作为总体化的辩证经验”这一章(特别是所引版本的第641页前后)。在这一章中在讨论这些关系时,也论及现代的集团、阶级、殖民地实践等问题。

验告诉我们人的关系的双重性质。作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简单关系，人的关系是直接的相互关系，而这种相互关系是一般共同体的原始结构。相互关系不是思辨的，也不是感情的，而是具有双重（或多重）震中的实践。它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这个实践领域最初是由先前的环境和物质条件规定的，因而这一对抗性的相互关系的条件的总和是建立在匮乏基础之上的。人是与许多同类生活在匮乏环境之中的实际的有机体，匮乏作为一种消极力量，把每一个人都决定为人的和非人的实在。每一个人，如果他希图消费我或所有其他人所必需的某种产品，他就成为危险的人，威胁着我的生命的人，从而成为既是人而又是非人的人，而我的同类对我就表现为我的异类。在最初阶段，生存斗争“不是通过人而相互对立的盲目本能，而是错综复杂的结构，是借助于这样一种实践来超越物质条件，这种实践或是建立道德，或是毁灭他者，这个他者不是有威胁性的简单客体，而是被彻底承认和判决了的自由。我们称之为暴力，因为唯一可理解的暴力，是自由以无机物质为中介对自由施加的暴力。我们实际上看到了，它可以有两个方面：自由的实践可以借助于物质工具直接毁灭他者的自由或把他者的自由放在括号里面不予以考虑（愚弄、欺骗），或者可以反对（异化的）必然性……”^①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能够理解压迫、恐怖、奴役、在异化的关系中的劳动等关系。

147

所有这些探讨，应当导致认识历史的真正问题。如果历史确实是一切多种多样的实践及其一切斗争的总体化，那么，那些冲突和合作的错综复杂的产物，在自己的综合实在性中必然是一目了然的，就是说，它作为一种正在进行总体化实践的综合产物而必然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迄今还是停留在同时期的总体化的平面上，那么剩下的事就是要考察实践的暂时化的不同时期的深处了。萨特认为，这样我们就获得了一种结构人类学的因素和辩证基础，而剩下的只是要让这

^① J. P. Sartre,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str. 689.

些结构自由地生存和在其自由发展中去认识它们。

尽管如我们强调过的,可能有人持批判性的意见,或者可能有人对个别观点持拒绝态度,尽管萨特坚持存在主义的方法论(我们指出过,存在主义的方法论在这一范围内不可能是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某种东西),可是他的观点(哲学观点和社会心理学观点一并在内)比所有目前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出色。这些努力表明,我们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重要特征将是:对各个问题的看法,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中有了共同基础,就可以有尽量充分的自由,就可以各色各样,甚至即使在这一基础上,看法也可能在许多方面是相对立的,但仍然是人类觉醒道路上的进步步骤。

三、路西安·哥德曼

哥德曼(1913—1970)在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处于早年卢卡奇著作的线上;他主张在这些著作的基础上继承和进一步发展卢卡奇的重大成就,同时特别要根据一定的社会文化试验材料对它们做出具体的阐述。因此,很自然,在他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一些唯物史观范畴:总体范畴、阶级和阶级意识范畴、可能意识的最大限度范畴、世界观和物化等范畴。

148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卢卡奇把辩证法的总体范畴理解为科学中的革命原则。哥德曼持有同样的观点:“总体观念实际上是一切辩证思

维的中心和基础。”^①由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总体的分析也是建立在各种形式的异化的观念之上的,哥德曼依靠卢卡奇对物化现象的分析,发现了历史的主体和客体的两极分化和分裂,没有那些思想手段,这种两极分化和分裂现象是无法解释的。正因为如此,物化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和哥德曼的主张中有重大意义的范畴。

由于有这样一些意向,哥德曼把哲学理解为“对特定社会的一定时代所提出的人的基本问题做出概念的回答的尝试”^②。对所有这些问题存在着三种可能的答案:概念的和抽象的答案(哲学);情感的和具体的答案(艺术);以及实践的答案——行动。因此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哲学家和艺术家的努力这么接近和为什么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双生子——哲学家和艺术家。

由此可见,社会学家们想从作者生平和环境来解释哲学著作和艺术作品的一切试图都不是从根本着手的。只有到某一社会的生活总体中才能找到有关各种哲学或艺术的性质问题的答案。“作品越是重要,越是有生命力和越是合情合理,它就越是可以通过对各个不同的社会阶级的思想的分析直接加以解释。”^③社会学的分析只是这种解释的一种必要的步骤。“重要的是要寻找出文学和艺术作品中作者通过个人的情感把历史现实和社会现实表现出来的途径。”^④

149

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哥德曼既对反映论也对意识在解释文化问

① L. Goldmann, *Recherches dialectiques*, Paris 1959, str. 169. 或者在另一处:辩证思维“从总体观念出发并肯定各个部分离开它们在整体中的关系,其本身是无法被理解的,同样,整体离开它的组成部分也是难以理解的。这足以证明,为什么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所特有的整体观点和细节分析之间经常出现振动。这一方法无论如何比理性主义的分析方法和直线方法更难运用和更难使人理解,但是科学和哲学同生活和实践一样,是不会有宽阔平坦的大道好走的”。(*Recherches dialectiques*, str. 25)哥德曼用现代心理学通用的意义结构概念代替总体概念,认为在这种意义上皮亚杰在其著作《发生认识论导论》(*Introduction à l'Epistémologie génétique*)中的研究特别有意义。哥德曼逝世之后,其《卢卡奇和海德格尔》(*Lukács et Heidegger*)一书于1973年在巴黎出版。

② L. Goldmann, *Recherches dialectiques*, str. 30.

③ L. Goldmann, *Recherches dialectiques*, str. 50.

④ L. Goldmann, *Recherches dialectiques*, str. 62.

题方面具有独立功能的理论持批判的态度。他把重心放在其意识和活动旨在完整地组织社会的阶级上,认为这些阶级在自己的实践的、理性的和感情的生活中竭力谋求一种人的世界和人的面貌,这些只是或多或少地能够被单个的个人所接近,但是作为一种趋向,却在整个集团中能动地发生作用。作家、哲学家、艺术家不是简单地反映集团的真正的意识,而是在概念或幻想的范围内塑造符合这一意识的意向的,但又凝练得多的世界。伟大的作品表明集团根本不是有意识的,而每一个较为重要的人物的思想结构,最多也不过是表明过于有限的事件的认识,在这些事件中这些人物的思想结构能够得到最彻底的和最一贯的表现。^①

正是这样,哥德曼在接受马克思和卢卡奇的基本范畴的同时,主张扩大研究历史现象的概念体系。“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研究文学创作的重要因素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中:文学和哲学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世界的外观的表现,世界的外观不是个人现象,而是社会现象。”^②

因此正如卢卡奇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所主张的那样,基本的总体就是历史的阶级(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这就意味着:“1. 每当涉及到寻找一种哲学,一种文学或艺术的流派的内在结构的时候,我们不是涉及到一代人,或者一个民族,或一个教会,不是涉及到一种职业或者任何一种别的社会集团,而是涉及到一个社会阶级和它同社会的关系;2. 一个社会阶级的可能的意识的最大限度构成一种心理学上始终如一的世界观,它表现在宗教、文学或艺术等方面。”^③

因此,在这种提纲式的公式中,阶级和阶级意识,作为一定的能动的历史的总体,这一阶级的现实意识和可能的意识的最大限度,乃是除了众所周知的生产关系等等概念之外构成精神社会学(*sociologie*

① 参见 L. Goldmann, *Za sociologiju romana*, Beograd 1967, str. 222 - 223。

② L. Goldmann, *Recherches dialectiques*, str. 46.

③ L. Goldmann, *Humanističke nauke i filozofija*, Beograd 1960, str. 75.

de l'esprit) 领域的任何研究的支撑点的范畴。

在考虑世界的外观问题和一种能够对各种文化历史现象做出独特说明的世界观类型学的问题时,哥德曼再一次利用韦伯和卢卡奇的分析,特别是卢卡奇的早期著作《心灵和形式》和《小说理论》中所做的分析。在这些著作中提出世界观的三种基本类型:悲剧的世界观、评论的世界观和小说的世界观。哥德曼认为世界观类型学问题是精神社会学最大的任务之一,并且是处在刚刚开始解决的阶段的问题。同时,他认为探讨这种类型学乃是哲学和文学的学术史的入门,是那种能够把某一著作中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区别开来的客观的手段。^① 世界观(例如理性主义、经验主义、泛神论、神秘主义、个人主义、悲剧的观点、辩证的观点等等),总是一种对于个人和集团的情况和处境的可能的首尾一贯的回答,总是对一定的多种多样的和常常是对立的历史情况的答案。这也就说明这样一种事实:一方面历史上常常出现艺术和哲学的复兴,而另一方面同一种世界观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功能,革命的、辩护的、保守的和颓废的功能。^②

151

除了这些在各个不同层次上研究所谓人的历史的总体的思想手段之外,哥德曼也特别坚持可能的意识范畴。这一范畴标志着一个阶级能够认识现实的最大限度而又不同这一阶级的存在与之紧密相关的经济和社会的利益发生冲突。它与现实的意识不同,因为现实意识标志着一定时期和一定国家的现实的认识阶段。

考虑到这个问题,哥德曼认为物理学家同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目前物理学家只注意“认识的两个层次,首先是

^① 哥德曼到处强调这一点:“但是,无论如何,这种类型学要成为历史和精神社会学发展中的主要阶段,现在对我们来说还远未能实现,即使是一般地实现。这是因为它要求长期地和具体地事先做好许多工作。”(*Humanističke nauke i filozofija*, str. 97)或者在另一处:“我们要补充说明,在我们看来,世界观类型学是哲学史家和艺术家的主要任务,一句话,它将是哲学人本学的主要贡献,但是它还仅仅是刚刚开始。同伟大的物理学体系一样,它将成为由长长一系列局部研究构成的花环,这些研究将从自己的方面加以解释和限定。”(*Le dieu caché*, Paris 1955, str. 30-31)

^② 参见 L. Goldmann, *Le dieu caché*, Paris 1955, str. 29-30。

思想标准:思维符合物体,其次是它的时间的实际认识层次,其价值取决于它们和物体的距离,而历史学家,特别是社会学家注意的,起码还有一种存在于一种东西和另一种东西之间的因素:构成他们所分析的那个社会的各个阶级最大限度的可能的意识”^①。

当我们谈到最大限度的可能的意识时,这就意味着我们在一定阶级的阶级意识内部也看到了差异,以及看到了某些集团和个人有可能表现出不一定人人都意识到的最大限度。当谈到科学家在特殊情况下能够达到超越他那个时代存在的一切社会阶级的现有意识的认识时,就是说“伟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以或多或少彻底的方式表达了符合某个阶级最大限度的可能的意识的世界观;这样说对于哲学家、作家和艺术家特别适合”^②。

最大限度的可能的意识这一概念对我们来说无论如何是适用于说明任何伟大的艺术作品和哲学著作的思想和观念结构的重要手段。但从政治行动来考虑起码要注意到这样一点:一个阶级或阶级集团最大限度可能的意识取决于各种不同的社会政治的和国内国际的发达程度和情势。当然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具体的政治要求不能只沿着考察最大限度可能的意识这一条路线走,而首先要注意那些决定着这种意识的客观的社会经济因素。在个别的时代,特别是革命的时代,在落后的阶级中也会形成这样的集团,其意识在其他阶级的影响下超过本阶级的实际意识,虽然直至一定的物质前提建成之前,要在实践中实现其意识,那必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向我们说明了,存在着某种意识做出各种浪漫主义的过高评价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这种过高评价在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曾经出现过,将来也肯定还会出现。要对可能的意识进行分析,由于要分析其经济社会前提,因而总是困难的。所以,无论是历史的推断还是政治的预测都必须有尽量牢固的基础,即客观地分析那

^① L. Goldmann, *Humanističke nauke i filozofija*, str. 86.

^② L. Goldmann, *Humanističke nauke i filozofija*, str. 37.

些条件,以及改变那些作为阶级意识变化的前提的条件。也应该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先进的个人、集团和组织在人类历史中的意义和作用,他们的预见标志着一定时期的可能的意识实际达到的最大限度,他们的行动指引着阶级的运动去开辟看来是可靠的、令人满意的和唯一可能的历史前景。

在韦伯、卢卡奇和哥德曼看来,可能的意识以及最大限度的可能的意识,会有各种不同的类型,这使人们可以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做出特别的说明和解释。哥德曼主要地和极为广泛地对这样一种现象,即帕斯卡尔(B. Pascal)的思想和拉辛的一些悲剧进行了具体的研究。他的研究是以悲剧的世界观观念(它表现出人与社会世界和宇宙世界之间深刻的危机)和我们上面谈到的前提为基础的。哥德曼提出一个问题:在17世纪的法国和18世纪的德国,是哪些社会阶层热衷于发展悲剧的世界观,并得出结论说:在法国是穿袍贵族,在德国是资产阶级。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向往民主自由的社会,但它由于自己的软弱而不能予以实现,它关于人的观念就带有理想和现实、理论和实践脱节的标记。同样,穿袍贵族由于出身于资产者行列,对凡尔赛宫廷的无聊生活持否定态度而力图革新;但它忠于君主制度,与这一制度联结在一起,因而不可能采取鲜明的社会变革的立场。所以,这两种情况产生了同样的悲剧的世界观。^①

在法国,歌德曼发现这种悲剧的世界观的立场存在于冉森教派中,在这里主要是“抛却世界和社会”。哥德曼通过对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格言和拉辛的悲剧的分析得出这样的论断:这些思想和某些悲

^① “一旦找到那种社会基础,它就不仅使我们能够说明康德的思想 and 帕斯卡尔的思想的相同之处,而且使我们能看到它们的主要差别。在德国资产阶级那里存在着意识和现实、思想和行动的悲剧式的脱节;在法国穿袍贵族那里,这种脱节存在于意识本身,存在于理性、职责和君主制度显而易见的现实及其全部优点之间。这也反映在以康德和哥德曼为一方的著作中和以帕斯卡尔和拉辛为另一方的著作中。在前者那里,主要是思维和行动脱节,在后者那里则主要是理性和感觉之间、职位和激情之间的冲突。”(*Recherches dialectiques*, str. 43-44)

剧说明,在冉森教派内部也存在分化,分化为温和派、中间派和两个极端派的必然性。当一些研究家仅仅看到阿尔诺-尼古拉(Arnauld-Nicole)周围的中间派、J. 奥尔西巴尔(J. Orcibal)周围的温和派时,哥德曼得出结论认为,帕斯卡尔的《思想录》的性质,即矛盾的逻辑和冲突的道德,完全不同于冉森教派众所周知的立场。这使他得出在冉森教派运动中必定还存在第三个派别的假说。由于发现马丁·德·巴尔科斯(Martin de Barcos)的原稿,哥德曼也就找到了他从上面对拉辛的某些悲剧,特别是对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中的世界观性质的分析产生的假设。《隐藏着上帝》这一著作也是进行这种分析的。

154 哥德曼称自己研究文学史的方法是遗传学的结构主义(或结构主义的遗传学的分析)。按照遗传学结构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幻想世界的结构与一定的社会集团的思维结构是同源的,或者至少与之具有可以理解的关系,作家在作品的内容方面,即在在这一结构所决定的幻想世界的创造方面具有充分自由。^① 哥德曼在其《小说社会学》中企图寻找这种结构的同源,但不再是在集团和个人的关系中寻找,而是在整个生产方式和各个历史时期的小说的艺术表现的关系中寻找。

哥德曼是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的分析出发的,这种分析指明交换价值的作用机制,从而也指出了商品生产的根本现象——商品拜物教和物化。哥德曼说,使用价值继续存在,“但是,它们的作用是隐蔽的,正如小说世界中真正的价值的作用一样”^②。在哥德曼看来,小说的复杂形式实际上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形式,在这种日常生活中,人们不得不以退化的方式即通过交换价值的中介来寻找任何物品。“由此可知,这两种结构,很重要的小说型的结构和理性型的结构,是完全同源的,甚至可以说是表现为两个不同方面的同一种结构。”^③

① L. Goldmann, *Za sociologiju romana*, str. 222.

② L. Goldmann, *Za sociologiju romana*, str. 52 - 53.

③ L. Goldmann, *Za sociologiju romana*, str. 53.

哥德曼就是这样一贯认为:符合物化占支配地位的世界的小说形式的进步,只要它与作为生产方式本身发展变化的结果的物化结构的同源变化相联系,也是可以理解的。为此目的,他十分详细地分析了马尔劳克斯(A. Malraux)的小说和 N. 萨劳特(N. Sarraute)和 A. 罗伯-格里莱特(A. Robbe-Grillet)的最新法国小说的联系。哥德曼的出发前提(这一前提同时又是他的工作假说)在于:在新世纪的物化社会中存在着特殊的小说形式也与之相适应的个别时期。个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功能的 20 世纪初以前的自由经济,在小说中与主人公是同源的;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 20 世纪的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结果,个人和个人生活在经济结构中和在整个生活中的意义消失了,于是我们就有了主人公堕落的小说;最后,在最近 30 年,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自我调节机构的建立,就有其相应的小说,这些小说描述独立的对象世界,唯一能表现出人的现实的那些结构和规律。^①

155

虽然这些研究尚未得到确定的和全面的证实,但我们认为,哥德曼已经获得一些重要的认识,获得对艺术和意识形态的现象和结构进行分析的方法手段,这将有助于更深一步地认识它们的发生和发展。

哥德曼虽然没有系统地研究过有关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意识问题,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并不回避它们的社会制约性问题。但我们在这里还想指出他的另一个观点,我们在 M. 韦伯和其他许多人那里可以看到这样的观点,但我以为不能用那样的形式去理解它。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关于价值判断和实在判断的争论。哥德曼写道:“首先,我们可以断定,涂尔干(E. Durkheim),特别是他的学生^②试图创立一种科学的社会学,强调(已经暗含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的)两个在

^① 参见 L. Goldmann, *Za sociologiju romana*, str. 198 - 203。

^② 哥德曼自注:彻底区分给定的东西和标准的东西,这特别归功于列维-布留尔(Lévy Bruhl)和他的著作《道德和道德科学》(*La morale et la science des moeurs*),因为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中,涂尔干在其关于标准的和“病理学的”东西的良好叙述中总是认为,行为规则能从对事实的简单的客观研究中推论出来。总之,在这一点上他的学生看来没有跟随着他。

今天对任何严肃研究来说都是确定的成果的原则：

(1) 科学地研究人的现实本身不能以什么价值判断为逻辑根据。或者如彭加勒(J. H. Poincaré)所表述的：在陈述式中的前提并没有命令式中的逻辑结论。社会科学的‘技术的’效益仅仅在于确立假说的命令式(某些手段和一定的目的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于人意识到由于掌握一定的价值而产生的成果这一事实。

156 (2) 研究者应该努力获得一种符合事实的图景，避免任何由于他个人的好恶而产生的歪曲。”^①

不需要特别强调，任何社会科学研究实际上都蕴含着一定的立场，对事实的认识虽然在心理上会加快或延缓得到价值判断，但是最合乎逻辑的描述取决于研究者的特定状态等等。哥德曼对这点比别人知道得清楚得多。问题只是在于，对历史事实的科学研究本身不能够成为任何价值判断的逻辑根据这一观点是否站得住脚，如果我们排除一系列不应该从中引申出任何价值判断的实际是次要的事实，那么对于更为重要的历史事实来说，这一观点只有在认为不存在历史规律——趋势(不管对它们做何解释)，不存在进步的历史运动(它意味着较高的阶段能够解决较低阶段不能解决的东西)的场合才适用。只有在认为人的历史参与在客观的历史环境、关系、矛盾等等中没有基础，在主观的价值评价和需要中有基础的场合才适用。

事情完全相反：现代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意向是把历史的行动和价值判断，以及赋予一定的历史环境和趋势以价值的活动，都奠定在尽量客观地研究和分析历史的结构、运动和趋势的基础上，就是说价值判断本身也得到尽量客观的科学根据。

因此，哥德曼在另一个地方在同 M. 卢贝尔(M. Rubel)争论这个问题时更多地表露出来的不是有关这些行为脱节的议论，而是正好相反，认为真正科学地研究某些基本的历史问题必将也成为价值判断的

^① L. Goldmann, *Humanističke nauke i filozofija*, str. 18 - 19.

基础。与马克思把价值判断和客观分析“混淆”的看法相反,哥德曼论证说,在马克思的辩证分析中认识、说明和价值三者是严格地不可分的。^①

学术上坚持严格区分实在判断和价值判断而否定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这种立场是现代社会许多脑力劳动者的状况合乎逻辑和可以理解的后果。他们的社会参与是严格受限制的,而超越这些界限的行动又使得他们的良知,甚至常常是职业的生存都成问题。

157

完整地把握哥德曼的著作,可以得出结论如下:他在社会学研究中,坚持运用在马克思主义中被忽视的或完全没有得到表述的某些范畴和概念手段,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新鲜的东西,并且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课题。而进行具体研究,经常检验这些原则的价值,这是哥德曼的活动的重要方面,这是长期的和折磨人的道路,但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要得到尽量广泛的根据和必要的前提所必需的。

四、罗歇·加罗迪

罗歇·加罗迪(1913—2012)是法国正统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最著名的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以大量著作从根本上反映了共产党本身的发展路线和立场的人物。加罗迪在其理论活动的初期,在60年代开始以前,完全处于苏联意识形态和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下。因此,他在这一时期论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主要著作之一,常有认识论和实证主义的一切标志。^②

加罗迪当时的认识论,以及苏联的认识论,由于许多原因不能适应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的要求。它们没有达到现代哲学发展的水平

^① 参见 *Recherches dialectiques*, str. 300。

^② 《唯物主义认识论》(*La théorie matérialiste de la connaissance*, Paris, 1953)书名本身就很有特色,因为由此可以看出他忽视了对这一问题的一般唯物主义的解释同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解释的重大区别。

158 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是公式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所有这些作者都停留在主观客观关系的古典的解释上,按照这种解释,主体被理解为一般的主体,即局限于他的认识是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上。

尽管没有忘记现实是人化的现实,尽管没有忘记强调实践因素,但是主体对于一种第一性的关系来说依然是外在的、附加的。加罗迪不理解的一点是:实践不仅是对自然的行为,而且是整个人与人的关系的实际的相互联系。所以,实际上不存在什么一般反映的主体(这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的遗毒),只存在处于历史情况和结构中的历史的人们。而实际上那种中介是历史地形成的人的思维,历史上构成的、意识形态化的和常常是神秘化的人的意识,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确实是那种需要研究的最有趣和最重要的中介。

加罗迪在其论自由的著作中没有摆脱一般意识形态主义的框框,直至 50 年代末才试图解释异化问题,而异化问题应该是上述问题的基础。^①

毋庸争辩的是,法国共产党曾经受斯大林主义的极大的影响,而那种受局限的视野相当大地限制了独立自主的创造性的活动,也限制了独立自主的政治参与和思想参与。例如,在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问题上以及在非斯大林化过程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 1968 年五月事件的时候又表现出回跳。直至许多其他党都开始清除极其复杂的教条主义的遗毒之后,特别是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法国共产党直到 1962 年 6 月赫鲁晓夫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批判了斯大林之后才进行它正式的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

加罗迪在那次中央全会上做了批判斯大林理论观点的报告。虽然一些观点尖锐,但终究还是没有认识到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

^① 参见加罗迪的《自由的原理》(*Grammaire de la Liberté*, 1950),《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L'humanisme marxiste*, 1958)和《人的前景》(*Perspectives de l'homme*, 1959)等著作。

解释的消极性在于如此致命地危害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① 同样,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相信党总是能够在斯库拉(Scylla)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②之间,即在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幸运地行进。只要人们想到“修正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具有如此众多的含义,如此众多的矛盾性和相对性,那么,这种斩钉截铁的断语不能不引起我们某种程度的怀疑。^③

另一方面,换句话说,清算斯大林的理论错误的主要理由是不算小的。基本的指责是:斯大林割裂理论和实践,从而导致把哲学概括为七个特征的缺点;宣扬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论点;只注意到帝国主义的早期阶段的规律性而主张战争不可避免;宣扬机械论的反映论;对实践问题注意不够;忽视对黑格尔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并简单化地理解关于黑格尔头足倒置的比喻;机械地解释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简单片面地认为唯物主义是进步的派别,而唯心主义则是反动的派别;割裂辩证法和现代科学;相信经典作家原著可以提供几乎全部现成答案,从而造成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托马斯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已经完成的一种原则和规律的体系并

① 加罗迪还总是以下述方式表述斯大林的特点:“如果全部抛弃那种遗产,那显然是错误的。斯大林尽管有某些错误,但他对运动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包括理论领域在内。大多数老党员都是通过斯大林在其《列宁主义问题》的著作所做的对基本原则的丰富和有利的综合而学习到共产主义的,这些基本原则的实质依然起作用,并且将会继续起作用。甚至他的基本论述在哲学上有重大教育意义的优点,对于扩大我们的世界观的伟大影响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R. Garaudy, *Rapport od 14. juna 1962*, “Cahiers du Communisme”, 7-8, 1962, str. 88)

② 希腊神话中两个凶猛强悍的女妖,危害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外出漂流时所经过的狭隘水域。——译者注

③ 在同一报告中,加罗迪写道:“我们党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前就已经懂得,同时既防止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解释,又防止教条主义的解释。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借口纠正斯大林的错误,使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怀疑。而教条主义借口所谓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好像从未犯过错误那样思考和行动,因而为生活所超越。”(R. Garaudy, *Rapport od 14. juna 1962*, “Cahiers du Communisme”, 7-8, 1962, str. 89)他在这一报告中,加罗迪对列菲伏尔采取傲慢的态度,依然把列菲伏尔看作似乎是一个由于具有模糊的和贫乏的左的黑格尔主义而滥用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来源的所谓思想家。(参见 R. Garaudy, *Rapport od 14. juna 1962*, “Cahiers du Communisme”, 7-8, 1962, str. 105)

从这些规律中推论出现实结构。

160 从那个时期起,加罗迪就越来越摆脱自己的教条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框框,并开始新的探索和钻研。在这条道路上,他必然要返回到一位思想家那里去,没有那位思想家,就无法理解马克思,这就是在斯大林主义时期遭到诋毁的那位思想家。正是在他批判斯大林的理论立场的那一年,他出版了自己的论述黑格尔哲学的书,一年之后又出版了论述毕加索、圣-约翰·培尔瑟(Saint-John Perse)和卡夫卡的大部头著作^①,阿拉贡(L. Aragon)为它写了一篇激动人心的序言。在这本关于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中概括地综述了这些主张。

首先必须指出,加罗迪公开承认了自己先前的思想发展阶段的教条主义的局限性和自己观点的意识形态主义。^②加罗迪看到了,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致共产主义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都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任务。在加罗迪看来,支配这一变化的基本因素有三:科学和技术的重大发展,社会主义已成为世界体系和亚非两大陆的非殖民化。当代世界结构的这些根本变化,要求人们拥有更广阔视野和新的概念手段。^③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联系,他特别强调了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哲学对于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产生的重大意义。加罗迪抛弃了过时的但在苏联哲学中依然存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职能,并且认为它的首要任务是成为人用以改造物和人本身,并且创造人本身的历史的意识的意识和动力。它力图尽量透彻地理解这一行动并获得优势地位。^④

① 罗·加罗迪:《上帝死了》(*Dieu est mort*, Paris 1962);《无涯的现实主义》,(*D'un réalisme sans rivages*, Paris 1963)。此后他出版了论马克思的有趣的著作《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Paris 1964)。

② 例如参见《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e du 20^e siècle*, Paris 1966, str. 19-20, 222-223)。

③ 参见 R. Garaudy, *Marxisme du 20^e siècle*, Paris 1966, str. 21。

④ R. Garaudy, *Marxisme du 20^e siècle*, str. 41-42。

正如许多当代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加罗迪把实践当作马克思的哲学观的基础,同时试图保留反映概念和自然辩证法概念。因此,在他看来,认识“按其本性,从它是对一种并非我们创造的现实的认识这种意义来说,是‘反映’;同时,按其方法,它是‘建构’”^①。这两种因素可以最好不过地表现“模式”概念。“模式”概念既包含着唯物主义的反映因素又包含着能动性、建构的因素,而后一因素能阻止产生那种要用绝对的终极真理来取代那种暂时的模型的妄想。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不是存在的哲学,而是行动、行为的哲学。^② 由于艺术问题首先是创造问题,任何关于艺术和创造活动的机械论的、唯心主义的或教条主义的解释和观念在美学中都必然会有不理想的后果。因此,实际上“美学观是马克思主义解释的试金石”^③。正如加罗迪通过在《无涯的现实主义》中的例子试图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观能够使近百年来一切最重要的研究一体化,同时使各种浪漫主义的或者神秘主义的变种非神秘化,并同时揭穿它们。现代的艺术观来自“对人的自主的确认:艺术不是模仿而是创造”^④。

由此可见,图画不可能是反映某种永恒的外部世界的镜子,但也不是用来透视永恒的内心世界的荧光屏。图画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模式”,而模式在历史上就人掌握自然、社会和自身的程度而论是各不相同的。这种看法使得加罗迪抛弃了那种认为在艺术中只有一种原则,在社会中只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点,并且强调上述这一切认识使我们不仅理解到而且希望,在艺术中以及在科学中存在着流派和风格的富有成果的多元主义。^⑤

加罗迪在探讨道德问题时,在道德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认为马克

① R. Garaudy, *Marxisme du 20^e siècle*, str. 49.

② R. Garaudy, *Marxisme du 20^e siècle*, str. 92.

③ R. Garaudy, *Marxisme du 20^e siècle*, str. 191.

④ R. Garaudy, *Marxisme du 20^e siècle*, str. 201.

⑤ 参见 R. Garaudy, *Marxisme du 20^e siècle*, str. 205, 210.

162 思主义必须首先解决下列三个问题：根绝教条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事先批判的哲学，也就是说，人们不能马克思主义地想象，似乎康德和费希特从未存在过；其次更加深刻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理论，并且承认存在主义已成为现实问题，虽然我们不能够接受它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最后，制定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扬弃理论，使我们能够研究人的一切领域，并且理解内心世界和价值，而又不致陷入神学观念。^①

同样，我们可以提到加罗迪关于宗教及其历史作用和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的关系等问题的饶有兴趣的研究。加罗迪遵循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宗教现象的思想，着重说明了马克思关于宗教是现实世界贫困的表现和同时又是对这种贫困的抗议的早期思想。加罗迪把这种抗议的特点看作是犹太基督教的战斗的因素，并且通过研究各种积极的历史参与，从历史角度研究这一特点，同时在理论上不把强调的重点放在存在上，而是放在主体性上（研究奥古斯丁[Augustin]、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 la Mirandola]、托·闵采尔[T. Münzer]到现代基督教人道主义者）。恰恰是这种抗议的特点表明，人们不能把宗派仅仅归结为消极的东西或制度化了的教会作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如果基督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不想在机械地碰头中最终各朝两种方向走，就必须意识到，我们如果不改变自己，我们就无法相互了解。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把自己看作是一成不变的终极真理的占有者。^②

加罗迪在最近时期参加了许多关于各种哲学和现实的社会问题的公开讨论，并且试图成为当代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真正的同时代人，他也许能够以其丰富的经验和文化，在许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

^① 参见 R. Garaudy, *Marxisme du 20^e siècle*, str. 86 - 87。

^② 参见 R. Garaudy, *Marxisme du 20^e siècle*, str. 169。加罗迪在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后同党的领导集团发生冲突，此后被开除出党。在这一时期出版了《关于法国社会主义模式》(*Pour un modèle français du socialisme*, Paris, 1968)；《社会主义的伟大转折》(*Le grand Tournant du socialisme*, Paris, 1969)；《完整的真理》(*Toute la vérité*, Paris, 1970)。

思想的活跃和研究做出贡献。

五、关于辩证法的讨论

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了一场关于辩证法的讨论,参加讨论的有:萨特、加罗迪、J. 奥尔塞尔(J. Orcel)、J. 伊波利特(J. Hyppolite)和 P. 维吉埃尔(P. Vigier)。讨论主要是围绕辩证法的特殊性和普遍性问题展开的,注意的中心是众所周知的、颇有争议的自然辩证法问题。

萨特的出发前提和主张是:总体范畴是历史的存在物和这一存在物的思想的基本范畴。对于生物学的个体和对于历史可以说总体性,对于自然界就不能这么说,因为自然界是无限的。萨特在提出自然界中是否存在总体性或总体化的问题的同时,认为这一问题应当由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人员去回答。

萨特认为我们只有在谈到历史的时候才谈得上总体和总体化。正因为这样,“辩证法规律按我们本身和我们本身的社会运动来说是社会的总体化。简言之,辩证法不是别的而是实践”^①。

萨特的所有这些见解和立场是以这样的一个论点和某种忧虑为基础的,这就是:我们承认自然辩证法时就必然事先限定历史进程本身,必然缩小或者完全排除人的自由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这是因为,对于萨特来说,历史是我们人的事业,明白无误地是辩证的事件,是不以历史之外存在的某些规律为转移的。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这些论

^① *Marxisme et existentialisme, controverse sur la dialectique*, Paris 1962, str. 16. 我们记得在这之前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有过若干次公开的争论,一次是同梅洛-庞蒂(M. Merleau-Ponty),另一次是同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天主教人物的争论,但这些争论没有多大理论意义。罗·加罗迪、G. 克瓦纽(G. Cogniot)、M. 卡维因(M. Caveing)、J. T. 德桑蒂(J. T. Desanti)、让·卡纳帕(J. Kanapa)、V. 列杜克(V. Leduc)和昂·列菲伏尔参加撰写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不幸遭遇》(*Mésaventures de l'anti-marxisme*, 1956)一书回答了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Les Aventures de la Dialectique*, 1955)一书。他们用小册子《马克思主义者对天主教的批判回答》(*Les Marxistes répondent à leurs Critiques catholiques*, 1957)回答了天主教的批评家。

断使我们抛弃外在的教条主义,即一种所谓的自然总体辩证理论,这种理论妄图决定人的历史的特殊性。”^①他在结束论述时谈到以下问题,并做出如下论断:能否承认辩证法的特殊性,承认辩证法“本身是人的辩证法,即辩证法与物质的和有机的存在物——人有关?”如果能够承认,“那么可以期望,我们在自然界中只能发现辩证过程的极为残缺、极其模糊和极不发达的形式”。^②

加罗迪是同萨特论战的主要对手,他不同意那种认为总体范畴足以规定历史辩证法的论题,他也不同意所谓恩格斯认为辩证法规律的清单已经完备的看法。同样他也不同意那种认为在自然辩证法概念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存在分歧的说法。他认为马克思同恩格斯的通信表明马克思是赞同恩格斯的研究成果的。加罗迪认为我们本身的历史实践以及其他科学都表明:我们行动的客体具有和自然同样确定的结构和历史。如果“一种关于结构的假说得到了证实,如果它表明是实在的,如果它给予我们一种支配现实的权力,那么,怎么能说,在那种认识的结构和那种事物本身之间不存在现实关系呢?辩证思维怎么能够给予我们支配权,支配一种在某一阶段不是辩证地存在的存在物呢?”^③在讨论中加罗迪得出如下结论:“在自然界中不存在那种在我们的思维中存在的辩证法。这种论断是神学的观念,起码是黑格尔的观念,照它的说法自然界中的存在是由绝对精神决定的。我们说自然辩证法存在着,这就是说,现实的结构和运动是这样的:只有辩证的思维才使我们能够理解和支配现象。总括起来说:一种物质的东西自在地存在着(先于我们和在我们之外存在着),它是具有(依然是先于我们和在我们之外)结构的;科学给我们指明这种结构是辩证的。”^④加罗迪在讨论中还试图强调指出自然辩证法不是自然哲学,不

① *Marxisme et existentialisme, controverse sur la dialectique*, Paris 1962, str. 21.

② *Marxisme et existentialisme, controverse sur la dialectique*, Paris 1962, str. 26.

③ *Marxisme et existentialisme, controverse sur la dialectique*, Paris 1962, str. 34 - 35.

④ *Marxisme et existentialisme, controverse sur la dialectique*, Paris 1962, str. 35.

是被证明的自然哲学,他担心接受自然辩证法的概念同时意味着人的历史仅仅只是极其广泛的自然史的附加物;再者,马克思主义者并未肯定自然界是总体,而是肯定在自然界中也存在总体的东西,这同样适合于历史,在历史领域只能谈到许多总体,而不是一个总体。最后,马克思主义者拒绝那种反映在自然界上的辩证规律的先验公式。

参加讨论的其他人在讨论中并没有提出新的因素。我们只能指出:伊波利特并没有排除把辩证法公式也运用于自然领域的可能性,而只是认为这种运用是有问题的,它得不到我们有效地参与人的历史所给予我们的可靠性。同样他认为,“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术语在历史辩证法中有其本源的意义,而且只有在这里才具有这种意义。^①

这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和在他们之外进行的有关这一重大哲学问题的许多讨论之一,它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双方都利用一些论据来证实自己的看法。但是无论哪一方面都没有很好地看到,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哲学问题。萨特对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占支配地位的辩证法的本体论主义——加罗迪是这种本体论主义的主要思想家之一——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而有关总体范畴是辩证法的基本范畴的答案却是片面的。同样,加罗迪和维吉埃尔的意图也是有道理的,他们没有排除自然过程、进化、现实的各个领域和它们的过程性和结构性——这表明这些过程的某种程度的辩证性,表明他们承认历史的东西和人的东西的特殊性,但是尽管如此,历史辩证法对于某种无意识的自然辩证法的关系问题依然未得到回答。

这些讨论常常采取经院哲学的烦琐形式,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某些国家中。因为在这些国家中人们还看不出当代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本质和意义所在。重新提出辩证法(以至自然辩证法)的普遍性,不顾一定的明显的差别和不能创造性地解决历史本身存在的问题的主张,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会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因为,如果我们

^① 参见 *Marxisme et existentialisme, controverse sur la dialectique*, Paris 1962, str. 51。

把排除自然辩证法的任何可能性的最过激的看法置于一边(而我们看到,已故的存在主义者萨特承认自然辩证法的片断的和不发达的形式的可能性),那么只有某一种思维的偏颇性才能否定在自然的运动本身中存在某些辩证法因素(矛盾、质变和量变的关系,等等)。肯定这一点之所以更为重要,是因为它最好地向我们表明现实的各个领域的本质的联系。但是,这一辩证法和这些我们能够在现实的一切领域确定的抽象形式(尽管它们总是历史地确定的)远不是能够穷尽的,对于人,从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真正最重要的领域是历史辩证法的领域。众所周知,正如在斯大林主义和教条主义中过去和现在都发生的那种情况一样,仅仅抽象地坚持这些普遍的范畴以及它们在历史上的运用,结果造成一种在理论上完全反动的没有意义的机械论和本体论主义。

要钻研和理解历史的东西,就必须钻研历史辩证法的特殊的范畴。而这一领域正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占优势地位的领域。那些在思想上和实践上探讨历史辩证法问题和解决现代文明的矛盾的人们,一当他们抛弃抽象的辩证法,就比那些承认抽象辩证法并且成为这种抽象的俘虏,或者经常力图证明所有科学都证实这种辩证法抽象和那些从黑格尔那里已经知道的范畴的人们,更加接近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

人的问题只能在历史的领域内解决。所以,怎样理解实践、历史的决定性、自由、异化、人和人道、历史的东西和个人的东西、社会结构的关系、意识形态和一般社会意识、解放的过程和道路等问题,一句话,怎样理解辩证的历史或历史辩证法,是具有首要和决定性的意义的。

六、其他理论争论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著述当中,应该提到的

是皮埃尔·纳维勒(Pierre Naville)的一部巨著。他在这一著作中,从黑格尔的著作起,一直叙述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和后期的著作,充分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劳动问题和劳动这一概念的起源问题的观点。^① 同样还应该提到奥·科尔纽(A. Cornu)的重要的历史著作。他在自己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对他们的发展做出了

^① 皮·纳维勒:《享受的异化》(*De l'Aliénation à la Jouissance*, Paris 1957)。在这个问题的历史-社会学分析中,纳维勒区分出劳动范畴和实践范畴:“作为一般的能动性,作为实践,人类集团的生活是创造;但是作为劳动,它是分离的创造物,即异化。在创造活动中,人作为自身的一种礼物,既属于自己本身,也属于其他人;但是,在劳动和对他人的强制所产生的异化中,人成为对自身和对他人的异己的东西。作为创造者,他得到自己;作为商品生产者,他丧失自身。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他是能动的,他的能动性一直是他的社会地位的钥匙;但是,只有对他的劳动条件做专门的分析,才能使他有可能改变这种状况,使之对自己有利。”(*De l'Aliénation à la Jouissance*, str. 367)此外,纳维勒在其较早的著作《心理学、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Psychologie, Marxisme, Matérialisme*, Paris 1964)中,有时主张与行为主义和机械主义相近的思想。在该书的结尾部分,在“新怪物”这一统一的标题下,颇多地论述了异化。纳维勒发表了大部头的分析社会主义的著作《社会主义的报应》, (*Le Salaire socialiste* 2, 3 Paris 1970; 4 - 1974; 5 - 1972)。

迄今为止最好的论据确凿的分析。^①

168 60年代初,《论据》(*Argument*, 1957 - 1962)杂志的出版者和主编科斯塔·阿克塞洛斯(Kostas Axelos, 1924 - 2010)发表了他的论马克思是技术思想家的著作,并在稍微晚一些时候发表了他的评论文集。^②阿克塞洛斯坚持那种否定在马克思那里存在任何本体论、自然哲学或自然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而把马克思的思想概括为本质上人本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在阿克塞洛斯看来,马克思不是从物质、自然等等出发,而是从人出发,从自然的、人的和社会的存在物出

① 奥·科尔纽:《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Paris, I sv. 1955, II sv. 1958, III sv. 1962)。此外,还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批判文集》(*Essai de critique marxiste*, Paris 1949)。在这一时期的令人感兴趣的主张中,可以提到下列著作:J. T. Desanti,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1956; Tran-Duc-Thao, *Phénoménologie et 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 Paris 1951; Pierre Fougereyrollas, *Le Marxisme en Question*, Paris 1959; Charles Bettelheim, *La transition vers l'économie socialiste*, Paris 1968; Charles Bettelheim, *Calcul économique et formes de propriété*, Paris 1970; Daniel Chauvey, *Autogestion*, Paris 1970; Yvon Bourdet, *Pour l'autogestion*, Paris 1974; Castoriadis Cornelius, *Le société bureaucratique*, I 1974, II 1973; Castoriadis Cornelius, *L'expérience du mouvement ouvrier* I, II, Paris 1974; Fabre J., Hincker F., L. Sève, *Les communistes et l'état*, Paris 1977。在法国,相当紧张地研究马克思的观点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活动在发展着。在最著名的“马克思学学者”中除了已经提到的那些人之外还有 M. 吕贝尔(M. Rubel),出版了《社会主义伦理学问题文集》(*Pages choisies pour une éthique socialiste*, 1948),在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导论中试图在伦理学的基础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他出版了关于马克思的大部头著作,书名叫作《卡尔·马克思思想传记》(*Karl Marx, essai de 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 Paris 1957),现在又出版了马克思学的著作《马克思学概论》(*Études de marxologie*),作为《实用经济研究所学报》的专辑。他后来的各种研究成果收录在《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Marx Critique du Marxisme*, Paris 1974)中。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提到 P. 山多尔(P. Sandor)研究辩证法史的尝试《辩证法史》(*Histoire de la dialectique*, 1945)一书,但它显得太烦琐、不够完整和不够深刻。J. 伊波利特(J. Hyppolite)的《论黑格尔和马克思》(*Études sur Hegel et Marx*, 1955)一书就充实得多。有意思的是:在50年代期间某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教徒也出版了一些极为广泛和详细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后者是从托马斯主义的批判立场出发的。还应该强调指出,法国的许多脑力劳动者和有名的科学工作者捍卫马克思的观念或者或多或少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E. 博提格利(E. Botigelli)、C. 列维-施特劳斯(C. Lévy Strauss)、若·弗里德曼(G. Friedmann)、阿·库维利埃(A. Cuvillier)、H. 德斯罗切斯(H. Desroches)、J. 福拉斯梯尔(J. Fourastier)、G. 古尔维奇(G. Gurvitch)和其他许多当代进步思想的代表人物。

② K. Axelos, *Marx penseur de la technique*, Paris 1961; *Vers la pensée planétaire*, Paris 1964. 这第二本书是论述古希腊罗马哲学和现代欧洲哲学的评论和论文集。

发,人为了满足需要而劳动,同时推动技术进步。这样一来,技术的概念和问题就成为马克思的哲学和理论研究的中心思想,并且加强对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研究和加紧在实践和技术中实现哲学。因此,他认为人的解放的唯一现实的前景在于技术的发展,这就成了他的“全球论题”的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的状况、功能及其独特的运用,就是各种形式的异化的根源,它返回到技术也是基本问题。现代世界生活在空虚之中。这是因为技术不仅仅是生产;它首先是离异;它对物质、生活、思想的离异。技术是人和世界之间对话和斗争的工具和武器。消除了异化的劳动应该成为娱乐,而新的星球的思想,地球的思想,遨游者、组织者、计划者的思想,永远是开放的。它是坚决的批判之批判的,将永远是带着问题的(*questionnante*),给自己本身提出一切,而且乐于提出问题。

169

在阿克塞洛斯看来,在马克思那里特别注意的是虚无和超越。一切都是异化了的,因而就需要否定。阿克塞洛斯关于星球运动和时代的设想是一个新的人类产生的过程,人对自己的总体对话的运动,但是同时,思想 - 存在和存在 - 思想依然经常对话,从哲学的实现、异化、总体,到艺术、娱乐和那些马克思首倡的一切设想问题都是开放的。

在60年代,在法国围绕着结构主义的讨论和争论也成了标志,结构主义几乎成了时髦的东西。结构概念对于理解一个整体,社会的或者非社会的整体的意义,老早就已经被发现了,在马克思和其他许多思想家那里就可以看到用变动的因素和结构的因素的关系来解释过程的主张。结构的東西对于变动的东西的优越性,同时态的东西对历时态的东西的优越性在F. 德·索绪尔(F. de Saussur)、R. 雅各布逊(R. Jakobson)和在他们们的影响下形成的结构主义学派的现代语言学研究著作中得到特殊的意义。在法国,首先在人种学研究领域,结构主义方法复活起来,在这人种学研究领域,C. 列维 - 施特劳斯在马克思的影响下以他的非凡的著作对原始公社的关系问题做了大量的说

明。在心理学和哲学领域 J. 拉康(J. Lacan)和福柯(M. Foucault)企图采用结构主义方法,从而使马克思主义队伍中间的讨论也激化起来。^①

170 这些理论家想要用结构来说明一切,完全用特定的社会结构来解释人,这时作为社会过程的本质和能动的因素的个性被完全忽视了,他们还主张抛弃一切有关人道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现象的研究,因此他们遭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②

当马克思主义者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1918 - 1990)抱着同样的看法开始发表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著作,即在很大程度上受结构主义观念影响的研究著作以来,争论就变得更加激烈起来。^③对于法国和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来说,阿尔都塞的观念在各个方面都是令人感兴趣的现象。在这些国家,阿尔都塞的观点被某些领域的人士迅速接受。阿尔都塞仅仅表明在理论观点上关于马克思的理论和哲学观念的起源、性质和意义还是相当模糊不清的。假如不是这样,就不需要接受阿尔都塞关于认识论断裂(*coupure épistemologique*)的概念,这一断裂阿尔都塞定位于1845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中。这样一来,这以前的马克思发展的整个阶段都被宣称为意

① 除那些论人种关系结构的大部头著作外,C. 列维-施特劳斯在下列著作中表达了结构主义方法的观点和研究成果:*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 Paris 1958; *Triste tropique*, Paris 1955; *La pensée sauvage*, Paris 1962。此外,还可以参加下列著作:J. Lacan, *Écrit*, Paris 1966; M.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Paris 1966。

② 参见 J. P. Sartre, interview, in "L'Arc" br. 30/1966; H. Lefebvre, *C. Lévy Strauss et le nouvel éléatisme*, in "L'homme et la société" 1-2/1966; H. Lefebvre, *Sur une interprétation du marxisme*, "L'homme et la société" br. 4/1967; L. Goldmann, *Structuralisme, Marxisme, Existentialisme*, "L'homme et la société" br. 2/1966; L. Sebag, *Marxisme et Structuralisme*, Paris 1964; G. Schiwy, *Der französische Structuralismus*, Reinbek bei Hamburg 1969。《思想》杂志(*La Pensée*)1967年10月专号讨论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载有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文章。

③ 阿尔都塞1960—1965年的论文后来发表在《保卫马克思》(*Pour Marx*, Paris 1966)一书中,与他人合作的有《读〈资本论〉》第1卷(*Lire le Capital*, I, Paris, 收录有路·阿尔都塞、J. 兰西埃尔[J. Rancier]、P. 马舍雷[P. Macherey]的文章)和第2卷(1965年巴黎版,路·阿尔都塞、E. 巴里巴尔[E. Balibar]、R. 埃斯塔布列特[R. Establet]合著)。

意识形态的阶段,而从那以后才是科学的阶段。或者是认为马克思曾经受康德和费希特的影响,而根本不曾是黑格尔主义者,由此可以判明根本否定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辩证的和批判的性质,这是在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时期和在斯大林主义中发生过的。^①

阿尔都塞尖锐地把意识形态同科学分裂开来,并且主张科学地论证哲学思想,从这一概念中抛弃一切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的意识形态性质的概念。这恰恰表明他极其接近现代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正努力克服的那种教条主义观念。任何想把哲学思维变为“科学”的意向都只会缩小哲学思想能动性的领域,并且把两种不同的研究世界和人生问题的方式混为一谈。这是典型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

因为,否定和异化的范畴对于阿尔都塞和对于现代实证主义者来说都同样是意识形态的概念。他甚至还捍卫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在这种斯大林观念中根本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概念否定以及否定之否定不起作用,这不是由于理论上的原因而完全是由于实用主义的原因。^②

阿尔都塞抽象分析的特定的逻辑,只是非批判地对现代文明的严酷问题进行哲学探讨,而现代文明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在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中表现出它的许多坏的方面。原因是阿尔都塞在对待这些问题方面和苏联官僚制度的哲学辩护士处在认识这些问题和过程的同一水平上。因此除了别的以外很说明问题的是,斯大林也同那些著名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平起平坐,或者在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中避而不谈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

^① 参见 L. Althusser, *Pour Marx*, str. 26 - 27。关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阿尔都塞写道,除了马克思最后的意识形态时期 1844 年之外,“青年马克思任何时候也不曾是黑格尔主义者,在开始时他是康德主义者和费希特主义者,后来是费尔巴哈主义者。关于青年马克思的黑格尔主义这个广泛传开的论题,也完全是一种神话”。(*Pour Marx*, str. 27)

^② “否定和异化不过是意识形态概念,它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不可能是别的,而只是意味着它们固有的意识形态的内容。”(L. Althusser, *Pour Marx*, str. 221) 斯大林抛弃“否定之否定”,这在阿尔都塞看来,正说明作者确实在理论上高明。(*Pour Marx*, str. 205)

172 革命。^① 或者同样,他非批判地对待整个斯大林主义时期,而这是任何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行动的试金石,他也非批判地对待关于苏联共产主义阶段的最新的宣言,这我们已经有机会在苏共最新的纲领中看到。同样,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早在四十年以前在苏联就在阶级专政的概念中表现出来,而且表现为阶级的人道主义;今天它开始在超越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以个人的人道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四十多年的期间,在苏联,通过重大的斗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其说通过个性自由的术语表现出来,不如说是以阶级专政的术语表现出来……十年以前,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只是以一种独一无二的形式成为阶级的人道主义。今天它存在两种形式:在无产阶级专政还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中国,等等)是阶级的人道主义,在已经超越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苏联)则是(社会主义的)个人的人道主义。两种形式和两个必然的历史阶段相适应。在‘个人’的人道主义中‘阶级’的人道主义可以看到自己固有的前景,现实的前景。”^②

意识形态的分析对于阿尔都塞来说并不具有理论的东西的优越性,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具有意识的东西的优越性。按照苏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科学的哲学的模式,在他确定科学性的时候,意识形态被他看作是更多地具有社会实践的功能而较少具有理论功能的观念的体系。意识形态和“意识”只有极少的联系;问题在于人类的大部分所处的结构,而不是要通过他们的“意识”。^③ 在这一意义上,阿尔都塞想鲜明地区分社会主义概念和人道主义概念,同时他认为这些概念(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联系是明显的理论上的不相符合。因为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概念是科学的概念,而人道主义概念却是意识形态的概念。把它解释为意识形态概念的时候,他并不因此想否定它的历史现实性。它表示存在的现实性的总和。但是,同科学概念不

① 参见 L. Althusser, *Pour Marx*, str. 212 - 213。

② L. Althusser, *Pour Marx*, str. 227 - 228。

③ 参见 L. Althusser, *Pour Marx*, str. 238 - 240。

同,它并不提供认识它们的手段,因而也不揭示现实的本质。^①

这样区分意味着离开历史先后关系来提问题。抽象的形式主义的分析在阿尔都塞的主张中是很有特色的,它并没有给这一问题提供什么本质的东西。因为在一种历史的先后关系中,社会主义概念除了它的全部“科学性”之外,还带有辩护性的和意识形态的性质,这正如人道主义概念在一定的历史关头,例如在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中,有过和有着许多意义重大的对价值的认识和对任何“科学的”概念的历史反响,因为它有着具体的历史的哲学领域和范围。

因此,完全正确的是: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判地对待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理论的反人道主义或非人道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的理论前提,同时又认为只有在消灭关于人的哲学(理论)的神话的前提下才能达到确定的对人的认识。^②

路·阿尔都塞到那时为止的理论主张表明他想要彻底分析的是思想理论的抽象而不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这必将给马克思主义带来烦琐议论的风格。这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其同批判的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相异的注释和概念论的形式主义,极为接近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接近所有那些用真正马克思的精神来克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努力。

某些正在寻找马克思主义现代政治危机的出路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讨论和主张,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实践则要重要得多。只要仔细观察最近20年来的这一发展,我们就将发现共产主义运动在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各国极为衰弱或者在这些社会中的影响几乎微

^① 参见 L. Althusser, *Pour Marx*, str. 229。

^② 参见 L. Althusser, *Pour Marx*, str. 236; 参见 *Lire le Capital II*, str. 73。在后一书中关于结构的等级问题,个别结构的时代特性和它们的决定性问题的提法在理论上是较为有意思的,这在理论上还研究得很不够。阿尔都塞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值得注意(参见 str. 46-47, 53, 164-165)。后来,阿尔都塞以《自我批判论文集》(*Éléments d'autocritique*, Paris 1974)的题目发表了自己对某些批判的回答和较短的著作《列宁和马克思以后的哲学和列宁对于黑格尔》(*Lénine et la philosophie suivi de Marx et Lénine devant Hegel*, Paris 1972)。

174

不足道。而在那些党依然比较强大的地方,特别是在法国,官僚等级制的结构,对于苏联的政治和实践的依赖,错过对重大历史事变做出反应的时机,停留在过时的政治斗争的原则上和满足于议会主义,等等,必然要引起左派队伍和力量中间的两极分化。这些党盲目追随1948年斯大林想要降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企图,赞成对匈牙利的干涉,对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反应过迟和过少参与(我们只举一些最重大事件),这就使得许多共产党员脱离了所谓共产党,并且把许多当今重大的有关工人阶级和一般共产党人的斗争问题: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性质、现代工人阶级的性质、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运动的作用、现代条件下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等等问题,都提到议事日程上。^①

175

在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中,首先应当提到赛尔格·马勒(Serge Mallet, 1927 - 1973)和安德列·高兹(André Gorz, 1926 - 2007)的分析。马勒在其论新工人阶级的著作^②中,研究自动化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状况。马勒的意见和看法是以自动化走在最前面的三个法国工厂的调查表为根据的。马勒在说明熟练程度越来越大的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时,肯定在那种情况下等级关系没有强调那么多,并且生产组织可靠性比在机械化工厂中大得多。同样,工程师和技术员由于自己的处境意识到接近工人阶级,从而产生一种他称之为“企业工团主义”的新型的工团主义。“‘新工人阶级’确实由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联结在一起,但是它现有的生活水平有赖于这些企业的极高水平的

^① 关于这些问题,许多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杂志展开了讨论和争论,因而完全具有国际性。参见“Les Temps Modernes”,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Journal”, “Praxis”(特别是《实践》杂志上与科尔丘拉夏令学园有关的讨论), “Neue Kritik”, “Die Internationale”, “Problemi del Socialismo”, “Critica marxista”, “Sociologie du travail”, “Autogestion”, “Alternative”, “Argument”, “New Left Review”, “Black and Red”, itd.。

^② 赛尔格·马勒:《新工人阶级》(*La nouvelle classe ouvrière*, Paris 1963)。还可参见皮埃尔·别勒维尔(Pierre Belleville):《一个新工人阶级》(*Une nouvelle classe ouvrière*, Paris 1963)。这个问题吉勒斯·马丁涅特(Gilles Martinet,)在《当代马克思主义》(*Le Marxisme de notre temps*)中谈到过,并且预先提出掌握尚处在资本主义阶段的工人阶级的立场的要求,而用托洛茨基关于不断革命观点的精神探讨现代的历史进程。

生产率。不管经济制度如何,这里存在的一种情况是不会改变的,从而也就彻底推翻了那种足以把现代工业的技术人员同‘工人贵族’混为一谈的分析。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之间存在生活水平上的明显差别,这是真的。但是,我们将会看到它没有保留工人阶级残余的消极后果,相反,这种‘先锋队’的存在曾经有过积极作用。”^①工人阶级的改良既要提高生活水平,而且也在于参与企业的管理,共产党至今还没有看到这一点,也没有把它当作自己的纲领和战略的重要因素之一提出来。

马勒以及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一种趋势和由自动化引起,但将会日益得到克服的新现象,因为自动化是生产发展的总趋势和前景,从而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争取克服雇佣关系的斗争具有新的形式和规模。马勒写道:“通过它,而且只有通过它,工人的斗争在工业最发达的新条件下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争取变为‘自由的社会生产者’。但是,同样,只有通过它,这种改良才能够有史以来第一次作为在这种条件下技术经济进化的逻辑过程出现,这种条件就是它不仅会成为工人的事业,而且会成为生产机构中技术人员和干部的事业。”

在这里,‘政治斗争’和‘改良斗争’之间旧的教条式的区分丧失了全部具体意义。‘改良斗争’在实际上为较小的改良的好处而告终,以便吸引工人阶级参加由政治的常常是议会主义的原因所决定的更广泛的行动,而这些原因对于工人阶级却是异己的。

反之,通过工人工会利用它们置于管理之上的监督的某些因素和甚至利用生产本身的关系给予它们的强制的手段可以看到,一种工人斗争的新形式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它谋求日益扩大无产阶级及其组织实际参与经济机构本身的管理,深入由生产关系的实际结构和它们的社会性不断产生的矛盾内部。”^②因此,马勒认为,工人阶级不再是旧

176

① Serge Mallet, *La nouvelle classe ouvrière*, Paris 1963, str. 69.

② Serge Mallet, *La nouvelle classe ouvrière*, Paris 1963, str. 175 - 176.

形式的革命阶级,即抱着夺取政权的愿望,而是因为想改变社会关系它才是革命阶级,因而它终究还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锋队,他在其他一些篇幅较短的著作中也表现出这种见解。

安德列·高兹的两本书^①也探讨这些问题,在这里他把现代人和工人争取社会主义的动机问题作为关注的中心。正是在工人意识形成的地方,即在生产关系中,这种要求的意识,包括关于改革社会关系必要性的意识,能够得到最好的发展。高兹因而也强调了现代“企业的工团主义”的意义,并且认为工会能够成为政治的动力。^② 正如这种在意大利特别活跃的新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的许多参加者(布鲁诺·特连亭[Bruno Trentin]、列利奥·巴索[Lelio Basso]、卢西奥·马格利[Lucio Magri]、维多里奥·福阿[Bittorio Foa]和其他人)一样,高兹从新资本主义发展中现代的经验 and 情况出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革命的起义去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不存在,并且经常等待大的危机会导致工人运动衰落。工人运动唯一可行的路线是那些准备用它来管理社会的力量现在所采取的立场。^③ 争取自主治理权力,争取实现中间目标这一达到终极目的的中介的斗争,应当成为工人阶级现代斗争的指导思想,在这里,在掌握管理的立场的同时将提出资

① 安·高兹:《工人战略和新资本主义》(*Stratégie ouvrière et néocapitalisme*, Paris 1964);《艰难的社会主义》(*Le socialisme difficile*, Paris 1967)。

② 高兹写道:“同群众的意识形态和他们的虚构相反,工会作为阶级现实的堡垒,在实现自己的作用的程度上,成为政治的动力。正是通过它,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和生产关系是不可分割的——确定地表现在自己活生生的具体现实中。正是在它那里,在异化劳动的王国,在它们的真理性和它们的意义(即使不是在它们的直接内容上)包含着革命的要求:要求生产满足需要,生产方式符合给社会生产资本的人们的人的需要。迄今为止只有在它那里才能够锻造出社会主义的人:同其他工人‘联合的、管理生产和交换的工人’,支配生产而不被生产所支配的生产者,创造性实践的人。社会主义如果不是首先由这些人组成,如果它不是一种优越的新制度,新的消费、文化、社会合作的模式,社会主义就将微不足道,甚至可能没有什么意义。在任何高度工业化的社会都必须确立这种模式。它在哪儿都还没有。迄今为止各个社会主义社会也都是使生产消费、需要、创造的努力、文化、教育服从积累过程的需要。这种搞法在某种意义上说比在资本主义的发达阶段还要系统化和还要不可调和。”(A. Gorz, *Stratégie ouvrière et néocapitalisme*, str. 22)

③ 参见 A. Gorz, *Stratégie ouvrière et néocapitalisme*, str. 14。

本主义的结构问题。这就意味着不是抽象地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而是意味着现在作为已经开始的现实,作为正在发展创造力和从内部挖资本主义墙脚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已经来临。

高兹在对具有当今消费社会的一切消极方面的现代新资本主义,对它的根本上是由利润来调节的生产进行令人信服的批判的同时,强调指出,对这种制度中工人阶级的状况的批判的出发点应当是全面观察人即生产者的状况,就是说应当首先全面观察和工人阶级所处的异化相联系的制度。高兹指出,在这种制度中生产者,即工人的地位的消极后果,指出资本主义利润政策时至今日也把他的生活大部分和劳动地点联结在一起,不容许他参与其他许多社会 and 文化的价值和创造劳动。晚近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依然是具有其个人消费的文明和造出大批个体的文明的野蛮社会。^①

高兹认为,工人阶级,特别是通过他们的工会,争取结构改革的斗争应该日益国际主义化,同时特别强调争取上述“革命的改革”的斗争并不意味着统治制度合理化,它的整体化,而是意味着“决定权的非集中化,限制国家或资本的权力,民主对于专制的胜利,而这也意味着使生产服从消费,使经济服从需要和生产者的监督,在所有显现出这些需要和这种监督的地方(企业、公社、城市、地区、部门、民族、学校),具有反垄断计划的最一般的目的,但是,如果不通过在所有这些层次上改变权力的关系的办法来中止实际的资本专政就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②。

在这种对于各个新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极为

^① 参见 A. Gorz, *Stratégie ouvrière et néo-capitalisme*, str. 65 - 66。

^② A. Gorz, *Stratégie ouvrière et néo-capitalisme*, str. 165. 高兹还在其《艰难的社会主义》一书中探讨了类似的问题,重新论证了争取工人监督企业,争取实现自治和创造一种现代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斗争,因为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极力为着更大的积累和投资而斗争,这只是对集权主义的国家主义化起作用。并且,高兹注意到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在争取自治和克服国家主义的斗争中的正面经验。高兹前不久又发表了新的著作《一种道德的基础》(*Fondaments pour une morale*, Paris 1977)。

重要的讨论和理论研究中,比利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23 - 1995)占据特别突出的地位。他在其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大部头著作^①中,依据有关现代经济思想的丰富资料,不仅从马克思的立场出发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现阶段,而且在广泛的哲学和社会学领域内,在马克思探讨这些问题的传统中把握政治经济学研究。曼德尔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而且分析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本身的基本问题。通过对苏联官僚主义化的原因,对满足它们的需要和可能的分析,曼德尔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立场出发解决工人阶级解放问题,并且探讨了国家消亡问题,最后还有劳动、社会主义发展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历史参与本身的意义问题。^② 这样一来,他就同时给社会主义各国的大多数经济专家树立了榜样,说明一种全球性的经济研究不能够仅仅归结为纯粹经济的范畴。因为,即使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意愿,也不可能是创立一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从根本上批判和超越它。

179 正如现代“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其他批判者一样,曼德尔在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所在时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增强剩余的能力和经常使货币贬值才能够减轻和避免危机的压力,军事工业和服务行业的发展就是试图制止这一点。而军火工业的不断发展,在军事技术和科学的现阶段几乎是全人类的直接危险。

另一种矛盾在于日益发展的自动化引起固定资本的不断增长,同时又引起剩余价值不断低落,这在大量财富存在的同时提出了商品生产的不可超越的界限问题。“只有在生产者自治的条件下生产资料社会化和它们的计划组织离开个人获取最大利润的目的而谋求合理地满足需要,才能够利用现有的生产力来生产越来越多的全面发展的个

^① 恩·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著》(*Traité de l'économie marxiste* I, II, Paris 1962)。

^② 参见 E. Mandel, *Traité de l'économie marxiste* II, str. 208 - 434。

性,而不是生产越来越多的不适用的或坏的商品。那时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就意味着大大缩短劳动时间——半天工作,半天工余时间——;普遍的高等教育;飞跃式地提高社会消费,即飞跃式地扩大在教育、保健、科学和艺术部门的就业;商品和货币经济和它们内在的使人的活动物化和使空闲时间的事务商品化的趋势这些新的异化的根源消亡。”^①

曼德尔考虑到现代工人阶级的斗争道路,特别是在1968年法国五月事件之后重新主张:资本主义不可能解决危机不可避免地重新回来这一问题,而且几乎不能满足今天的青年人。同时他主张对制度的全面危机这一革命变革的推动因素不能袖手旁观。曼德尔反复谈到资本主义本身中的结构改革,认为它们可能而且甚至应该以总罢工告终,总罢工或者将会摧毁现存的制度,或者将会建立两重政权。

180

曼德尔接受了列宁关于工人苏维埃形式的直接民主和国家消亡的观念,甚至还有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国家主义官僚制的政权形式的批判,同时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斗争的基本措施不是“参与共决”(Mitbestimmung——这被看作是公开的阶级合作),也不是“自治”(在资本主义社会这将意味着间接参与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工人监督。它将使工人能够依靠对企业的管理自由地安排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它意味着工人通过选举出来的可以随时撤换的代表有决定干活和休假、生产过程的进度、引进新的生产等等的权利。争取与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战略和一种过渡的纲领相适应的工人监督的斗争,必然要从实际和群众的利益以及工人、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的经验,日常积累的经验中产生出来。^②

从整个这种情况来看,考虑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不同模式,强大

^① E. Mandel, *Kritik des Wachstumstheorie im Geiste des "Kapitals"*, in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heute*. 100 Jahre "Kapital", Frankfurt a. M. 1968, str. 256. 曼德尔最新的经济著作是《后资本主义》(*Spätkapitalismus*, Frankfurt a. M. 1972)。

^② 参见 E. Mandel, *Leçons de Mai 1968*, "Les Temps Modernes", august-septembar 1968, str. 319 - 325。

的知识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对非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表达思想的自由和广泛的信息交流,很明显,法国现在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变动方面是令人最感兴趣的国家和地区之一。除了在哲学和社会学思想领域的重大成果之外,对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具体的历史的斗争来说特别重要的是上面提到过的要突破旧的政治实践的框框的尝试。把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整个政策纳入议会政治的框框的做法。那种认为一切工人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都要在日益成为改良主义的官方政策范围内来解决的看法,在1968年五月事件中受到法国工人阶级的有重大意义的造反行动的最大打击。

181 引起大学生不满和造反的是有关大学的情况,这仅仅是青年一代反对现存的生活方式的条件和无意义的造反的一种表现;法国工人阶级以其总罢工和在罢工过程中的许多社会改良,清楚地表明它忘记了社会主义力量革命斗争的手段。(这里要补充一句:当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得比较强大的时候,这种经验同样在社会主义各国,对于工人阶级反对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官僚制度的斗争具有特别重大的历史意义和重要性。)

法国的事件几乎所有的基本力量都通过了。但是只是赞成在现代历史事件、变化和要求的水平上没有成为改良主义或没有为斯大林主义观念俘虏的东西。法国共产党在这一事件中的抉择只是一种理论和实践上软弱的抉择。在那种历史情况下,总体的革命变革问题肯定不是决定性的日程问题。那种深刻的历史变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但是,这一历史事件和革命热情能够用来把握工人阶级对整个社会的新立场,而不只是在政治领域提到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结构改革——我想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所有这些事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前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列宁时代有价值的并且直接由他提出的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观念是否已为今天的历史所证实: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由反封建的结构改革和旧的封建关系内部的过程准备好了的

(工业、商业、银行资本等等的发展,一句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因而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终结;反之,按照这种观念,社会主义只有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之后才能开始,就是说只有在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机构和政治权力之后才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的结构改革和进程。俄国的、中国的和南斯拉夫的革命迄今为止证实了这一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资本主义的变化,许多国家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一场大战在掌握核武器时代之没有意义,等等,以及迄今为止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全部经验,恰恰在加强关于上述观念过时的观点。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在某些国家,很不发达的国家和发达的国家,在某些严重的历史变乱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通过政治上掌握国家政权登上历史舞台。但是,越来越明显的是工人阶级革命斗争应改变方针,就是说应掌握确定的立场,举行反资本主义性质的结构改革,在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就教育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管理社会,以便在将来同时成为最好的反对官僚政权的集体,这在今天是现实的历史可能性和甚至是历史的绝对命令。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上台粗暴地中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意大利的发展,同时也揭开了欧洲法西斯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只是在被开除出公开的文化生活二十多年之后才得到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在意大利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是强大的,因而在从法西斯主义解放出来和建立了一种相当广泛的资产阶级民主之后,围绕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极为活跃。经常参加讨论的是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参加过抵抗运动或者起码是在历史实践中支持意大利社会主义力量的斗争的哲学教授们,他们拥护一种本质上是历史的思想,其意向是超越资产阶级世界的界限。^①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意大利情况的特殊性也就造成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存在,它们都在意大利外面和在意

^① 安东尼奥·班菲(Antonio Banfi),一位最著名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后来写道:“党的斗争,接受工人阶级政党的工作,对于我正如对于其他的人一样,是一个具体的和生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校……”(*Prospettiva filosofica*, 1950, in *La ricerca della realtà II*, Firenze 1959, str. 728)班菲同时补充说,对此他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在对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围绕“新秩序”集团的运动、第三国际目标的实际同情中,和在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发展的热忱中,也受过长期的训练。在《马克思主义论文集》(*Saggi sul marxismo*, Roma 1960, str. 117, 118)一书中可以看到类似的论题。

大利地下参加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此外,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有一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意大利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葛兰西(A. Gramsci)的本质反教条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的著作。如果说法国人曾经有过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运动在战前几乎能够不受阻碍地发展的优越性,那么意大利人具有的优越性在于他们的最重要的政治人物,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后来的共产党的奠基人和书记——安·葛兰西,他知识渊博,鲜明彻底地坚持了欧洲最良好的文化思想传统。战后,他的《狱中札记》发表,这对于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特别重大的事件。意大利共产党人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不依赖于苏联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们极为容易地接受了葛兰西的观念;共产党人都反对接受葛兰西的原理,导致同他们本应遵循的意识形态相矛盾。这不仅发生在哲学理论方面,同样也发生在具体政治方面。葛兰西观念无论如何也不能与没有意义的哲学、辩证法、认识论的解释等等混为一谈,也不能与斯大林主义关于铁板一块的党、民主主义完全消失了的民主集中制的观念混为一谈,不能与认为苏联的革命和社会主义模式是唯一可能的因而是必须的等等主张混为一谈。因此,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实践在这一时期不仅是矛盾的而且是完全不彻底的。要把对葛兰西的号召,他的自由的和有弹性的精神、他的反官僚主义、他的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苏维埃”的观念,同另一方面参加情报局反对真正开始实现葛兰西预见到将成为新的历史关系的实质的东西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讨伐统一起来是很困难的。

说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发展中这种矛盾情况的性质的是他们当时最大的哲学界人士安·班菲(Antonio Banfi)和加·德拉·沃尔佩(G. della Volpe)的活动,他们经过长期大量的哲学理论活动之后走向马克思主义,作为全面的文化思想家,并不那么容易能够躺到斯大林

范畴体系的官方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上。^①

185 特别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安东尼奥·班菲(1886—1957),他在经历了战前批判的理性主义的富有成果的时期之后,通过丰富的文化和本质上人道主义的想法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正如大多数坚强的知识分子一样,班菲强调马克思主义不仅是资产阶级意识的而且也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危机的理论和实践的答案。因此,对于他来说,马克思主义不能够只是成为某种狭义的方法,某些特征而且是人的解放的普遍适用的思想。因此,班菲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的、历史的、伦理学的、理论的和人道主义的普遍适用性,这对于他来说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具体的历史性,而且意味着人的解放的理论和对人争取人性的实现的斗争的说明。^②

班菲特别明显地坚持意大利拉布里奥拉(A. Labriola)和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它同某种本体论主义、机械性、范畴体系等等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格格不入的,而是从根本上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和解放的性质。这样,班菲就在革命的历史的辩证法中来寻找和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本质,从而使历史实践,实践范畴重新被置于注意的中心。^③ 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简单的口头上的历史的理

① 普罗克拉斯提斯是希腊传说中的一个强盗,常强迫过路人躺在他的一张用来杀人的铁床上,矮小者被拉长,高大者被锯短。——译者注

② 参见 A. Banfi, *Saggi sul marxismo*, Roma 1960 (*Sull' universalità del marxismo*, 1957), str. 45 - 61。班菲在归纳这些原理时写道:“马克思主义本身原则上能够解决我们在意识形态和哲学之间、实践和理论之间、具体参与和精神之间进行的争论。它的历史渊源和有关它的意识是同一种潜在的历史的、伦理的、理论的和人道的普遍适用性相符合的。但是,正因为这样,这普遍适用性并不是以抽象真理的直接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斗争、要求、任务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终究要在历史中并通过历史才能知道。”(*Saggi sul marxismo*, str. 61)

③ 班菲在其最近的著作中写道:“历史不是像形而上学思维想象的那样是天命或抽象合理的大纲,亦非如抽象历史主义想象的那样是一系列冷漠的事件,历史主义同形而上学思维的对立纯粹是消极的。它是情况、结构、价值的创造和发展。如果想把它的含义规定为在文化意识中接受的各种不同的对立方面之间共同的东西,那么,它就是人的普遍适应性和自律形成的辩证过程,理想的普遍适应性和精神自律存在的基础。”(*La mia esperienza filosofica*, *La ricerca della realtà I*, str. 11 - 12)

论,而是作为人的事业,作为自我创造的历史理论,而伴随着它的文化意识乃是对这种有机的发展的赞美”^①。

这样,马克思主义对于班菲来说是有关人和他的历史的见解和理论大纲的根本主张,摆脱了任何教条主义和抽象性的自由的哲学的、历史的和社会学的研究,从而作为“历史本身实行的激进行动的指南,以便通过人的中介来建立人的世界和生活”^②。

因此,对于班菲来说,本体论作为论述现实的东西的根本原则的存在及其形式的理论,终究是某种“实用主义的神话学”^③,它注定要把现实简单化,而不是说明和解释现实。因此,我在后边还要谈到,他任何时候也没有涉及“为什么”和最根本原因的问题,而是谈到现实的具体结构“怎样”的问题。同样,他认为思辨概念只能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用作理性研究的手段,而不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用非理性的东西本身的客观形式。^④

班菲通过他的所有这些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历史实践的最好理论的主张,继承了欧洲最好的和最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和科学的传统,这些传统使人摆脱形而上学、反自然主义和教条主义,并且为新的科学的和历史的意识而斗争。班菲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进行公开的和全面的对话,这不仅是一种伟大文化和博学的榜样,而且也是唯一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和理论的对话对于人的问题的解决的必要性的原理的范例。因此,对于班菲来说,新的“社会化的人”

^① *La mia esperienza filosofica, La ricerca della realtà I*, Firenze 1959, str. 14. 他还继续写到某一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某种哲学、科学或历史;它是哲学,精神自由的活动的历史的人道性。”(*La mia esperienza filosofica, La ricerca della realtà I*, Firenze 1959, str. 15)

^② *La mia esperienza filosofica, La ricerca della realtà II*, str. 696, 759-761. 除别的外,他在这里写道,马克思主义不是历史以外的某种形而上学思想,而是历史本身对其辩证过程和具体历史行动的意识,“按其伦理学意义也是潜在的行动目的,而按文明和文化则是唯一组织和发展的原则”(*La mia esperienza filosofica, La ricerca della realtà II*, str. 760)。有关这种问题还见于上述论文集中《哲学的远景》一文。

^③ A. Banfi, *Prospettiva filosofica, La ricerca della realtà II*, str. 719.

^④ 参见 A. Banfi, *Prospettiva filosofica, La ricerca della realtà II*, str. 719-720。同样参见 *L'uomo copernicano*, Milano 1950, str. 381。

是那种不存在形而上学的妄想的人,并且他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在自然中活动并且创造自己特有的历史事业的同时求得意识的普遍适用性和知识的合理性,它们使人能够从事他的实践的的历史活动。因此,班菲认为,从哲学理论上钻研一种文明和文化的理论应该是注意的中心,马克思主义作为伴随着工人阶级为确认它的万能的的人的职能的斗争的意识,给这种理论提供了最多的前提。^①

第二个推动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意大利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人是加尔万诺·德拉·沃尔佩(1895—1968),他也是在作为哲学教授长期从事理论活动之后经过独特的经验主义和后来的存在主义,在战后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关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的激烈争论^②同他的战后的著作和与他思想相同的人有联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意大利的哲学中,金蒂雷(G. Gentile)和克罗齐(B. Croce)的独特的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占统治地位,从而马克思主义对这种哲学的过时性的批判也容易超越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德拉·沃尔佩和与他思想相同的人就有过那种情况。在他的关于逻辑学这门实证科学的著作中,对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的解释是关注的中心。^③ 德拉·沃尔佩在谈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思辨的批判的时候,认为马克思的方法同黑格尔的方法根本不同,并且这两位思想家在起源学上也是无法联结在一起的。如果说黑格尔的方法是神秘

^① 参见 *L' uomo copernicano*, Milano 1950。同时可参见 *Prospettiva filosofica* (1950); *L'unità dialettica della civiltà moderna* (1951)。另一方面,就是在班菲关于苏联社会和人的非批判的和几乎是浪漫主义的描写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共产主义者)的意识,在意识形态上也是有沉重负担的,同时不知道他的观念是同斯大林主义的狭隘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主义及机械论完全对立的。例如,上面引用过的《现代文明的辩证统一》(*L'unità dialettica della civiltà moderna*)一书中的有关的段落。福尔维奥·帕皮(Fulvio Papi)发表了大部头的关于班菲的专著《安东尼奥·班菲的思想》(*Il pensiero di Antonio Banfi*, Firenze 1961)。

^② 关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和有关黑格尔在马克思问题上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参见 Vjekoslav Mikecin, *Suvremena talijanska filozofija*, Zagreb 1966; *Marksisti i Marx*, Zagreb 1968(它附有大量书目文献)。

^③ Galvano della Volpe, *Logica come scienza positiva*, Messina-Firenze 1950。

主义的、抽象的总体的辩证法,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那么,马克思的方法是具体—抽象—具体的途径。^①

在德拉·沃尔佩的影响下,一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主要是L.科莱蒂(L. Colletti)、马里奥·罗西(Mario Rossi)和尼古拉奥·梅尔克耳(Nicola Merker)也维护这种观点。在50年代末(1958年),在《当代》杂志上科莱蒂和V.杰拉丹(V. Gerratani)展开了尖锐的争论。科莱蒂竭力指出恩格斯在晚期论述黑格尔哲学的性质、辩证法和体系的关系等等的著作中的观点,同样还有列宁在晚期论述黑格尔哲学的意义的著作中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几年以后,切·卢波里尼(C. Luporini)也卷进争论中去,他认为德拉·沃尔佩和他的学生们忘记了马克思范畴的历史性,并且指出把马克思和黑格尔完全割裂开来是错误的,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方法论主义是错误的,他提出认为自己的马克思的模式是抽象—抽象的模式观点,同德拉·沃尔佩关于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具体—抽象—具体的解释相对立。^②

德拉·沃尔佩还企图提出自己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为的是首先同占统治地位的克罗齐的和科学的理性美学观相反的直觉美学观相对立。艺术的东西和科学的东西在德拉·沃尔佩看来,按其认

189

^① 德拉·沃尔佩在其论逻辑学这一实证科学的主要著作中写道:“具体的方法表示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循环的运动……”(*Logica come scienza positiva*, Messina-Firenze 1950, str. 189) 他在此书的末尾还说:“逻辑符号依然是事先确定的,具体—抽象—具体的循环是标志任何科学的知识——因此不再是纯粹的知识或思考——的统一的三个逻辑认识论方面的循环:1)问题的给定性或历史唯物主义的情况;2)假说或历史—理性的组织(确定前后项的假定的中介);3)实验或结束给定的东西和假设或者物质和精神相互作用的循环(把假设变为规律)。”(*Logica come scienza positiva*, Messina-Firenze 1950, str. 211) 此外,德拉·沃尔佩还指出马克思早期著作的重要性,从而已在1950年翻译和出版了它们。

^② 在这次讨论中最重要的文章有:M. Rossi, “*Rovesciamento*” e “*nucleo razionale*” della dialettica hegeliana secondo Marx (“*Opinione*”, br. 4-6, 1957-58); L. Colletti, *Il marxismo e Hegel* (1958); L. Colletti, *Dialettica scientifica e teoria del valore* (predgovor knjizi E. V. Iljenkova, 1961); C. Luporini, *Appunti per una discussione tra i filosofi marxisti in Italia* (“*Rinascita*” 1962); C. Luporini, “*Rovesciamento*” e il metodo nella dialettica marxista (“*Critica marxista*”, br. 3, 1963); Mario Rossi, *Marx e la dialettica hegeliana* I, Roma 1960, II, Roma 1963; Nicolao Merker, *Le origini della logica hegeliana*, Milano 1961。

识因素是根本无法区分的,因为如果不是那样,艺术作品的相关性就将是不可理解的。^① 所以,他认为论述这些问题的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卢卡奇)并没有完全丢掉浪漫主义的美学的前提。

在德拉·沃尔佩看来,为了认识艺术著作,除了艺术著作的结构和产生它的社会结构的关系问题之外,除了要证实一般认识论方面之外,还需要确定认识论方面的特殊性,这构成要求说明那种理性-直觉的具体性,有别于任何其他科学的或哲学的著作的艺术作品的语义学分析。而这种分析指出语义学-技术中介的特殊性,语言-表现的特殊性。德拉·沃尔佩在分析了各种不同的艺术作品之后得出结论:“前面做过的对诗作的实际的分析就使得我们完全能够得出结论如下:1)真理或作为语言的诗的认识价值(正如其他任何语言一样)是建立在形象-概念之上或者是在逻辑-直觉结构之上,在给我们证实任何诗的或‘幻想的’作品的某种(理性的)结构或某种意义的必要的优越性的东西的基础上的;2)每一种意义都直接或间接地给我们表示着经验或联系,因而表示着一种社会学的怎么样,因而这样一来,而且

190 只有这样,才能给诗奠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由于它的科学的、反教条主义的、反形而上学的性质只能批判地理解;3)终究只有分析诗的语义学的(语词的)构成(这是迄今被回避了的)才能够做到也表明它的独特性和特殊性,指明在何种意义上诗的语言有别于科学的语

^① “因此,我们应该得出结论:正如存在历史的或科学的语言等等一样也存在‘诗的语言’(discorso),应该在严格的字面意义上来理解‘语言’这一术语——作为理性-直觉的行为——,在诗的情况下,在一切情况下去理解它。在其他精确的术语中我们应该理解诗和艺术完全是(具体的)精神,这正如历史或科学一样,没有理由把历史和一般科学区分开来:就是说在认识的、认识论的一般因素中感觉(幻想或类似的东西)和精神是统一的、不能区分的。”(G. della Volpe, *Critica del gusto*, Milano 1966, str. 6)

言,从而确定以前使用过的关于客观的和历史的激情的公式等等。”^①而那种语义学—技术领域的特殊性首先在于它的“多义性、‘多种含义性’(多种语义性),这是和科学性,单义的那种语言有区别的”^②。

这种多义性表现在比喻、符号以及各种表现方式上,它们作为技术因素不仅是为艺术作品构成的,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区别艺术作品的标准,换言之,艺术作品按其技术因素的那种差别实际上是无法互译的。^③

德拉·沃尔佩的这些努力是一种超越克罗奇把直觉和推理领域鲜明地分割开来的直觉美学的片面性的尝试。但是,同样,马克思主义中的那些仅仅满足于艺术认识论方面的观念在许多艺术现象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虽然德拉·沃尔佩没有最终从自己的原理引出结论,但是,我们可以说他的分析和观点已使他形成一种本体论的艺术观,这种艺术观在马克思主义中也有其代理人。

191

我们已经提到德拉·沃尔佩的观念,特别是考虑到对马克思和他同黑格尔的关系的解释,在意大利哲学界和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引起了许多争论。在这些论战中最积极的是一位意大利最著名的马克思主

^① G. della Volpe, *Critica del gusto*, Milano 1966, str. 46-47. 稍晚些时候,德拉·沃尔佩以下述方式概括了自己的看法:“美学——真正文学的诗学或严格意义的诗学——的必然后果在问题范围上是从关于上述语言学符号的理论产生出来的,可以暂时表述如下:1) 诗或文学的特殊性、独特性就是语义学的特殊性,即特殊的技术的性质;2) 从而同样是一般科学的语义学的特殊性,因而是它的技术的独特性;自然,同时注意到迄今提出问题和经过检验的认识论前提被压缩为抛弃已成为习惯的回避精神(理想性)或幻想(特殊性)具有的这种或那种共同的或一般的认识论性质,以便对诗或文学艺术同哲学和科学做出区分。”(*Critica del gusto*, Milano 1966, str. 69)

^② G. della Volpe, *Critica del gusto*, Milano 1966, str. 77.

^③ “为了彻底确定诗的符号,最后需要提出:1) 如果说比喻(连同它的极端性、比较和夸张)是那种活生生的或僵死的一般认识的价值(是诗的或者庸俗的),如果说那种诗的符号或者有典型特征的多义的概念同样可以是转义和字面意义的,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诗的符号或概念是为它的语义学的多义性或多种语义性的方面或性质所规定或确定的,因而也是为它的语义学的自律所确定的;2) 因此,诗的符号在典型意义上是这样一些意义或者绘画的表现或者语词的表现,它们从其语义学的自律中吸取足够的组织和构成的力量——或者它们本身直接地或者和其他交织而成——全部表现的领域(文学作品)……”(*Critica del gusto*, Milano 1966, str. 119)

义哲学家切扎雷·卢波里尼(Cesare Luporini, 1909 - 1993)^①,他通过存在主义和政治上参加抵抗运动而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现代历史性论争的理论和实践的答案。

在有关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讨论中,卢波里尼反对德拉·沃尔佩和他的追随者的观点,认为他们忘记了马克思的范畴的基本特性——它们的历史性。他责备他们把马克思和黑格尔完全分割开来,从而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宗派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解释。同样,同他们把辩证方法看作是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观点相反,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那样,卢波里尼认为这种方法在马克思那里叫作抽象—抽象的方法。^②

卢波里尼的研究活动的一部分是批判地回顾哲学传统,并且发表了论列奥纳多·达·芬奇、伏尔泰和康德的著作。^③他研究的问题中,研究得最多的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哲学和科学的关系问题,辩证法和历史的东西的问题以及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问题。站在最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路线上,卢波里尼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基础,而且也是人的历史存在的基础,并且认为最根本的东西是社会实践。^④所以,批判地对待非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以及列宁同经验批判主义论战时的片面观点是可以理解的。特别在学术著作《真理和自由》一书中,卢波里尼强调,抽象的或孤立的意见任何时候也不能看作是现实的直接反映。这种关于意见以及主客观关系的抽象观点在列宁时代是普遍流行的。但是,“如果这说明列宁的历史情况,那么这并不能证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维护这一个站不住脚的、在现代马克思主义完全

① 卢波里尼生于1909年,弗兰尼茨基在本书中误写为“生于1908年”,特此更正。——译者注

② 参见C. Luporini, *Il circolo concreto-astratto-concreto*, “Rinascita”, 1962, br. 24。

③ 主要著作有: *Filosofi vecchi e nuovi*, Firenze 1947; *La mente di Leonardo*, Firenze 1953; *Voltaire e le “Lettres philosophiques”*, Firenze 1955。

④ 参见C. Luporini, *La consapevolezza storica del marxismo*, “Società” 1955, br. 3。

多余的概念上的经常巧妙的努力是有道理的”^①。

卢波里尼在他的最新的著作,即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译本的很长的序言中,重新回到争论很多的关于马克思思想的起源和发展阶段的问题上来。特别说明这一著作的特点的是:特别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中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和大多数对这一发展的解释者不同,他认为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还“不是马克思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这一过渡的直接先导”^②。和阿尔都塞不同,卢波里尼特别坚持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哲学根据,也就是它的人道主义。^③ 同样,卢波里尼强调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经同“人本主义的哲学立场”,也就是费尔巴哈的立场决裂,并且正确地解释道,在下述意义上可以谈到马克思的科学性:“就是结构的观点,个人的功能(反过来也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人的个体的问题。丧失或以某种方式消灭了那种个人本身或个体本身在其中成为结构本身的前提的结构主义是一种真正的意识形态,虽然它表面上看来是科学的。”^④卢波里尼确实强调政治领域在他们的发展中的决定意义,同时又正确地强调在他们的发展中并不存在纯粹黑格尔的阶段,费尔

193

① C. Luporini, *Verità e libertà*, “Società” 1960, br. 2, str. 212. 后来在研究与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后的原著有关的现实性和历史性的著作中卢波里尼又谈到这点:“在这里我们注意到马克思把它看作是从人的方面去‘占有’(Aneignung)的能动的过程,而不是机械的反映(Widerspiegelung)就够了。关于‘反映’(或‘抽象’)的比喻只适用于表示同一过程的(局部的或全部的)结果而不是它的运动方式。分析到底,它只能实际应用于描述一个理想的过程的地方而不把它同唯心主义混为一谈。”(*Realtà e storicità*, “Critica marxista” 1966, jan. - febr., str. 100)

② C. Luporini, *Introduzione a “L’ideologia tedesca” di K. Marx - F. Engels*, Roma 1968, str. 64.

③ 切·卢波里尼在这一著作中写道:“但是,必须强调指出,在这里‘基础’一词是什么意思。1844年手稿显然提供了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一种人的哲学)。因此,在今天对于许多人来说也将是当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Introduzione a “L’ideologia tedesca” di K. Marx - F. Engels*, Roma 1968, str. 81)

④ C. Luporini, *Introduzione a “L’ideologia tedesca” di K. Marx - F. Engels*, Roma 1968, str. 85.

巴哈的阶段,或者康德的阶段,费希特的阶段,等等。^①

当时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情况以及已经提到过的传统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能够比较全面、比较自由和比较富有弹性地对待今天重大的政治和社会的问题,这就预先决定了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得以避免在政治上孤立。对此做出最大努力的是他们最著名的人物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 1893—1964),一位几乎经历过近几十年来欧洲共产主义的全部盛衰的人。

虽然以前他在自己的某些看法上与第三国际的领导集团不一致(例如,法西斯主义问题)或者起码有过不同的意见;虽然在战后他基本上维护斯大林政策的主要特点,但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事件使得陶里亚蒂有可能以一种独立政策的精神极为迅速地表述自己的怀疑、不一致和分歧。

194 陶里亚蒂在他答《新论据》杂志记者问时(1956年5—6月)已经表示赞成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并且提出鲜明的意见,对那种批判的水平表示不能满意。^② 虽然他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者首要的任务是对本身的历史的各个时期做出有根据的分析,同时提出对斯大林主义的解释,陶里亚蒂终究还是毫不含糊地认为造成斯大林错误的原因是:

^① 参见 C. Luporini, *Introduzione a "L'ideologia tedesca" di K. Marx - F. Engels*, Roma 1968, str. 87。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多次讨论中无论如何有必要提到阿尔多·扎纳尔多(Aldo Zanardo)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叶·P. 康捷尔(E. P. Kandelj)和 V. A. 卡尔普申(V. A. Karpušin)的论战。扎纳尔多在其著作《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和问题》(《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反响》[*Forme i problemi suvremenog marksizma (O odjeku misli mladoga Marxa)*], "Studi storici" 1962, br. 4)中批判了苏联的理论和实践的某些重要因素(实证主义、教条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行为等等),苏联作者以《再论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命运》(*Još jednom o historijskoj sudbini misli mladog Marxa*, "Voprosy filosofii", 1964, br. 1)一文作答,它只是表明哪些被人们看作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完全不能进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对话。

^② 在这次答记者问中,陶里亚蒂强调,如果要追究这种制度是怎样造成的,就恰恰说明斯大林时代以后这一切做法“只有说明这些错误不仅是某种个别的东西,而是深深地贯穿苏联生活的现实的,这样才是能够理解的”。(P. Togliatti, *L'intervista a "Nuovi argomenti"*, 1956, br. 20, in P. Togliatti, *Problemi del movimento operaio internazionale* [1956 - 1961], Roma 1962, str. 101)

“官僚机构在苏联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而且可能首先是在党的生活中起着过大的作用。但是,在这里要说明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是相当困难的。是一种东西渐渐地变成另一种东西的表现。”^①

陶里亚蒂看到现代世界的全部总体性,发展的各种不同形式,历史和文化的传统,等等。据此得出结论:再也不能说只有一种苏联的模式适用于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运动了。“制度就整个来说成为多中心的,因而在共产主义运动本身中再也不能说一个领导中心,而只能说经常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达到进步。”^②

陶里亚蒂从这一切中郑重提出下列主张:在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情况下展开强大的和群众性的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摆脱传统的教条主义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的领导公式,这些公式曾经使得任何共产主义运动注定要孤立和无所作为。人们早已清楚,把一个运动的经验机械地搬到另一个运动中,就会导致注定的错误和失败。在这种意义上,陶里亚蒂认为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在其争取社会改革的斗争中,还可以极多地利用民主的宪法。“我们是民主主义者,因为我们将要在宪法、它所规定的民主的法规和法律的范围内行事,并且我们要求一切人尊重这种法律和循守一切法律规范,首先要求统治者这样做。我们把握住民主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将能够朝着社会主义前进。”^③

据此陶里亚蒂认为采取多党制建设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和实际必要的。这种想法不仅仅是从意大利情况的特殊性或者从对“斯大林统

195

^① P. Togliatti, *Problemi del movimento operaio internazionale*[1956 - 1961], Roma 1962, str. 103. 后来,陶里亚蒂断定,苏联从斯大林时代起就开始有害地限制党内的民主制度,并且开始建立官僚机构。(参见 *Problemi del movimento operaio internazionale*[1956 - 1961], Roma 1962, str. 104)

^② P. Togliatti, *Problemi del movimento operaio internazionale*[1956 - 1961], Roma 1962, str. 116.

^③ P. Togliatti, *Rapporto all' VIII Congresso del 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 (dicembre 1956), *Nella democrazia e nella pace verso il socialismo*, Roma 1966, str. 51.

治下造成的错误以致恶行”的批判中引申出来的。^①在他看来,他提问题和分析问题的基本主题是从关于说明具有民主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的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的分析的意识以及从关于社会主义的样板不断发展的意识引申出来的。“在以前只能从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才确定社会主义的方针这一点出发,在今天这一过程正在工人群众以及中等阶层和知识分子的广大阶层中实现着。因而存在着扩大那些即使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承认社会主义前景的政治力量的阵营,当然,他们不可能全都属于一个唯一的政党的。”^②

196 陶里亚蒂在其著名的所谓《雅尔塔备忘录》中提出他关于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见解和批判的看法,由于它是在他临终之前写成的,因而意大利共产党人也就把它看成是某种政治遗嘱。在这里,陶里亚蒂首先反对苏联党的领导想要在那个时候召开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来正式谴责中国的观点和政策的意图,并且认为这种现代的革出教门的做法只会损害西方的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它们终究还不能够适应它们面临着的任务”^③。

考虑到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深刻的危机,正在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集中经济管理、进行计划和国家干预中寻求出路,革命的工人运动和工会的任务必然要获得新内容。资本主义的计划化是伴随着反民主的和专制的趋势发展的,必须用民主的方法来反对这些趋势。在陶里亚蒂看来,由于资本主义计划化的发展,工会碰到特别明显的困难处境。因为计划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所谓收入政策,它包括整

^① P. Togliatti, *Die marxistische Konzeption der politischen Partei der Arbeiterklasse, Ausgewählte Schriften*, Frankfurt a. M. 1967, str. 201.

^② P. Togliatti, *Die marxistische Konzeption der politischen Partei der Arbeiterklasse, Ausgewählte Schriften*, Frankfurt a. M. 1967, str. 201. 关于这一问题参见 Ivo Petrinović, *Koncepcija Komunističke partije Italije o talijanskom putu u socijalizam* (1969)。关于陶里亚蒂的研究参见:Giorgio Bocca, *P. Togliatti*, Roma - Bari 1973; E. Ragionieri, *Palmiro Togliatti*, Roma 1973; L. Gruppi, *Togliatti e la via italiana al socialismo*, Roma 1974。

^③ P. Togliatti, *Promemoria sulle questioni del movimento operaio internazionale e della sua unità* (Yalta, agosto 1964), “Rinascita” 5. settembre 1964, str. 3.

整一系列为此推行的限制提高日工资的措施。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工会的斗争不能依然孤立在各个国家的领域内。而实际缺少那种国际的计划和共同的斗争,正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缺陷之一。

陶里亚蒂毋庸置疑地和坚决地主张在寻求和选择自己的历史道路上每个党的自主和每个民族的主权,这对于意大利共产党的自由的胜利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陶里亚蒂写道:“我想,在今天的历史发展和它的总的前景(进步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的路线上,争取进步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形式和具体条件在现在和最近的将来都将是同过去极不相同的。同时,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因此,每一个党都必须懂得独立地行事。我们坚决拥护的党的自主不仅是我们党内必要的,而且也是在当代条件下我们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前提。因此,我们将是任何关于重新建立一个集中的国际组织的建议的反对者。”^①

197

由这些要求可以看出,陶里亚蒂的丰富的革命经验以及对那些集中主义的组织的许多失败和有时是悲剧性的看法、要求和行动的批判,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情报局第二次会议的评价,对把斯大林主义的模式加给中欧各国的做法的批判,是站得住脚的,因为这种做法引起工人阶级本身的一系列公开造反行动,它们只是靠暴力才被镇压下去。陶里亚蒂没有抛弃关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统一的思想,然而他所理解的统一,是在每个国家实现这些任务的有差别的多样性的统一。为了解决个别党之间可能的隔绝和紧张关系,陶里亚蒂提出最好的手段是:各个党经常接触和交流经验;召开集体的会议研究各个党共同的问题;召开关于经济、哲学、历史等一般问题的国际讨论会。^②

^① P. Togliatti, *Promemoria sulle questioni del movimento operaio internazionale e della sua unità* (Yalta, agosto 1964), “Rinascita” 5. settembre 1964, str. 4.

^② 参见 P. Togliatti, *Promemoria sulle questioni del movimento operaio internazionale e della sua unità* (Yalta, agosto 1964), “Rinascita” 5. settembre 1964, str. 4.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整个备忘录中确实对终究依然存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结构提出了本质上尖锐的批判——这就不必多说了。在这里,明显地表现出关于在各个国家和在国际方面社会主义发展的两种观念的尖锐冲突:老的、终究还是斯大林主义的、不民主的、官僚主义的和不明智的实践,建立在欧洲政治和文化的最优良传统和许多成就的基础之上的开放的、富有弹性的观念。因此,陶里亚蒂“无法理解的”是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各国,劳动的人或者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具有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领域比在发达资本主义各国存在的还要狭小。^①陶里亚蒂感到奇怪的是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各个领导集团之间存在着分歧;但是完全不知道这是一些什么分歧。因此他主张在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下公开讨论迫切的问题,在他看来这将会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权威和影响。^②

但是陶里亚蒂认为,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各国最重要的是“超越斯大林造成的限制以及取消民主和个人自由的制度的问题。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提供统一的图景。普遍的印象是返回到列宁主义的保障党内外广泛的发表意见和在文化、艺术及政治方面进行讨论的自由的努力受到阻碍和反对。这种阻碍和反对在我们看来是难以理解的,首先是因为今天的情况再也不存在资本主义的包围,而经济建设已取得很大的成就。我们永远赖以出发的思想是: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它对工人存在着最广泛的自由,他们以有组织的

^① 陶里亚蒂自然很好地懂得(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应该思考什么和怎样思考),在斯大林时代不仅有许多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有着不同于官方的思想而丧失了生命,而且在斯大林以后许多人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丧失了自己的地位。所以,在陶里亚蒂那一时代的意大利,意大利共产党中的一些中央委员是大学教授或者著名的社会和文化工作者。(在其他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完全可以理解:从这种情况考察政治文化问题的视野和坐标与斯大林主义的根本不同,后者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在上述场合是粗俗的和独断专行的。

^② 参见 P. Togliatti, *Promemoria sulle questioni del movimento operaio internazionale e della sua unità*, str. 4。

方式参与对整个社会生活的管理。因此,我们欢迎一切合乎原则的说法和一切事实证明,这种现实不仅存在于苏联而且存在于其他社会主义各国。但是相反,有时呈现给我们的事实给整个运动带来损害”^①。

陶里亚蒂去世后不久,意大利共产党人就全部发表了他的“遗嘱”^②,还有 L. 隆哥(L. Long)写的前言,从前言可以看出党的领导把陶里亚蒂的观点完全接受下来而作为自己正式的观点,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意大利共产党人迄今为止,证实了他们对所采取的立场始终如一的决心。无论在党内民主的发展方面,还是在有关决定性地把运动的界限加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头上的做法上,我们都将能够成为它的见证人。

199

即使考虑到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内部有很多流派,从迄今为止的描述中可以看出,理论讨论已具可观的规模,正在进行许多从理论上解决现代历史的重大问题的努力。在对法国马克思主义和法国新左派的评述中我们已经谈到,许多在为资本主义范围内结构改革而斗争的新观念的拥护者,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也不乏其人(列·巴索、布·特连亭、维·福阿等等)。

同样,本来意义的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某些意大利哲学流派中,特别是在所谓新启蒙运动中有着肯定的反响,各种不同起

^① P. Togliatti, *Promemoria sulle questioni del movimento operaio internazionale e della sua unità*, str. 4.

^② *Testament*, “Rinascita”, 5. sept. 1964.

源的思想家拥护新启蒙运动。^①以恩兹·帕奇(Enz Paci)为首要人物的《或此或彼》杂志(*Atu-Atu*)周围的集团特别想把胡塞尔的某些观念同马克思的观念联结起来。由于坚持可能性范畴、消除任何末世论的骗局、批判的人道主义,意大利新启蒙运动极其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的理论立场。

因此,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因其有重大意义的理论传统和在意识形态上独立自主,将能够写成现代史上有意义的一页。在对一种将是最接近马克思的观念的欧洲社会主义观念的探讨研究中,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具有把许多成分编织成那样一种新观念的前提条件。

^① 就意大利本身的来源来说,意大利新启蒙运动可能包括:尼·阿巴尼亚诺(N. Abbagnano)的实证主义的存在主义,G. 普雷蒂(G. Preti)的实用主义的新实证主义,R. 康托尼(R. Cantoni)的历史主义的人道主义,N. 博比(N. Bobbi)和L. 杰伊蒙纳特(L. Geymonat)的方法论的唯理论及恩·帕齐和《或此或彼》杂志周围的集团坚持的现象学。此外,意大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包括:P. 南尼(P. Neni)、列·巴索(L. Basso)、E. 阿加齐(E. Agazzi)、U. 切罗尼(U. Ceroni)、G. 彼特拉涅拉(G. Pietranera)、拉·洛姆巴尔多·拉狄塞(L. Lombardo Radice)、C. 萨里纳里(C. Salinari)、N. 巴达洛尼(N. Badaloni)、R. B. 班狄涅里(R. B. Bandinelli)、C. 卡塞斯(C. Cases)、E. 拉卓涅里(E. Ragioneri)、G. 康德洛罗(G. Candeloro)、P. 阿拉特里(P. Alatri)、G. 马纳科尔达(G. Manacorda)、G. 阿尔菲(G. Arfè)、P. 斯普里阿诺(P. Spriano)、G. 普罗卡齐(G. Procacci)、A. 卡腊齐奥洛(A. Caracciolo)、A. 佩森蒂(A. Pesenti)、V. 维特洛(V. Vitello)、E. 塞雷尼(E. Sereni)、罗·罗桑达(Rossana Rossanda)、G. 普雷斯蒂皮诺(G. Prestipino)、阿·扎纳尔多(A. Zanardo)、L. 格鲁皮(L. Gruppi)等等。杂志除提到的外还有,《工人世界》(*Mondo operaio*)、《社会主义史杂志》(*Rivista storica del socialismo*)、《当代人》(*Il Contemporaneo*)、《马克思主义批判》(*Kritica marxista*)、罗马安东尼奥·葛兰西学院出版的《葛兰西研究》(*Studi Gramsciani*)和米兰的贾恩贾科莫·费尔特里涅利学院出版的《年鉴》(*Annali*)。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 在英国、美国和古巴

一、英国

从上面的叙述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多数欧洲国家的命运的特殊原因。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中,法西斯主义在一个历史时期使工人运动,从而使作为一种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可能比较自由地得到发展,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斯大林主义时期的特点是自由的和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几乎完全消失。非斯大林化开始后,马克思主义才在这些国家里得到了新的推动,而在这方面,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的抵制以及赫鲁晓夫提出新的政治方针曾具有头等的意义。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进程也有其特有的盛衰,一直到用一句话可称之为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切最终占了上风为止。

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中,首先是在英国和美国,革命的工人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发展得弱得多,有其别的原因。19 世纪末以及 20 世纪 30 年代前,英国资本主义的垄断地位还反映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中。英国工人阶级较好的社会政治地位——20 世纪美

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有利于改良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和争取不断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而他们的生活条件本来就比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要好得多。由于走工联主义和工团主义斗争的道路(这种斗争由于民主传统而具有广阔的发展可能),这些运动的理论家们丧失了广泛考察历史动向的可能,而局限于提出经济主义的和实际政治的主张。他们这样做是不需要马克思的艰深的辩证法的,而且,我们还要提到,英美的哲学和科学思想的经验主义传统又与这一辩证法风马牛不相及。

由此还产生一些理论上的幻觉,认为在这种西方社会主义的发展中会有完全不同的运动,马克思的革命的辩证的思想只适用于一定的形势,但一般不适用于这些运动。这当然也就促成了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者理论上的弱点,他们不懂得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用到英国和美国工人阶级斗争的特殊条件中去,以便成为本来可望把工人阶级大多数团结在自己周围的运动的领导者。这个问题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中还没有得到解决,虽然很明显,由于基本上按照俄国的样板和经验办事,这两国共产党孤立于本国工人运动的主流之外,脱离了这个主流。

英国马克思主义最著名的人物是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 1900-1976),他早年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参加过许多马克思主义杂志(《当代季刊》、《过去和现在》)的工作,是剑桥大学的一名教员。多布首先是由于写了有关资本主义发展以及苏联的经济发展的历史研

究文章而在国际舆论界出名的。^①

多布在各种文章以及在关于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著作中,也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② 这一著作的大部分跟多布关于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问题的看法一样,是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批判。多布赞成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解释危机时首先依靠马克思的这样的看法:由于资本主义竞争和资本结构变化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润率趋于下降。^③ 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消费很难能同生产率按比例地增长,这两者的冲突是表现在制度的周期性破产上的矛盾的一个因素。“同时,由于它只是一个方面,马克思认为,生产领域内的矛盾——作为积累结果的日益增长的生产力和日益下降的资本赢利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构成问题的实质。”^④

203

多布研究社会主义问题,参加了两次大战之间自由派社会主义学派就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展开的广泛讨论。在多布身上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这场讨论的影响,这场讨论基本上具有理论的和抽象的性质,

① Maurice Dobb,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London 1964);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917* (London 1948). 关于多布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解,保·斯韦齐(P. Sweezy)50年代初在《科学和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上揭开了一场讨论,参加讨论的有许多经济学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的解释,在这一发展中外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意义和作用问题,以及把从14至16世纪这个时期定为封建主义时期还是定为过渡时期。多布那本关于苏联经济的著作是对苏联经济发展的最完整的研究著作之一,包含对苏联20年代和30年代的经济学家和理论家的许多看法,他们中的许多人(布哈林、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奥辛斯基等)后来都被斯大林主义作为敌人而加以迫害。

② M. Dobb, *Politička ekonomija i kapitalizam* (1937, 1945); *On Economic Theory and Socialism* (1955).

③ 多布在这本著作中写道:“资本在正常情况下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增加而积累;这一变化如果不被‘剩余价值年率’的增长消除的话,就会加速利润率的下降。马克思显然把利润率下降这一趋势看成是发生周期性危机的重要原因,同时又把它看成是一个决定长期趋势的因素:这是积累和扩张的过程由于自身的后果遭到削弱并由此不可避免地重新下降的一个基本原因。”(M. Dobb, *Politička ekonomija i kapitalizam*, Beograd 1959, str. 109)

④ M. Dobb, *Politička ekonomija i kapitalizam*, Beograd 1959, str. 119.

204

他们能够用来充当自己的某些假设的依据的经验,又只是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发展的有限的经验。因此,在多布身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某些批评家们相反,他竭力想证明,计划经济可能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合理。多布在分析中,主要是把计划管理同市场机制对立起来,因此,他的这些分析基本上是抽象的。具体的历史发展表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同样也并不完全排除计划,在现在的历史环境下,社会主义经济同样也不排除市场。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下面这样的结论也是抽象的:“指导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规律有重大区别,原因是,假设说,那些仍然不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制定统治决定的人所了解、所认识的要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附属的变数,从而也作为受制于一定条件的行动和事态出现的一部分要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受到控制和受制于自觉的决定的,从而也是属于问题的一定条件之列的。”^①

关于社会主义的这些十分重要的问题,应当指出的是,多布跟高度发达国家的其他许多理论家一样,当然也考虑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赖以提出自己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差别的一般观点的那些理论假设以及本国的实际可能。然而,社会主义在不够发达的国家里的具体发展,在面临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国际市场上的强大竞争的时候,必然会采取破坏生产和社会发展完全按计划调节这样一幅抽象图像的某些措施。

除多布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者科学工作者中,我们还可以提到赫·勒维(H. Levy)、J. 刘易斯(J. Lewis)、莫·康福斯(Maurice Cornforth)、R. 梅克(R. Meek)、T. B. 博托莫雷(T. B. Bottomore)、E.

^① M. Dobb, *Politička ekonomija i kapitalizam*, Beograd 1959, str. 271. 跟多数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多布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差别是:“在前者,财产的利益占主导地位,而人的利益意义不大或者甚至毫无意义;在后者,人的生活的利益是最高主宰,而保持财产的价值毫不重要。”(*Politička ekonomija i kapitalizam*, Beograd 1959, str. 119)

J. 霍布斯鲍姆(E. J. Hobsbawm)以及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两位著名学者:J. B. 哈耳达奈(J. B. Haldane)和 J. D. 贝尔纳(J. D. Bernal)。《新左翼评论》(*The New Left Review*)今天在英国肯定属于最活跃和最令人感兴趣的马克思主义杂志之列。^①

二、美国

205

在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状况和发展与此相类似。在英国,资本主义是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具有这个时期自己的经济和文化遗产,而北美的资本主义则是在缺乏许多这种传统,特别是文化传统的情况下蓬勃发展起来的。虽然这种发展的个别时期也有过尖锐的阶级冲突,特别是在19世纪末,当时在欧洲侨民中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运动也得到发展;虽然在这些阶级尖锐冲突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通过丹尼尔·德·莱昂(Daniel de Leon)、L. 萨尼亚尔(L. Sanial)、L. 布丁(L. Boudin)等人推动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但是美国经济在国际上的有利地位和急剧发展,促使政治斗争首先导向经济的目的。从此,美国的工团主义也大大发展起来,这种工团主义如同在英国一样,一直在相当程度上对革命的和更广泛的理论,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漠不关心。不存在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相应的理论,并不是说美国的资本主义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和内部的矛盾。恰恰相反,在整个蓬勃发展和居民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的情况下仍然出现的30年代初震撼美国的危机以及朝着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生的内部变化,最明显不过地证明了,旧的资本主义关系对于大大

^① 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翼理论家的著作主要有:H. Levy, *Social Thinking* (1945); M. Cornforth, *Science versus Idealism* (1946); M. Cornfort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J. Haldane, *The Marxist Philosophy and the Science* (1938); T. B. Bottomore, *Classes in Modern Society* (1955); E. J. Hobsbawm, *Primitive Rebels* (1959); E. J. Hobsbawm, *The Age of Revolution* (1962); John Strachey,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1956); G. D. H. Cole,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1-5 (1953-1960)。

206 发展了的生产力来说,是太狭窄了。^①但是,北美资本主义的这些矛盾目前主要不是在基本阶级力量的政治冲突中来解决,也不是通过强化美国工人阶级的社会要求来解决。北美资本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优惠地位,几十年来没有发生战争冲突和破坏,并恰恰由于这样的局面而在世界其他地区中获利,为维持现在的生产和阶级关系制度而建立各种“排气口”(制订耗费十分巨大的征服宇宙的计划,或者反动地干预一些国家人民的求解放的愿望和斗争,如刚果、越南等等),这一切产生了一种制度是合理的这样一种幻觉,并且始终使工人阶级对自己的历史利益感觉迟钝。工人阶级在这一时期对于本国的这种历史幻觉,对于其他种族的艰难的和非人的处境以及他们的正当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漠不关心。然而,对如此强大的一个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对美国人民在自己的历史上进行过的最不体面的一场战争采取调和态度,同样只会对他们的内部矛盾的结局产生致命的影响。

这种形势无论如何都无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虽然马克思主义思想经常影响着美国的思想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早在20世纪初,L.布丁(L. Boudin)出版了一本谈卡·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书,连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也认为有必要将这部书翻译出版。在这同一时期,丹尼尔·德·莱昂(1852—1914)展开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活动,他在根据马克思的原理写的一些文章中奠定了所谓的“工业工联主义”的基础,而这种“工业工联主义”成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基本主张。20世纪初,德·莱昂的某些基本主张同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主张以及列宁时期为具体实现这些主张而做的尝

^① 众所周知,资产阶级最著名的一位政治经济学家曾企图以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的必要性的看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在美国,凯恩斯(J. M. Keynes)学派也有许多追随者,其中最出名的是:A. H. 汉森(A. H. Hansen)、S. E. 哈里斯(S. E. Harris)、A. P. 勒纳(A. P. Lerner)等人。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斯韦齐(P. M. Sweezy)在自己的一本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的书中曾俏皮地嘲笑凯恩斯学派,说他们“抽掉经济制度的社会内容,把经济制度看成是一台需要送到修理车间整修的机床,在那里,国家这位工程师将对它加以整修”。(*Teorija kapitalističkog razvitka*, Zagreb 1959, str. 365)

试十分接近。德·莱昂明确地强调,推翻阶级统治意味着“推翻政治国家并用工业社会制度来替代这一个国家,在这种制度下,全体人民共同占有并支配生产资料”^①。德·莱昂竭力把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组织与斗争统一起来,他认为,他的“工业工联主义”可以战胜无政府主义的废除一切行政管理的主张,也可以战胜“政客的议会痴呆症”,并开创一种建立在“民主的地方自治”基础上的民主地组织起来的管理部门。^②

207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内,保罗·A. 巴兰(Paul A. Baran, 1910 - 1964)和保罗·M. 斯韦齐(Paul M. Sweezy, 1910 - 2004)取得的成就最为重大。保·巴兰生于乌克兰,在父母家里他就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因为他的父亲在大学生时代就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派。他曾在德国和苏联学习,1939年起到美国,1949年获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教授职位。除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许多文章外,巴兰发表了一部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著名大部头著作。^③在这部著作中,他研究两个关键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剩余产品以及不合理的生产和消费问题、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在巴兰看来,经济剩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四种形式出现:“第一是社会的过度消费(首先是在高收入者中,但也在诸如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所谓的中产阶级中);第二,社会由于存在非生产性工人而有生产性亏损;第三,由于现有生产机构组织不合理和浪费而造成生产性亏损;第四,由于存在失业而造成可以理解的亏损,而造成失业的原因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缺少有效的需求。”^④

巴兰接着研究垄断资本的发展和政策(关于这一点,在他与保·斯韦齐共同发表的书中谈得更多),他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私有制不能

① Danial de Leon, *Industrijalni Junionizam*, Cleveland, O. 1934, str. 70.

② 参见 D. de Leon, *Industrijalni Junionizam*, Cleveland, O. 1934, str. 71.

③ P. A. Bar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1957, str. 24.

④ 参见 P. A. Bar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1957, str. 24.

208 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合理基础,也不能成为不发达国家人的发展和解放的合理基础。特别重要的是他关于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关于资本主义向这些国家的渗透,关于殖民主义及其后果,关于每个国家的这种发展的特殊环境,以及关于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前景的研究。

保罗·斯韦齐生于美国,他因发表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著作闻名于世,在这部著作中,他不仅论述了马克思的基本经济观念,而且探讨了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出现的许多经济观念。^①此外,斯韦齐非常注意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他和巴兰合写了一部专门的著作来谈这些问题,这部著作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

斯韦齐同自己的同事巴兰在这部著作中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现阶段,在他们看来,这一阶段与以往的竞争阶段在许多方面有区别。现阶段的基础不是私人企业主和竞争,而是大公司和垄断。这种公司的特点首先在于它们是由经理管理的,经理们组成执行机构,他们同时又是董事会成员。主要的决定和权力掌握在经理们手中,他们自己维持自己,靠自己的资金实现再生产,几乎不必对其他股东负什么责任。每一个这样的公司都企求在财务上完全独立。^②

209 这两位作者接着认为,就其管理方式及其对企业界的关系而言,以及就企业的合理化而言,这些公司同旧的企业有质的不同。首先是

① 这部著作于1942年问世,题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只需要强调指出,跟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斯韦齐不认为要到利润率趋势性下降的规律中去寻找原因,而应到消费不足的趋势中去寻找原因。然而,他并不像凯恩斯及其信徒们那样认为,这些困难只有通过国家干预才能得到解决。

② 参见 P. A. Baran, P. M.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and London 1966, str. 15-16。关于经理人员问题,巴兰和斯韦齐认为,他们是产业主阶级最活跃和最有影响的一部分。调查表明,他们是从这个阶级的中层和上层吸收人员的。因此,经理人员也位居最大的业主之列。此外,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没有作为经理人员的特殊利益了,阶级的每一个特殊的部分都会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参见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and London 1966, str. 34)

这些公司有计划地逃避风险,又允许企业界的其他成员生存。^①然而,在他们看来,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以及使它区别于旧企业的是,“创造剩余”的规律以及根据整个制度的发展使这一剩余绝对和相对地增长的趋势。“这一规律立即要求与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势性下降规律做对比,而这是必要的。我们不去分析这一规律的各种变种,我们可以说,所有那些变种都是一种竞争制度的前提。当我们用关于不断增加的剩余的规律来替代关于日益下降的利润率的规律时,我们并不抛弃,也不修正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神圣的立场,因为我们只不过考虑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那就是自从提出这一立场以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竞争和垄断的资本主义的结构变化的重要内容在这一替代中也有其理论表现。”^②

这两位作者在序言中就强调指出,他们的这一著作主要探讨一个基本问题: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的生产和吸收。而这种吸收通常是通过消费,或者通过投资或浪费进行的。^③作者在对这些进程进行分析时,得出结论认为,在生产、消费和投资的关系中,存在着使垄断资本主义停滞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管怎么说,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结论:垄断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内部矛盾的制度。这一制度追求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剩余,而又不能创造为吸收增长的剩余和使制度不受阻碍地运转所必要的消费和投资可能性。由于不能自行吸收的剩余不能自行生产,因此,停滞是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状态。”^④

由于这些原因,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在吸收在科学和工艺规程迅猛发展基础上创造的剩余方面出现的困

210

① 参见 P. A. Baran, P. M.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and London 1966, str. 48。

② P. A. Baran, P. M.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and London 1966, str. 72。

③ 参见 P. A. Baran, P. M.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and London 1966, str. 79。

④ P. A. Baran, P. M.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and London 1966, str. 108。

难。他们专门用了好几章来探讨公司以及国家为实现这种吸收而奉行的各种政策。作者特别强调指出不合理和昂贵的市场宣传、政府的民用开支,为了保持世界的现状和遏制当代人类的解放愿望而拨出的巨额军费。^①

制度的这些矛盾性和不合理性必然反映在今天成了国际性的阶级矛盾中。作者得出了与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得出的相似的结论:美国的工业无产阶级(他们构成美国工人阶级的少数)基本上已同现有制度融为一体,并享受着这一制度的优越性,因此,在国际范围内,革命的主动性转移到正在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不发达国家中贫困化的群众身上。^② 至于美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回答——工业无产阶级最终必然会举行革命来反对自己的资本主义压迫者——听起来不再是可信的。产业工人是美国工人阶级中微不足道的少数,而他们在基础材料工业中的有组织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已作为消费者和意识形态已得到校正的社会一员而与制度一体化了。他们已经不像马克思时代的产业工人那样,是制度的特殊的牺牲品了,尽管他们跟制度的其他各个阶级和阶层一起受制度的自发性和不合理性之害,其受害程度比一些阶级和阶层重些,比另一些阶级和阶

① 作者在谈到国家和吸收剩余时,由于下面的理由不使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术语。他们写道:“我们决定,不遵照前面引过的例子[指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提法。——普·弗兰尼茨基],而是出于两个理由宁愿使用不加引号的‘垄断资本’和‘垄断资本主义’这两个词。第一,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始终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这一作用在数量上肯定增强的话,我们并不认为,关于最近几十年来发生质的变化的证据是可信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特别强调国家在垄断资本主义现阶段的作用只会使人以为,这一作用在资本主义早先的历史上是毫不重要的。更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像‘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样的术语,几乎势必使人以为,国家是站在私人经济一边的某种独立的社会势力,制度的运转不仅取决于这两个势力的合作,而且取决于它们的对抗和冲突。我们认为,这是十分错误的意见。那些看来是经济界和政府之间的冲突,事实上却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的反映。因此我们认为,避免使用导致这种看法的术语是可取的。”(P. A. Baran, P. M.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and London 1966, str. 66-67)

② 参见 P. A. Baran, P. M.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and London 1966, str. 9。

层又轻些。

当然,制度有其专门的牺牲品。他们是失业者和无法就业者,到处流浪的农业工人,大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居民,流浪儿童,靠微薄的退休金生活的老人,一句话,是那些‘局外人’,他们由于自己的购买力有限,不可能去求得消费的满足”^①。

但是,作者认为,这些集团过于不纯,不可能作为一支统一的和团结的力量出现。由此得出结论:在当前时期不存在一支能够从内部使这个不合理的制度发生严重问题的唯一力量。然而,垄断资本主义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对它的未来只做内部的界限、规律和趋势的探讨是不够的。美利坚合众国统治着和剥削着几乎所有所谓的自由世界国家,因而遇到强大的抵抗。抵抗的最高形式是进行旨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革命战争。巴兰和斯韦齐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有过多次的革命战争:越南、中国、朝鲜、古巴和阿尔及利亚。这些战争和胜利,同不发达国家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解决自己问题的切身体验一起,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播下了种子。正因为如此,“世界革命不只是一种动听的空谈:这一措辞反映了现实,肯定将越来越成为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占主导地位的特点”^②。

巴兰和斯韦齐的著作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及其规律性、矛盾和趋势进行探索的一个独创性的尝试。他们的分析不是无所不包的,这是作者自己也强调的,而某些最重要的结果和观点起码会引起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和对提出的问题做出富有论据的解决的努力。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如莫·多布或者 J. M. 基尔曼(J. M. Gillman),对于作者所提出的观念表示激烈的反对,他们不得不对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运转以及这种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的地位提出似乎更有利的解释,来与这

^① P. A. Baran, P. M.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and London 1966, str. 363 - 364.

^② P. A. Baran, P. M.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and London 1966, str. 365.

种观念相抗衡。^①

然而,有一点必定是毫无争议的。具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和社会主义传统的欧洲发达的工人阶级,对自己的垄断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的反应要猛烈得多,其觉悟和行动绝不至于走到这种地步:把这一制度经济上的福利看成是解决自己的生存的历史性办法。

在30年代比较出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中,还有悉尼·胡克(Sidney Hook),他的论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书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然而,他后来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他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方法的一部篇幅较小而又不充分的著作证明了这一点。^② 在战后时期,除了已经提到的人以外,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已经提到过的赫·马尔库塞和埃·弗洛姆。在美国作者中应当提到霍·塞尔森(H. Selsam)、
213 约·桑默维勒(J. Somerville)、J. M. 基尔曼、D. 斯特鲁尼克(D. Strunik)、H. 威尔斯(H. Wells)、巴·丹汉姆(B. Dunham)、K. 沃尔弗(K. Wolff)、M. 比恩鲍姆(M. Birnbaum)以及“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The American Institute for Marxist Studies)的活动,该所在H. 阿普特克尔(H. Aptheker)、F. 斯·科恩(R. S. Cohen)的领导下,展开了

^①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杂志《马克思主义评论》(*Critica Marxista*, 1967年11—12月号)组织了一次广泛的讨论,参加的有莫·多布、J. 基尔曼、泰·普拉格尔(Th. Prager)等人。这里我们还能指出的是,巴兰和斯韦齐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要比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逊色得多。他们认识不清楚社会主义国家中当前进程的种种复杂性,怎么也不能接受我们在这一部分已经有机会了解到的先锋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的观念中的某些过渡性措施,不能接受放弃了关于计划的主导地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和市场不起作用等等教条主义观点的南斯拉夫的实践。在这些问题上,他们两位站在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

^② Sidney Hook, *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 (1933); *From Hegel to Marx* (1936);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Scientific Method* (1955).

广泛的出版和理论活动。^①

然而,马克思的思想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此。尽管美国公众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多数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中的许多人过去和现在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从著名的社会学家T. 维布伦(T. Veblen),到社会科学领域内当代的一些研究家,诸如 W. 米尔斯(W. Mills)、D. 里斯曼(D. Riesman),或者奥地利出生的经济学家约·熊彼特(J. Schumpeter)。^②

三、古巴

214

如果我们不能说两个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实现马克思的思想和梦想,但是我们却可以说古巴在这么做,不过,古巴是开始以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这么做的。总的来说,在谈到拉丁美洲的时候,欧洲的准绳,像不适用于亚洲的现实一样,也不适用于拉丁

① 霍·塞尔森试图研究社会主义和伦理学问题(*Sozialismus und Ethik*, 1943, 1955; *Philosophy in Revolution*, 1957)。约·桑默维勒发表了一本关于苏联的哲学的书(*Soviet Philosophy, A Stud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1946),还出版了一部关于和平的哲学的引人注目的书,他在这本书中令人信服地告诉美国公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其实质来说是要求消除各国人民间的战争冲突的民主运动(*Philosophy of Peace*, 1949)。H. 威尔斯发表了批判实用主义哲学的著作(*Pragmatism — Philosophy of Imperialism*, 1954),而巴罗·丹汉姆著有《人与神话的对立》(*Man against Myth*, 1947)和《锁住的巨人》(*Giant in Chains*, 1953)。在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范围内出版了探讨马克思主义和民主以及马克思主义和异化的两本书(*Marx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1965; *Marxism and Alienation*, New York 1965),参加写作的有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年,埃·弗洛姆发表了一本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引人注目的文集,参加撰写的也有许多特别是来自欧洲和美洲的马克思主义者(*Socialist Humanism: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New York 1965)。1969年,德国裔的“委员会社会主义”最老的代表之一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发表了自己的主要著作《马克思和凯恩斯。混合经济的限度》(*The Limits of the Mixed Economy*, Cambridge, Mass. 1969)。

② 在上述理论家和当代文明的研究家的最出名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指出下列:J.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1942); C. W. Mills,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1951); C. W. Mills, *The power elite* (1956); C. W.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1959); D. Riesman, *The Lonely Crowd* (1960); D. Bell, *Marxian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2); G. Lichtheim, *Marxism. 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 (1961)。

美洲。拉丁美洲各国以及古巴的特点首先是若干世纪以来的殖民地附属地位,同西班牙殖民者的斗争,民族解放战争的经验以及与一个日益强大的、最终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相邻,这个国家在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越来越多地使自己的资本渗透进拉丁美洲这些国家,从而使这些国家的大地主、资本家和军阀依附于自己。因此,我们在20世纪就看到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局面: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强有力,但同时又存在大庄园主,存在大批贫困的无地农民。尽管拉丁美洲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土地问题以及摆脱对北美的经济依附和摆脱北美的剥削,仍然是两项首要任务。^①

从19世纪末,我们就可以注意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从而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当时,阿根廷的许多社会主义联盟结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组织,从中产生了阿根廷社会党。该党有自己的理论家J. B. 胡斯托(Juán B. Justo),他把自己的观点建立在达尔文、斯宾塞和马克思的主张的基础上。在智利,在L. E. 雷卡瓦伦(L. E. Recabarren)的领导下,社会党加入了第三国际,而秘鲁产生了两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雷(Victor Raul Haya de la Torre)和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 1895 - 1930)。维·劳·阿亚是人民党的奠基人,最终采取了改良主义和因循守旧的态度,而何·卡·马利亚特吉却成了拉丁美洲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1928年成了秘鲁社会党(两年以后,改名为共产党)的创始人。他不仅接受了马克思的革命思想,而且把它运用于秘鲁的特殊情况,他得出结论认为,考虑到个体农民在封

^① 参见秘鲁马克思主义者何·卡·马利亚特吉(J. C. Mariátegui)写的一部关于这些问题的优秀著作《论秘鲁现实的七篇文章》(*Sedam eseja tumačenja peruanske stvarnosti*, 1928)。在当代出版物中,请参见《游击队员》(*Partisans*, 巴黎)杂志1967年第37期(4—6月)上登载的一篇文章《古巴和拉丁美洲的卡斯特罗主义》(*Cuba et le Castrisme en Amerique Latine*),伊格纳西奥·索特洛(Ignacio Sotelo)的《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Der historische Ort des Marxismus in Lateinamerika, Marxismusstudien, Sechste Folge, Tübingen 1969*)以及工人运动研究所百科手册《工人和民族解放运动》(*Radnički i nacionalnooslobodilački pokreti I, Beograd 1968*)。

建大庄园的落后反动的结构中的地位,这一农民阶层是有可能进行反帝革命,因而也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

由于上面谈到的拉丁美洲特殊和复杂的历史和社会情况,出现了关于拉丁美洲各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各种看法。有人认为,主要的矛盾是工业的发展和落后的农业结构之间的矛盾。有人又认为,主要矛盾表现在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资本的关系上。而今天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主要矛盾是外国(首先是北美的)垄断资本、地主和与他们勾结在一起的本国资本家同其他各个社会阶层的矛盾。

如果我们除此之外还考虑到古巴的事件——那里占主导地位的革命力量是游击运动,那么,应当着重指出,拉丁美洲在这方面也具有杰出的传统和重要的经验。只消指出 20 世纪初的革命中的墨西哥游击战或者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直到 30 年代初,尼加拉瓜在传奇般的奥古斯托·桑迪诺(Augusto Sandino)领导下,依靠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援助,同美国军队进行的成功的游击战,就够了。同样,古巴也具有进行地下的、游击式的和公开的斗争的杰出传统:先是反对西班牙当局,特别是 19 世纪末在何塞·马蒂(José Martí)领导下进行的斗争,后来是反对美国的渗透和对美国垄断资本的依附的斗争(40 年代的 E. 切瓦斯[E. Chibús]运动)。所有这一切向我们指明,卡斯特罗(F. Castro)考虑到了一种革命的可能性,这种革命的可能性在此以前在拉丁美洲的某些地区是成功地经受了考验的。

古巴的不同寻常的革命现象,像 20 世纪其他许多革命现象——俄国、中国、南斯拉夫、阿尔及利亚等等的革命现象一样,再一次表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和对历史的解释必须有两个因素作为自己的基础:第一,对于采取历史性行动来说,最具决定性的,但也是最困难的,是对采取这一革命的历史性行动的现实的和最佳的可能性做出估计;第二,人在不断选择他认为最能解决一定的历史问题和矛盾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在创造历史的规律性。

216

在这种情况下,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工人阶级发起的,也不是

共产党发起的。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及其战友受到何·马蒂和 E. 切瓦斯这两位古巴进步思想家以及一些革命进程——我们提到过其中的一些——的鼓舞。但是,古巴的革命也表明,当代解放运动,由于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在与自己迄今的殖民者或剥削者的冲突中开展的,它们如果想实现鼓舞着它们的主要的人道目标,就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

卡斯特罗要把古巴从富·巴蒂斯塔(F. Batista)这个独裁者和美国资本的傀儡手中解放出来,这在开始时似乎是不现实的和不可能的。^①卡斯特罗早在1953年就首次尝试强行推翻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但是没有成功。自那时起,他的革命运动就以1953年7月26日作为开创日。第二次尝试是在1956年,他带领80名追随者在古巴岛登陆,在最初的日子里就只余下12人仍是自由和在进行斗争的。1959年1月1日,古巴全境终于解放。这12位革命者所开始的游击战,他们从事游击战的策略、决心和坚定的态度以及在同大垄断资本,首先是北美的垄断资本的利益发生冲突后又进一步把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起没有先例的历史性事件。

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其他革命者解救古巴人民,特别是古巴农民的苦难的革命坚定态度,立即遭到国内外资本的猛烈反抗。对于土地改革和建立合作社,美国垄断资本的回答是抵制,最后是封锁。如果想拯救革命和巩固已经争取到的成果,就不能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美国帝国主义决意维护自己的阵地,这使革命要么投降,要么发展到进一步、更加彻底的阶段。而这是需要有异常的勇气、自信心、人民的信任、革命的想象力,需要摆脱公式主义和教条的。而这些正是菲·卡斯特罗及其战友在很大程度上所具备的特点。因此,60年代古巴的发展的特点是做了特殊的努力,根据古巴以及整个拉丁美洲的特殊情况来克服古巴旧的剥削者结构。从60年代初起,古巴的革

^① 参见 L. Huberman and P. Sweezy, *Cuba, Anatomy of a Revolution*, New York 1961; Th. Draper, *Castro's Revolution, Myths and Realities*, New York 1962。

命者公开宣布自己的目标是社会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是自己的理论基础。这样,古巴革命就提出了,特别是给拉丁美洲提出了几个供讨论的主要问题,这同时又导致了与一些共产主义的运动和政党发生尖锐的争论。

尽管古巴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国内方面并不坚持一些固定的看法,因为他们在革命开始时还没有这样的看法,但是他们还是试图把自己的道路理解成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几乎是必然要经历的道路。埃·切·格瓦拉(E. Che Guevara)认为,胜利的革命战争的最重要的结论是:“从古巴革命的经验中,可以为拉丁美洲大陆的革命运动引出三个重要的教训:1. 人民的力量在战争中可以战胜一支正规军队;2. 未必总是要等待一切条件都成熟了才进行革命,起义领导可以去创造这样的条件;3. 拉丁美洲大陆不发达国家的武装斗争必须主要在农业地区进行。”^①

诚然,古巴革命的领袖们并没有搞绝对化,并没有认为游击战是拉丁美洲国家唯一的革命道路,但是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占主导地位的,他们认为,共产党人的职责是,只要出现游击战的尝试就应立即给予援助。他们甚至认为,游击战是人民的和群众的斗争,认为几乎对于他们的大陆的所有国家来说,游击战都要放在其他各种斗争形式的前面。卡斯特罗有句名言,他说“安第斯山脉应该成为美洲的马埃斯特腊山”,菲·卡斯特的讲话中的许多地方以及切·格瓦拉的许多文章都是谈这个问题的。他们提出的基本论据是:这些国家的军队是压迫者的军队,必须加以粉碎;拉丁美洲农民总的处境是爆炸性的,他们反对封建结构的斗争越来越具爆炸性而遭到国内外联合起来的资本的武装抵抗;最后,这一斗争的性质是全大陆性的,也就是说,不能设想这场斗争将只是作为内部社会力量的斗争展开的,而应

218

^① Ernesto Che Guevara, *Der Partisanenkrieg*, Hamburg 1968, str. 11. 在这部著作中,切·格瓦拉描述了游击斗争,并对进行游击斗争提供了指示。

看到这将是所有人民的力量和所有镇压的力量之间的一场生死之争。^①

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系统地陈述了这些看法。他认为,在拉丁美洲,一种不能像军人般简要精确地表达的政策不可能被认为是革命的。德布雷在总结古巴的经验时认为,在这场革命中出现了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新东西的现象。例如,德布雷阐述了卡斯特罗的思想:对革命而言,先锋队的存在是必需的,但是,“这一先锋队不一定必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那些想进行革命的人们也有权利和义务独立于这些政党而把自己组织成为先锋队”^②。

德布雷认为,拉丁美洲的革命及其先驱古巴革命对国际革命经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在一定的条件下,“政治机构是不能脱离军事机构的,它们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组织是人民军队,它的核心是游击队军队。先锋党可以以游击队中心的特殊形式存在。游击队是成长中的党”^③。

建立武装中心,而不是“政治”中心这一观念肯定主宰着他们的看法,这种看法后来最激进地表现在格瓦拉的下面这个口号上:让我们造出两个、三个、许多个越南。除了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斗争有比较发达的民主条件的某几个拉丁美洲国家(例如,乌拉圭或者智利)之外,对于几乎其他一切存在着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军事独裁统治的国家来说,古巴革命者认为,最有效和几乎唯一可能的道路是建立得到人民支持的游击队,游击队同时也将是新的革命党的萌芽和核心,而不是相反。德布雷认为,对于当代的条件来说,“人民军队将是党的核心,而不是相反。游击队是核心中的政治先锋队,真正的党只能从它的发展中才能诞生。因此,要发展政治先锋队,就应当发展游击队。

① 参见《革命资料》(*Materialien zur Revolution*, Darmstadt 1968)中收集的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报告,特别是格瓦拉1963年写的文章《游击战——一种方法》。

② Régis Debray, *Révolution dans la révolution*, Paris 1967, str. 103.

③ Régis Debray, *Révolution dans la révolution*, Paris 1967, str. 113 - 114.

因此,在今天的环境下,主要的重点必须放在发展游击战上,而不是放在巩固现有的党或者建立新党上。因此,武装起义的工作今天是一号政治工作”^①。

抱有这样一些想法的古巴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发生了冲突,这是显而易见的,后者基本上仍然坚持首先是工人阶级从事非法或合法斗争的传统观念,而在这个大陆的某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从人数上说已经超过了农民。^② 古巴的论点,特别是在强调武力和农民是革命最重要的因素时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同法农(F. Fanon)关于第三世界以及第三世界摆脱殖民主义的论点是吻合的。今天,几乎已不能有丝毫的怀疑,这些思想家对帝国主义殖民势力的最尖锐的谴责是完全有道理的。法农正确地指出,殖民主义绝不是什麼“思想机器”,也不是“理智力量”,而是“自然状态”的武力,这种武力只能用更强大的武力才能加以消除。法农明确地写道,“在多数民族主义政党的宣传中,农民一贯被忽视。虽然在殖民地国家中显然只有农民是革命的。农民没有什么可以丧失,而只会得到一切。农民丧失了社会地位,忍饥挨饿,遭受掠夺,从而能最迅速地发现,只有使用武力才是合算的”^③。

220

古巴的革命者跟法农一样,可以以古巴、阿尔及利亚或者越南为例,说这些都明显地证明了他们的观点。然而,必须同样指出,各国的

^① Régis Debray, *Révolution dans la révolution*, Paris 1967, str. 125. 这里必须指出,德布雷在陈述这些观点时过分绝对化,他片面地强调了古巴的经验。这在存在比较强大的工人运动和党的传统的地方,必然引起尖锐的反应。在考察这些国家的革命道路时,这一点是不能也不应该看不到的。

^② 特别是他们和委内瑞拉共产党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后者把他们的成员 D. 布拉沃(D. Bravo)的游击运动说成是派别活动,而非·卡斯特罗却充分支持布拉沃。卡斯特罗指责委内瑞拉领导犯了机会主义、右倾和投降主义的错误,而委内瑞拉共产党中央则尖锐地指责古巴领导想充当革命的“超民族领导”,等等。参见《非·卡斯特的讲话》(*Govor F. Castra od 13. marta 1967*)和委内瑞拉共产党总书记庞·马科斯(P. Markos)的答复《到底讨论的是什么问题》(*Šta je to o čemu se diskutira. “Međunarodni pokret. Dokumentacija”, br. 3, Beograd 1968*)。

^③ Frantz Fanon, *Die Verdammten dieser Erde*, Reinbek bei Hamburg 1969, str. 47.

情况不是一样的。在一些国家里,存在着社会党和共产党为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进行民主的、公开的和合法的斗争的一切可能性。在一些国家里,也存在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的十分强大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但是,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里,情况跟法农或卡斯特罗的说法和分析是一模一样的。大批受剥削的、落后贫穷的农民不仅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压榨,而且不能跟上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剥削第三世界而兴旺起来的那些国家的越来越迅猛的发展的步调。如果帝国主义继续奉行自己的政策,这个第三世界很可能将从卡斯特罗、法农或者胡志明的革命主张中看到多多少少是人的生存的前景。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此外,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尽管这种解放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牺牲,对于社会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来说,以及对于仍然始终是落后的意识的发展和变化来说,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公开的革命冲突是第三世界被剥夺了权利和受凌辱的群众历史生存的**绝对必要条件**。应当从这一角度来看待切·格瓦拉的决定。他的奋不顾身和牺牲只是这个被剥夺了权利的世界求解放的光辉时刻之一,因此他将永远被铭记在所有把自由看成是人的生存的同义词的人心中。

221 从更广的历史前景来看,切·格瓦拉试图在玻利维亚组织游击队而当时又没有成功,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一个基本的和决定性的问题是,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现在的危地马拉、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就是这样)或者在第三世界的其他许多国家里,它们求解放的革命道路是要走游击战,还是要走党进行斗争的传统道路或者是两者相结合。我们已经看到,古巴的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了走游击队的道路。看来,在许多国家里,这条道路也是最富有创造性的解决办法,同时也要加上地下运动在城市里获得可能的和肯定也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支持。

从上面的探讨中,我们看到,古巴马克思主义者身上有一种特别鲜明的主观因素,他们在解决问题时往往采取唯意志论的做法。卡斯特罗曾多次强调,设想先要有觉悟,然后才进行斗争是极其错误的。

“必须首先进行斗争,然后革命觉悟才必然会越来越有力地产生。”^①这一态度在国内政策上也反映出来了。为了使生产更加顺利地增长,对个人实行物质刺激还是精神刺激,在这个难题上,古巴马克思主义者把重点更多更多地放在后者上,担心过多地大力强调物质因素会使社会主义觉悟和关系走样。“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必须明确:我们绝不否定物质刺激的客观必要性,但是我们拒绝把它当作鼓励人们行动的唯一刺激。我们担心,在经济领域内,这种刺激很快会成为目的本身,那时就会妨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应当忘记,这一种刺激形式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当加以克服的资本主义的措施。”^②

特别是在对古巴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期,古巴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认为,可以更多更多地依靠群众的觉悟和发扬这样的觉悟,而不是依靠从资本主义继承下来的某些经济规律。他们明确地表明,他们不主张首先应当建设物质基础而把觉悟的提高看作只是一个次要问题,或者首先应当渡过称为社会主义的那个阶段然后才开始发展共产主义关系;而是主张应当同时建设这两个阶段。在这个问题上,在斯大林主义的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肯定有许多惨痛的经验,这些经验使得没有定见和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古巴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有理由摆脱这种斯大林主义的形而上学。在任何方面,把所谓的社会主义阶段同共产主义分割开来只能成为——迄今也始终成为——替许多与社会主义民主、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相容的东西辩护的借口,我们还会有机会以南斯拉夫为例谈论这一点。

然而,只有采取正确的态度,只有认为所有这些阶段实际上说的是共产主义的不同阶段,说的是一种不能强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存在的异化(例如在政治领域内加强国家政权、国家机器及其各种伴生的官僚权力等级制,或者把马克思主义——更不用说它的一种贫乏的

222

① F. Castro, *Revolutionäre und Pseudorevolutionäre, Materialien zur Revolution*, str. 119.

② E. Che Guevara, *Brandstiftung oder Neuer Friede?* Reinbek bei Hamburg 1969, str. 75 - 76.

变种——变为一种新的宗教,等等)的某些形式的社会制度,——只有这个时候才开始出现真正的和最困难的问题。在新社会最初几个发展阶段已经预告着未来发达的共产主义关系的形式有哪些呢?

古巴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最初几个阶段就应当解决和克服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一些经济范畴和关系,例如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他们中头脑最清醒的理论家切·格瓦拉写道,一根看不见的粗绳——价值规律——把异化了的人束缚于社会,它涉足于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决定着人的道路和命运。格瓦拉认为,因此,如果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可以用我们从资本主义继承下来的腐朽的武器来实现(作为经济细胞的商品、赢利,作为杠杆的个人物质利益,等等),那么,就很容易走进死胡同[……]为了建成共产主义,我们必须在建设物质基础的**同时培养出新人**。因此,重要的是正确地选择动员群众的工具。这一工具基本上必须是道义性质的,同时绝不应当忽视正确地使用物质鼓励,首先是社会性质的物质鼓励”^①。

限制和克服商品-货币关系的方式之一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计划工作,这同时也是对基本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化的结果,这是古巴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快就完成的一件事。然而,国有化和中央集权制必然会导致官僚主义关系的加强,而这种关系也是有较深的历史传统的。这个问题很快就提到了古巴马克思主义者面前,卡斯特罗在取得胜利仅仅五年就在自己的讲话中强调,“应当像保护社会主义不受帝国主义之害那样来保护它,使它不受官僚主义之害。不要忘记这一点,因

^① E. Che Guevara, *Der Sozialismus und der Mensch auf Cuba, Materialien zur Revolution*, str. 175 - 176. 在这一意义上,古巴人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免费受教育,免费医疗,住房、电、煤气、水免费(还不是对所有人都如此),等等。古巴的经济能否承担起这一切而产生较大的震动(尽管假设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提供了大量贷款和援助),这是很难说清楚的。如果我们根据社会主义迄今为止的发展经验来下结论的话,回答首先是否定的,而不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在社会和经济关系的现阶段,很难设想,可以完全克服商品生产的某些基本范畴,而又不产生比较深刻的社会动乱,不产生正是古巴人自己希望避免的现象,生产增长不足,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干预加强,等等。因此,在这方面,古巴的实例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感兴趣的。

为官僚主义是十分危险的、暗藏敌人。你们听到过一千万人在谈反对帝国主义,但是你们听到过多少人在谈反对官僚主义?肯定、肯定、肯定是不多的。它是一大祸害,但我们现在对它不重视,因为它还没有概念”^①。

似出于上述理由,古巴马克思主义者还吸取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看到了过分中央集权的危险性,并立即宣布采取权力下放的措施,加强了某些自治的形式,据我们所知,在这方面还不存在比较固定的主张。在这方面,多尔蒂科斯(O. Dorticos)总统在一次向记者发表的谈话中说的话是富有特征的,他说:“1960年和1961年,研究古巴革命进程的某些观察家对于经济和政治领域内过分中央集权的趋势表示不安。对于进行革命的一个不发达国家来说,实行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是势所难免的,这是为了协调一致地运用自己的资源,解决落后所带来的一些重大问题。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复杂程度的越来越高和社会关系的越来越多样化,要求实行能使生产力在更高水平上发展的权力下放过程。恰恰是过分的中央集权,由于不了解需要,由于生产脱离消费,由于压制工作中的主动性以及由于生产和分配活动的官僚化,最终窒息了地方上的主动性,因为地方和地区的生产条件服从于高级行政机关所制定的决定。除此之外,还应当补充的是政治上过分的中央集权的危险性,这甚至带来了个人专权的问题。万幸的是,看来古巴领导人是充分意识到这些危险的,今天可以看到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实行权力下放的双重趋势。这或许是

224

^① F. Castro, *Govor od 2. januara 1965*, “Međunarodni radnički pokret. Dokumentacija”, str. 18. 卡斯特罗在上述文章的另一段落中强调:“陈词滥调往往比帝国主义本身更有害,因为帝国主义总是通过镇压和犯罪活动来压制和抵制人民的斗争,而教条和陈词滥调相反,扼杀革命者的精神,使他变得迟钝。”(*Materialien zur Revolution*, str. 118)关于官僚主义问题,切·格瓦拉(参见 *Ökonomie und neues Bewusstsein*, Berlin 1969)和其他许多人也谈到过。

今日古巴最令人感兴趣的现象之一。”^①

225 关于社会主义的这一基本问题,迄今的经验表明,重要的是建立起官僚、个人权力等等无法加强的那样一种社会关系,而这不是取决于一个或者几个领导人的善良愿望、觉悟的高低或者性格的。因此,克服政治形式的问题、等级制度,发扬自治的社会主义民主等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迄今为止,除了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以外,古巴人表现出了极大的革命毅力、勇气和真正的人道主义来实现这一主张,舍此谈不上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克服经济和政治上的异化。

古巴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反革命为消灭他们的革命事业所做的种种尝试,他们勇敢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古老的设想:武装人民。古巴人建立了“保卫革命委员会”和民兵,把武器发到大多数人的手中,从而表明,特别是向小国表明,全民防御是唯一有效的手段,可能的侵略者可能在它面前却步;这同样是对建立军国主义官僚制的做法的重要纠正和障碍。他们同时总是声明,他们的革命问题不只是他们一国的狭小的事业。卡斯特罗和古巴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强调,他们的“人民绝不会以背叛国际主义义务的代价来实现未来”,“对于古巴革命者来说,反对帝国主义的战场包括全世界”^②。

他们的革命活动的深刻人道性质的动力是对本国人民以及整个未解放人类的苦难的同情。尽管他们从未忽视自己的民族责任,但是他们意识到,只要世界大部分地区还受压迫和被剥夺权利,就不可能有完全自由的民族。应当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菲德尔·卡斯特罗在

① V. 弗洛雷斯·奥莱亚(V. Flores Ole)和F. 洛佩斯·卡马拉(F. Lopes Kamara)对奥·多尔蒂科斯的采访记,载于1967年1月18日的《永久报》(*Siempre*),题为《古巴总统心目中的古巴》(*Kuba— kako je vidi njen predsjednik, “Međunarodni radnički pokret. Dokumentacija”*, str. 13)。

② F. Castro, *Unser Schlachtfeld umfasst die ganze Welt, Materialien zur Revolution*, str. 124, 126.

一次讲话中所说的豪言壮语,他说:“我们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热爱我们杰出的人民,我们热爱用我们的双手创造出来的财富,但是早于祖国,存在着人类!”^①

古巴革命是人类历史创造活动的一个非凡的现象。它的发展在许多方面是古巴革命者所没有料想到的,马克思主义曾经不是他们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但是,事实表明,革命的彻底性和决心最终会把当代的任何革命引上社会主义轨道。这立即向古巴的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他们必须不仅根据著名的原则,而且同样根据他们的革命过去和现在在其中展开的历史环境和特殊条件来解决这些问题。古巴革命肯定不是最后的一幕,正如当代任何一场社会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最后的一幕一样。因此,他们的思想和探索的活跃是值得注目的,这必然会有某些失误,或者至少会出现理论要求和现实之间的不协调。然而,仅就到目前的情况而言,他们的事业和思想已属于现代史最光辉的几页,这几页将永远成为人类历史创造活动最杰出的文件。

以上基本上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如果我们没有提到某些国家,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国家里不存在或不曾存在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和研究。但是在某些没有被提及的国家里,没有使我们觉得是对马克思主义在国际范围内的贡献的比较明显的发展,因此我们在对这一发展进行综合的时候不考虑专门提及。那将是撰写专门的个别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的任务。其他许多国家则刚刚走上摆脱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依附状态的道路,工人运动和知识分子不够强大,理论和哲学的传统更为薄弱,而这样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前提。

我们还需要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的发展,

^① F. Castro, *Govor od 19. aprila 1967*, “Partisans”, avril-juin 1967, str. 71.

这个国家尽管是一个不发达的小国,由于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非凡的活动,它表明历史发展的进程是可以大大加快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代革命进程的理论基础;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这个国家今天正在书写当代历史的重要一页。

第四篇 马克思主义 和南斯拉夫革命

第一章 革命以前的时期

南斯拉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 20 世纪初还在进行反对土耳其落后的封建主义和奥匈帝国属于时代错误的制度的解放斗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的国家,而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南斯拉夫几乎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农民占人口的 75% 以上,并处于由此而来的落后状态。只有看到这一切,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组织所做的努力和所获得的成就。这个组织利用了国内外的对抗关系和形势,通过一次革命高潮,不仅使本国升入自由民族之列,而且通过自觉地改变社会结构,使本国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心。^①

虽然使南斯拉夫变成发达的国家,还有一个过程,还需要一番新的努力,还需要经过一段发展,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南斯拉夫就没有自己的长期历史。实际上,早在 19 世纪后半叶,马克思主义思想就已经随着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了,

^① 战前(1941 年),南共大约有 1.2 万名党员,同时,地下的南共青团(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团)大约有 3 万名团员。

并且经历了革命运动本身在不发达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必然经历的各个阶段。由于在一个不自由的国家的落后环境里,资产阶级很晚才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必然要遇到在欧洲比较发达的土地上发生的这样一些新的过程,这些过程不仅已经预告了资本与劳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并且把这场斗争提到战场上来。

虽然南斯拉夫各地的工人阶级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但是,这些过程以及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派别的斗争,必然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所影响并起一定的作用。而这就意味着,除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外,还必然会出现形形色色的错误倾向——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①

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里还是一种不常见的而且不够发展的思想,但是它首先是通过斯维托扎尔·马尔科维奇(Svetozar Marković, 1846 - 1875)特别是在解放了的塞尔维亚开拓道路的。

斯·马尔科维奇^②是塞尔维亚政治史和文化史上最伟大和最光辉的人物之一。由于他为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而斗争,因此他标志着塞尔维亚政治和文化发展上的转折点。但是在他的著作和活动中,一般地说,还没有完全摆脱空想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除了他以外,在这一时期还必须指出一位主张社会主义的值得注意的人物瓦萨·佩拉吉奇(Vasa Pelagić),而稍后还有腊多万·德拉戈维奇(Radovan Dragović)、米塔·策尼奇(Mita Cenić)、迪米特里·图措维奇(Dimitri Tucović)和杜山·波波维奇(Dušan Popović),他们都是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的创

^① 关于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可参见铁托所做的《南共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Politički izvještaj CK KPJ*, 1948)和他在庆祝南共成立和活动40周年时所做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革命斗争的四十年》的报告(*Četrdeset godina revolucionarne borbe Komunističke partije Jugoslavije*, 1959)。同样,还请参见《南共联盟简史》(*Pregled istorije Saveza komunista Jugoslavije*, Beograd 1963)。

^② 斯·马尔科维奇的主要著作有:《东方的塞尔维亚》(*Srbija na Istoku*, 1872);《巴黎公社与国际》(*Pariska komuna i Internacionala*, 1871);《科学和生活的现实方向》(*Realni pravac u nauci i životu*, 1873)等。

始人,同时也是这个党的最革命和最有才干的领袖,马克思主义思想正是通过他们在我国才变得越来越出名的。在克罗地亚,最出名的社会主义者当时有伊万·安策尔(Ivan Ancel)和维托米尔·科拉奇(Vitomir Korać),而在斯洛文尼亚则有弗朗策·热列兹尼卡尔(France Železnikar)和埃特宾·克里斯坦(Etbin Kristan)。

资本主义发展的日益加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劳动阶层的艰难的生活条件以及国家在塞尔维亚资产阶级和君主制度霸权统治下统一起来之后的一系列问题(民族问题,农民问题,一般劳动阶层的生活问题和民主自由问题,等等)得不到解决,以及对战后特别是在中欧和东欧发生的革命事件的活跃反应——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各地社会党的统一(1919年4月)和“南斯拉夫社会工党(共产党人)”的建立,并在1920年的武科瓦尔代表大会上完成了这个统一过程和清除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袖的过程。从此,马克思主义思想尽管经历了各种阶段,仍然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斗争的理论基础和依赖于革命力量的存在和发展才能够存在的一种世界观和社会观。

231

但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斗争恰恰碰到了一系列重大的障碍和困难。新诞生的国家从创立之初起,就充满一系列的对抗。主要由于落后的农民经济,细小而分散的农村庄园,大量的土地掌握在一小撮地主手里,由于在外国资本(起先是法国和英国的资本,而以后越来越是德国资本)的控制和影响下经济很不发达,国家成了进行各种经济投机活动和金融投机活动的理想之地,这些投机活动一直伴随着南斯拉夫资产阶级的政策,直到它破产。因此,两派势力立刻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一派是以君主制度为中心的统治集团和塞尔维亚资产阶级,另一派特别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资产阶级。悬而未决的民族问题和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倾向,使得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实际上以民族斗争为幌子,掩盖他们的经济利益和要求。

在这些矛盾中发展着政治生活的一个方面。但是,这些矛盾在南斯拉夫劳动群众的发展、要求和斗争中又有共同的矛盾,因为南斯拉

夫劳动群众,除了民族问题之外,还日益尖锐地把其他的政治和社会要求,如民主化、解决艰难的经济地位、解决工会问题和解决土地问题等等要求提上了日程。对于这些要求以及对于共产党人在制宪议会选举中的显著胜利,资产阶级的答复是颁布非常法(1920年的公告和1921年的保卫国家法),从而禁止共产党并废除全体共产党议员的当选证书。

232 只有从这些情况中才能了解南斯拉夫革命力量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历史。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主要革命组织——南斯拉夫共产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完全处于非法状态,受到残酷的迫害,并在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常有许多最优秀的干部牺牲。迫害是残酷的,斗争是毫不留情的。党在这样的环境里,必须把严密的地下活动和合法的斗争形式尽量妥善地结合起来,因为党的最优秀的干部,当时只能辗转过着非法的政治生活,而且这样的生活也常常为多年的监禁和劳役所中断。我们今天可以提到的所有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即这场革命斗争的主角和这场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主要代表者,以及多数今天仍然处于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经受了所有这些严重的考验、迫害和监禁,等等。

在这个时期,党内的派别斗争也使得这种形势更加严重,尤其是在1929年1月君主主义专政以后,党内的派别斗争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可是,在30年代初,党的队伍终于开始逐渐巩固起来,虽然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已经开始产生消极影响,已经成了斯大林的官

僚主义和国家主义政策的工具。^①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1937年无疑是一个转折性的年头。这一年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892—1980)担任了党的书记,并且在国内选出了新的领导机构。党的新的领导在极短时期内便在组织上和政治上使党在当时日益临近的我国历史的决定性时期里胜任最艰巨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思想基本上与代表它的力量具有同样的命运。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当代社会革命力量在思想上的最高表现,在南斯拉夫很难突破严格的书刊检查和政治迫害,而它的代表者没有任何方便条件,可以在地下斗争的尖锐冲突中静下心来建设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单是向南斯拉夫公众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需要克服重重困难,不仅要准备全部出版物可能遭到没收,而且还要准备经

233

^① 铁托在南共成立40周年时所做的报告中指出,当时共产国际几乎已经准备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正当党组织随着新的领导的确立而开始巩固的时候,却要来解散南斯拉夫的党组织。考虑到30年代后半期所发生的事件,铁托对当时的情况做了下面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时共产国际在同其他党的关系中,日益明显地表现出官僚主义和公式主义的态度。实际上,斯大林在苏联大清洗时期通过共产国际对其他党所奉行的政策,是一种毁灭共产党人的革命形象,制造无气节的共产党人这样一类人的政策。当时,列宁给共产国际的工作确立的原则和精神就开始遭到严重的歪曲。这种政策给许多党带来了巨大损失,这在法西斯侵略时期,在对这些国家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当时这些党应当表现出自己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同群众是有联系的,在思想上是成熟的,应当组织人民进行反对占领者的斗争,并站在这一斗争的前列。(斯大林的这一政策在1947年后通过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和活动,再度复活了)由于斯大林的这种政策,我党丧失了大批干部,他们或者是在政治上堕落了,或者是在苏联斯大林的各次大‘清洗’时期遭到杀害。在清洗中,我党和国际革命斗争多年来所培养的百余名经过锻炼的共产党人遭了难。在他们之中,有我党几十名从前的领导人,我只想举出几个人来:菲利浦·菲力波维奇(Filip Filipović)、斯切潘·茨维伊奇(什特费克)(Stjepan Cvijić - “Štefek”)、弗拉迪米尔·乔皮奇(Vladimir Čopić)、腊德·武约维奇(Rad Vujović)、克·霍尔瓦廷(K. Horvatin)等人。他们以及我国其他上百名居领导地位的共产党人都一起死于斯大林的监狱和集中营中。”(J. B. Tito, *Četrdeset godina revolucionarne borbe Komunističke partije Jugoslavije, Govori i članci*, Zagreb 1960, sv. I, str. XX - XXI)

受多年蹲监狱的痛苦。^①

由此可见,形势无论如何是不利于思想理论工作,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原理的建设的。当时的形势是直接准备革命,迅速向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进攻并防止他们的袭击,为影响可能有助于革命高涨的一切力量的觉悟而斗争。

234 在一个文化活动还没有欧洲那样广泛和发达的国家里,在一个理论思想基本上带有模仿性质,而政治、经济和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国家里,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必须针对克服和解决最严重的,有时关系到党组织本身的存在存在的政治和组织问题,这完全是正常的。不过,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也始终是一种指南针,它不仅给革命力量指出了现代发展的总趋势,而且使革命力量能够从常常是错综复杂和几乎毫无指望的形势中正确地找到出路。

这种发展情况的另一个特点是,南斯拉夫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同工人阶级一起站在斗争的行列里的,或者至少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的熏陶的。早在20年代初期,就有一部阐述辩证法的著作问世^②,而在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方面出类拔萃的有:菲利浦·菲力波维奇(Filip Filipović)、奥格年·普里察(Ognjen Prica)、西马·马尔科维奇(Sima Marković)、维塞林·马斯列沙(Veselin Masleša)、博日达尔·阿季亚(Božidar Adžija)、奥托卡尔·克尔绍万尼(Otokar Keršovani)、萨费特·克鲁皮奇(Safet Krupić)、D. 内德利

① 马克思主义的几乎全部著作都是以半合法的或秘密的方式出版的,而更不用说列宁的著作或在严格的地下活动状态下出版的党的刊物了。合法地出版的有,卡·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1933年)和第2卷(1934年)。第1卷是莫·皮雅杰(M. Pijade)和罗·乔拉科维奇(R. Čolaković)在服苦役时译的,而第2卷是莫·皮雅杰一人翻译的。还有卡·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934年萨格勒布版);弗·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934年萨格勒布版);格·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1935年萨格勒布版);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935年贝尔格莱德版),等等。

② V. 里巴尔:《辩证法原理》(V. Ribar, *Principi dijalektike*, Zagreb 1922)。在该书中,作者试图把辩证法运用于生物学物种起源的问题和进化论上。里巴尔后来始终专心研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

科维奇(D. Nedeljković)、M. 什纳伊德尔(M. Šnajder)等人。^①

在其他的文化工作者、作家、批评家等等中间,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样也有自己重要的代表者。可是,在上面提到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困难情况下,革命的思想往往要通过各种文学作品和刊物才能比较容易地传达给读者,因此,正是某些文学家和政论家对当时的几代人起了强有力的进步影响。他们中间首先要推米罗斯拉夫·克尔莱日阿(Miroslav Krleža)所创造的强有力的艺术形象,他以自己全面的文学活动和政论作品写下了我国进步思想的重要的一章,其次是莫·皮雅杰(M. Pijade)、阿·策萨雷茨(A. Cesarec)、罗·乔拉科维奇(R. Čolaković)、约·波波维奇(J. Popović)、斯·加洛加日阿(S. Galogaža)、乔·约万诺维奇(Đ. Jovanović)、普·比哈里-梅林(P. Bihalji-Merin)、马·里斯提奇(M. Ristić)、布·克雷夫特(B. Kreft)、韦·格利戈里奇(V. Gligorić)、米·波格丹诺维奇(M. Bogdanović)、哈·基基奇(H. Kikić)、克·拉津(K. Racin)、伊·格腊霍尔(I. Grahor)以及其他许多人。

他们全都曾经做了多次努力来出版进步刊物,他们面对巨大的困难,通过下述杂志为宣扬马克思主义和用马克思主义阐明各种现象,首先是社会生活现象而进行了斗争,这些杂志是:《火焰》、《文坛》、《科学和生活》、《文学》、《新文学》,还有《今天》、《轴心》、《犁沟》、《艺术和批评》、《我们的实现》、《表现》、《当代》以及其他许多杂志。

在做这些努力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在阐述哲学、科学和艺术问题时有过尖锐的交锋。我们30年代的革命运动以之为出发点的意识形态前提受到两个重大因素的制约:第一,属于第三国际并且

^① 所有这些人也都是马克思主义主要著作的翻译者和各种进步刊物的出版者。他们的主要著作有:F. Fillipović, *Razvitak društva u ogledalu historijskog materijalizma* (1924); F. Fillipović, *Seljački pokret i agrarno pitanje u Jugoslaviji* (1929); O. Prica, *Suvremena filozofija i prirodne znanosti* (1937); Sima Marković, *Princip kauzaliteta i moderna fizika* (1935); D. Nedeljković, *Ideološki sukob demokratije i fašizma* (1938); D. Nedeljković, *Anti-Bergson* (1939); D. Nedeljković, *Dijalektika* (Beograd 1939)。

严守纪律地为它的存在辩护；第二，法西斯主义的现实存在及其入侵的直接危险。为了理解后来——不仅是战时的，而且也包括战后的——进程，需要强调指出，南斯拉夫共产党作为严格的地下党和干部党是在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它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建立的，当时，列宁主义已用斯大林说法做了解释，有人又借用列宁的第三国际的威信把这样解释过的一种列宁主义强加给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对伟大十月革命的这一产物的信任推动了党，当然也巩固了党的队伍，特别是在面临决定性的较量的时候。因此，党一方面受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党和意识形态、艺术、哲学等等的阐述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政治上灵活的革命党。第一个因素特别反映在党的某些主要人物和集团围绕米·克尔莱日阿编辑的《烙印》杂志展开的尖锐的论战。^① 尽管这场冲突的基本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对今后历史道路和斗争的估价，但论战在哲学和艺术方面反映得最为强烈。克尔莱日阿这批人对30年代的事件所持的某种历史性的怀疑态度和听天由命的态度，不可能成为革命的政治行动的基础。在理论领域内，也有失误，有对违背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的某些观点做不必要的辩护（例如，受实证主义影响的里希特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但是当论战和讨论转到艺术领域——在南斯拉夫文化界，克尔莱日阿肯定是这方面的佼佼者——，那些为反映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等辩护的人的前景，看样子很不美妙。在艺术上挥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旗帜绝不可能在任何方面给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和头脑清醒的人留下什么印象，因为他明白，纯理性的态度

^① 关于哲学问题的论战是在《科学和生活》杂志上展开的，同克尔莱日阿展开的进一步的论战是在《表现》、《青年文化》、《烙印》等杂志上进行的。克尔莱日阿以《辩证的反野蛮行动》（*Dijalektički anti-barbarus*）为题把整整两期《烙印》杂志（1939年12月第8期和第9期）用于这场论战，而党的方面则于1940年把主要的文章收集在一起，出版了《文集》第1期（1940年萨格勒布版）。关于这场讨论的哲学方面，参见下列文献：I. Babić, *Odnos filozofije i znanosti u radovima jugoslavenskih marksista 1931 - 1941*, “Putevi revolucije” br. 5/1965；Stanko Lasić, *Sukob na književnoj ljevici 1928 - 1952*, Zagreb 1970。

和阐述不可能造就艺术家和创造出艺术。一个政治运动必须使自己的理论观念,特别是艺术立场和观念完全划一和毫无对话,这在克尔莱日阿看来绝不是合乎逻辑的。他对某些历史问题,特别是艺术问题的透彻的观察,他的批判精神,他的革命的艺术直觉和远见,对未来的进程来说是重大的批判性提示。

如果我们看到——而当时在这一场合是最重要的——代表斯大林主义观念的不是一个掌权的社会主义官僚,而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运动,它还没有明确区分马克思或列宁的观念和它们的斯大林化的变种之间的差异,那么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和充满矛盾。南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政党,它并没有由于耽溺于理论争论而忘记自己的首要任务: 237
革命的政治活动。南共领导的英明最清楚地表现在1941年,当时,尽管有斯大林关于革命的教条,但是,实际上等于否定斯大林精神的一个革命进程还是开始了。当时,人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情况,但是,这一斗争行动和景象本身,显然是同当时斯大林的革命观念和唯一的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观念相对立的。

第二章 革命的第一阶段 (1941—1945)

为民族生存而斗争的时期以及决定性的阶级搏斗的到来,比可能预想到的要快得多。到1941年年中,欧洲几乎全部处于法西斯的占领之下。1914年,第二国际曾面临一次生死攸关的挑战——帝国主义战争。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第三国际内的各国党又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当时的形势是新的、特殊的,这种形势也就应当特殊地加以解决。但是,第三国际斯大林的领导在估计新战争方面优柔寡断,对当时的主要危险认识不清,第三国际的领导官僚主义地服从于苏联对外政策的一切权宜行动,不理解如果不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去解决具体的民族矛盾和问题就谈不上国际主义,斯大林妄想解决一切理论之谜并把自己的教条主义决定强加于一系列的运动和民族,——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各国共产党的混乱和束手无策,以致整个欧洲,除了南斯拉夫之外,没有一个党能够积极地应付这种新的特殊的形势。

实际上,不仅应该成为彻底的列宁主义者,而且应该达到列宁的天才的革命创造水平,从而得以实现迅速的、刻不容缓的和根本的转变,指导革命力量从一条道路走上另一条道路,并为革命力量创造出

在当时情况下唯一现实和富有成果的活动可能性。

南斯拉夫有它许多内在的特点,其中某些特点我们已提到过。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整个欧洲形势的特点是法西斯占领的现实以及法西斯为反对资产阶级世界的民主力量,而稍后则为反对“社会主义”世界的民主力量而发动了战争。而这些情况完全不同于1917年俄国的情况或者1927年中国的情况。

240

对于马克思主义问题来说,在理论上并且在实践上解决每一个国家当时的这种情况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早在1941年4月10日(即法西斯刚开始占领时)以主要的革命战略家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党的领导,决定采取一切措施准备起义,而稍后,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6月22日发表了告人民书号召起义,6月27日组成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所有这些都是战略性的决策,在当时还看不出这些决策对于我国以及对整个国际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后果。^①

当时的基本问题当然是民族解放问题。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认为这一问题是解决当时形势的关键,因此把这个问题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提出来了。在整个斗争期间,民族解放问题一直是最基本的问题。早在1941年8月,铁托就曾对这个问题做过如下的说明:“第一,南斯拉夫各地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伏伊伏丁那、桑贾克和达尔马提亚)人民解放游击队

241

^① 我们要指出,南共与欧洲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不同,它不顾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的条约,对法西斯侵略的回答是号召自己的党员和其他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捍卫国土,给予尽可能持久的抵抗并把武器保存起来。根据1941年4月10日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建立了由铁托主持的军事委员会。南斯拉夫于1941年4月17日就签署了投降书。此后,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地区被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法西斯分子所瓜分,而在另一部分地区则建立了完全依赖于轴心国的法西斯政权。南共在1941年5月1日的告人民书中以及在1941年5月初举行的会议上,都强调指出,党将组织和领导反对占领者的斗争,并且指出,争取民族和社会的解放是它的首要任务。这次会议还指出,党应当致力于团结所有的爱国志士,而不论政治、信仰或者民族的差异如何,致力于结成斗争的统一战线。开始武装斗争的最终决定是在1941年7月4日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出的。

的主要目的是：把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从占领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并同帮助占领者压迫和屠杀我国人民的内奸做斗争。

第二，我国人民自由和独立的最大敌人是德国法西斯主义及其在我国各地肆虐的其他一切法西斯帮凶。因此，一切爱国者的神圣职责就是毫不留情地进行斗争，直到这群法西斯匪帮被彻底消灭为止。

第三，游击队之所以称为人民解放游击队，就是因为它不是任何政党和派别的战斗组织（具体地说也不是共产党的战斗组织，虽然共产党人是站在斗争的前列的），而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战斗队。凡是能够参加反对占领者的武装斗争的爱国者都应加入这一队伍，不问他们的政治信仰如何。

第四，在我国各族人民反对敌人的全面斗争中，游击队肩负着多方面的任务。他们必须摧毁为法西斯征服者效劳的一切设施：铁路、桥梁、工厂、工场、弹药库和武器库。他们必须竭尽全力制止占领者抢走农民的粮食、牲口和其他食品。应当用武力从占领者手中夺回征用的粮食、牲口和其他食品，并把它们分给人民，而留下必要的数量供游击队用。游击队必须阻挠征收税赋，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一切都是为占领者进行征服战和进一步压迫我国人民效劳的。

第五，游击队必须手执武器，保卫居民点、城市和农村不受法西斯的蹂躏。游击队必须保护人民的财产不受占领者抢劫。

第六，游击队必须处处消灭法西斯的队伍，特别是军官和盖世太保、黑衫党等等。同样，应当无情地消灭他们的南斯拉夫代理人、形形色色的人民的叛徒和内奸，他们把大批人民最优秀的儿女交到法西斯刽子手的手中，充当占领者的忠实走狗，对我国人民实行恐怖。

242 第七，游击队必须不倦地发展人民的抵抗运动，举行人民起义，作为斗争的核心，领导这些起义。游击斗争迄今的经验表明，全民起义的问题未被重视，因此有必要火速消除这一缺点，因为不然的话，游击队可能脱离群众，而群众是准备为正义的事业奋斗的。

第八，游击队的政治路线必须是：由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组成人民

解放反法西斯阵线,而不问其政治和宗教信仰的差别如何。”^①

这一根本性的转变和对革命斗争所进行的独特的指导,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经验和革命理论的创造性贡献,而且从它们以后的结果和影响来看,还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今天在南斯拉夫具有一些特点。

这是一个天才的决定,是我国革命的主要战略家——约·布·铁托的丰富经验、坚定意志和革命敏锐性的产物。由于这个文件以及后来在1948年所持的立场,还由于开创了迄今从未实现过的社会主义进程,铁托成了现代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人物之一。这个决定不仅发挥了共产党人的积极性(他们勇于牺牲自己并在被占领的城市里的残酷斗争中成批遇难),而且也发挥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向他们指出了明确的前途。同时,这个决定也使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妄想充当所谓人民利益的捍卫者的任何企图都不能得逞,并迫使那些企图这样做的人立即暴露出他们的真面目:同占领者相勾结,反对人民解放斗争和共产党人。尽管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懂得,广泛的人民阵线是胜利的根本保证,他们自觉地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阵线,然而,由于种种情况凑合的结果,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还是成了这样的唯一组织,它的全体党员和领导都投身于斗争,从而成为整个人民解放斗争公认的领袖和基本的活动力量。

与此相适应,在人民解放斗争范围内,还展开了一个逐渐改变当时的旧南斯拉夫的资产阶级结构的过程。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前途既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旧南斯拉夫,因为它不能解决一系列内部矛盾和问题,它最后听任占领者任意宰割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更不可能是法西斯主义的南斯拉夫。因此,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宣告要摧毁旧政权和建立以人民解放委员会为形式的新政权。这一点早在

243

^① 约·布·铁托:《人民解放游击队的任务》(*Zadatak Narodnooslobodilačkih partizanskih odreda*),《铁托演说和论文集》(*Govori i članci*)第1卷,第1—2页。其他各点(一直到第16点)谈的是游击队的其他任务和策略,等等。

爱·卡德尔(Edvard Kardelj, 1910 - 1979)于1941年10月写的关于人民解放委员会是人民政权的临时代表一文在理论上得到了反映。卡德尔在文章中说:“在由于人民起义的胜利发展而业已驱逐占领者的地区内,现在正在建立从人民中间直接地和自由地选出的新的政权机构——人民解放委员会。”^①

在进一步的阐述中,卡德尔明确地指出,之所以不能保留旧的区政府和宪兵队,是因为这些都是旧的政权机构,对于解放区的安全以及对于动员人民同占领者做斗争,它们不能提供任何保证。卡德尔强调指出,同样,“今天,人民解放委员会还不是到处都具有政权代表者的性质,但是它们必须具备这样的性质。它们今天事实上是政权的代表者,诚然,是临时的代表者。因为,它们的职责是行使这一职能,以利于人民解放斗争,直到我们获得解放,直到把占领者驱逐出我国从而能够转而从事组织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的那一天止”^②。

卡德尔在列举这些委员会的任务时着重指出,人民到处自发地怀着激情欢迎它们,因为人民把它们看作是自己的权力和自己求解放的武器。卡德尔还强调指出,这些委员会“不是任何一个党或专门组织的机关,今天,站在同占领者做斗争的立场上的所有的政治集团、组织和人士都应有代表参加其中”^③。

244

事态的整个发展还在斗争进行的过程中就达到了顶峰: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南人解委会)第二次会议于1943年11月

^① E. Kardelj, *Narodnooslobodilački odbori moraju postati istinski privremeni nosioci narodne vlasti*, *Put nove Jugoslavije*, Beograd-Zagreb 1946, str. 234.

^② E. Kardelj, *Narodnooslobodilački odbori moraju postati istinski privremeni nosioci narodne vlasti*, *Put nove Jugoslavije*, Beograd-Zagreb 1946, str. 235.

^③ E. Kardelj, *Narodnooslobodilački odbori moraju postati istinski privremeni nosioci narodne vlasti*, *Put nove Jugoslavije*, Beograd-Zagreb 1946, str. 236. 几年以后,莫沙·皮雅杰(1890—1957)写道(当时他已同斯大林的官僚展开了尖锐的论战):从中可以看出,“南斯拉夫共产党从一开始起就明确地认识到,为了保证人民斗争取得最终的胜利,必须粉碎旧的国家政权机关,并代之以新的人民政权机关。在被占领的欧洲,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共产党有力量这么做”。(M. Pijade, *O tridesetgodišnjici Komunističke partije Jugoslavije*, Beograd 1949, str. 15)

29日就在法律上使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工作合法化了,南人解委会同全国委员会一起组成了立法机构和执行机构,从而宣告了新的,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诞生,因为这个国家是以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为首的。^①

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以欧洲前所未见的方式,以人民解放斗争的形式并通过这样的斗争,解决了根本任务,体现了历史发展现阶段的基本规律性,即摒弃和克服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不言而喻,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只不过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第一阶段的任务——确保人民民主的,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新政权和建立新的国家机构,这种国家机构意味着根本消灭旧的国家机构,同时也是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保卫业已取得的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作为这次人民革命的第一批战斗者和领导者,深得本国各族人民的信任,这尤其表现在广泛地设计和建立起来的人民阵线上。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人民政治组织,离开了它,就不能设想解放斗争会具有如此广泛的基础,同时也不能设想后来人民会如

^① 南人解委会第二次会议被视为南斯拉夫最高人民立法和执行代表机构。会上选出的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成了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最高人民政权机关。会议通过了专门的决议,决定剥夺在国外的南斯拉夫政府所享有的南斯拉夫合法政府的权利并禁止彼得二世国王回国。会议同样还通过了如下决议,关于按照联邦原则建设南斯拉夫;关于赞扬和感谢人民解放军;关于实行南斯拉夫元帅称号;关于批准南人解委会执行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的决定、命令和声明。

此积极地投身于国家的恢复和建设。^①

斯大林的最高机构对于我们这种事态发展中的许多情况(例如,建立无产者旅和组成国家的管理机构,等等)是不赞同的,而在解放后,由于这场革命不同于俄国的革命,他们又根本不懂得我们这个新型的人民民主国家实质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官僚主义的自命不凡的态度不可能承认那些没有按照他们的意图和计划进行的事情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而在不屈从于他们的一切指示和他们要支配一切新的社会主义进程的霸权主义愿望时,情况就更是如此了。^②

^① 为了认清武装斗争的形势,我们要指出,1941年底,游击队里就有大约8万名战士。无产者第一旅是1941年12月22日组成的。1942年和1943年又组建了一些旅、师和军,因此,1943年底,人民解放运动大约有30万名战士和很大的解放区。战争结束时,已经组编成集团军的游击队,大约有80万名战士。在人民解放斗争中,牺牲的战士和领导人超过了30万人,受伤的约有45万人。在这场斗争中,南共牺牲了大约5万名党员和它的3/4的战前的干部。经过战争,党大约有14万名党员,在战斗中以及在集中营里牺牲的南斯拉夫人总数大约为170万人,即每9名公民中有一人牺牲。为了了解这些事件,除上述书籍外,另请参见下列文献: *Oslobodilački rat naroda Jugoslavije 1941 - 1945*, I - II, Beograd 1957 - 1959; Vladimir Dedijer, *Dnevnik I - III* (1945 - 1950); Rodoljub Čolaković, *Zapisi iz oslobodilačkog rata I - V* (1946 - 1955)。

^② 铁托1946年在《新南斯拉夫的解放斗争和革命改造的特殊性何在》(*U čemu je specifičnost oslobodilačke borbe i revolucionarnog preobražaja nove Jugoslavije*)一文中就指出了这一点。不过,安·日丹诺夫在其众所周知的论1947年国际形势的报告中,在谈到人民民主国家时,把它们说成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某种东西,他说:“同时也就奠定了全民国家所有制的基础,建立新型的国家,即人民共和国,这里政权属于人民,大工业、运输机关和银行属于国家,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各劳动阶级联盟是主导的力量。于是,这些国家中的人民不仅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压榨,而且已在奠定着过渡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础。”(A. Ždanov, *O međunarodnoj situaciji*, Beograd-Zagreb 1947, str. 6)

因此,在就这些问题而产生的争论中,卡德尔还在当时就不得不强调指出:“鉴于我们的革命是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条件下开始发展的,这场革命在它的每一阶段具有人民民主的形式,但是就其阶级力量和这些力量的内部关系来看,这场革命实际上只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它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除了解决了政权问题本身外——主要只是解决了一些一般的民主任务,而只是在战争结束阶段和战后不久,才开始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一点是无关紧要的。基本的问题是政权的性质和革命的力量内部关系,而不是革命变革的速度本身。因为速度要取决于革命的客观条件和革命领导力量的策略手段。所以我们有权利说,我们的人民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形式,因为我们的革命是在以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条件下产生和开始发展的。”(E. Kardelj, *O narodnoj demokratiji u Jugoslaviji*, “Komunist” br. 4/1949, str. 3)

当时还不清楚的许多事情,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越来越清楚了。整个这一革命实践和悲剧,南斯拉夫历史现实和革命主体的革命变革,过去和现在都必然改变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观点、心理、智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可以说,这个过程的一个方面是持续的斗争,这场斗争还没有结束,因为这场斗争产生于不发达的环境,是在欧洲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下,同斯大林的心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艺术、哲学、自由、批评、民主等等的看法的斗争。

246

在这一意义上,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活中,1941年是他们至关重要的一年。实际冲突开始于1941年(当时还有许多旧观点和成见),且不说对当时革命进程的深刻程度和历史范围的认识如何。如若没有实现革命,我们的革命意识没有发生变化和得到发展,如若没有造就独立的革命主体,对在这一革命时期令人惊叹地表现出来的自身的创造力缺乏自信心,就绝不可能在1948年做出生命攸关的、历史性的伟大决策。

第三章 革命的第二阶段 (1945—1950)

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革命既是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也是他们的实践。在真正创造历史和加速历史进程的紧要关头,革命的决定既不是根据什么处方,也不是按照什么教科书作出的,而是在对本国和国际的整个一系列关系作透彻研究的基础上做出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首先是他们的领导,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所开辟的前景的基础上,的确是胜任历史任务的。他们通过自己的历史性活动,把广大人民阶层吸引在自己周围。广大人民阶层在毫不留情的解放战争和革命的烈火中,经历了在别的场合下需要几十年和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内部改造。

在国家解放以后,革命立即继续进行。摆在年轻的革命面前的直接任务是:巩固新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恢复遭到破坏的国家并为将

使国家脱离落后状态的经济和社会的新进程做好准备。^① 1945年末,人民阵线在大选中以压倒优势获胜,新议会遂宣告共和国成立。共产党人占主导地位的新政权把主要生产手段(工业、银行业和商业)收归国有,并实行了土地改革。第一个五年计划(1947—1951年)的意图是加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改变仍与战前一样的十分不利的人口结构。

然而,对于南斯拉夫革命者来说,形势不仅是复杂而困难的,而且是充满矛盾的。尽管正在实现的是一个实质上反斯大林主义的进程,斯大林主义作为一个问题还没有提出来。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观念还深受所有那些由第三国际作为唯一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观点强加于人的观点的影响。^② 此外,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所能依据的只有唯一的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苏联的经验。他们当时始终无私地承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威望,承认苏联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们甚至认为,这个狭隘的联盟是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最合乎逻辑的和唯一可能的前景。在革命时期同苏联领导打交道的某些糟糕的经验还不足以成为抛弃对他们的信任以及从另一角度观察他们的社会结构的理由。在国家的组织、党的作用的理解以及对科学和文化的态度等方面,苏联的影响极为强烈。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和国家主义的因素不断阻碍我们的发展,结果必然造成困难和各种畸形现象,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时民主的革命道路经常

① 在战后的最初几年中,总共有几百个(据计算约为800个)敌对团体在活动,有一万多名反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人,他们在西方国家的帮助下,竭力想推翻新政权。当时,36%以上的工业、50%的铁路以及80多万幢房屋遭到破坏。根据1938年的国民收入,南斯拉夫每人大约是60美元,比德国少5/6,比法国少3/4。以上材料取自D.比兰季奇《1945—1969年南斯拉夫争取自治社会主义的斗争》(D. Bilandžić, *Borba za samoupravni socijalizam u Jugoslaviji 1945 - 1969*, Zagreb 1969)。比兰季奇的材料取自我国以及国际的资料。

② 在这一时期,除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而斯大林当时被列为第四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外,还大量发表了苏联时兴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有日丹诺夫、列昂诺夫(M. A. Leonov)、罗森塔尔(M. Rozental)的,还有列昂节夫(L. A. Leontijev)、奥斯特罗维特扬诺夫(K. V. Ostrovitjanov)的,等等,以及关于“党的建设”的极其官僚主义党性的文章。在艺术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念,然而,这种观念完全没有产生出比较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在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上,占主导地位的完全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观点。

在抵制这些畸形现象。

249 不论上述影响如何,最初的中央集权制在革命的武装阶段以后的最初的日子里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团结一致地去战胜国内的资产阶级,后者得到国际资本主义集团的强大支持。同时还需要由雄厚的中央积累和基金来保障对国家的经济建设进行大量投资。然而,同样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南共努力由其他群众性政治组织(人民阵线、反法西斯妇女阵线、反法西斯青年阵线,等等)来贯彻这些措施,并因此得到人民的巨大支持。同样,党内的民主也比在受斯大林直接影响的那些国家里广泛得多。

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革命是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的,这个革命还始终处于高涨时期,它完全是一次独特的革命,必然要求采取一系列特殊的措施、行动,对进一步的发展过程做一系列特殊的研究,并且,由于这一切而绝不能够轻易地把它纳入其他某些“规定”的范围和道路中。而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则在于:革命的领导力量是真正想把革命过程进行到底的,是献身于建设新世界的伟大而崇高的理想的,我国人民最优秀的儿女为了建成这样一个新世界,在革命前和革命时期都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个世纪以来,这些伟大的原则一直推动无数的劳动群众同多少世代以来的剥削人和损害人的尊严的世界进行殊死的斗争。这些原则同把斯大林及其领导的思想 and 政治实践强加于人的倾向,同否定国内和国际上的独立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无原则行为,最后同那些与本国和国际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实践格格不入的马基雅弗利主义的行为是无法一致的。

250 因此,当斯大林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合营公司、中央银行、自己的军事专家和民用专家)使南斯拉夫党和国家处于不平等地位并最后主宰它们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由于自己的官僚主义的盲目性,对南斯拉夫的形势做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知道,苏联和他本人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和各族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威

望,但是他没有看到一条创造性的革命道路本身所带来的成果和巨大的变化。他本来寄希望于他一采取行动就会要么粉碎抵抗,要么干脆撤换领导。

联共(布)中央通过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V. M. Molotov)签署的信(第一封写于1948年3月27日,第二封写于1948年5月4日)开始攻击,他们在信中指责南共中央奉行反苏政策,党溶化于人民阵线,醉心于资本主义成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理论,等等。南共中央通过4月13日和5月17日两封信拒绝了这一批评和攻击,此后,情报局于1948年6月28日进行了公开的谴责。

情报局的决议(南斯拉夫公开发表了这一决议及各封信,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却没有公开发表南共中央的回答)指控南共把南斯拉夫引向资本主义,并号召南共党员强迫南共领导放弃到当时为止的政策。南共中央立即发表声明,宣布拒绝所有的指责并召开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于情报局决议发表一个月之后,于1948年7月21日至28日举行,代表大会完全赞成南共中央的立场。

这一转折性事件很快就表明,这实质上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理解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冲突。冲突初期(1948年)所发生的情况连我们自己也感到难以置信和模糊不清,随着这些分歧的进一步发展,许多刻板公式的被抛弃和通过整个国内生活所必不可少的自由分析,现代世界及其趋势的图像以及这种冲突的性质才获得了另一种、越来越清楚的轮廓。

事实上,必须把斯大林及其辩护者们在第三国际的第二个时期精心制造和硬要强加于人的那一套教条主义遗产全部抛弃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明显地感到,有必要对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大肆宣扬的关于斯大林的种种评价做真正的重新估价。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国家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政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及其智力活动的分析,所有这一切都通过这次冲突获得了新的说明。

251 尽管自那次事件以来从历史的角度看相隔的时间还很短,但是,今天已经很清楚,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领导所采取的立场是具有头等意义的历史性行动,是现代社会主义发展中的转折点之一。

这一冲突本身把社会主义实践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一系列问题提出来了。在当时开始的反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运动中出现的某些现象,不仅使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感到吃惊,而且使他们深深地感到痛心。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应当弄清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么可能使用往往低于现代资产阶级的实践和政治水平的方法呢!①

当苏联和阵营中的其他国家开始对进入紧张的经济建设时期的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和采取歧视措施时,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做出了巨大努力来顶住这一切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压力,而且也努力从理论方面来解释这一切现象。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十来年所取得的成果,一方面根本否定和战胜了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解释,同时也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开辟了新的境界。

252 在社会主义的最初几个阶段,主要的危险之一是被推翻了的资产

①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所有那些伟大活动和成果之外,还需要永久写下这样一些估价和观点,它们被认为是达到了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最高水平,人们并以此来约束所有共产党和指导它们的某些活动,而实际上这些估价和观点只是一个官僚主义集团的最卑鄙的污蔑和愚蠢的自以为是。1948年我们被指责为犯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错误,保存资本主义因素,使党消失在人民阵线中,等等;此后,情报局1949年在决议中又声称:“在1948年6月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已经指出铁托-兰科维奇(A. Ranković)集团由民主和社会主义方面转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方面去的事实,而在情报局那次会议后所经过的这一时期内,该集团则已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完全转到法西斯主义和公开出卖南斯拉夫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去了。”(“*Boljševik*” br. 22/1949, str. 19. [参见《南斯拉夫问题参考资料》,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15页。——译者注])在各种结论中还有这样一条:“因此,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认为反对这受人雇佣的铁托间谍凶手集团的斗争,乃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职责。”(“*Boljševik*” br. 22/1949, str. 21. [参见《南斯拉夫问题参考资料》,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19页。——译者注])对一个实际上是欧洲的唯一做出了重大牺牲和努力,完成了自己的民族任务和社会主义国家竟做这样的分析,竟使用这样的词句,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和对待这个国家的态度原来竟该是这样的!

阶级,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也存在另一种危险,这种危险是在社会主义进程本身内部产生的,它可能使社会主义关系发生致命的蜕变,变成国家主义的—官僚主义的关系,这一点在到当时为止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则是不为人们所承认的。正如铁托后来在总结这一过程和问题时所说的那样:“然而,在经济和其他方面仍然很落后的情况下,国家机器在管理经济和社会生活其他方面过大的作用,政权高度集中在国家中央机构手中,以及党直接领导国家机构,这些情况自发地产生出新的现象和危险:官僚主义,党和国家机构合而为一的危险,政权机器独立行事及其置身于社会之上的危险,社会政治工作者变成行政首长和劳动人民变成命令的执行人,而不是社会建设的积极和自觉的参加者的危险,等等。这一切现象有使政治领导脱离群众的危险,并且会使劳动人民的创造性主动精神受到压抑和使社会生活及经济生活陷于停滞。但是,尽管我国经济落后,官僚主义的蜕变和党同行政机构合而为一的倾向并不是在我国的国土上产生的,而是通过抄袭斯大林的做法中的一切,作为斯大林的做法的思想影响和物质影响从外部传来的。这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给我们造成了不少的损失。

另一方面,尽管南斯拉夫革命经常强调需要实行民主,强调自己的特点,反对官僚主义蜕化,但是,直到同斯大林的压力发生冲突和对它进行反抗之后,我们才懂得了官僚主义蜕变的全部意义及其危险性。霸权主义是官僚主义的外部表现,而内部的官僚主义分子则是官僚主义在威胁革命成果和社会主义发展方面的积极支柱。

因此,在外部同官僚主义的冲突更加要求对国内官僚主义分子进行更彻底的清算。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经预言,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受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威胁,而且还受到官僚主义的威胁。这一预言

在我国发展的实践中得到了表现和证实。”^①

在革命初期就开始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经过这些事件之后达到了新的高潮。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认识到,国家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必然会加强官僚主义因素和国家主义因素,所以便大胆地开始了国家机器的权力下放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正是由于这些具体的动向和进程,在理论方面也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特别是在1948年以后,社会主义及其实质和发展道路的问题在南斯拉夫曾经是一个中心的实际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理论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不仅有职业理论家,而且还有最强的理论干部,他们同时也在实践上指导着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建设。

这里提出了下面两个基本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又包括一系列其他问题):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性质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以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及其建设的道路问题。

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得出了一系列十分重要的结论,这些结论实质上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基本思想,但是与一系列观点相抵触,这些观点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最近的发展时期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

首先,关于只存在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观点被彻底抛弃了,这种观点是斯大林主义顽固地、教条式地强加于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对于这一点,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有理由可资说明。南斯拉夫的实践本身就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不是用俄国革命的方法,而是在民族解放斗争的范围内,通过完全独特的途径争取到的。

254 除了这一点之外,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论分析使人必然得出这样的结

^① 约·布·铁托:《南斯拉夫共产党革命斗争的四十年》(*Četrdeset godina revolucionarne borbe Komunističke partije Jugoslavije*),《铁托演说和论文集》(*Govori i članci*, Naprijed - Zagreb)第1卷,第34—35页。在这个时期(1949年),马克斯·巴切(Maks Baće)对当时试图带进国际生活的苏联国内生活中的官僚垄断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参见*O nekim pitanjima kritike i samokritike u SSSR-u*, “Komunist” br. 6/1949)。

论：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不应该被归结为一种唯一的形式。这是同辩证法关于发展过程中的一般、特殊和个别的统一这个基本论点相违背的。每一个实现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性的个别国家，都是一个具有自己特殊的内部结构，并处在不断变化的特殊的外界条件下的特殊的国家。可见，这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般规律性必然要在具体的形式中得到体现，而这些具体形式是由某个国家的性质以及某个时刻的各种历史情况所决定的。各个国家的特殊性是如此的多种多样，情况又是如此的不同，因此，任何从教条主义出发指定发展道路的做法，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真理的最普通的违背。

几年之后，卡德尔在奥斯陆所做的众所周知的演说中，曾特别精辟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一系列国家已通过欧洲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机构走上了向社会主义进化的道路，因此革命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适用的，他并且强调指出，这里不能忽视两点：“目前，这种过程主要是在高度发达的国家中才是可能的，因为这些国家早期便出现在资本主义的历史舞台上，获得了特殊的经济特权，有了经济力量以及与此相应的很高的生活水平，而这就会减弱它们内部的社会矛盾。在这样的条件下，民主传统真正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社会矛盾的调节者，以逐渐加强社会主义的因素。至于落后的国家，由于没有任何悠久的民主传统，而内部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种过程的开展要困难得多，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完全不可能的。在现代国际资本的巨大集中以及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任何一个落后国家都不能指望沿着正统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求得发展。这样，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就不仅面临着解放劳动的方法问题，而且首先面临着使本国从落后状态、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依赖地位解放出来（这是不发达国家达到社会主义的准备条件）的道路和方法问题。”

255

除此以外，不管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如何，任何内部矛盾的极端尖锐化（这种尖锐化是在某种不能在工人运动中实行妥协的制度在经

济上和政治上毫无出路的特殊条件下发生的),都会使这些矛盾的和平的、民主的解决受到破坏。这种尖锐化必然会导向革命的冲突。旧南斯拉夫的情况也正是这样的。如果认为在这种条件下,工人运动的革命道路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出发点,就是说,应该把正统的资产阶级民主作为向社会主义发展唯一可能的方式,这就等于制造一种教条,这种教条的危害性,比方说,不比另一个教条——把十月革命的道路强加于一切国家——的危害性小些。目前,有一些国家已经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在一定条件下足够清楚地证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今天来否认这个事实,正像当社会主义通过正统的民主形式而逐渐演变已成为一系列国家的历史事实的时候来争论这种演变是否可能一样,也是错误的和可笑的。依我看来,这两种教条今天都是实现当代国际社会主义的绝对要求的一个巨大障碍,而这种要求就是:找到一条有机的内部团结的道路;不是——比方说——像共产党情报局那样要求一致思想和一致行动的团结,而是要建设性的民主合作,以便在通往社会主义的总的运动路线的基础上把各别的国际社会主义潮流联系起来。”^①

256 这一历史发展因素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社会主义的实质和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已经提出来了。在这一大堆问题中,必须解决国家、政党、社会主义民主和符合新的社会关系的新道德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取得的成果肯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对于斯大林主义来说,下面这种做法已习以为常:以各种数字——从生产出多少吨钢、牛奶和谷物,直到工厂的数目和军队的实力——来衡量社会主义的发展。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他们简单地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建成,只需要从经济上加强它,而忘记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历史范畴,因此是一个过程。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个建立新的社

^① E. Kardelj, *Socijalistička demokratija u jugoslavenskoj praksi*, Predavanje održano u Oslu, 8. oktobra 1954, Beograd, str. 12 - 14. (参见《南斯拉夫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34—236页。——译者注)

会关系的问题,在这种关系中,人逐渐地不再是客体、数目、听任摆布的对象,而成为历史的真正的创造者。社会主义的任务是逐渐消除对人的统治,而实现对物的统治,实现劳动人民自己的统治。然而人们只是有权选举那些管理他们或“以他们的名义”进行管理的人,是实现不了这一点的。而只有他们自己来管理生活的一切主要领域,即经济、政治、教育等领域,才能实现这一点。

只有建立了这样的关系,人们才能认识到,才能充分意识到,他们是历史的真正的创造者,从而摆脱一切历史幻想,摆脱思想、宗教和政治方面的各种盲目崇拜。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唯有自由的人才能具有的那种人的尊严,因为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他的命运不取决于这种或那种国家暴力,不取决于官僚主义机构或者等级制度的轻率决定,而取决于他在其中作为平等的一员的自己的集体。

这种认识实际上把社会主义的一个关键问题提了出来。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有机会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公社和国家消亡问题的解决,从列宁致力于组织工人管理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以及从当时的其他一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中有所了解。

然而,必须考虑到,在这以后的整整 30 多年中,整个马克思主义受到斯大林所宣扬的观点的影响,这些观点顽固地反复出现在一切出版物、论文、书籍和指示之中,甚至无产阶级的国际实践也以它们为指南。正因为如此,便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上述那些思想和认识不仅得到了特别的阐述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且获得了真正新颖的内容和意外的收获,因为这些东西是在新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被发掘出来的,而这种经验是同所有那些在不久以前还被认为是符合传统的经验不相符的。而传统的经验同发掘出来的经验恰恰相反。

这样说绝不是贬低那些在得出历史经验本身之前就提出了这些思想的人的天才,但是也不贬低下面这些人的创造性活动,他们同整整一个被奉为“神圣的”时期相反,创造了自己的历史,而使他们的理论观点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他们的历史性的创造和人类的自我牺牲

精神。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1950年6月27日对于现代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来说,将成为有意义的一天。那一年,在上述理论认识的基础上开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进程——把政权和管理交给劳动群众自己的进程,这也意味着国家在社会生活的一些部门的消亡。那一年,铁托便能够指出:“国民议会今天要讨论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最重要的一项法律的草案——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的根本法草案。这一法律的通过,将是国民议会在通过关于生产资料国有化法律以后的一个意义最重大的历史性行动。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这并没有实现工人运动的‘工厂归工人’的行动口号,因为‘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的口号,不是什么抽象的宣传口号,而是一个含有深刻内容的口号。它包含着关于公有制、关于劳动人民的权利和义务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部纲领;因此,如果我们真正想建设社会主义的话,就可以而且必须把这一口号付诸实现。”^①

258 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不论私人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只能由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那种关系来代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公有制是以社会管理这些资料为前提的,也就是以直接生产者的解放和独立为前提的。

在无产阶级用武力夺取政权,而资本主义关系在此以前未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情况下,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集中行使权力和实行管理,是这个国家继续生存的必要条件(在社会主义将通过高度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而产生的那些国家中,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在上面提到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理论上给它指出的那种任务,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整顿国内的关系,保障自己不受其他可能发生的情况的危害以及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

^① 约·布·铁托:《论工人管理经济企业》(*O radničkom upravljanju privrednim preduzećima*),《铁托演说和论文集》(*Govori i članci*)第5卷,第205页。

社会主义国家在完成巩固革命的首要和基本任务以后,还会面临一种在其本身中存在的内部危险——官僚主义的危险。^① 凡是在无产阶级国家还没有开始消亡的进程,首先是在经济职能方面还没有开始消亡的进程的情况下,国家社会主义的形式必然会得到加强,并独立而成为一个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特殊机构。劳动群众经济上的解放以及整个社会方面的解放的被延缓和推迟,必然使那些在经济上最近似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停滞不前。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过去就已明确地看到的那样,为了建立起社会主义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建立起标志着社会发展的另一个历史阶段的那些关系,工人阶级的国家必须开始一个实际上意味着它本身的消亡的进程。这当然是社会主义的主要问题。这一认识和革命行动使得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革命,从而也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一个新阶段。

259

^① 关于官僚主义问题,在我们的理论书籍中已经谈得很多了。铁托在谈工人自治的同一篇报告中曾经指出:“把工厂、矿场等等交给工人管理,我们就使得一种名叫官僚主义的传染病不能在我们这里传播。这种传染病是令人难以置信地、轻易地、迅速地、从资产阶级社会带过来了,而且,在过渡时期中它是危险的,像水螅一样,它的触须从各方面阻碍和阻挠正确的和迅速的发展过程。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大的敌人之一,这是恰恰由于它偷偷地渗入了社会主义各方面的活动,人民在开始的时候还觉察不出来。认为官僚主义在我国不是根深蒂固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它已经钻进各个机关、国家机构和经济部门中心。但是,我们知道了这一点,并且已经采取了一整套的措施使它的渗透成为不可能。单单只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定期运动是不够的,必须展开经常的斗争和教育人民。”(约·布·铁托:《论工人管理经济企业》(*O radničkom upravljanju privrednim preduzećima*),《铁托演说和论文集》(*Govori i članci*)第5卷,第229页。[参见《南斯拉夫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01页。——译者注])而卡德尔在人民革命十周年时曾经写道:“举例来说,国家的消亡过程是社会主义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过程是不会自发地完成的。听任这一过程自发地发展,这就等于加强同这一过程相对立的反动因素,这就等于首先加强想使整个社会屈从于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以及最后屈从于官僚主义帮会的官僚主义倾向。虽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已经很重视官僚主义的危险,可是,所有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中,官僚主义的危险甚至比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所能预料的程度更大。我们从目前时期得到的经验告诉我们:官僚主义是阶级制度残余的最后和最顽固的堡垒,因而也是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敌人。”(*Deset godina Narodne revolucije*, “Komunist” br. 2-3/1951, str. 97)

第四章 革命的第三阶段 (1950—1965)

一、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含义

同斯大林主义的冲突以及认识到把政治领域(国家、官僚、党)加以夸大和奉为偶像是战胜资产阶级之后危及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大危险之一,这就揭开了围绕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展开理论讨论的一个深入的过程。这首先是竭力从历史形成的种种“冲积层和沉积物”的下面去发掘马克思的真正的实际思想和意图,进而从原则上来解决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所形成的问题:克服各种形式的异化的方式和途径。其次是寻找出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条件下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道路,同时又不能闭眼不看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大家庭这一复杂结构的一系列民族的和社会的特点。最后,所有这些活动和理论上的努力不只具有理论的尊严,而且,理论观念和成果立即或多或少地反映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考虑到下面还将谈到的许多内外困难,社会实践不可能完全按照理论分析的成果的模式去做,因此,有时候宣告的事情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冲突采取了比较激烈的形式。除此之

外,还应当补充的是,南斯拉夫不存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不存在同样发达的、可以直接进行干预并推动自治社会关系发展的工人阶级,而且在我们的条件下主要倡导者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先锋队。如果我们还考虑到新南斯拉夫所继承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民主关系的发展程度低,我们的革命同官僚主义发生的冲突要比社会主义在发达得多的国家里可能发生的冲突来得尖锐,这就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了。^① 在存在政治范围的强大影响和社会经济结构不发达的时候,官僚主义必然会自行再生。

鉴于在50年代初,南斯拉夫还始终同斯大林的霸权主义政策发生尖锐的冲突,甚至遭受政治和经济的强大压力,理论上的考虑和观念是在同苏联的理论和实践不断抗衡的情况下发展的。因此,1952年底铁托在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做报告时,就批判了苏联的官僚主义实践、大俄罗斯霸权主义政策以及国家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所处的雇佣关系的处境,他强调指出,解决办法不在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国家职能,而在于加强自治,也即在于使国家职能消亡、实行权力下放和管理民主化。关于这些问题,他得出结论说:“首先,我想谈一谈经济部门和人民政权实行权力下放和民主化问题。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在社会发展的一个更高阶段,也就是说,只有在生产资料充分掌握在生产者手中,只有在工人通过自己选出的管理机构来自己管理工厂和企业的时候,这两种管理形式才能够,而且也必须平行展开。因此,只有当国家不再通过国家机构对经济进行管理的时候,真正的民主管理才开始。[……]因此,在我国革命发展的初期阶段,当国家还没有把工厂和企业交给工人管理,国家还是通过自己的机构,也就是说只是通过经理——作为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雇员——来管理这些工厂和企业时,在这一时期是谈不上社会主义的民主管理的。在这最

^① 应当强调指出,在工人阶级的发展中这个因素最具决定意义和最困难。迄今,即使是最发达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也没有把这一原则作为根本的革命纲领,因此在这一方面,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尤其是它最发达的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经验以及优势。

263 初的发展阶段,劳动人民的国家必须根据物质可能性立即尽量妥善地解决劳动者的社会问题。人民的国家自己逐步地增加了工人的工资,制定了宪法、各种法律和法令,根据这些法律和法令,职工的退休权、工资照发的年度休假权等等都有了保障。国家自己出钱,承担了职工的保险,为劳动者建立了各种文化机关和其他机构,可是,只有把工厂和企业交给工人掌握,国家的首要的和最重大的行动才算完成。这个行动本身就包含着国家消亡,亦即国家经济职能消亡的因素,而同时也包括在生产中,从而也在社会中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①

在这些话里,实际上包含着新时代的民主化的实质,人的进一步解放的实质。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受到自己的社会范围和资产阶级范围的限制(在这种范围内,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自由达到了高度的发展水平),他们只是从政治自由和多党制方面来看待民主和自由问题,而看不到,人的自由问题是一个深刻得多的问题,这个或那个政党做出决定的政治自由使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人民不可能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自己掌握自己的活动和发展,因为他们不掌握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生产力。

人的解放正是在我们这一发展时期经历着迄今为止最彻底的形式,因此,人的解放不能仅仅和首先指赋予政治自由,而是首先要建立起这样的民主机构,它将通过劳动人民本身的生活和社会进程,简言之,即通过实现经济自由来确实保障劳动人民有最大的可能来实行自治,因为唯有经济自由才能成为人在其他一切方面获得彻底解放的重要先决条件。

^① 约·布·铁托在南共六大所做的报告《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为争取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J. B. Tito, *Borba komunista Jugoslavije za socijalističku demokratiju*),《铁托演说和论文集》(*Govori i članci*)第7卷,第224—225页。关于这些问题还可以参见铁托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国际局势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内部发展有关的任务》(*Zadaci Saveza komunista u vezi s međunarodnom situacijom i unutrašnjim razvojem socijalističke izgradnje Jugoslavije*, 1958)和在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社会主义建设和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的作用和任务》(*Izgradnja socijalizma i uloga i zadaci Socijalističkog saveza radnog naroda Jugoslavije*, 1960)。

卡德尔 1954 年在奥斯陆所做的报告中曾经写道：“依我们看来，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发展着的民主的组织机构，也应当适应这个客观过程。我们认为，只有下面这样的直接民主机构才能适应这些任务，这种直接的民主机构能保证劳动人民有最大的可能通过相应的主要管理机关，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实行民主自治。我们的工人委员会、合作社、公社彼此垂直联系的自治经济共同体以及教育、文化、科学、卫生和其他社会服务机关的独立的社会管理机构，都具有这种职能。这些形式和这种社会活动的日益巩固，同时将是逐步建立新的民主机构的形式，而这种机构将在新的社会经济的基础上有机地成长，而且归根到底将成为国家这一权力和暴力工具的消亡形式。换句话说，在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条件下，应该建立这样一种民主的社会管理的组织机构，它将使劳动群众有可能直接地和经常地，而不是仅仅通过自己某一个政党的上层来在这一机构中发表意见。公民们直接参加社会自治机关，就能通过它们直接决定由谁在上级机关中做他们的代表。其他任何道路都会导致官僚主义，阻碍个人的社会主义创造性的主动精神。当然，在这样的条件下，自觉的社会主义战士的主要斗争场所不是狭义的国家管理机关，而是劳动群众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的社会自治机关。国家管理机关应该是一个服从于这种社会自治机关的专业机构，而自觉的社会主义战士必须在群众中进行斗争，使他们在相应的民主机关中做出的决定是社会主义的决定，也就是说，使之符合于保卫社会主义免受反社会主义倾向的影响，以及符合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因素的需要。”^①

为了实现这一切，必须着手建立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机构，这些机构将尽量接近生产者本身，并将接管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的若干重要职能，从而同工人委员会和其他社会管理机关一起，构成新的社会共同体。这些单位不是别的，正是公社，而马克思就曾把公社看作

^① E. Dardlj, *Socijalistička demokratija u jugoslavenskoj praksi*, str. 30 - 31.

完成国家的消亡并最终代替国家本身的一种形式。卡德尔在同一篇报告中说道：“公社的力量和重大的社会作用首先在于它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行动的独立性，其次在于它和工人委员会及其他的生产者自治的民主机构有着有机的联系。因此，公社不仅是一个政治机构，而首先是一个公社经济机构，它的第一个职能将逐步削弱，而第二个职能则会日益增强。实际上，留在公社地区的剩余劳动是经由公社进行基本分配的。这样，公社就直接关心其范围内的生产力的经常发展。”^①

完全可以理解，这样一种按照马克思的精神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实现，在已经改变的整个经济制度的观念中也必然有其基础。这里抛弃了斯大林关于国家拥有绝对权力，国家完全管理和组织经济、从事计划工作以及占有剩余劳动并进行分配等等的国家主义观念（根据这种观念，劳动者仍然只是被管理的对象），在对国家和劳动集体的经济职能、计划工作的性质以及经济规律的作用等问题的理解方面，同样也发生了剧烈的转变。

鲍里斯·基德里奇（Boris Kidrič, 1912 - 1953）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就对这一问题做了十分正确的阐述。他说：

“因此，从为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反对官僚主义，即反对官僚主义的因素和使社会主义革命退化的潜在可能性而斗争的角度来看，正在我国建立的新的经济制度的实质是什么呢？[……]”

266 这样来看问题，我认为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要求我们正在建立的新经济制度具有下列几点：

1. 由直接生产者自己管理我们的工厂和企业。这一要求是建立真正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达不到这一要求，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就得不到最终保证，因为生产资料就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与直接生产者相脱离[……]

^① E. Dardlj, *Socijalistička demokratija u jugoslavenskoj praksi*, str. 49.

2. 新的经济制度应当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并尽可能避免用行政的手段来遏制这些规律发生作用。

用行政的手段来同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进行‘斗争’,最终是不会有结果的,而且是不合理的。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客观经济规律总是存在的,即是客观存在着的,因此,无视客观经济规律的存在和作用的行政的和官僚主义的做法,总是会受到毫不留情的报复,而且通常是以十分反常的形式[……]

3. 社会对客观经济规律的掌握,必须严格地仅限于那些一般的范围(在我们的现代计划工作术语中,我们称之为社会计划的基本比例),它们保证社会生产不致发生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现象,同时给国家的经济发展提出总的方向。应该在这些基本比例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直接生产者和公社的主动性[……]

4. 真正由社会占有剩余劳动和对剩余劳动进行社会主义的民主管理。我要立即指出,我现在的这一提法形式上诚然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彼此截然相反的解释。在斯大林提出骇人听闻的‘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说法以前,苏联的官僚们也曾在形式上同意这一提法并加以运用。然而,苏联的实践又如何呢?在苏联的实践中,全部剩余劳动(集体农庄的一部分剩余劳动除外)都为国家所占有。具体地说:全部剩余劳动与直接生产者相脱离,而由苏联的官僚等级来决定它的进一步使用并用它来满足自己奢侈的要求。在这方面,苏联官僚等级的社会经济作用完全与资本家阶级的作用相似[……]

267

我不想提出具体的技术性的和专门经济性的办法。对这个问题的具体探讨还需要进行一定的技术性和专门经济性的深入研究。然而,这里要谈的问题是在进一步发展对剩余劳动的社会主义民主管理方面应遵循的一般方针。

我想,这些一般方针主要有如下几点:

1. 应当完全丢掉下面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当剩余

劳动完全与直接生产者和公社相脱离时,这种占有才是对剩余劳动的社会主义占有,即社会占有。这种看法也正是一种官僚主义制度的理论‘出发点’。如果能够把生产资料的管理托付给直接生产者进行,那么,也可以把一部分扩大再生产交给他们直接管理,不过这要以这种剩余劳动管理不妨碍其社会流动的需要为限。而在我们这里,特别是在完成关键性的基本建设以后,这种限度将大大扩大。比方说,为什么我们的企业不能用它们自己生产的剩余劳动来大力改建和扩建呢?这绝不意味着企业占有积累,正如它们管理工厂不意味着它们占有工厂一样,为什么劳动集体不能在直接管理自己生产的大部分剩余劳动的基础上来改善自己的社会福利——建造住宅、开设诊疗所等等呢? [……]

2. 剩余劳动的这种必要的社会流动不应只通过社会计划规定的方式来进行。这种流动的一部分也可以通过客观经济规律的简单作用来进行[……]

3. 至今的所谓关键性投资制度实际上仍旧是一种预算制度,尽管我们迄今为止曾设法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改组这种制度。这种制度之所以是一种预算制度,正是因为投资的赢利性和合理性这个因素并没有在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的基础上得到足够的考虑,在投资问题上,仅仅从行政上加以确定是不够的。在决定关键性投资时,赢利性和合理性这个因素目前整个来说可以通过人民银行所规定的信贷制度得到充分体现。当然,信贷制度的前提是年度归还率和利息。因此,苏联的‘理论家们’在叫嚷什么提供信贷、规定年度归还率和利息是回到资本主义的方法。诚然,信贷、年度归还率和利息这三者在形式上的确是符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然而,鉴于我们的生产力是低下的,我们还长期不能放弃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再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而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固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是旧事物在新事物中的残余,但是已作为社会主义分配的手段和方法。因此,信

贷、年度归还率和利息只在形式上是一种老方法,而就内容而言,却已不再是老方法了。”^①

所有这些看法以及我前面提到的那些看法都对斯大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进程的观念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且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指出社会主义必须加以实现的那些共产主义因素,指出在同落后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传统和倾向进行斗争时唯一能使一个社会主义运动得到充分的表现和取得完全胜利的那些因素。在我们的理论和实践中彻底根除了一种偏见,这种偏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官僚由于进行了绝对的统治,由于组织和分配剩余劳动,就标志着社会主义达到了最高目标并能代替劳动人民的创造性。这样,不仅对我们来说,而且总的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从根本上否定和克服了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并表明,如果不经常致力于实现劳动人民尽量广泛的社会管理,就绝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目的——把人从各种形式的依赖关系和非人道化现象中解放出来。 269

这种认识也必然反映在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的发展的看法上。强行推行农村集体化的短暂时期(1949年前后)很快就表明,无论从经济观点还是从政治观点来看,这都不是办法。因此,马上放弃了强行建立合作社的主张,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重大问题和未来的前景搁下来了。但是,我们当时存在着技术结构基本上是小农和中农以及一定数量的大型国营农场、城市的农业经济和农民合作社,针对这种局面也必须找到农村的社会主义发展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相应的途径。

特别是弗拉迪米尔·巴卡里奇(Vladimir Bakarić, 1912 - 1983)从理论上研究了这些问题,他同卡德尔一起对解决这个问题做了重要贡

^① B. Kidrič, *Diskusija na VI kongresu KPJ, Zbornik VI kongres*, Beograd 1952, str. 183 - 192. 这些想法实质上指的是克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异化,而为了实现这些想法,应该实现首先表现为生产者自己参加分配社会收入的具体自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献。他在自己所著的《过渡阶段的地租问题》(1950年)一书中就指出某些理论家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他们认为,土地国有化就意味着必须完全取消地租,由于国家的干涉(国家企图取消地租),地租在苏联没有以传统的形式出现。他的这种透彻的观点对于集体化运动前后出现的级差地租尤为适合。巴卡里奇在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般原则来解决我国发展的特殊性问题方面,曾在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三次代表大会上(1954年)特别阐述了我国农村发展的可能性和途径,实质上他提出了以下两条出路:“第一条是俄国的道路。俄国人在1928年前后曾面临类似的(不完全相同的)问题,实际上他们在‘农村集体化’的幌子下着手剥夺所有的粮食生产者,从而为自己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一生产领域打下了基础。毫无疑问,我们完全不能走这条道路。这条道路将会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发展趋势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相违背。

可见,留给我们的只有第二条道路。我认为,这条道路具有两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它首先要求我们的公社、劳动人民和共同体更直接地参与这些产品的生产,并密切注意消费的情况。

270 这条道路的第二个方面是对农业生产者的关系问题。我们看到,我们目前常用的刺激农业生产者的手段是不够的[……]这就是说,毫无疑问,要在农村进一步发展商品市场、小商品生产者市场,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道路是痛苦比较少、比较迅速的,我们的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这种‘美国的’道路,即提高小生产者的商品性和稍为增加他们的收入,就使农村市场活跃得多[……]

当然,这种完全‘不受约束的’发展的自发势力会在农村导致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倾向的复活。但是,这种完全‘自由的’和自发的因此也是不可能的。大农业资本家在生产中的作用在我们这里应该为社会主义成分所代替。从土地面积和其他条件来看,我们的农民是绝对担当不了这一角色的。农民的可以见到的前景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依靠自己的劳动力、自己家庭的劳动力和现代技术工具的尽量

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者。应该向农民指明并帮助他们实现这种前景。在这样的前景中,不仅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且还会有助于我们动员农村自身的力量来发展生产力和为社会主义工业扩大市场。”^①

可见,由此应当得出结论:鉴于南斯拉夫农业的发展情况,我们既放弃了俄国的强制性的集体化道路(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的,这条道路在斯大林主义的,因此也是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内是合乎逻辑的),同时也抛弃了助长农村资本主义倾向的发展和仅仅指靠个体农民的道路。“在农业生产的方针问题上,大致说来有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在于:是应该大大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农场和社会主义合作社,还是任凭个体农民保持现状?大家知道,我们在现阶段的方针是大力支持和发展农村的社会主义农场和社会主义合作社,而不是完全支持个体农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努力解决的是农业问题,而不是农村、农民和农民的生活问题。我们不应该错误地理解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不应该把这理解为不关心农民。情况绝非如此!我们全力支持小农,只是我们认为,一个国家不能这样来解决农业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幻想,不能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在社会主义农场和社会主义合作社中,我们竭力加强的,正是个体农民不能为我们解决的东西,因此我们这样做绝不是给他们制造障碍,而是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道路。”^②

271

卡德尔在他的论述农村社会主义政策问题的著作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提出了丰富的论证,他在这部著作中比较明确地

^① V. Bakarić, *O aktuelnim pitanjima rada na selu i u poljoprivredi*, Referat na III kongresu SKH; in *O poljoprivredi i problemima sela*, Beograd 1960, str. 382 - 385.

^② V. Bakarić, *Uloga socijalističkog gazdinstva i socijalističke kooperacije u modernizaciji poljoprivrede*, in *O poljoprivredi i problemima sela*, str. 527 - 528. 巴卡里奇在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题为《关于农村的内部发展和农业政策》的报告(*O unutrašnjem razvoju na selu i poljoprivrednoj politici*, 1959)中,也探讨了这些问题的某些重要方面。

论述了这一发展的方向。当然,我们从来也没有放弃基本目标:对我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或者换句话说,在农村实现社会主义。然而,这里的主要问题是这一过程应该采取什么途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也正如卡德尔所强调的,由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原因,我们放弃了在简单的劳动合作的基础上使土地普遍集体化的道路,而确定了首先在社会主义成分中,即在大型农场中扩大对现代化生产手段的社会投资,并采取联合土地以及同个体农民合作的相应方法。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不赞成采取任何运动式的联合土地和使土地社会化的办法,而主张社会主义成分和农民在符合双方物质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符合现代化生产资料的现有规模的具体联系。我们关于综合地建设最具备成功条件的合作社的观点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这是使土地逐渐实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大生产并定能立即提供高产和高度劳动生产率的途径。在这条道路上取得的每一项新成就都将成为新的、使大家信服的范例,并将把越来越多的土地吸引到促进农业的过程中来,这也使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每一个前进步骤都会更容易,而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则更便宜、更能赢利。”^①

考虑到这些因素和南斯拉夫到当时为止的经验,卡德尔得出如下结论:在农村,资本主义类型的分化倾向已经十分微弱、十分有限,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向资本主义倾向做任何让步。其次,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下的中小农户占优势,我国农村尽管社会关系已发生变化,但是它本身并没有比战前更胜任实行技术改造和发展农业的任务。“由此可以得出第三个结论,即在这个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不断加强社会

^① E. Kardelj, *Problemi socijalističke politike na selu*, Beograd 1959, str. 22. 关于农业生产中的社会主义合作化问题,卡德尔说:“合作化是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国营农场、农民劳动合作社、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及其经济,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包括工商业组织)与个体农户进行生产合作的一切形式的名称。它在社会组织的和为这种生产过程而准备的整块土地上准备、建立、开始或发展社会生产过程的因素,它在这种过程中,在社会投资和社会基本生产资料的基础上,促使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成为扩大再生产的承担者。”(*Problemi socijalističke politike na selu*, Beograd 1959, str. 151)

主义农业成分,加强其生产能力和在市场上所起的作用,从而使它越来越能同农民进行合作。

因此下面这项任务应当具有最重大的意义:我们要最大限度地装备我国的一切国营农场、农民劳动合作社、合作社经济农场,以及每一个比较发达的、能够在较大的耕地面积上同农民进行认真的生产合作的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并使它们能够进行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所有这些要素以大量的、生产成本比农民的成本低的商品在市场上出现,肯定会激起和加速个体农户更多地转向现代化农业生产,从而转向同合作社进行合作。近几年来,这种趋势已经让人相当强烈地感觉到了。”^①

273

可见,社会主义生产成分与合作化是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迅速提高整个农业生产的基本因素。正如卡德尔所强调指出的,土地社会化的过程也将在这一发展的范围内展开。这一过程有两种实现的方式:“第一,扩大社会主义成分的面积,这将成为伴随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合作化发展而经常发生的现象;第二,为了建立现代化的生产过程而逐步地把私有土地联合起来,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私有土地将在技术和经济的意义上社会化,而土地所有权将日益直接地表现为货币地租。社会将对这种地租进行愈益有力的监督,根据自己的经济需要指导其发展,但是,要符合一定的政治关系,要符合保持和加强城乡劳动人民的政治团结的需要。”^②

这样,我国按照马克思主义精神来解决并已经解决了过渡时期中,尤其是农民在人口中占很高百分比、农业生产比较落后的国家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至今没有一条道路可以机械地搬用于我们的情况,而是应该像在社会生活的其他一切领域内一样,以特殊的方式方法来解

① E. Kardelj, *Problemi socijalističke politike na selu*, Beograd 1959, str. 139 - 140.

② E. Kardelj, *Problemi socijalističke politike na selu*, Beograd 1959, str. 168.

这条新开拓的道路在短时期内已取得了重大的成绩。”^①

274

二、理论上的进一步突破和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

50年代初,整个南斯拉夫社会处于一种改革的阵痛之中,特别是在寻求对特定的历史冲突做出理论阐述以及解决冲突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方面。在南斯拉夫的边界上,军队在炫耀武力,天天制造使我们的边防战士死于非命的挑衅,与此同时,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在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社会、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新观念开拓道路。

首先是那些艺术创作经验丰富的人士活动的领域以及从战前起就存在理论争论的领域在理论方面有了最成熟的突破。因此,克尔莱日阿1952年在卢布尔雅那举行的文学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从马克思主义对艺术现象的美学观点来看,可以说是意义重大的事件。克尔莱日阿以其天才的艺术想象力和富有洞察力的思想揭露了斯大林主义和日丹诺夫主义对艺术加以否定的那种眼光狭小的官僚习气。他不只是与官僚主义对艺术的党性的解释相反,指出了艺术作品的实质,并且按照同样的路线指出围绕为艺术而艺术的争论的真正含义。

克尔莱日阿问道,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运动的真正含义何在?“这个诡计的恶魔般的意思在于:把‘为艺术而艺术’作为‘危及革命思想发展的头等意识形态危险’革出教门的这个美学讲坛是设在绞死了拉伊克(Rajk László)的那个绞刑架下,设在坎佩西诺(Campesino)被关的那个西伯利亚集中营中的。”他写道:“日丹诺夫、列瓦伊(J. Révaj)之流是这样解释自己对为艺术而艺术所持的圣像破坏者式的

^① 由于在15年的时间内实现了这些主张,农业摆脱了落后的工艺结构和耕种方式,我国的国营农场在60年代下半期小麦的产量平均每公顷达到35公担以上,玉米为50公担,甜菜超过400公担。个体农户在同一时期小麦的产量平均达到每公顷20多公担,玉米为25公担,甜菜超过280公担。这些平均产量已是很高的水平。

疯狂反对态度的：他们把完全是无辜的和过时的，可以说已被人遗忘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概念孤立起来，似乎这种‘为艺术而艺术’是完全脱离现代人而自在地作为反革命的永动机存在着的，它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无非是想用含有毒性麻醉剂的唯心主义烟雾使社会革命失去知觉，以便居心险恶地扼杀革命。日丹诺夫、列瓦伊和维辛斯基 (A. Višinski) 是从唯物主义、斯大林的‘灵魂工程师’和辩证法行家的高度来谈论这场‘为艺术而艺术’的瘟疫的，因为他们明白，‘为艺术而艺术’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而是用公社社员的鲜血往自己的宗教的、资产阶级的调色板上添加颜料，尽管这是完全不合逻辑的。为什么维辛斯基和日丹诺夫在死去的凡·高 (V. W. van Gogh) 面前如此害怕，这一点我们不明白，正像我们不能设想卡桑诺瓦 (L. Casanova)、杜克洛 (J. Duclos) 或者克瓦纽 (G. Cogniot) 今天与毕加索 (P. Picasso) 一起会把拉伊克绞死这种不可能发生的事一样。”^①

克尔莱日阿指出，在这一斯大林主义的路线上，形成了一个由一批毫无创造才能的艺术家和宣传家组成的方阵，这些人同时变成了固执得令人讨厌的美学思想家，最后产生了一种宫廷弄臣现象——格拉西莫夫主义，与历史已经完全遗忘的 19 世纪矫扭做作的宫廷学院主义不相上下。再加上如果一个孤家寡人的预言竟然成为整个有社会倾向性的绘画和诗歌的任务，那么，鉴赏力和审美观就着实低劣了。而“低劣的鉴赏力始终是一种可靠的证据，表明某具尸体正在这样的腐败文明的楼梯下腐烂。低劣的鉴赏力，准确地说，多少世纪以来是崩溃的肯定征候，专家的鉴定从来是不骗人的。它们是确凿无疑的死斑”^②。克尔莱日阿同时还起来反对斯大林政策的霸权主义，他明白

^① Miroslav Krleža, *Govor na Kongresu književnika u Ljubliani, Eseji VI*, Zagreb 1967, str. 36-37.

^② Miroslav Krleža, *Govor na Kongresu književnika u Ljubliani, Eseji VI*, Zagreb 1967, str. 49-50.

地指出,任何自辩书都不可能是艺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从来不意味着,一个社会主义大强国的政权有权不仅使资产阶级的所有权社会化,而且把整个整个的民族和整个整个的大陆的所有权和自由权,包括生产力和土地上的财富和资料、人力及人的信念统统社会化。任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书面理论都不能为这样的政策辩解,不论把那些‘灵魂的工程师’说得多么英明,我知道他们并不是那么回事。”^①

276 就这样,克尔莱日阿以其艺术家的出色经验和天才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动荡中重新恢复了艺术的尊严。艺术的尊严不在于艺术应当成为别的某种东西的手段,更不应当成为政治的手段,艺术本身作为人类存在的最本质的形式之一有其自己的含义和价值。只有在经历了一次革命的进程和同斯大林主义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之后,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对上述问题的复杂性变得比较敏感,才愿意并有能力接受他们十五年以前不可想象的那种艺术观。自那时以来,在南斯拉夫,艺术创作活动开始日益自由地发展,在绘画和文学领域内,出现了日益广泛的艺术风格和表达形式,出现了属于当代世界艺术最高成就的作品。因此,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向艺术家提出某种“任务”的话,那就只能是一个——本身足够的,同时又是绝对的——任务:成为艺术家。而每一个艺术家将根据他自己的性格、感情以及构成每一个人的特点的其他一系列主客观因素去参与塑造人类的存在必不可少的新形象。

在哲学领域内,这个时期只是为以后同斯大林的做法进行更深入的较量准备基本的前提,斯大林把哲学和马克思主义问题贬低为七个特点,就像《圣经》上的无所作为的七年一样。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传统在南斯拉夫并不强大,年轻的干部在成长中。这一领域内的一些最重大的独特的突破(青年卢卡奇、布洛赫、科尔施等人的著作)还不为人知晓和了解,因此,人数不多的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当时所关

^① Miroslav Krleža, *Govor na Kongresu književnika u Ljubliani, Eseji VI*, Zagreb 1967, str. 48-49.

注的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斯大林主义的变种的批判,提出某些新问题,特别是同认识那些斯大林特别很少提到的特殊性范畴的重要性有关的某些新问题,独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遗产并开始提出本体论、人类学和历史学问题,而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则是一件大事。^①

这样,在哲学方面,南斯拉夫哲学家开始了一场激烈的讨论。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历史、人和人道主义,并越来越同那种把自然和历史本体论化的传统抽象的辩证法研究发生冲突。除了已经提到过的个别人以外,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还通过当时创办的《观点》杂志(*Pogledi*, 1952-1955)做出了重大的努力,这场理论争论在这家杂志上反映得最清楚。鲁·苏佩克(R. Supek)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极其重要的社会主义文化问题,他强调的恰恰是这个问题的人道主义方面。“社会主义文化的人道主义内容或者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在于消除或者逐步克服人的意识和自然的一切形式的异化,而在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以前的发展中,这一切形式的异化是受制于人对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依赖的。”^②苏佩克接着指出迄今为止的各种社会中的各种形式的异化,他得出结论说,对于迄今为止的文化遗产,需要的不是否定的态度,而是创造性的批判态度,而“取消这些形式的异化的意思

① 比较完整和篇幅较长的作品有:M. 马尔科维奇(M. Marković)的《苏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修正》(*Revizija filozofskih osnova marksizma u SSSR-u*, Beograd 1952);普·弗兰尼茨基(P. Vranicki)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问题》(*O problemu općeg, posebnog i pojedinačnog kod klasika marksizma*, Zagreb 1952);普·弗兰尼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发展》(*Misaoni razvitak Karla Marxa*, Zagreb 1953),这本书特别着重于论述广大公众几乎一无所知的马克思思想的早期发展时期。上面提到过的G. 彼得洛维奇(G. Petrović)关于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以及《苏联自十月革命至1938年的哲学》一文(*Filozofija u SSSR-u od oktobarske revolucije do 1938. god.*, “Pogledi” br. 2/1952)论述了俄国和苏联的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Marxovi i Engelsovi Rani radovi*)发表于1953年(第二版于1961年,第三版于1967年),包含自1844年初起至1846年底止的主要理论文章(其中包括众所周知的《经济学哲学手稿》[*Ekonomsko-filozofske manuskripte*]在内)。

② Rudi Supei, *Materijalni, socijalni i personalni osnovi socijalističke kulture*, “Pogledi” br. 4/1953, str. 238.

278

是指通过文化活动,也即通过人的意识和人的感受性的社会形成来改造社会关系,来积极地培养和创造另外的需要”。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这一革命的必然性已经成为进步人类的意识的组成部分——在目前发展阶段,取决于人道主义内容,即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里个人的具体解放和丰富发展”^①。

哲学家们提出明显的人道主义问题,以马克思的异化观念为理论基础,这在当时就带来了某种不协调,然而,这种不协调对于当代复杂的历史行动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在那几年,政治领域面临我国发展中的一些显然困难和极其重要的问题。但是,政治领域同样也不习惯于这些调子,因此做出了不安的反应,宣布这一切努力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因此,上述倾向的南斯拉夫哲学家本身就带有抽象人道主义的“厄运”,似乎哲学讨论本身不包含最高水平的思想和理论的抽象,似乎“具体的人道主义”即使没有特别明确的理论的,从而也是抽象的前提,也是可能的。

279

当我们总结 50 年代初的所有这些理论上的成果时,我们看到,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和观点的变化在许多方面是彻底的。然而,社会结构的变化却不是以同样的速度进行的。尽管关于人民委员会的新法令扩大了地方机关的自治权,尽管强调司法机关工作的合法性和独立性,尽管 1952 年通过了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法,等等,工人自治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很弱的,而国家社会主义的权力仍然十分强大,不仅在经济关系中是如此。然而,不应忘记,这些年是南斯拉夫战后发展中最困难的几年。“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实行全面的经济封锁(!),我们同西方国家缺乏牢固的经济联系,而且西方国家在这一时期还利用了我们的处境,接着是天灾(旱灾)使生产停滞了好几年。此外,50 年代初国家处于半动员状态中,准备抵抗斯大林霸权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只有靠人民做出巨大的牺牲,向各阶层的居民施加强大

^① Rudi Supei, *Materijalni, socijalni i personalni osnovi socijalističke kulture*, “Pogledi” br. 4/1953, str. 244.

的压力,让他们努力工作以及靠加强国家的职能,才能度过这样的局面。

与此同时,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思考的一个基本想法是实现与斯大林主义相反的进程——自治进程。而自治进程本身又带来了民主化进程,但在上述情况下,这两个进程都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困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当我们考虑到以后的努力和进程时)都没有能阻止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去实现马克思的主要理想——克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异化、国家的消亡和加强自治。在这样的形势下,党和国家最著名的领导成员之一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Đilas)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构思我国社会进一步发展和民主化的途径。吉拉斯的出发点不是对国家、雇佣关系以及对作为克服经济和政治的依赖关系的历史性进程的自治问题做深刻的分析,他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基本上归结为这样一种看法: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在于取消一党的垄断和建立多党制。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的这样一种看法忽视了南斯拉夫的发展的一系列特点,机械地照搬发达的资产阶级世界的某些经验。^①

与对我国自身的社会主义内部发展、对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官僚主义等等进行分析相联系,研究理论的兴趣也扩大到对全世界当前的发展和各种关系的探讨,同时很快就发现了斯大林主义在这些问题上落后于形势的具体发展达几十年之久。再不能仅仅以40年前

280

^① 吉拉斯的主张在南共联盟中央1954年1月举行的非常全体会议上遭到谴责,同时他丧失了共产主义者联盟中的领导职务。稍后,他自己退出了共产主义者联盟。鉴于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新近的发展中也出现了上述主张,最后一章对此还将比较详细地论及。吉拉斯后来在《新阶级》(*La nouvelle classe*, Paris 1957)和《不完善的社会》(*Die unvollkommene Gesellschaft*, Wien-München-Zürich 1969)等书中提出的众所周知的关于“作为阶级的官僚”的论点中,关于需要克服共产主义,把共产主义基本上等同于斯大林主义的论点中,更加详尽地论述了自己的主张,尽管我并不同意吉拉斯上述解决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特殊发展的主张,我认为,后来对吉拉斯采取的行动并不符合我们自己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意图。考虑到最新的一些现象以及对某些公开的政治活动做出反应的方式(司法机关进行干预),我认为,我们的某些法律条文已经过时,是同我们的社会关系以及我们的社会意识的变化水平相违背的。

的理论观点来看待资本主义了,而应该解释为什么恰恰在最发达的国家中不存在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因。情况表明,资本主义在这几十年间未能解决某些最重大的和最关键的内部问题,首先是危机、战争和某些已成为现代生活不可缺少的经济部门的扩大再生产问题。但是情况也表明,资本主义找到了某些解决办法,这些解决办法最终仍然意味着对私人资本的否定,尽管整个过程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发展。在发挥这种认识方面,米·波波维奇(M. Popović)的分析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他在一篇文章中得出结论说:“在大危机中,资本主义已到了这样的地步,它本身,即作为一种独立自主的社会力量的资本本身,再也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了(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就连在危机过程中吞噬了许多小资本的最大垄断组织在这方面也无能为力。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到这种程度,社会化的生产达到这种程度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规律,首先是作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规律的平均利润规律,再也不能推动社会,不能进行整个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了。然而,社会不能垮台。纵然做出种种牺牲,它也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它也确实找到了解决的办法,这就是通过前面列举过的措施,在全国范围内使经济生活进一步社会化。客观发展必然要求全国性的社会化,以便使社会能够继续进行生产和生存下去,并且这一点必须在适当的程度上做到。因此,国家资本主义首先是按照经济生活全国性的社会化(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研究一个民族及其民族经济生活的话,则是经济生活的无所不包的社会化)的方向发展起来的,而且在日益发展和加强。而如果不取消私人资本,不取消资本的私人所有制,则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①

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理论上的探讨特别反

^① Milentije Popović, *Što državni kapitalizam znači u društvenom razvitku*, “Naša stvarnost” br. 2/1953, str. 6-7. 还可以参见 Milentije Popović, *Beleške o nekim problemima savremene socijalističke misli*, “Socijalizam” br. 3, 4/1959。

映在所有这些思想动态的综合性文件——1958年4月举行的南共联盟七大通过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中。纲领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已过分狭窄时，才承担起经济职能的。国家机器这样也就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基础，从而大大加强了它的社会作用。资产阶级国家和国家机器由于上述原因而竭力凌驾于社会之上，不仅力图抵制工人阶级的独立的社会作用，并且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的条件下限制私人资本的作用。^①

由于这一切是在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些国家里，统治势力同不发达国家相比已长期享有特权地位）发展的，这些国家由于长期积累了超额利润，因此大大发展了生产力，并在世界上享有优越地位。“根据以上各种原因，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在经济和政治上有能力在较大的程度上，满足工人阶级某些阶层的物质要求，甚至民主要求，同时也就影响着他们的政治觉悟。这种趋势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对本国资产阶级和国家资本主义官僚分子采取机会主义态度的基础，而且也是他们有时支持国家上层分子的帝国主义政策——霸权政策的基础。因此，发达国家的高度物质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落后国家的贫困和附属地位的直接结果；而世界大部分地区上的压迫、强暴和缺乏民主权利又成为少数发达国家资产阶级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先决条件和基础。”^②

282

① 这种发展的一个后果就是国家官僚大为发展，这种官僚就阶级力量对比的关系而言可以起到不同的作用。“国家作用的加强也产生了官僚分子的经济政治力量，这种力量在加强并有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政治因素的倾向。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为其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影响和地位的斗争的均势愈大，官僚分子的职能也就在努力加强和保留垄断资本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社会特权的同时更为独立。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思想就是建立在这种倾向的基础上，它们力图把国家描绘为社会经济关系中超阶级的民族调解者。资产阶级的力量愈大，官僚分子就愈为明目张胆地为资产阶级服务，从而推行其反动政策。”（*Program SKJ*, Beograd 1958, str. 208. [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392—393页。——译者注]）

② *Program SKJ*, str. 210 - 211. (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395页。——译者注)

纲领在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中强烈的国家主义倾向的同时,强调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没有纯粹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仍然存在强烈的私人资本和垄断资本的因素。纲领同时指出,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某种特殊的独立的形态,而是一种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由于垄断资本主义在社会和经济方面不能解决现代社会问题而产生的倾向。“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资本主义关系的特殊形式可以是资本主义保全自己的最后努力,也可以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这首先取决于工人阶级的力量及其自觉的政治行动,也即取决于工人阶级为政权斗争的结果。”^①

东方集团的批评家们正是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国家主义观念的辩护士,他们尤其大肆攻击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消亡的观点(我们已经看到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因素之一),他们还攻击我们,说我们把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神秘化,赋予它超阶级的性质。

283 在第一个问题上,这一切表明,他们在理论上根本弄不清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是指什么,它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有何不同,因而赞成那种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必然产生人的异化,而且也产生像个人崇拜之类的畸形现象;而在第二个问题上,他们也表现出缺乏现实感和不正确。纲领中没有一个地方断言那种要调和阶级矛盾的超阶级性。相反地,纲领现实地指出:“工人阶级不能幻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每个经济职能的国家化同时也就是经济职能的社会主义社会化。只要资产阶级还是国家政权的决定性力量,它就力图用经济职能的国家化达到其保持和加强资本主义特权和政治地位的目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自动过渡到社会主义和真正的生产资料社会化,也就是说,不可能有那种将生产资料服务于全体劳动人民和每一个劳动人民的社会化。只有工人阶级自觉的政治行动、工人阶级争取政权中的领导作用的斗争,以及它利用这种领导作用来真正改

^① *Program SKJ*, str. 212. (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397页。——译者注)

变社会关系的准备和能力,才能实现这一过渡。”^①

至于谈到社会主义本身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实质的理解,谈到社会主义制度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性质,以及国家、政党和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我们还想强调一下国家和政党的关系问题以及一般对待科学艺术的创作和过程的态度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也同斯大林主义的观点断然决裂,这些观点在第三国际第二时期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根深蒂固,而且到今天仍然在许多运动和国家中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

社会主义关系的开始产生和实际实现,是对官僚主义国家主义关系的否定,它使人认识到,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无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或者社会主义制度下都必然产生官僚主义。只要社会存在等级制度,只要还存在权力、存在一部分人从属于另一部分人的问题,那么,官僚主义作为一种倾向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们已经提出的种种看法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具有明确的认识,就不致使官僚主义发展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同时可以进行具体斗争,防止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滋长。而只有在发展劳动人民的平等和使国家职能的统治消亡的基础上才能达到这一点。

284

纲领说:“建立在各种形式的国家所有制和国家机构的管理权基础上的国家集中管理生产资料的形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而在一定范围内,它们在今天以至将来也起同样的积极作用。这特别适用于那些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里,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等因素特殊的相互交织在一定时期内是必需的,进步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的这种国家管理经济生活的形式是需要的,它们一直要保持到基本的落后范围减少,生产者自己和劳动人民管理社会生产资料的社会集中机构和分散的民主机构固定下来的时候为止。”

^① *Program SKJ*, str. 212. (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397页。——译者注)

在行使经济职能的同时,国家具有一种使其经济丧失内部动力的倾向,以便强调国家本身的作用,并使之成为社会上不可缺少的东西。当这些倾向强烈表现出来的时候,国家就可能变成为使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和阻挠发展的因素,变成为阻碍组成新社会结构以保证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因素。

我国的经验,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都表明,仅仅通过国家机器管理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会导致管理的日益集中、国家和党的机构日益紧密结合,导致国家和党的机构的加强,和使之成为一个超社会的独立力量的倾向。

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着过渡时期的特殊现象,即社会主义关系发展中的官僚主义和官僚国家主义倾向。这些现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机构中上述倾向的直接产物,它使这些机构不为社会服务,而成为社会的主子。哪里的社会主义经济前提比较落后和薄弱,哪里的工人阶级真正社会作用和影响比较小,上述现象也就更加强烈。

官僚主义和官僚国家主义的倾向是旧社会关系的最后反映,它们企图改变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这首先指的是:当生产力和生产者已不能再继续忍受这种或那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和管理方法的时候,它们却力图保持、扩大或恢复这种方法。

官僚主义的危险在于它象疾病一样削弱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机体,从而动员和加强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倾向。官僚主义首先不可避免地要割断主导政治力量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因此使一切内部社会矛盾尖锐化。”^①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个根本问题上的主张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制定的历史性路线的。在这一发展中,国家必须越来越丧失自己的政治性质,变成行使某些共同的社会职能的社会经济组织的形式。为了实现这一改变,为了克服各种形式

^① *Program SKJ*, str. 223 - 224. (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07—409 页。——译者注)

的经济异化和政治异化,为了在从基层到最高层实行自治的原则基础上来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将需要有哪些进程,这多半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就目前而论,纲领只能原则性地指出:“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是,而且必须是特殊形式的国家,即日益消亡的国家。它的社会作用和它的组织必须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过程将有可能不依国家作用的具体体现者的主观愿望为转移,而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加强和社会主义关系的确立而演变。”

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发展民主和社会自治,是一种能够而且必须逐渐地,即通过演进来解决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矛盾的有机形式。”^①

286

关于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纲领规定了现阶段我国的革命发展,指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意图。这就是说,纲领指出,我们的经济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有计划地指导经济发展和经济的商品性质的基础之上并在这一基础上发展的。然而,即便在当时,也已经放弃了那种妨碍个人和集体增加生产的主动性和利害感的计划观念,并要求计划指导可以并必须得到实践的确认和修正,反之又要使社会主义实践的体现者的活动具有尽可能可靠的前景。“无论什么永恒的法则也不能确定社会主义运动的这两种因素之间的具体数量关系。这种关系应当由社会主义的人以自己的实践、思想斗争和社会批评来确定,同时以客观可能性、自己的感觉和他们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觉悟作为行动指南。”^②

① *Program SKJ*, str. 297. (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482页。——译者注)。在这个意义上,纲领比较清楚地区分了公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的概念:“生产资料公有化形式可以分为从间接的公有制或国家所有制起(这种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建设第一阶段的特点),到直接的和真正的公有制止(这种公有制更直接地交由被解放的和联合起来的劳动人民去管理)。生产资料公有制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在物质上、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加强而发展。因此,这种情况一直要到社会占有过程通过或依靠社会力量(国家或政权的形式)完成的时候为止,在每一种公有制的形式中都存在着或多或少国家所有制残余。”(*Program SKJ*, str. 308. [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492页。——译者注])

② *Program SKJ*, str. 329. (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516页。——译者注)

纲领原则地提出了按劳分配原则,而不是按照某个中心的行政规定实行分配的原则。重点越来越多地放在自治者身上,放在他积极参与管理企业,而且管理更加广泛的社会共同体上,放在他自由地支配在完成对共同体的义务后由他支配的那部分剩余劳动上。^①

287

所有这些认识,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机器官僚主义化的危险性的认识,同样也必须运用到主要政党的问题上,因为党很容易成为国家机器的附属物和一种强烈的官僚主义因素。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党逐渐失去传统的政党的特征,因为它“并不把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的特权从人民群众手中转入政治上层人物的手中”(卡德尔语),而它的任务正是在于培养劳动人民尽量顺利地掌握那些以前由国家垄断的职能。真正实现和加深社会主义民主,并不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由最有觉悟的分子组成的组织存在的必要性,而是使这种组织的争取新的社会主义内容,反对一切在社会主义发展初期存在和

^① 纲领说:“在分配制度的这些关系的范围以内,劳动者具有,而且应当具有更大的可能,以不断地、直接地、实际地通过自己在工作岗位上的劳动和积极参加企业、公社和整个社会的管理机构,来解决自己的个人地位、自己的收入和社会产品的总分配的问题,同时认识并自觉地了解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解放了的工人是个人物质利益、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独立的创造者和管理者。他不再透过生产以外的某种力量所给他决定的工资的三棱镜来看待社会了。他的收入首先取决于整个经济组织的成就和个人努力。因此他日益把个人收入看作推动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发展及满足其集体需要的职能”(Program SKJ, str. 334. [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521页。——译者注])。而对于工人委员会的性质,则做了如下的表述:“工人委员会既不是私有者的代表,也不是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者。工人委员会为社会的利益管理生产资料,而它们在物质和政治道德上的愿望又鼓舞着它们进行工作,正因为这样,工人委员会是反对官僚主义和反对个人利己主义的最合适的社会经济工具。”(Program SKJ, str. 347. [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532页。——译者注])

起作用的反社会主义倾向的斗争中,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①

苏联关于党政合一以及把党变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万能裁决者的论点被坚决抛弃了。问题不在于革命以后最有觉悟的力量(党)将成为领导力量,而在于如何进行领导。而在这方面,我们的实际和理论的全部经验表明,应该把领导作用理解为党在教育 and 培养劳动人民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和机构来管理自己的生活方面发挥作用,而不是理解为通过国家和党的领导来官僚主义地包办代替。

纲领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一重要和本质的问题做了如下的明确的阐述:“因此,共产党人同人们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统治的政党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先生同学生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必须日益成为平等之间的关系。在实现他们集体利益中最称职和最有能力的人们因而得到最大信任。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领导力量开展自己的活动必须通过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进行发展社会主义的斗争,而首先是通过劳动群众本身的生活、劳动和社会活动。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努力为社会主义发展而斗争,在这一斗争中越来越少通过自己的权力,而更多地通过劳动人民即社会生产资料生产者的直接权力,通过

^① 铁托早在1950年就特别强调指出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同对这个问题的更先进的社会主义解决办法之间的差别:“此外,斯大林是怎样提出党与国家的关系的问题的呢?在他的著作中,他从未确定党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他把党的作用降低到管理依然打上阶级社会烙印的国家机器的位置。因此,苏联的党越来越官僚主义化,日益成为官僚主义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部分,成为它的同一体,简直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就是丝毫不足为奇的了。因此苏联的党失去了和人民的联系,失去了与它应当对之关心的那些事物的联系。党的职责是成为全部政治、文化和经济行动的组织和最积极的参预者,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对之进行监督,用其自身的榜样来提高群众的创造性热情。把党的作用降低成为执行种种措施的官僚主义机器的一个部分,成为强制性的国家机器的一个部分——这一切全是违背列宁关于党在第一过渡时期的作用的学说,党在此时应当是领导者、教育者,而不是执行者。这种陈套的观点也曾开始在我国生根,但是我们采取了必要措施,并且将在我国对于这一类的东西进行严密的警戒。”(《O radničkom upravljanju privrednim preduzećima》, sv. V, str. 223 - 224 [参见《南斯拉夫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96页。——译者注])关于这些问题和类似的问题,另请参见 V. Vlahović, *Pojam i suština proleterskog internacionalizma*, “Socijalizam” br. 1/1958; *Program SKJ i “zaoštavanje” ideološke borbe*, “Socijalizam” br. 2/1958。

289 各种社会自治机关来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同时,共产党人必须为调动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切因素而斗争,使这种活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并教育和培养广大群众参加社会主义管理。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领导力量进行这样的活动可以保证自己不官僚主义化,同时可以不断地提高劳动人民的社会觉悟,逐渐地减少和消除政权和‘被统治者’之间、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国家和公民之间的矛盾。”^①

只有探讨了这一切过程,才能不仅对社会主义和现代世界的重大问题,不仅对具有不同社会经济结构的国家的关系问题做出答复,在这方面,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首先采取了坚定的立场,认为有可能通过奉行积极共处政策来避免全面的毁灭性的战争冲突。这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以前从未以这样的形式出现过的世界形势进行分析的结果。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殖民地国家的解放和制订建设落后的国家的长期宏大规划,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最后,科学技术和核武器的突飞猛进(核武器使得任何一方都不能寄希望于幸免这样一场灾难),简言之,这一切就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得出以下结论的依据:积极的国际合作和争取和平的斗争是摆脱这种局面的唯一正常、人道和符合人的尊严的出路。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有一种不可战胜的看法和信念,即认为从原子的尘埃中不再可能建设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290 “积极共处政策是生产力飞速发展的一种表现和一种需要。这种发展促使全世界事实上的联系,和各国经济紧密的相互依赖,考虑到由于使用核武器给人类带来不可避免的灾难,这种发展使作为解决各国间一切问题和争端的工具的战争毫无意义。这种政策体现出当代世界对广泛的经济合作,全面的文化、科学等合作的客观需要。在选择战争或和平面前,积极共处政策是唯一现实的和平政策。积极共处政策符合于目前整个世界经济的需要。如果没有在世界普遍经济繁

^① *Program SKJ*, str. 302. (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486—487页。——译者注)

荣道路上进行平等的、日益广泛的、正常的自由的世界经济合作,那么世界经济的稳定和进一步发展便是不可想象的。社会主义目的之一应该是世界经济的统一。但是这种统一将比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分工形式优越,这种统一将建立在世界各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在各民族经济之间内容全新的、比资本主义制度更紧密的关系上。

这样理解的积极共处政策不仅通过国际合作和巩固和平服务于消除战争危险,而且同时也为社会主义的飞速发展创造了条件。积极共处政策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必然会制止和削弱那些阻碍前进,同时并挑起新的世界大战的潜在危险的力量;这种政策还会使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取得更广泛的基础,削弱实行霸权政策的可能性,摧毁滋长官僚主义的基础并使社会主义国家得以更迅速和健全地发展。因此,这种政策不但使现有的社会形式无法长期保存下去,而且将促使其更迅速地改变。”^①

需要特别指出,这一立场涉及调整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避免一场全面的灾难问题,鉴于今天有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破坏的可能性,发生这样一场灾难是一种现实的危险性。但是这一立场绝不触及一切被压迫的、未获得解放的人民使用他们认为最适宜的一切手段去争取自身的解放的权利。每一国人民都有权进行革命,他们求解放的问题是历史赋予的权利,每一国人民或者每一个阶级迄今每当认为革命是他们争取自由的唯一前提的时候总是使用这一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任何一国人民或任何一个阶级享有这一权利。

纲领在论述理论和文化问题的时候指出,有两个社会因素至今阻碍了社会主义理论思想的发展。首先是官僚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现象,这种现象必然导致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一堆静止的教条和抽象的真理;影响这一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① *Program SKJ*, str. 264 - 265. (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451—452页。——译者注)

的影响,这种影响导致特殊形式的修正主义,我们曾有机会在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做康德主义的解释的倾向中看到这一点。^①

在党、科学和艺术的关系方面,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在自己的正式纲领中特别抛弃了一切官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观点,第一次在一个党的共产主义纲领中把事情摆在正确的位置上。实质上,科学、哲学和艺术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限制它们的自由发展,因为这三者是十分复杂的领域,它们只有在自身的发展中,当然也要面对社会实践,才能得到真正的校正和获得真正的标准。无论是个人,还是政治因素——它们实际上都有自己的特殊的活动范围——都不能成为这种发展的裁决者,任何死板的公式和规章都不能成为在这些领域进行必要的创作活动的酵酶。

因此,可以满怀马克思主义的责任感和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最伟大的代表人物的精神得出结论:“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认为,科学思想愈是大胆公正地追寻真理,它的发展就愈符合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真正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绝不想在这方面有任何的垄断,而是努力通过更深入地认识社会客观现实的办法继续不断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无论是整个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或是它的个别机构都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或其他某些社会科学方面的公断人。共产党人根据社会利益、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最先进部分的社会觉悟程度和社会的物质可能性,利用或运用科学的成果。科学自己就是判断者,而在社会科学方面,检验客观真理的决定性的标准只能看社会科学的成果是否符合实际,而这一点在社会和科学的实践中将得到最后的检验。”^②“根据社会的相互制约性和科学艺术在社会中的重大作用,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时既反对对马克

^① 关于这些问题的论述,参见 *Program SKJ*, str. 238 - 241。(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23—426 页。——译者注)

^② *Program SKJ*, str. 399。(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584 页。——译者注)

思主义关于科学艺术在社会中的作用的观点作任何实用主义的歪曲，也反对把科学艺术变成日常政治利益的手段。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时也反对这样的‘理论’，即以抽象的自由观念为名在实际上取消科学艺术创作的真正自由，使它从属于反动的政治倾向。我国彻底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要求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思想作用不要成为对科学艺术的各种流派、学派和风格进行武断裁判的作用。……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根本目的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在思想意识上应反对一切对人不够信任的现象，反对贬低人的创造力，贬低人能改变世界，使人生活得更合理、更有内容，对待一切更有人性的才能。它也应该反对以科学艺术自由为幌子而实际上要确立反动的和反社会主义的观点，或是破坏社会主义社会政治道德基础的企图。”^①

这不仅是由于认识到科学、哲学和艺术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和标准，同时也由于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思想比其他整个有关社会和生活的资产阶级观点优越。这还由于对思想、科学和艺术发展的错综复杂的性质持一种正确的、辩证的观点，而思想、科学和艺术的发展过去粉碎，将来也总是不断粉碎任何想把某些绝对的框框、教条和规章等等强加于人的企图，不论这些东西叫作神学原则、唯心主义的假设、斯大林规定的特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叫作主观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的其他任何产物。

因此，纲领本身不是以辩护的口吻，而是以强烈的批判精神结束：“为完成我们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这个目标，应该批判地对待自己和自己的工作，我们应该做教条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忠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创造精神。任何已经创造的东西对于我们都不是神圣得不可超越的、都不是

293

^① *Program SKJ*, str. 417. (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601—602页。——译者注)

不能让位给更先进、更自由、更具有人性的东西的。”^①

三、其他理论关切

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南斯拉夫的这种独特的和创造性的发展,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其他领域产生了积极影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社会和文化问题的各个领域,必须粉碎和克服斯大林主义的陈腐观念。鉴于上述问题中的某些问题从根本上说属于社会学的题目,很早以前就感到有必要克服教条主义地把整个复杂而广泛的问题缩小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几个题目的做法。此外,如果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那样,把社会学的全部问题归结为只是一般理论的、抽象的问题,那就使马克思主义不仅丧失了新的探索领域,而且无法进行对社会学研究来说也是必要的经验主义研究,无法制定特殊的有效的办法。

因此,50年代初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就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以及就对待经验主义研究的态度展开全面讨论的标志下度过的,而西方世界的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经验研究已经大大向前发展了。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哲学学科还是社会学学科?这一争论本身(后来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以类似的方式重复了这一争论)只是证明时机不成熟,证明马克思主义者在那些时期还有某种学究气,还没有能力,也不具备社会可能性来独立地解决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些重大的和决定性的问题。

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讨论十分激烈。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利用经验主义社会学的方法学来研究社会学现象,而另一些人则又认为,必须尽早采纳这一领域内一切正面的东西,消除当时存在着的巨大差距。这个问题不简单。从经验主义社会学的发展经验中

^① *Program SKJ*, str. 424. (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608页。——译者注)

就知道,它正是由于在其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中缺少一种连贯的理论观念而陷入危机的。但是,斯大林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也陷入了危机,斯大林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高度教条的,而且是庸俗的和贫乏的。斯大林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缺少甚至对一个社会和一种文化来说是攸关重要的许多问题,甚至还缺少整个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因此,上述理论讨论和努力的结果以及争论的结局基本上是,南斯拉夫社会学家确定了下面这样的方针:掌握经验主义社会学领域内的全部成果,独立地研究我国复杂的发展中的社会学现象。他们还致力于不丧失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和人的必要的和不可或缺的理论观念(首先是哲学观念),以便进行必要的理论概括,在许多部分的材料和成果中间归纳出一个整体。^①

当时,在哲学界展开了最活跃的讨论。在革命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进入了自己的成年。从批判斯大林主义越来越过渡到独立地确定自己的哲学观,以及过渡到积极参与一个革命进程,而这个革命进程对于人的创造性和文化总是必然会提供广阔的天地。

295

围绕比较复杂和深刻地评价整个哲学史,特别是黑格尔的体系和辩证法所展开的批判性努力,解决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以及作为特殊

^① 不论观点存在多大的根本性的分歧,在围绕社会学展开的这些讨论中,我们可以举出:阿·菲亚门哥(A. Fiamengo)、约·戈利查尔(J. Goričar)、R. 鲁基奇(R. Lukić)、奥·曼迪奇(O. Mandić)、纳·帕什奇(N. Pašić)、鲁·苏佩克、柳·塔迪奇(Lj. Tadić)、鲍·季赫尔(B. Zihel)以及柳·日夫科维奇(Lj. Živković)等人。在当时问世的比较重要的著作中主要有:R. Lukić, *Opšta teorija države i prava*, Beograd 1956; O. Mandić, *Od kulta lubanje do kršćanstva*, Zagreb 1954; B. Zihel, *Književnost i društvo*, Sarajevo 1958; Lj. Živković, *Nauka o društvu*, Zagreb 1958; Lj. Živković, *Društvena nadgradnja*, Zagreb 1960; R. Supek, *Ispitivanje javnog mnijenja*, Zagreb 1961; V. Korać, *Marx i savremena sociologija*, Beograd 1962; M. Đurić, *Problemi sociološkog metoda*, Beograd 1962; R. Supek, *Omladina na putu bratstva*, Zagreb 1963; R. Lukić, *Društvena svojina i samoupravljanje*, Beograd 1964; V. Milić, *Sociološki metod*, Beograd 1965; S. Milosavljević, *Sojuzot na Komunistite na Jugoslavija vo sistemot na socijalističkata demokratija*, 1965。

现象的艺术的性质和人的本质问题上的争论,得到了比较完整的反映。^①

296 这场激烈的讨论以及对斯大林原始的哲学和文化观的批判,反映在许多次哲学集会和座谈会上,并在下面这两派人中间形成了越来越尖锐的对抗,一派基本上站在旧的观念的立场上,另一派人则多少断然地不仅抛弃了斯大林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观念,而且抛弃了斯大林的精神和斯大林对哲学含义的理解方式。最激烈的争论是在布莱德(1960年11月)举行的反映论讨论会上展开的。反映论和继承下来的辩证唯物观的辩护者们在哲学界成了少数,大多数哲学家转向了新的问题以及个别哲学传统问题的新的观念。^②

尽管在上述倾向中,在对一些问题的提法上存在很大的区别,甚至在对待某些重大哲学问题上也存在很大的区别,但是还是可以指出,他们的共同倾向是:设想人是实践的存在,因此把实践范畴列为对

① 在这个领域内较重要的著作中,我要提到:Mito Hadži-Vasilev, *Odras-Izraz*, Skopje 1959; B. Bošnjak, *Logos i dijalektika*, Zagreb 1961; P.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Zagreb 1961; Lj. Tadić, *Filozofske osnove parvne teorije H. Kelsena*, Sarajevo 1962; V. Rus, *Hegelova i marksistička dijalektika o istovetnosti i razlici*, Beograd 1963; S. Stojanović, *Savremena metaetika*, Beograd 1964; M. Marković, *Dijalektička teorija značenja*, Beograd 1961(这本书和沙夫的书一起,是马克思主义书籍中探讨语言的哲学问题的两本最透彻的书)。研究逻辑问题的还有:B. 舍什奇(B. Šešić)、A. 克雷什奇(A. Krešić)、A. 斯托伊科维奇(A. Stojković)、S. 克尼亚泽瓦(S. Knjazeva)等人。在美学领域内,有下列著作:I. Focht, *Istina i biće umjetnosti*, Sarajevo 1959; I. Focht, *Mogućnost, nužnosti, slušajnost, stvarnost. Hegelovo učenje o odumiranju umjetnosti*, Sarajevo 1961; D. Grlić, *Umjetnost i filozofija*, Zagreb 1965。除他们以外,研究这些问题的还有 D. 耶雷米奇(D. Jeremić)和 M. 达姆尼亚诺维奇(M. Damjanović)。

② 主要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质和人道主义性质,即批判性质的一批人,他们稍后建立了“科尔丘拉夏令学园”(1963年),并创办了《实践》(*Praxis*, 1964年)杂志,他们集合了全国的多数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科尔丘拉夏令学园”很快就把全世界一切比较有名、比较富有创造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集合在一起,并成了就当代最重大的一些问题自由地交换意见的地方。稍后,他们在《哲学》(*Filozofija*)杂志上也比较活跃。另一批人建立了《辩证法》(*Dijalektika*, 1966年,贝尔格莱德)杂志。除上述这几个杂志外,还有其他许多研究社会问题的杂志,如《视域》(*Pregled*, 萨拉热窝)、《我们的题目》(*Naše teme*, 萨格勒布)、《社会主义》(*Socijalizam*, 贝尔格莱德)、《观点》(*Gledišta*, 贝尔格莱德)、《理论和实践》(*Teorija in praksa*, 卢布尔雅那)等。

人和历史进行解释的基础；对辩证法做出历史的解释；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来观察当代的进程以及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道主义问题。^①

上述哲学家摒弃作为了解认识过程的基础的反映论，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反映这个现象不存在，而是因为这一概念始终停留在传统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客体关系上和片面的认识论上。历史的主体，人，是有行动的，是积极的改造者，只有从世界（自然的历史的世界）不断的变化中，才能理解人本身及其认识、意识和文化的变化。因此，世界是人的世界，是变化了的自然物质和人的关系，因此，自然历史现实的变化同人及其意识和关系的变化是一个统一过程。

297

从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立场出发，产生要求进行更全面、更详细的分析和研究的其他许多问题。一旦传统的主体-客体关系的看法被克服了，那么把历史和人分为两个范围——人只能借助于自己的认识去适应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范围与人能借助于自己的认识去克服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范围——的划分也就消失了。同把自由看成是对必然性的认识的理论相反，哲学家们更多更多地是以马克思哲学观点的精神来看待这一问题的：“如果把自由看成是对天命、命运、普遍的必然性的认识和接受，那么‘自由’就不过是自愿受奴役的另一种称呼而已。自由不是对外界和内部的必然性的屈从和适应。自由的活动只能是人改变自己的世界和人自身的活动。对必然性的认识只是对自由界限的认识。自由的积极条件是对必然性界限的认识，是对人的创造可能性的阐述。自由不是对自然进行肆无忌惮的开采。自

^① 在这些著作中首先应当提到：M. Kangrga, *Etički problem u djelu Karla Marxa*, Zagreb 1963；V. Pavičević, *Uvod u etiku*, Beograd 1962；G. Petrović, *Filozofija i marksizam*, Zagreb 1965；D. Pejović, *Protiv struje*, Zagreb 1965；R. Supek, *Sociologija i socijalizam*, Zagreb 1966；P. Vranicki, *Čovjek i historija*, Sarajevo 1966；V. Sutlić, *Bit i savremenost*, Sarajevo 1967。此外，还出版了基本关于这一类问题的论文集：*Humanizam i socijalizam*, I - II, Zagreb 1963；*Čovjek danas*, Beograd 1964；*Smisao i perspektive socijalizma*, Zagreb 1965；*Marks i savremenost*, Beograd 1963, 1964。

由在于人有能力使自然人人性化,在于按人的方式参与自然的赐福。人和自然不是只需加以克服、使之屈从和加以利用的现成力量的集合体。自由的本质不在于掌握已有的,而在于创造新的,在于发展人的创造力,在于扩大和充实人性。”^①

南斯拉夫的哲学家不是简单地只是谈“青年”马克思,或者只是谈“老年”马克思,而是清楚地认识到,人的异化这个根本问题和人的解放问题是贯穿马克思的著作和马克思的历史活动的一条主线。对于他们来说,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最重要的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也就是对那些要使雇佣劳动、商品拜物教、经济和政治的异化永存的历史社会关系的批判。这样,异化就不只是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存的实质,而且同样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个根本问题。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新社会,没有要使旧的关系、雇佣劳动和**双重身份的人永存这样的任务,而是恰恰要通过对社会关系新的组织来克服当代世界的异化的一些根本形式。**

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就可以理解,哲学家们的努力的一个特点是对于在社会主义迄今的发展中产生,并且只是产生新形式的异化的那些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结构持批判态度。“斯大林主义现象作为一个国际现象清楚地表明,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官僚主义反革命起码跟资产阶级反革命一样危险。一般来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官僚主义产生于存在无产阶级对国家及其工具持非批判性信任态度的地方,产生于无产阶级不往前看而往后看,并且接受实际上应予克服的‘经过考验的’和‘可靠的’权力工具的时候。而且,当无产阶级原则上意识到官僚主义和国家机器的危险性,却又认为需要留待‘明天’去取消它们,因为它的首要任务是从事‘创造性劳动’,于是,无产阶级便错过了对旧社会的产物进行必要的、彻底的破坏这个历史性机会,而没有这种

^① G. Petrović, *Čovek i sloboda, Filozofija i marksizam*, str. 168 - 169. 无须特别强调指出,跟我们将谈到的其他问题一样,在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的其他代表人物那里,也可以发现类似的观点。

破坏就没有社会主义。”^①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哲学家们过去和现在都把实现“自由生产者联合体”(马克思语)、实现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看成是克服雇佣关系和当代社会中异化的主要形式的唯一的历史性机会。实现自治是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事,其目的不仅在于增加生产、加速生产力的发展、提高生活水平等等(这一切也是比较自由的生活前提)。自治的根本含义是造就新的历史人物和使人不再依附于个人、集团或者等级制的新的历史社会关系。“所有这些任务,工人委员会必须如此地加以解决,那就是工人委员会真正地,而不是表面地使工人-生产者产生积极参与生产、调节劳动集体中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意识,并充当工人可以在其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意识(以其基本形式)的物质和社会的基础。不实现这些基本的社会主义关系,就谈不上过渡到更高的形式,因为个人的利益与直接生产共同体的集体利益不调和的话,生产共同体的利益与整个社会不协调的话,就谈不上社会主义意识和谐地得到发展。这是这样的基本前提之一,它使‘社会不作为抽象与个人相对立’,使‘普遍利益’不作为异物与‘个人利益’或‘个别利益’格格不入,并且使人们避免陷入那些实际上把社会主义神秘化的关于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关系性质的伪科学提法。”^②考虑到这一问题,考虑到科学和技术在当代的发展,鲁·苏佩克在提出自由时间的问题时强调指出,这个问题把讨论满足人的需要提上了日程,但是不是从保持人的单纯生活的角度提出的,而是从全面发展的人的角度提出的,他们作为创造性的个人有必要在社会中表达并满足自己的一系列需要。“这些需要的分配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不能是某个超社会的权威、国家或者某种社会中坚阶层的事,而只是自由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或者公民的事。在这个前景中,工人自治或者社会自治在人的需

299

① Lj. Tadić, *Proletarijat i birokratija, Humanizam i socijalizam*, II, str. 47.

② R. Supek, *Radničko samoupravljanje i humanizacija rada i potrošnje, Humanizam i socijalizam*, II, str. 156.

要获得健康或正常的满足方面负有一系列的特殊工作任务。”^①

因此,哲学家们并没有忽略事情的“技术”方面,没有忽略发展生产力的巨大需要和使我们的社会共同体达到发达程度的必要性,但是他们同时也始终强调必须发展那些使社会主义从本质上区别于迄今的阶级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的其他方面。“需要同时发展生产力和创造这样的社会条件,在这些条件下,追求金钱、权力、成功的欲望,将被发扬人们的创造激情,全面地培养和充实生活的内容,逐步地发扬个人在经济、科学、艺术和政治中的主动精神,培养建立在相互信任、宽容、友好基础上的稳定和谐的相互关系等所抵销。”^②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所有这些活跃的和创造性的进程的基础上,本书作者得以与教条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垄断主义野心相对抗,提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存在各种变形的必要性的论点。本人曾经指出,哲学的看法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历史的看法,因此它基本上取决于整个历史实践所达到的水平,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人的历史实践的多方面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对这一实践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应采取多种态度”^③。在复杂的历史形势下,人的创造性不可能只以一种方式存在,而这里所说的人的创造性从来就不囿于规定的范围。因此,必须断然拒绝存在一种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或者更确切地说,存在这种哲学的统一的结构观点,并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各种变形的必然性,其中每一个变形都不会有同样的历史共鸣、价值和作用。“每一种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亦然——基本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它在多大的程度上是自己时代的思想精髓,也就是说,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和预言了自己时代的基本问题、自己时代的理论和实

① R. Supek, *Radničko samoupravljanje i humanizacija rada i potrošnje, Humanizam i socijalizam*, II, str. 170.

② M. Marković, *Marksistički humanizam i problem vrednosti, Humanizam i socijalizam*, I, str. 130.

③ P. Vranicki, *Marksističke teme*, Zagreb 1973, str. 101.

践所关注的事和自己时代的前景。”^①

我不再列举从这一哲学活动中可以列举的许多情况,只是强调指出一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哲学思想以往从未达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当代发展时期那样的历史性的活跃程度和与社会的密切相关程度。

所有这些变化和理论方面的创见向经济理论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南斯拉夫的经济学家从关于价值规律及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的讨论,经过计划、市场、收入制度、扩大再生产等问题,为吸收新的理论立场进行了一定的努力。我国经济的整个发展,包括中央机关在支配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上几乎完全享有垄断,它们在扩大再生产政策上有主要发言权,还有确定价格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整个经济地区或者工业部门处于从属的地位),等等,越来越同业已宣告的从物质和社会上进一步加强工人自治,使工人阶级摆脱国家行政桎梏的愿望发生冲突,这种行政桎梏使工人自治几乎完全丧失了物质基础,从而也丧失了经济和社会上的有效性。

在这些讨论中,一部分人主张加速使经济规律发挥作用,加速实行权力下放,因而也加速削弱经济实力中心,使市场更有力地发挥作用;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对如此激进、迅速地采取这样一些措施比较担心。即便对于理论来说,困难也是不小的,对于具体实践来说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在具体的实践中,每一个缺点很快会变成政治问题。

南斯拉夫的经济学家在这一时期基本上抛弃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不起作用的论点,关于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唯一的规律的论点,关于市场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是未经测量的范畴的论点,以及关于扩大再生产,价格和收入的确定由国家、由中央垄断的论点。现在的问题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计划经济与市场的联系和协调问题,是中央集权做出的决定和非中央集权做出的决定的协调问题,是在自己的经济决策中应当享有较大独立性的社会整体的各个部分

^① P. Vranicki, *Marksističke teme*, Zagreb 1973, str. 103.

302

与整个社会的协调问题；另外还涉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首先对经济问题、各个经济主体的利益以及满足这种利益的途径提供高质量的、客观的和充分的情报。这一切都是紧迫的问题，因为迄今为止占主导地位的对经济实行行政管理的制度，不仅在经济发展领域内，而且在社会关系和民族关系上造成严重的后果。^①

这些困难和矛盾以及从还不发达的自治结构中产生的重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在1964年12月举行的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占了主导地位。铁托在自己的报告中明确地强调指出，如果在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形成方面继续保留国家的主导地位，自治就势必会发生危机。“我们今天所存在的社会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因素这样地干预社会生产，特别是掌握企业的几乎全部资金以及随心所欲地加以分配，这是同生产进一步顺利发展不相容的。或者，更糟糕的是，把这些资金用于各种非生产用途，或者用于非营利的和非紧迫的投资。只有劳动集体掌握必要的物质手段——按照宪法，他们有这样的权利——，扩大再生产进一步的发展才有可能顺利。我认为，那些认为积累问题只涉及政治因素，顽固地想保持迄今为止的制度——中央集权的积

① 在这一时期的经济论文中，我们可以指出下列著述：R. Lang, *Međunarodna saradnja i ekonomski razvoj*, Zagreb 1955；A. Dragičević, *Potreban rad i višak rada kao kategorije klasnog društva i njihovo odumiranje u socijalizmu*, Zagreb 1957；D. Čalić, *Izgradnja industrije u Jugoslaviji*, Zagreb 1957；Z. Pjanić, *Problem stanovništva u ekonomskoj teoriji*, Beograd 1957；S. Dabčević-Kučar, *Kretanje najamnine u savremenim kapitalističkim zemljama*, Beograd 1961；B. Horvat, *Ekonomska teorija planske privrede*, Beograd 1961；J. Sirotković, *Problemi privrednog planiranja u Jugoslaviji*, Zagreb 1961；F. Černe, *Uvod v analizo trga in cen*, Maribor 1961；A. Bajt, *Raspodjela nacionalnog dohotka i sistem ličnih dohodaka u našoj privredi*, Beograd 1962；*Uzroci i karakteristike privrednih kretanja u 1961, 1962 godini*, *Žuta knjiga*, “*Ekonomist*” br. 1, 1963 (Beograd)；*O nekim problemima privrednog sistema*, *Bijela knjiga*, “*Ekonomski pregled*” br. 3-5/1963, Zagreb；D. Gorupić, *Izbor radova*, Zagreb 1963；V. Stipetić, *Jugoslavensko tržište poljoprivrednih proizvoda*, Beograd 1964；Milentije Popović, *Društveno-ekonomski sistem*, Beograd 1964；J. Stanovnik, *Zemlje u razvoju u svjetskoj privredi*, Zagreb 1965；M. Korać, *Problemi teorije i prakse socijalističke robne proizvodnje u Jugoslaviji* (u suradnji sa S. Dabčević-Kučar, M. Koraćem, M. Samardžijom, J. Sirotkovićem, R. Štajnerom, T. Vlaškalićem), Zagreb, 1965。

累制度的同志们是十分错误的。这些同志对劳动集体参与决定分配和积累的资金的使用的权利提出异议。首先,这本来就是他们的权利。”^①

同一些观点在卡德尔的报告中也有反映。卡德尔的报告批判地提到经济到当时为止的外延的发展,提到还受到旧的行政管理经济制度的许多残余因素牵制的自治制度,提到对投资基金管理的国家垄断主义性质,提到在分配这些巨额物质手段时主观主义尺度和政治愿望的强大影响。卡德尔同样主张对这些基金和扩大再生产实行权力下放,也即主张从经济上加强工人自治,削弱国家垄断和官僚。他同时告诫说,不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代经济可以没有一定的中央机关和计划,只不过不再是国家政治型的计划罢了。“因此,完全从权力下放的角度来观察扩大再生产制度的改革是十分错误的。这次改革的出发点必须是实行一定的权力下放,这一点是对的;然而,实行一种社会自治基础上和范围内的民主的集中制新形式也必须成为这次改革的组成部分。正是对事情采取这样的态度,才使我们的经济制度不像某些短见的批评自治的人一再重申的那样,成为19世纪经济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变种,而是成为一种民主的计划制度的出发点,对于这种制度来说,指导因素是从事劳动的劳动者的基本的利益,而不是非经济因素的主观意志。”^②

关于稍后在民族问题上出现的紧张局面,需要指出的是,这次代表大会看到了这些问题。铁托在自己的报告中强调,“民族主义的畸形现象的出现还由于存在国家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妨碍各

^① J. B. Tito, *Uloga Saveza komunista u daljoj izgradnji socijalističkih društvenih odnosa i akutelni problemi u međunarodnom radničkom pokretu i borbi za mir i socijalizam u svijetu*, Osmi kongres SKJ, Beograd 1964, str. 26. 还可以参见: J. B. Tito, *SKJ u novoj etapi razvoja socijalističkog samoupravljanja*, Novi Sad 1976。

^② E. Kardelj, *Društveno-ekonomski zadaci privrednog razvoja u narednom periodu*, Osmi kongres SKJ, Beograd 1964, str. 81, 92-97. 关于当时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迫切问题,也可以参见 V. Bakarić, *Aktuelne teme*, Zagreb 1965。

民族间一体化的进程。这种倾向一方面导致官僚主义中央集权倾向,导致单一民族政府主义,忽视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社会经济职能,另一方面导致关闭在‘自己世界内’的倾向。这两种倾向实质上都是民族主义的,是对经济和社会一体化的正常进程同样有害的。

受这样的畸形现象之害最烈的是劳动集体、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因为他们要实行的是符合他们利益的生产的社会主义一体化,而不是民族主义的解体化或者单一民族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①。

维·弗拉霍维奇(V. Vlahović)在自己的报告中同样强调指出,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时期内讨论了我国发展中的民族关系的各个方面。“这些讨论的一个积极方面表现在劳动人民强烈地要求共产主义者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来进一步加强我国各族人民的友爱和团结。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无助于更加充分地认识民族关系的观点和活动。甚至可以说,有些观点倒退了,陷入了民族主义以及沙文主义的泥淖。

出现了一种断言,说什么‘民族应当尽快消亡’,民族问题是‘资产阶级的偏见’,这些断言实质上反映了单一民族政府主义或者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导致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现象。这些理论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后果是在有些地方可以听到的一个结论:‘不幸的是,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大家庭’。

在这样一些看法中,可以看出在国家主义、官僚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的联系。官僚主义者看不到在比较复杂的关系中存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更加丰富的形式。官僚主义者有一种感觉,似乎多民族大家庭以及自治形式的多样化使生活复杂化。官僚主义者喜欢简单、单调。

事实上,社会主义充分肯定民族,开创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基础上

^① J. B. Tito, *Uloga Saveza komunista u daljoj izgradnji socijalističkih društvenih odnosa i akutelni problemi u međunarodnom radničkom pokretu i borbi za mir i socijalizam u svijetu*, Osmi kongres SKJ, Beograd 1964, str. 33.

肯定各族人民的进程,同时又推动克服民族的局限性和狭隘性,更快和更充分地使各个民族投身于世界进步的社会发展之中。从而各个民族也就成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更有活力的细胞。

人为地硬去推行一种与别的进程相脱离的进程,只会导致消极的民族主义过火行动,忽视真正的民族利益,出现假的先锋主义,和不考虑民族特殊性的所谓的国际主义。”^①

对于在我国革命的第三阶段中积聚的社会矛盾,我们做了上述种种探讨,实际上,我们已经写到这一阶段的末尾,已经临近下一阶段的起点。

^① V. Vlahović, *Idejna kretanja na sadašnjem stepenu našeg razvoja i dalji zadaci Saveza komunista Jugoslavije*, Osmi kongres SKJ, Beograd 1964, str. 169 - 170. 另请参见同一报告中谈科学、文化和艺术问题的部分以及《革命和创作活动》一书(*Revolucija i stvaralaštvo*, Beograd 1973)。

第五章 革命的第四阶段 (1965—)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所有这些艰难的突破,指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是重要的几个论点。第一,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在不发达国家中,是一个漫长而连绵不断的进程,有一系列不能先验地确定的阶段。第二,在进行了革命的武装阶段之后——如果存在这样一个阶段的话——还存在许多问题,有必要进行要求不仅在社会经济关系中而且在政治领域中发生变化的结构性的和更深刻的革命变革。第三,革命的这些阶段不是自发地产生于经济基础的发展,这些进程不存在社会力量只需对之适应的内在规律性,而是人本身,作为历史进程的重要体现者和创造者,在解决随着社会各领域的发展而产生的内部矛盾的同时,也创造这些规律性。

南斯拉夫社会的革命力量根据马克思主义所有伟大思想家们的基本假设和想象,采取了坚定的立场,认为人的历史能动性是他自身改造和解放的根本基础。在我们的时代,要达到这种历史能动性,唯一的办法是:联合起来的人们以各种自治的形式,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管理和决定社会生活的职能,从而取代那些撇开他们并往往反对他们

的政治或经济管理机关。在这成为事实之后,人们才可以宣称,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性。但是,发展本身的过程极其清楚地表明,如果人们对现实的进程和矛盾没有不断的创造性的认识,这种“规律性”是多么虚幻,而其他也具有自己的现实体现者的“合法”进程,又是多么有可能使上述进程成为问题。 308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社会 60 年代初的发展极其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主要政治力量以及哲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理论家激进地持反官僚主义的观点,主张把自治原则作为我国发展的基础,把国家的消亡看作这个同一进程的另一面,主张通过扩大人的历史活动和权利来克服经济的和政治的异化。然而,尽管有了这种认识和愿望,社会越来越深地陷入危机。始终还占主导地位的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关系的后果开始越来越突出地在我国生活的各个领域显露。经济的外延的发展,作为上述关系的后果,一再表明经济无法赢利和没有能力加入国际交换,对于已经比较发达的南斯拉夫经济来说,这变得越来越尖锐。对扩大再生产实行的国家主义的垄断,导致了经济上的许多失误,各个经济部门的发展和地位方面的比例失调以及通货膨胀的趋势等等。工人阶级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他们的劳动,而更多的是取决于国家行政部门的行政措施。国家始终还掌握着几乎 3/4 的投资基金,而过分地以行政手段确定价格的做法使实际关系和各个劳动集体的劳动价值变得模糊不清,这特别对于工人阶级中比较发达的那一部分不能起到刺激作用。没有解决的外汇制度原则,对于那些生产搞得最好的企业也不能起到刺激的作用。所有这一切,加上其他种种行政干预,只是加强了南斯拉夫经济的自给自足性,而这个时期,考虑到南斯拉夫奉行反对结盟的独立政策,它对外界必须变得尽可能有能力,尽可能独立和尽可能开放。社会主义闭关自守不仅标志着它在一个一定的历史时刻的弱点,而且有使它自身的落后关系和看法一成不变地保存下去的巨大危险。

关于上述经济问题,联邦议会于 1965 年年中通过了几项应当使 309

局势缓和下来的法规。首先涉及货币改革、改变平价、减少国家投资基金、国民收入做有利于经济组织的预分配。情况很快就清楚了,这一切只是治标的办法,问题要深刻得多。问题不只是在经济改革,而是进一步发展自治的努力,必然会导致更深刻的社会关系的改革。因此,如果真想使革命进程继续下去的话,必须把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看成是革命的下一阶段。

当时,新阶段只能是:进一步加强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同时削弱国家社会主义关系。而削弱国家行政机关的经济实力又只能通过把扩大再生产和投资的重点放到劳动集体身上,摆脱价格形成方面的行政桎梏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1966年通过的新五年计划规定,1970年纯产值的分配要做到70%留给经济部门。对于我国发展的这一历史时期,这一主张必然导致市场关系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活跃,从而也导致那些在这些关系中无法开展,对社会也无关紧要的经济事业活动的消失——自然是逐步消失。这些进程也必然把计划体制、外汇体制、外贸体制、奖金等等提上日程,但是同样也把政治制度提上日程。党和国家的作用必然要进一步发生变化,而随之而变的是许多迄今流行的看法、习惯和特权。因此,毫不奇怪,这一进程在我国社会生活的不同范围内遇到了抵制,使得这一进程本身成了问题。

在理论领域内,对上述问题的探讨继续进行着。自治问题及其各个方面,仍然是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中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不仅仅从一般理论的水平上或者从政治理论的水平上加以探讨,

而且对自治的各个问题展开了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具体分析。^① 310

我国革命这一阶段的头几年,南斯拉夫绝大多数重要哲学家维护唯一与马克思主义相称的参与历史的哲学,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创办了《实践》杂志的南斯拉夫版和国际版。上述流派的哲学家这个时期主要关心的事是探讨辩证的、历史的和人类学的前提,以便理解人的自由和人性问题,而这也意味着理解导致自由和人性的当代具体进程。因此,处于注意中心的仍然是对作为一种思想和实践体系的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这一体系由于着重强调国家和政治的因素而阻碍社会主义制度下进一步解放的进程,同时还扼杀自由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本身。进行这种批判的时候,认为斯大林主义已是不可返回的过去这种官方的意见已占上风,而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的改善又使一直伴随着我们的关系的某些幻想重新复活。当时没有设想到,不管社会最先进的部分的意愿如何,国家主义范围的强大的影响和整个国家的落后状态,导致了斯大林主义的观念和方法的出现。 311

能够说明这些努力的特点的另一个要素是这样的一种愿望:希望

① 在这一领域的书籍中,我们可以指出下列著作:M. Todorović, *Oslobođenje rada*, Beograd 1965; R. Supek, *Sociologija i socijalizam*, Zagreb 1966; *Participacija, radnička kontrola i samoupravljanje*, Zagreb 1974; N. Čobeljić, R. Stojanović, *Teorija investicionih ciklusa u socijalističkoj privredi*, Beograd 1966; D. Čalić, *Produktivnost rada i privredni razvoj SFRJ*, Zagreb 1966; D. Čalić, *Ekonomski aspekti razvoja suvremenog socijalističkog društva*, Zagreb 1972; V. Bakarić, *Aktuelni problemi sadašnje etape revolucije*, Zagreb 1967; V. Bakarić, *Socijalistički samoupravni sistem i društvena reprodukcija*, Zagreb 1974; M. Pečujlić, *Klase i savremeno društvo*, Beograd 1967; M. Pečujlić, *Susret svetova*, Beograd 1976; Mihajlo Popović, *Problemi društvene strukture*, Beograd 1967; N. Pašić, *Klase i politika*, Beograd 1968; *Aktuelni problemi privrednih kretanja i ekonomske politike Jugoslavije* (kolektiv autora), Zagreb 1968; E. Kardelj, *Raskršća u razvitku našeg socijalističkog društva*, Beograd 1969; E. Kardelj, *Radnička klasa, samoupravljanje i naučno tehnički progres*, Beograd 1969; E. Kardelj, *Protivurječnosti društvene svojine u savremenoj socijalističkoj praksi*, Beograd 1972; E. Kardelj, *Pravci razvoja političkog sistema socijalističkog samoupravljanja*, Beograd 1977; B. Horvat, *Ogled o jugoslavenskom društvu*, Zagreb 1969; B. Horvat, *Privredni ciklusi u Jugoslaviji*, Beograd 1969; *Ekonomska politika stabilizacije*, Zagreb 1976; A. Dragičević, *Reforma i revolucija*, Zagreb 1969; J. Županov, *Samoupravljanje i društvena moć*, Zagreb 1969; J. Županov, *Privredni sistem i ustavna reforma* (Kol. aut., redakcija R. Lang), Zagreb 1973。

从理论上尽量有力和尽量全面地阐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土地上已获得越来越发达的基础。有许多文章谈及这个问题,这些文章涉及哲学问题的广泛领域,从实践、自由、异化等范畴,直到技术、艺术和社会主义问题。《实践》杂志的合作者注意到南斯拉夫向外界开放的必然性以及革命的这一阶段本身带来的进程的必然性,清楚地看到了在我国发展的这一阶段,商品货币关系势必会得到比较有力的发展,但是他们同时又指出商品货币关系政策的个别代表人物的某些片面性和缺乏批判的态度,这些人忽视了比较自由的市场的消极后果。个别人的言论中常常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当作治疗我国社会一切困难的万应灵药,而同时又没有看到这毕竟仍然是商品生产,即便社会主义社会采取比较有力的行动,它还是会再生出商品和货币的拜物教。指出我国发展中这个始终是必要的进程的另一面也和以前一样,导致同政治领导机构的尖锐争论,政治领导机构毫无道理地把这些保留意见和告诫看成是反对采取这些措施。

《实践》杂志还提出了其他许多哲学问题和理论问题,当然也提出了对世界和人这个当代题目中的一些问题的一系列不同看法,而这本来也是《实践》杂志编辑部所希望的。这家杂志的问世不仅在探讨上述某些问题方面,而且在扩大讨论和理论思想的自由方面,都意味着前进了一步。《实践》杂志的合作者宣告,他们采取“批判现存的一切”的态度(直到今天为止,这种态度仍然是维护固有的范围和关系的人们的靶子),他们不过是提出了对社会主义任何比较自由的发展必不可少的态度而已。这种态度就是,社会主义是一个开放社会,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不可能存在任何应当不受辩证批判的范围。南斯拉夫哲学家决不打算从这种态度中得出任何无政府的结论和举动,因为不然的话,他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马克思本人在援引当时涉及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一态度时,也并不认为,在这个资产阶级社会里一切都是消极的,只消简单地加以否定就是了。如果把批判理解成辩

证的否定,那就更是这样,因为这种否定本身就包含所批判所否定的东西中的一切积极因素。关于这一态度,过去和现在所指的是完全不同的:第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任何范围都不能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第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应蜕变为某种政治教育方法和像在斯大林主义制度下那样,“为现存的一切”辩护。关于批判现存的一切的态度是同马克思的整个辩证法观念相一致的,马克思在一个地方曾经规定说辩证法是这样一种方法:它在积极理解现存状态的同时也理解对它的否定,辩证法不对任何东西实行监护,它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我对这个问题做了较多的强调,只是因为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形式中,开放性、批判性、民主性以及克服理论和思想上的垄断是实行更为彻底的进一步改变和发展自治进程的绝对必要条件。^①

60年代中,在保守势力(他们抵制合乎逻辑地推行经济和社会改革,仍然总是通过国家主义官僚主义结构占统治地位的棱镜来观察我国发展的道路)和主张进一步推进我国革命的力量之间在政治范围内

313

^① 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著作外,哲学家们在这一时期,还发表了以下作品:M. Kangrga, *Etika i sloboda*, Zagreb 1966; M. Kangrga, *Smisao povijesnog*, Zagreb 1970; M. Kangrga, *Čovjek i svijet*, Zagreb 1975; B. Bošnjak, *Filozofija i kršćanstvo*, Zagreb 1966; M. Životić, *Pragmatizam i savremena filozofija*, Beograd 1966; M. Životić, *Egzistencija, realnost i sloboda*, Beograd 1974; M. Marković, *Humanizam i dijalektika*, Beograd 1967; M. Marković, *Preispitivanja*, Beograd 1972; Zaga Pešić-Golubović, *Antropologija kao društvena nauka*, Beograd 1967; Zaga Pešić-Golubović, *Čovek i njegov svet*, Beograd 1973; Lj. Tadić, *Poredak i sloboda*, Beograd 1967; Lj. Tadić, *Tradicija i revolucija*, Beograd 1972; D. Rodin, *Aspekti odnosa između Hegelove i Marxove dijalektike*, Beograd 1967; D. Rodin, *Marxova misao zajednice*, Beograd 1974; D. Nedeljković, *Humanizam Marxove dijalektike i dijalektika humanizma danas*, Beograd 1968; D. Nedeljković, *Dijalektika na delu*, Beograd 1976; A. Krešić, *Dijalektika politike*, Sarajevo 1968; A. Krešić, *Političko društvo i politička mitologija*, Beograd 1969; A. Krešić, *Kraljevstvo božje i komunizam*, Beograd 1975; D. Grlić, *Zašto?* Zagreb 1968; D. Grlić, *Estetika I, II*, Zagreb 1974, 1976; V. Rus, *Dijalektika čoveka i sveta*, Beograd 1969; V. Rus, *Etika in socializem*, Ljubljana 1976; G. Petrović, *Mogućnost čoveka*, Zagreb 1969; G. Petrović, *Filozofija i revolucija*, Zagreb 1973; S. Stojanović, *Između ideala i stvarnosti*, Beograd 1969; P. Vranicki, *Marksističke teme*, Zagreb 1973; P. Vranicki, *O nekim kontroverzama u marksizmu*, Rijeka 1976; V. Sutlić, *Praksa rada kao znanstvena povijest*, Zagreb 1974。

的内部冲突公开暴露之后,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我国的社会结构还背负着官僚主义,背负着国家主义的管理方式的包袱。1967年年中,在南共联盟中央全会上排除了以亚·兰科维奇为首的势力。然而,这些事件突出地表明我国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落后,这种结构始终能够使社会领域、安全领域得到足以阻碍我国社会主义整个民主发展道路的活动规模和权限。其次,不公开地解决我国社会中,首先是共产主义者联盟中的有争议的问题,会使实际状况变得模糊不清,会使广大阶层失去方向,会妨碍进步力量同保守势力展开更有效的民主斗争。

由于这些原因产生的困难,但是同样也由于改革的头几年就预想到的经济困难,导致了我国社会中出现一系列其他的紧张局面和批评。改革清楚地表明了,经济的粗放的发展掩盖了几乎所有企业的剩余劳动力,也就是说清楚地表明了,潜在的失业始终存在。靠大批裁减劳动力,或者靠关闭所有不赢利的企业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但是,采取进行高质量和有赢利的生产的方针,同样是势所难免的。^①

314 这一时期在企业内部,特别是在上述困难比较明显的那些企业里,或者在自治制度不发达,在企业的管理上听任技术至上主义和行政命令倾向得到加强的那些地方,出现了进一步的冲突。爆发一系列小规模罢工一事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这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工人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是软弱的,而不是强大的,此外这还表明自治制度是不完善的。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罢工也必须成为工

^① 在迄今为止的发展中,只有一小部分劳动力,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劳动力被解雇。考虑到出国谋生的人为数颇多,应当强调指出,他们绝大部分是由于我国仍然是一个农民国家所造成的(农民平均约占人口的一半,许多地区不发达、贫困),这些阶层要求摆脱贫困生活,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而我国社会又一下子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吸收全部劳动力。要做到这一点,只能以经济继续粗放发展为代价,而这又会使经济陷于灾难。一部分劳动力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而到国外去的。尽管存在这种情况,不应当得出结论认为,就业问题不是这一时期我国发展中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人阶级斗争的合法手段,不论意识形态上的种种非难如何,特别是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家们叫嚷什么罢工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然而,以自治为基础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中,不利用自治的法律形式来解决企业内部的物质和社会问题,更明显地反映出这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弱点,但同时也反映出自治制度本身的弱点。^①

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特别是在1967年全会之后,使得人们有可能更加清楚地认识与民族关系有关的某些问题,并消除从中央集权制和国家主义结构产生的某些弊端。在对这样的缺点,甚至弊端进行正当的批评的同时,已被压制下来的民族主义观念和要求又露头了,这些民族主义观念和要求,在小资产阶级阶层中过去和现在都不乏代表人物。甚至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认为,唯有民族纲领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而看不到民族纲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已经被克服了,社会主义的问题只能靠社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也即在社会和阶级的纲领基础上来解决,而这样的纲领也就是指各民族平等、各民族自由表达民族感情和各民族享有自决权。

从这种种情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革命还面临重大的问题。这不仅在实践中是如此,而且在理论上也是如此。虽然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许多问题原则上都已解决了,但仍然存在许多进一步的困难,还有陌生的问题。国家行政部门的权力还十分强大,经济政策中也同样存在这样的影响。在国家和党的机关中,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观点和管理方式还始终未被克服,在民族关系上产生了单一民族政府主义的观念和实践。党和国家在支配宣传手段方面的壟

315

^① 某些激进的共产主义小组,特别是在西方的托派中间,认为这些比较激烈的罢工中的某些罢工表明工人阶级和居统治地位的官僚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是仅仅根据某些现象得出的结论,而对整个形势的实质了解不够。当然,无须掩饰,国家主义官僚主义的管理形式还始终存在着,我前面就已经谈到过。然而,也应当懂得,通过自治的形式来争取权利的合法斗争的可能性比已经利用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同样,当工人阶级通过自治形式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并以这一方式在管理经济和社会进程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工人阶级才真正得到了表现,1968年年中,开始掀起比较自由和比较独立的青年和学生运动,表现为几次举行游行和示威,要求更加彻底和更加坚持推行自治进程。

断权以及制造舆论的可能性远比这个阶段应该达到的程度要大。在作为对自治以及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加强最负有责任的政治组织共产主义者联盟内部,其民主关系仍然不符合社会自治目前的发展程度以及整个南斯拉夫社会的发展可能性。如果除此之外,再加上没有解决的银行资本、外汇制度、财力雄厚的外贸企业的问题,专家治国论倾向的加强以及没有实现把扩大再生产转交给工人阶级及其自治形式,那么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必须在理论上为克服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努力,而且可以看到,南斯拉夫社会面临进一步的强烈的改变进程。

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困难、不足和问题归纳成一句话,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的目前的形势归纳成这样一句话:在继承下来的政治管理形式(代议制民主、选举制度、国家主义结构和影响等等)与大体上仍停留在社会的基层、不够发达、物质上薄弱的自治形式之间的矛盾增强了。从第一个范围不断再生产出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观点和行为以及我们从马克思的分析中已经熟悉的所有那些官僚的神秘作为。而第二个范围还没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范围,还没有从基层到上层渗透进整个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在我看来,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革命今后的发展中,最重大的一个问题和最重大的革命行动在于理论上的明确性,在于提出要求和采取行动进行改革以及使南斯拉夫社会发生这样一种结构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是,在从社会的基本单位一直到最高和统一的管理形式中,建立起以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结构。代议制政治民主制度及其政治形式和影响,对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的发展来说,对于工人阶级和我国社会其他自治结构在社会方面——不仅在经济上——发挥更有力的作用来说,变得越来越狭小。不要以为,迈出这一决定性的革命的一步是简单的和轻而易举的,不会出现一系列伴生的困难和矛盾。而且,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看来或许才刚开始有某些预兆。

对于解决我国社会发展所有上述困难和矛盾来说,存在几个暗中

的和公开表达的历史性“方案”。第一,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倾向虽然在前面描述过的我国社会的结构中实际存在着,并且是一切中央集权制和单一民族政府主义的基础,但这种倾向不可能得到强烈的表现。然而,如果设想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官僚主义国家主义反革命,那将是闭眼不看现实存在着的势力和野心,如果考虑到许多外界的压力和影响,那就更其如此。

第二种观念主张实行多党制,即设想我国社会关系的进一步民主化需要几个社会主义政党。抽象地来看,这一态度既不反社会主义,也不反马克思主义,但是这可能是完全不适当的,依我之见,这可能在我国的发展中产生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后果。过渡到几个党,这肯定会更快地导致政治民主主义的发展和—个党的某些垄断权的取消。然而,在南斯拉夫迄今的事态发展中,这意味着把解决根本问题的重点转到政治范围,采取这样的斗争所要求的那些工具、技术和伴随而来的行动,首先会导致官僚政治势力的加强,而不是导致自治力量的加强。因此,我们如果不是通过在自治基础上改造社会而是通过这些进程来尽早克服这一作为权力、武力和压迫范围的政治范围的话,我们只会加强这一政治范围。如果我们考虑到我国社会强大的小资产阶级形态以及南斯拉夫各个地区发达程度上的明显差异(这助长民族主义观点),这一道路只会危及迄今的革命成果。

317

第三种观念是我简单地已经描述过的。这种观念假设自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扩大和巩固,这一结构变为从基层到上层的社会关系的主导形式。对于采取这样一个革命行动来说,需要领导这些进程的政治力量(南共联盟和社会主义联盟)坚决把社会和这些组织的民主化进程进行到底,更加坚定地抛弃妨碍这一民主化的不足取的形式(舆论不发达、党内关系不够民主、工会的作用不够独立、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种现象的社会主义批判不力、各个机关的工作没有完全公开、不能最大限度地了解情况等等)。在工人阶级、党、知识分子等等当中,我国社会的主要进步力量始终站在这第三种立场上。这一道路

迄今引导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取得了历史性胜利。尽管对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发展来说,最可取的是这第三条道路取得最终的胜利。但是这条道路并不是命运注定的。这条道路的命运取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观力量。^①

318 当我们考虑到上述所有这种种情况时,我们必须公开指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某些因素是无法纳入欧洲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国家落后、工人阶级不强大、战争的破坏,后来遭到的封锁和许多经济困难,加上南斯拉夫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同斯大林主义发生冲突并因而需要在本国内部解决斯大林主义的影响的第一个国家——这一切都无助于在生活的各个范围内更快地建立发达的民主关系,而这是上述模式的必然前提。同时不应当看不到,西方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还未能冲破和克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甚至遵循自己的经济利益,同艰难地打入世界市场的不太发达的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展开竞争。从这方面考虑,以及考虑到其他许多当代的进程,特别是个别国家的人民争取最终摆脱殖民主义的斗争,工人阶级自身解放极其需要的工人阶级国际团结处于经常的危机之中。

然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结构中的上述不足之处(首先是客观性质的,主观局限性也起了作用),不能掩盖不发达的小小的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为数不多)恰恰对这个极其需要的新模式所做的贡献。

首先是1941年创造性地度过了历史性的局面和危机,这始终可以成为任何革命创造、非教条的态度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范例。

第二个要素是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的斯大林主义的

^① 这一主张得不到实现,就必然会导致上述政治纲领之一的实现,而这意味着使传统的政治社会(有较多的或者较少的自由)永远保存下去。我认为,从整个这一部分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在整整一个历史时期,使人摆脱经济和政治的依赖的活动将因此而停止,或者至少是其速度大为放慢。作为这一解放的思想和实践的基础的自治或许会在世界范围内遭受失败。整整一个历史时期肯定会处于技术至上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结构以及同样的政权的标志之下。这不仅是南斯拉夫的发展,而且是当代历史时代的一个决定性的问题。

非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性抵制。1948年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将成为生命攸关的分水岭。当时刚刚经历了战争的混乱和破坏的一个党,坚决反对国家主义官僚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观念和实践,维护每个党和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的主权。

第三个要素——它对于社会主义新的和比较发达的模式是重要的,具有最大的意义——是作为社会革命的重要基础的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的理论观念 and 实际贯彻。社会主义作为克服现代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异化的唯一历史基础,必然会带来这样一场社会革命。

319

如果除此以外,我们再加上始终不渝地奉行积极和平共处原则以及对上述所有问题做出了理论阐述,我们就会看到,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所有这些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所有这些成绩,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新的、更为人道的问题的关系的问题是当代世界的基本问题。但是,这不是什么抽象的问题,不是靠关于人、社会精神和善良的意图的猜测来解决的问题。新人道主义的问题实质上是人在经济、政治以及精神领域内的解放问题。

这基本上是历史行动的问题,看不到人的问题也就是历史问题,也就看不到在人类进步中最本质的东西。

历史上的革命行动至今是人类一切高尚的成就以及人的全面解放的基石,过去如此,今天仍然如此,今后也将如此。只存在一个战场,人可以在那里争取到自己的人性,那就是历史实践。

因此,今天新的社会主义关系的问题,自觉地和正确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实质上是新人道主义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南斯拉夫革命通过理论和实践过去和现在都指明了社会主义进程的实质,从而突破了迄今的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点,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中标志着一个新阶段,并继续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伟大和深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这些思想而成为当代历史的主导思想的。

结 语

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趋势和它的历史进行的这一总的考察，就足以清楚地不仅说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内容丰富的历史，而且也说明它始终是当代的基本理论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作为欧洲文化的表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在欧洲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至今最伟大和最富有成果的篇章。现代文明的其他发源地由于缺乏整个古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以及资产阶级的文化（这种文化发展的顶峰是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德国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而不适宜于这样一种复杂的理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的土壤。其他地区由于历史上落后的情况，由于缺乏上述文化和思想的传统，只有在最深刻的实际革命的创造时期，即在马克思主义由于政治社会问题和革命实践而得到丰富的时候，才能对这一发展有所贡献。

然而，在这些进程（尽管是在马克思的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中应当克服这样的一种幻想，以为这些进程在不发达的局面下可以直接通过建立卡尔·马克思所设想的那些结构来完成。在这样的情况下，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我们又称之为社会主义发达的欧洲模式），不论这些进程和成果为社会主义进一步的发展创造了什么样的前提，也不论它们在这些国家里意味着多大的历史性步骤和进步。

这同时也是一个理由,它说明不能仅仅根据最发达的标准来评价这些新的历史结构的创立,正如发达国家的进程不能根据这些不发达国家里的经验、需要和观点来判断一样。

在现代世界特殊而复杂的进程中,不管马克思主义思想将通过何种途径被人吸收和接受,它间接地或直接地都是当代主要的积极思想,因为历史的发展虽然遇到种种困难和发生偏差,但仍然使人的力量获得进一步的解放,并且导向社会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一种革命的和批判的思想,因而也成为现代主要的思想,因为时代本身就是革命的和批判的。

不过这一发展既不是片面的,也不是简单容易的。某些最发达的国家至今避免了较深刻的革命变化,尽管这些国家仍然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因此就产生了一种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和加以片面解释的局面:基本的理论思想(首先是哲学的、社会学的理论思想)仍然在两条轨道上发展。资产阶级世界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同样在寻找出路。科学和理论的蓬勃发展,本身包含着自身发展过程的一定的逻辑。最卓越和最具素养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尽管抱有资产阶级的观点,都不可能对当代世界的似是而非的议论、愚蠢的行为和不人道的表现漠然处之,正如比较高明的马克思主义者也绝不能容忍马克思主义的烦琐哲学和斯大林主义的精神一样。

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思想仍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路线发展。闭眼不看这种发展的各种积极因素,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来说,就是不必要地作茧自缚。正因为这种发展的平行性和同时必然产生的渗透现象还要保持很长的时间,所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理论上的优越性就不能表现为抽象地否定其他一切东西,而应表现为批判的和创造性的对话。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者承担更多的义务,并且表明不能躺在经典作家的言论和思想上睡大觉。因此,仅仅停留在最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见解上,是不够的和在理论上是落后的;甚至那种认为只需要“坚持他们的思想”的提法也是不够

323 的,因为历史每前进一步,就提出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因此,问题不仅在于继承一定的思想材料(当然这些材料是基础),而且也在于根据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精神,独立地解决当代人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等等方面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思想,它既是唯物主义,又是辩证法,但也是人道主义。马克思之所以高明,并不在于他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理解世界,也不在于他以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待现实。这些观点在马克思以前就已经有了。马克思之所以高明,就在于他把这些最伟大的思想成果统一起来,在于他对历史和人,对人本身的历史这一领域做出了崭新的、独创的解释和阐述,而这一领域在马克思以前是没有人说明过的,同时它也是人的利益的基本领域,是人的努力、愿望、利益、斗争和理想的活动范围,是人自身的历史的领域。

历史是自然发展的最为错综复杂的因素,同时也是整个由人创造的。这个领域按照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刻板公式是解释不清的。这是因为,只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先于历史存在本身而存在,那么就只有在这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中才产生历史。说得更确切一些,意识是社会存在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它的活跃的、最具有创造性的部分。正因为如此,规划、目标是社会存在的重要特点。

现代最伟大的资产阶级思想著作(我绝不是贬低它们的价值)不是只抓住了人类和历史的局部,就是最终走到非辩证的本体论,要不就是陷于极端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经济学家充其量只是为处于经常不断的危机之中的资产阶级社会寻找各种各样的治标的办法,而社会学家则往往被淹没在一大堆经验材料里面,而不了解这一社会结构的职能。他们都是不了解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有机组织学家。

在这场对话中,马克思主义只有以完整的和创造性的形式才能保持其优越地位。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来说,这种完整性意味着:不片面地停留在客观辩证法上并使之成为一种本体论,从而忽略人以及与人有关的全部问题;也不片面地停留在已成为一般辩证法的同义

324

语的历史辩证法上。尽管强调这些问题在今天对于人类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这种做法必然最终陷入片面的人本主义,片面的人本主义就是缺乏切合实际的和一般辩证的现实基础,而这种基础也是历史辩证法的前提之一。忽视自然的、片面的人本主义与在自己的实证哲学中忽视人和历史的、片面的本体论(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的本体论)相对立。

哲学有它自己关心和研究的对象,因此它将继续按照传统的学院精神发展。但是,如果说理论思维,首先是哲学思维应当阐明人的愿望、可能性、预见和追求、犹豫和怀疑,并在看来已毫无出路的非人处境中指出可能的出路和人性的东西,那么马克思主义唯一的意义和历史职责就在于作为理论思维去实现人类精神的这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方面,并从而始终成为自己时代的批判性的思想。任何其他努力,如果想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传统的学院式问题、抽象的辩证法等等范围,那是忽略了马克思主义思维中的本质东西。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能成为一般哲学的同义语的原因。

作为一种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曾经是,并且仍将是现代历史上革命力量的体现。但是这些革命力量也经历着各种不同的进程、情况和变化。一部分革命力量在不同程度上同资产阶级世界发生冲突,另一部分则或多或少地与资产阶级世界融为一体了。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自己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明确地反映了这种种倾向。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并不是偶然现象。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内部将永远存在政治和理论方面的紧张状态,因为每一种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没有合适地反映一定的历史情况。马克思主义今天也面临着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即科学地研究这些倾向,说明阶级力量及其关系的发展情况,从而确定自己的政治行动。因为,当无产阶级同历史上的反动派发生公开冲突的时候,向无产阶级提出改良主义的口号,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样,当无产阶级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结成为整体,而对于资产阶级世界只是作为议

325 会或工会反对派存在的时候,对无产阶级发表革命的口号,也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也并不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不是实现进一步社会改造的历史体现者。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为制定一种真正的和富有成效的政策,同样也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深刻的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提供主要因素。

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历史上新生力量的思想,因此也是社会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史在这方面指出了这样一种反常的现象:除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某些时期以外,在社会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即在斯大林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思想发展的范围最为狭小。在这一时期居然把政治和理论非常不幸地等同起来,并且把政治上的裁决强加于理论。这不可能不产生后果。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复兴并没有随着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而到来,并没有不断地致力于建立那些能够日益促进人类财富的全面实现的关系,相反,整个这一群众性的创造活动被一个法庭,只有一个法庭,即政治法庭的绝对判决否决了。这种政治法庭要求用自己的政治判决代替千百万群众、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和主要的文化领域的工作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的工作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和国家最高权力被等同起来,于是,不言而喻,国家官僚是凌驾于整个运动之上的权力。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为了反对对人的统治,争取建立这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将根本消除人的物化和人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异化这一事实,是为了彻底消灭以其本身的存在贬低人的个性的一切拜物教现象。

斯大林主义只是以新的形式继续和加剧了这些现象,并以为这样就完成了历史任务。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家们非辩证地仅仅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取消私人所有制,确立国家和官僚机构的无限权力。他们没有看到,社会主义本身就具有自己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没有看到斯大林主义把一个最低的阶段绝对化了,在这个阶段中,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异化(雇佣关系、政治权力和理论上的不自由等等)泛滥到不可收拾的程度,而且这种异化基本上还始终产生于革命。因此,斯

大林主义既不仅仅是教条主义,也不仅仅是修正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关系的蜕变,是个性的蜕变,是整个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蜕变。蜕变得如此厉害,以致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社会主义的结构和关系。斯大林主义是对最初的社会主义革命冲动做有利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的统治的否定。它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全部财富(本书至少大致上对此做了说明)归结为我们掰指头就可以数得过来的几点特征,并且想靠这种思想武器来占有当代世界文化中的社会阵地,而根本没有看到,资产阶级的思想提供了精巧得多的(虽说是局部性的)工具,或者至少提供了比那区区几页神圣不可侵犯的断语更胜一筹的分析。

斯大林主义阶段现在还没有完全被克服。马克思主义思想绝不应忘记这一阶段,以便始终清楚地了解什么阶段是不应当有的。斯大林主义是政治范围完全占居上风,对个人和社会的自由严加压制,它虽是某些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特定的阶段,但是在类似的情况下,它同样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出现。因此,充分了解斯大林主义的消极作用,正如了解资产阶级思想(即便是最清醒最明智的思想)不能在解释世界、历史和人及其斗争和争取解放的道路等方面代替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样,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前提。任何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都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所创造的这样一些范畴,这些范畴在创造性的运用中始终表明自己不仅是了解过去,而且也是了解今天和未来的最重要的思想工具。这些范畴就是辩证法、实践、总体、异化、拜物教、物化、人道、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形态、革命等等,它们是人在争取尽量高的觉悟和自由的顽强斗争中的意识发展迄今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

因此,在一般理论领域内,马克思主义也要对这些范畴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全面分析迄今阻碍或分裂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各种偏差——从忽视人的各种本体论观点到忽视具体的历史和自然的各种人本主义观点。

327

因此,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不仅要详细分析资本主义现阶段当前的发展和各个殖民地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克服资本主义的独特办法的问题,而且还面临着文化和文明这个统一而复杂的现象的问题。一方面,人类面临着越来越迫切的、会给有关国家的人民和全世界造成无法估量的严重后果的人口爆炸问题。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也面临着阐明当代历史范围内的一种文化和生活观念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这种观念将否定和丢弃荒谬的消费社会、拜物教意识、神秘化了的关系以及对别人和整个人民的命运所持的完全漠然的态度。而在这方面,可以说迄今只完成了极少一部分准备工作。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本身表明是一种比原先设想的要复杂得多的过程。因此,克服斯大林主义,意味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要做出进一步的努力。这也意味着要不断地对社会主义的各个阶段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和改变,而有人却总是企图使这些阶段保持原样,使之固定不变,并宣布这些阶段已经足够了。应该把社会主义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全面和自由发展的唯一的历史范围和媒介,不仅如此,还应该把它理解为人及其各方面的才能和潜力全面解放的唯一媒介。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特殊的形态,而是一个过渡性的历史时期。这一过渡性的最深刻的实质,就是同一切阶级的遗产和旧时代的残余(简言之,也就是异化)做斗争,并为争取人的解放而进行不断的、群众性的斗争。

328

甚至在最发达的国家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劳动阶层也才刚刚开始摆脱艰难落后的过去。拜物教意识势必使争取更富有人性的生活的斗争变得困难。对于政治组织、集团或者个别人的信任极其强烈,致使工人阶级对于它们在革命后的发展和变革既不能采取批判的态度,迄今也不能施加比较有效的影响。为此,不仅需要有许多历史经验(某些经验已经获得),而且需要有很高的经济和文化水平,才能够彻底理解和实践马克思的主张的深刻含义,马克思的主张来自对资本、雇佣关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异化、商品和意识的拜物教的批判,

其目标在于消灭政治、国家和党而建立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体。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向国际工人运动经常指出:社会主义不是把权力从资产阶级的手里转交给万能的国家和官僚,即便这个国家是从革命队伍中产生的。需要经常指出,劳动者是历史的基础,是真正的创造者和真正的权力。把所有这些历史性的大权交给个别人,这就意味着承认自己的幼稚。正是由于这一切,在革命的劳动群众的旗帜上不能再写着自由、平等、社会主义民主等抽象的口号,而应该写着具体的、唯一符合历史的要求——直接实现经济解放,首先是实行劳动人民的全面自治。在这个问题上,重要之点不在于是称为工人委员会还是称为自由生产者联合体,是按照南斯拉夫的形式发展还是按其他的形式发展,是比较快地还是比较慢地取消国家的、官僚主义的和类似的权力和管理形式;重要之点在于自治和直接民主,它是社会主义运动的轴心,正如私有制和间接民主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基础一样。国际无产阶级和整个社会主义力量必须在自己的革命旗帜上写上这一条作为基本口号,并把它视为自己的历史权利和任务。

完全可以理解这是一个复杂、艰巨而充满矛盾的过程,这个过程同各种旧的习惯、关系、心理状态、等级制度和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消极现象等等发生冲突。但是,如果缺乏生气蓬勃的、创造性和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实践,就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因此,社会主义的创造性的媒介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全面发展的前提,正如自由的、批判性的和无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全面地顺利地发展的前提一样。不实现所有这些前提,首先是不实现自治进程,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归根到底会产生出给整整一个历史时代打上烙印的国家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的结构。

329

其他任何思想都不能为这种发展提供基本因素和指出方向。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是任人摆布的,那么,它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史本身的一个重大经验。对于某种思想来说,如果把它编成法典和写成若干条文,那是最有害不过的。文化和科学理论的创

造不是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教师的学校,而是成熟的个人的活动、思想对话和冲突。这些人不是有了已谱好的总乐谱的扬声器,而是创作总乐谱的作曲者。

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迄今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积累的丰富的发展经验来看,可以断言,马克思主义不仅在社会主义实践方面争得了许多重要阵地,而且在理论方面也已经很清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未来在于它的多样化。

一些人必然会强调某些问题和观点,以便从这些角度进行彻底的分析;一些人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问题;另一些人则从较局部的意义上来理解问题。因此,在理解各个科学和哲学领域、一定的规律和范畴的重要性和性质方面,必然会存在差别。

从马克思主义迄今的历史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循着这一路线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也有人抛弃了马克思的思想的某些重要点,而陷入了某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同样也发生了前面谈过的情况,即不仅把一定的范围,而且把一定的起点和终点都强加于马克思主义的每一种思想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极端的做法,这种做法今天已不再导致富有成效的创造;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该认识到,这是他们自己的思想的发展史上的重要经验之一。

正如我们可以谈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多样化(这同时是马克思主义比较充满生气和比较全面的发展的必要前提)一样,我们可以谈论迄今存在着的社会主义,或者至少是社会主义初始进程的多样化。列宁的主张与斯大林所“加以实现的”完全是两码事。列宁主张加强工人和社会自治(苏维埃),斯大林则与之背道而驰,建立了窒息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的专制的国家主义官僚主义的制度。社会主义今天在中国的发展具有自己的特色,正如社会主义在古巴或在南斯拉夫是特殊的变种一样。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观念基本上是反国家主义和反官僚主义的,这决定了它有一系列其他的特点。现在,具有充分的民主传统和发达的工人阶级的发达国家面临着一项紧迫的

任务,那就是要考虑实现这样一种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将使民主自由(以及政治自由)得以进一步发展,新的社会主义自治结构得以建立。在这方面,南斯拉夫的经验是最中肯的。这一模式必须以政党的多元主义为前提,虽然,如果以为政治多元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来说也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那是历史性的幻想。随着社会的阶级特点以及社会的这样的结构的克服,社会的政治性质以及作为政治斗争的必然前提的众所周知的政治阴谋和操纵也将得到克服。随着社会的各级实现自治,社会的政治性质、社会的国家形式以及政治组织——政党也将得到克服。联合在生产、文化和社会联合体中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这一最发达的模式中最终必然会克服统治着他们或者以他们的名义进行管理的一切政治形式和机构,甚至比不发达国家里还要迅速。通过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争取社会权利,而不只是政治权利(工人的监督、参与管理、市政方面的管理)的斗争,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的发达阶段已经有可能开始造就新的历史性人物。这更适用于那些已经迈步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

对于当代历史的这些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进程来说,马克思主义思想提供了最多的因素来理解这些进程和做出进一步的历史预测。但是,这只是指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即保留了它的重要的辩证方面——那种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不仅表现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态度上,而且也表现在对待一切社会,包括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态度上。历史在实质上也是一种批判,历史的发展就是批判地克服一定的关系和一定的阶段。批判性的理论也必须符合历史发展过程的这一内在的批判。

331

可见,马克思主义不能指望通过用圣经十诫或者七个特征去灌输绝对知识的办法来培养信徒,而是要提醒人们了解人的真正的诞生地,了解自然和历史,了解人的创造以及完全由人创造的这一历史进程的辩证法。应该向人指出,不存在任何能成为现实力量的抽象概念,而抽象概念只是在一定的关系中才成为历史上的虚假的现实力

量。要摆脱所有这些假象,通过创造新的理想的抽象概念是办不到的,而只有通过采取最具体的历史性行动才能做到,在这样的历史性行动中,人将成为自己的关系;自己的劳动和自己的产品的主人。

马克思主义是这一解放事业的理论。这绝不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似乎向真正的历史的人提供了不现实的理想,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向他揭示了他本身,揭示了他的历史发展的组成因素,他自己创造的规律以及他必须经历的发展过程。

从哲学上和理论上明确地预知这些因素,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创造性理论和人的自觉的历史性行动的先决条件。这不是绝对真理,不是人的发展的终极的目的。这是对那种从本质上说是人性的、此岸性的和历史的的东西的认识,是那种只有在具体情况下才能实现,而又只能是一个过程的普遍性的东西。

某种创造性思想最困难的地方正是抽象理论的过程和具体过程的结合。只要这种真实的抽象仍然是主导思想,那么明确了解客观可能性、明确了解应该经历的具体阶段,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不对各种途径和远大目标做出这种一般性的说明,任何具体的历史行动都必然会淹没在日常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混沌之中;同样,陷于抽象之中,就必然导致脱离实际过程,导致那种掩盖真正的弱点的虚假的崇高和优越。

马克思主义是迄今唯一的这样的一种理论思想,这种思想以自己的力量指出这些过程的统一性,并且为建立人们的劳动共同体提供了基本前提。人们将理解到,他们生活的直接生产,是他们生存和思想的基本前提;但是,他们也将理解到,他们的思想是他们的生产过程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重新提高了人的价值,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摧毁了一切不现实的偶像、崇拜物、神秘现象以及统治人的势力。

但是,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抽象地、费尔巴哈式地进行这一工作,而且还指出人必须经历和实现的过程和关系,以便使人觉醒起来,

重新感到自己是一个人,是自己的历史、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思想的创造者。

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实质上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争取实现人身上的一切高尚品质的斗争,这就使人能够了解自己和自己的历史,能够丢掉过去的沉重的意识形态遗产,并理解到自己的历史、生活和时代的意义,而这只是人的,由人赋予的意义。

如果没有这一点,人的生存就可能是真正的苟且偷安,或者是执行无法实现、无法预料的计划。人的全部伟大之处和生存的乐趣正是在于:人创造出自己的生活,使生活具有意义和前途。

此外,马克思主义还提出了一点伟大和重要的认识: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历史;这种创造是一种实践和理论统一的过程,它和人类生活同样是无限制的;任何一种神秘现象都是人本身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人不仅是最高级的生物和人本身的唯一的含义,而且也是人的唯一的命运。

参 考 文 献

我们在这一参考文献中只列入那些我们在本书中至少以某种方式引用或者参考的文献。为了避免重复同一个文献，我对每一种援引文献只标注第一版的出版时间。而对一些写作和出版时间距今已有很长的时间间隔的文献，我则提供两个版本。著作的标题我按照我使用和引用的语言加以标注（偶尔有例外，因为有的文献我使用我们本国的语言加以引证）。绝大多数文献我都能够准确地加以标注，但是有一些文献由于我利用了各种极为不同的资料，所以关于这种文献的准确性也取决于那些资料。

ABENDROTH WOLFGANG, *Aufstieg und Kris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1964).

ABENDROTH W., *Sozialgeschichte der europäischen Arbeiterbewegung* (1965).

ADLER FRIEDRICH, *E. Machs Überwindung des mechanischen Materialismus* (1918).

ADLER MAX, *Kausalität und Teleologie* (1904).

ADLER M., *Marxistische Probleme* (1913).

- ADLER M., *Demokratie und Rätssystem* (1919).
- ADLER M., *Die Staatsauffassung des Marxismus* (1922).
- ADLER M., *Politische oder soziale Demokratie* (1926).
- ADLER M., *Lehrbuch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I sv. 1930, II 1932).
- ADLER M., *Das Rätsel der Gesellschaft* (1936).
- ADLER M., *Die solidarische Gesellschaft* (posth. 1964).
- ADORNO THEODOR, *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 (1949).
- ADORNO TH., *Minima Moralia* (1951).
- ADORNO TH.,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1956).
- ADORNO TH., *Dissonanzen. Musik in der verwalteten Welt* (1956).
- ADORNO TH., *Klangfiguren. Musikalische Schriften I* (1959).
- ADORNO TH., *Quasi una fantasia. Musikalische Schriften II* (1963).
- ADORNO TH., *Jargon der Eigentlichkeit* (1964).
- ADORNO TH., *Negative Dialektik* (1966).
- Aktualjnye problemy marksistkoj etiki* (kol. autora, 1967).
- Aktuelni problemi privrednih kretanja i ekonomske politike Jugoslavije* (kol. aut., 1968).
- A la lumière du marxisme* (I 1935, II 1937).
- ALEKSANDROV G. F., *Istorija zapadnoevropejskoj filosofii* (1946).
- ALTHUSSER LOUIS, *Pour Marx* (1966).
- ALTHUSSER L., *Lénine et la philosophie suivi de Marx et Lénine devant Hegel* (1972).
- ALTHUSSER L., *Eléments d'autocritique* (1974).
- Anekdotična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zistik* (1943).
- ANGEL PIERRE, *Eduard Bernstein et l'Évolution du Socialisme Allemand* (1961).

ANGRESS T. WERNER, *Die Kampfzeit der KPD (1921 – 1923)* (1973, I amer. izd. 1963).

Antworten auf Herbert Marcuse (kol. aut., 1968).

ANWEILER OSKAR, *Die Rätebewegung in Russland 1905 – 1921* (1958).

Arbeiterdemokratie oder Parteidiktatur (zbornik, 1967).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sv. VIII (1968).

ASMUS V. F., *Logika* (1947).

AXELOS KOSTAS, *Marx penseur de la technique* (1961).

AXELOS K., *Vers la pensée planétaire* (1964).

BABIĆ IVAN, *Odnos filozofije i znanosti u radovima jugoslavenskih marksista 1931 – 1941* (1965).

BABY JEAN, *La grande Controverse sino-sovietique 1956 – 1966* (1966).

BAĆE MAKS, *O nekim pitanjima kritike i samokritike u SSSR-u* (1949).

BACZKO BRONISLAW, *Weltanschauung, Methaphysik, Entfremdung* (1965).

BADIA GILBERT, *Rosa Luxemburg* (1975).

BAJT ALEKSANDAR, *Raspodela nacionalnog dohotka i sistem ličnih dohodaka u našoj privredi* (1962).

BAKARIĆ VLADIMIR, *Problem zemljišne rente u prelaznoj etapi* (1950).

BAKARIĆ V., *O aktuelnim pitanjima rada na selu i u poljoprivredi* (1954).

BAKARIĆ V., *Uloga socijalističkog gazdinstva i socijalističke kooperacije u modernizaciji poljoprivrede* (1957).

BAKARIĆ V., *O unutrašnjem razvoju na selu i poljoprivrednoj politici*

- (1959).
- BAKARIĆ V., *Aktuelne teme* (1965).
- BAKARIĆ V., *Socijalistički samoupravni sistem i društvena reprodukcija* (1974).
- BAKARIĆ V., *Aktuelni problemi sadašnje etape revolucije* (1967).
- BAKUNJIN MIHAIL, *Gosudarstvennost i anarhija* (1873).
- BANFI ANTONIO, *Prospettiva filosofica* (1950).
- BANFI A., *L'uomo copernicano* (1950).
- BANFI A., *L'unità dialettica della civiltà* (1951).
- BANFI A., *Il problema sociologico* (1954).
- BANFI A., *La mia esperienza filosofica* (1955).
- BANFI A., *La ricerca della realtà* (I 1959, II 1959).
- BANFI A., *Saggi sul marxismo* (1960).
- BARAN A. PAU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1957).
- BARAN P. A. i P. M.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1966).
- BARTOLI HENRY, *La doctrin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Karl Marx* (1950).
- BAUER BRUNO, *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 (1841 – 1842).
- BAUER B., *Die Judenfrage* (1843).
- BAUER B., *Die Fähigkeit der heutigen Juden und Christen, frei zu werden* (1843).
- BAUER B., *Das entdeckte Christenthum* (1843).
- BAUER B., *Charakteristik L. Feuerbachs* (1845).
- BAUER OTTO,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1907).
- BAUER O., *Rätediktatur oder Demokratie* (1919).
- BAUER O., *Bolschewismus oder Sozialdemokratie* (1920).

BAUER O., *Svjetski položaj socijalizma i socijaldemokratski program* (1926).

BAUER O., *Kapitalismus und Sozialismus nach dem Weltkrieg* (1931).

BAUER O., *Ustanak austrijskih radnika* (1934).

BEBEL AUGUST, *Die Parlament. Tätigkeit des deutschen Reichstags und der Landt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1876 – 1893).

BEBEL A., *Die Frau und der Sozialismus* (1883).

BEBEL A., *Charles Fourier* (1888).

BEBEL A., *Christentum und Sozialismus* (1892).

BEBEL A., *Die Sozialdemokratie und das allgemeine Wahlrecht* (1895).

BEBEL A., *Napadi na osnovne poglede i taktičko stajalište partije* (1899).

BEBEL A., *Aus meinem Leben* (3. sv. 1910 – 1914).

BEER MAX, *Opća historija socijalizma i socijalnih borbi* (1924).

BEHRENS FRITZ, *Die Bedeutung der Statistik für die Ausnutzung ökonomischer Gesetze der Übergangsperiode* (1956).

BEHRENS F., *Zum Problem der Ausnutzung ökonomischer Gesetze der Übergangsperiode* (1957).

BELL DANIEL, *Marxian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2).

BELLEVILLE PIERRE, *Une nouvelle classe ouvrière* (1963).

BENJAMIN WALTER, *Schriften*, I, II (1955).

BENJAMIN W., *Illuminationen* (1961).

BENJAMIN W., *Angelus Novus* (1966).

BERMAN J. A., *Dialektika v svete sovremennoj teorii poznanija* (1908).

BERNSTEIN EDUARD, *Pretpostavke socijalizma i zadaci socijalne de-*

- mokracije* (1899).
- BERNSTEIN E., *Der Streik* (1906).
- BERNSTEIN E., *Die Geschichte der Berliner Arbeiterbewegung* (I – III, 1907 – 1910).
- BERNSTEIN E., *Der Revisionismus in der Sozialdemokratie* (1907).
- BERNSTEIN E., *Die Arbeiterbewegung* (1910).
- BERNSTEIN E., *Aus den Jahren meines Exils* (1917).
- BERNSTEIN E., *Sozialdemokratische Lehrjahre* (1928).
- BETTELHEIM CHARLES, *La transition vers l'économie socialiste* (1968).
- BETTELHEIM CH., *Calcul économique et formes de propriété* (1970).
- BETTELHEIM CH., *Les Luites des Classes en URSS. Première Période 1917 – 1923* (1974).
- BETTELHEIM CH., J. CHARRIÈRE, H. MARCHISIO, *La construction du socialisme en Chine* (1965).
- BICHTLER K., *Die Marxsche Theorie von der Gesellschaftsformation und das entwickelte gesellschaftliche System des Sozialismus* (1968).
- BIGO PIERRE, *Marxisme et humanisme, Introduction à l'oeuvre économique de Karl Marx* (1953).
- BILANDŽIĆ DUŠAN, *Borba za samoupravni socijalizam u Jugoslaviji 1945 – 1969* (1969).
- BLANC LOUIS, *Organisation du travail* (1839).
- BLANQUI AUGUST, *Critique sociale* (1885).
- BLOCH ERNST, *Geist der Utopie* (1918).
- BLOCH E., *Thomas Münzer als Theologe der Revolution* (1922).
- BLOCH E., *Erbschaft dieser Zeit* (1935).
- BLOCH E., *Freiheit und Ordnung* (1946).
- BLOCH E., *Subjekt-Objekt* (1949).

- BLOCH E., *Das Prinzip Hoffnung* (I 1954, II 1955, III 1959).
- BLOCH E., *Differenzierungen im Begriff Fortschritt* (1957).
- BLOCH E., *Zur Ontologie des Noch-Nicht-Seins* (1961).
- BLOCH E., *Naturrecht und menschliche Würde* (1961).
- BLOCH E., *Tübingenski uvod u filozofiju* (I 1963, II 1964).
- BLOCH E., *Atheismus im Christentum* (1968).
- BLOCH E., *Das Materialismusproblem, seine Geschichte und Substanz* (1972).
- BLUMENBERG WERNER, *Karl Kautskys Literarisches Werk* (1960).
- BLUMER GIOVANNI, *Die chinesische Kulturrevolution 1965 – 1967* (1968).
- BOCCA G., *Palmiro Togliatti* (1973).
- BOCK H. M., *Syndikalismus und Linkskommunismus von 1918 – 1923* (1969).
- BOGDANOV A., *Empiriomonisum* (1905).
- BOGDANOV A., *Filosofia živogo opyta* (1920).
- BOGDANOV A., *Tektologija* (1922).
- BOCHENSKI I. M., *Der Sowjetrussische Dialektische Materialismus* (1950).
- BOCHENSKI I. M. i G. NIEMEYER, *Handbuch des Weltkommunismus* (1958).
- BOLLHAGEN PETER, *Soziologie und Geschichte* (1966).
- BOLLHAGEN P., *Gesetzmässigkeit und Gesellschaft* (1967).
- Boljšaja sovetskaja enciklopedija* (1926 – 1931).
- BORCHARDT JULIUS, *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1919).
- BÖRNE LUDWIG, *Briefe aus Paris* (1832 – 1834).
- BOŠNJAK BRANKO, *Logos i dijalektika* (1961).
- BOŠNJAK B., *Filozofija i kršćanstvo* (1966).

- BOTTOMORE T. B., *Classes in Modern Society* (1955).
- BOUDIN L. B., *Das Theoretische System von K. Marx* (1907).
- BOURDET YVON, *Pour l'autogestion* (1974).
- BRAHM HEINZ, *Pekings Griff nach der Vormacht. Der chinesisch-sowjetische Konflikt von Juli 1963 bis März 1965* (1966).
- BRAUNTHAL JULIUS, *Geschichte der Internationale* (I 1961, II 1963).
- BROCKSCHMIDT K. F.,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bis zum Fall des Sozialistengesetzes* (1929).
- BROUÉ PIERRE, *Le Parti bolchevique* (1963).
- BROUÉ P. ET., E. TÉMIME, *La révolution et la guerre d'Espagne* (1961).
- BRUS W., *Modeli socijalističke privrede* (1961).
- BUBER-NEUMANN MARGARET, *Kriegsschauplätze der Weltrevolution. Ein Bericht aus der Praxis des Komintern* (1967).
- BUCHARIN NICOLAI, *Die politische Oekonomie des Rentners* (1913).
- BUCHARIN N., *Imperialismus und Weltwirtschaft* (1918).
- BUCHARIN N., *Das Programm der Kommunisten* (1918).
- BUCHARIN N. i E. PREOBRASCHENSKY, *Das ABC des Kommunismus* (1918).
- BUCHARIN N., *Oekonomik der Transformationsperiode* (1920).
- BUCHARIN N., *Theor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1921).
- BOUKHARINE N., *Sur la théorie de la "Révolution permanente"* (1925).
- BOUKHARINE N., *Les Problèmes de l'édification socialiste* (1926).
- BOUKHARINE N., *La loi de l'accumulation primitive socialiste ou pourquoi il ne faut pas remplacer Lénine par Préobrajenski* (1926).

BOUKHARINE N., *Les Problèmes des régulateurs de la vie économique ou l'erreur fondamentale du camarade Préobrajenski* (1926).

BOUKHARINE N., *Le Problème des lois de la période de transition* (1926).

BÜCHNER G. i F. WEIDIG, *Der Hessische Landbote* (1834).

BÜCHNER GEORG, *Dantons Tod* (1835).

BUTENKO A. P., "Nacionalnij kommunizm" ideologičeskoe oružie buržoazii (1958).

BÜTOW HELLMUTH, *Soziologie und empirische Sozialforschung*, I, II (1966, 1967).

BUZZI A. R., *La théorie politique d'Antonio Gramsci* (1967).

CABET ETIENNE, *Voyage en Icarie* (1842).

CALVEZ J. Y., *La pensée de Karl Marx* (1956).

CARR EDWARD HALLET,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I 1950, II 1953, III 1953).

CASANOVA GASTON, *Mathématiques et 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 (1947).

CASTORIADIS CORNELIUS, *La société bureaucratique*, (I 1974, II 1973).

CASTORIADIS C., *L'expérience du mouvement ouvrier* (I, II 1974).

CASTRO FIDEL, *Govor od 2. januara 1965.*

CASTRO F., *Unser Schlachtfeld umfasst die ganze Welt* (1966).

CASTRO F., *Govor od 13. marta 1967.*

CASTRO F., *Govor od 19. aprila 1967.*

CASTRO F., *Revolutionäre und Pseudorevolutionäre* (njem. 1968).

CAUTE DAVID, *Le Communisme et les intellectuels français* (1964).

CHAMBRE HENRI, *Le marxisme en Union Soviétique* (1955).

CHAMBRE H., *Der Karl Marx à Mao-Tsé-Tung* (1959).

- CHAUVEY DANIEL, *Autogestion* (1970).
- CH'EN JEROME, *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65).
- CLIFF TONY, *Staatskapitalismus in Russland* (1975, I engl. izd. 1955).
- COHEN HERMANN, *Einleitung mit kritischen Nachtrag* (Langeovu djelu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1896).
- COHEN H., *Ethik des reinen Willens* (1904).
- COHEN F. STEPHEN,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73).
- COHN-BENDIT G. I. D., *Le gauchisme – remède à la maladie sénile du communisme* (1968).
- COLE G. D. H.,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1 – 5 (1953 – 1960).
- COLIN AUGUST, *Le cri du peuple* (1831).
- COLLETTI LUCIO, *Il marxismo e Hegel* (1958).
- COLLETTI L., *Dialettica scientifica e teoria del valore* (1961).
- COLLOTTI-PISCHEL E., *La Cina rivoluzionaria* (1968).
- CORNFORTH Maurice, *Science versus Idealism* (1946).
- CORNFORTH M., *In Defence of Philosophy* (1950).
- CORNU AUGUST, *M. Hess et la Gauche hégélienne* (1934).
- CORNU A., *Essai de critique marxiste* (1949).
- CORNU A., *K. Marx et F. Engels* (I 1955, II 1958, III 1962).
- CUNOW HEINRICH, *Die Technik in der Urzeit* (1912).
- CUNOW H., *Die Marxsche Geschichts-, Gesellschafts- und Staatstheorie* (I 1920, II 1921).
- CUNOW H., *Allgemeine Wirtschaftsgeschichte* (I – IV, 1926 – 1931).
- ČALIĆ DUŠAN, *Izgradnja industrije u Jugoslaviji* (1957).
- ČALIĆ D., *Produktivnost rada i privredni razvoj SFRJ* (1966).
- ČALIĆ D., *Ekonomski aspekti razvoja suvremenog socijalističkog*

društva (1972)

Človek i epoha (kol. aut., 1964).

ČERNE FRANC, *Uvod v analizo trga in cen* (1961).

ČERTKOV V. P., *Neantagonističeskie protivorečia pri socializme* (1957).

ČOBELJIĆ N. i R. STOJANOVIĆ, *Teorija investicionih ciklusa u socijalističkoj privredi* (1966).

ČOLAKOVIĆ RODOLJUB, *Zapisi iz oslobodilačkog rata*, I – V (1946 – 1955).

Čovek danas (kol. aut., 1964).

DABČEVIĆ-KUČAR SAVKA, *Kretanje najamnine u savremenim kapitalističkim zemljama* (1961).

DANIELS R. V., *Das Gewissen der Revolution. Kommunistische Opposition in Sowjetrußland* (1960).

DÄUMIG ERNST, *Das Rätesystem* (1919).

DÄUMIG E., *Der Rätegedanke und seine Verwirklichung* (1920).

DEBORIN A. M., *Vvedenie v filosofiju dialektičeskogo materializma* (1915).

DEBORIN A. M., *Lenin kak myslitelj* (1924).

DEBORIN A., *Lukács und seine Kritik des Marxismus* (1924).

DEBORIN A. M., *Filosofija i marksizm* (1926).

DEBORIN A. M., *Dialektika i estestvoznanie* (1929).

DEBORIN A. i N. BUCHARIN, *Kontroversen über dialektischen und mechanistischen Materialismus* (1969).

DEBRAY RÉGIS, *Révolution dans la révolution* (1967)

DEDIJER VLADIMIR, *Dnevnik*, I – III (1945 – 1950).

DE LEON DANIEL, *Industrijalni Junionizam* (članci od 1905 – 1914) (1920).

- DEMETZ PETER, *Marx, Engels und die Dichter* (1959).
- DESANTI J. T.,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1956).
- DEUTSCHER ISAAC, *Stalin* (1949).
- DEUTSCHER I., *Trotzki*, I – III (1954 – 1963).
- Dialektika sovremennogo obščestvennogo razvitia* (kol. aut., 1966).
- DIDEROT DENIS, *Le Rêve de d'Alembert* (1769, obj. 1830).
- Die nächsten Aufgaben der Partei* (Teze dem. centr., 1921).
- Die Aufgaben der Gewerkschaften* (Teze rad. op., 1921).
- Die chinesische Frage auf dem 8. Plenum der Exekutive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1928).
- Die entwickelte sozialistische Gesellschaft* (kol. njem. i ruskih aut. 1973).
- Die Grosse sozialistische Kulturrevolution in China* (1966 – 1967).
- Die Linke gegen die Parteiherrschaft* (Hrg. u. eing. von F. Kool, 1970).
- Die Polemik über die Generallinie der internationalen kommunistischen Bewegung* (1965).
- DIEHL KARL, *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und das Rätesystem* (1920).
- DIEHL K., *Über Sozialismus, Kommunismus und Anarchismus* (1922).
- DIETZGEN EUGEN, *Dietzgen-brevier* (1915).
- DIETZGEN E., *Materialismus oder Idealismus? Ein Lösungsversuch gemäss J. Dietzgens Erkenntnislehre* (1921).
- DIETZGEN JOSEPH, *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Kopfarbeit* (1869).
- DIETZGEN J., *Ekskurzije socijalista u oblast teorije spoznaje* (1886).
- DIETZGEN J., *Das Acquisit der Philosophie* (1887).

- DIETZGEN J., *Logische Briefe* (1894).
- Die Linke antwortet Jürgen Habermas* (kol. aut., 1968).
- DOBB MAURICE, *Politička ekonomija i kapitalizam* (1937).
- DOBB M.,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1946).
- DOBB M.,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917* (1948).
- DOBB M., *On Economic Theory and Socialism* (1955).
- DOLLÉANS E., *Histoire du Mouvement Ouvrier* (I – II 1939).
- DONNITHORNE A., *Chinas Economics System* (1967).
- DORTICOS OSWALD, *Kuba – kako je vidi njen predsjednik* (Interw. 1967).
- DRAGIĆEVIĆ A., *Potreban rad i višak rada kao kategorije klasnog društva i njihovo odumiranje u socijalizmu* (1957).
- DRAGIĆEVIĆ A., *Reforma i revolucija* (1969).
- DRAPER THEODORE, *Castro 's Revolution, Myths and Realities* (1962).
- DUBČEK ALEKSANDAR, *Govor u Centralnom komitetu KP Čehosl.* (1968).
- DUNHAM BARROW, *Man against Myth* (1947).
- DUNHAM B. *Giant in Chains* (1953).
- DURKHEIM EMILE, *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 (1895).
- DUTSCHKE R., *Versuch, Lenin auf die Füße zu stellen* (1974).
- ĐILAS MILOVAN, *La nouvelle classe* (1957).
- ĐILAS M., *Die unvollkommene Gesellschaft* (1969).
- ĐURIĆ MIHAJLO, *Problemi sociološkog metoda* (1962).
- EGIDES M. P., *Osnovnoj vopros etiki kak filosofskoj nauki i problema npravstvennogo otčuzđenija* (1967).
- EICHORN WOLFGANG I, *Wie ist Ethik als Wissenschaft möglich?* (1965).

- Einundzwanzig Bogen aus der Schweiz* (1843).
- ENGELS FRIEDRICH, *Die Beduinen* (1838).
- ENGELS F., *Briefe aus Wuppertal* (1839).
- ENGELS F., *Aus Elberfeld* (1839).
- ENGELS F., *Die deutschen Volksbücher* (1839).
- ENGELS F., *Karl Beck* (1839).
- ENGELS F., *Retrograde Zeichen der Zeit* (1840).
- ENGELS F., *Platen* (1840).
- ENGELS F., *Modernes Literaturleben* (1840).
- ENGELS F., *Joel Jacoby* (1840).
- ENGELS F., *Requiem für die deutsche Adelszeitung* (1840).
- ENGELS F., *Ernst Moritz Arndt* (1841).
- ENGELS F., *Immermanns "Memorabilien"* (1841).
- ENGELS F., *Schelling über Hegel* (1841).
- ENGELS F., *Schelling und die Offenbarung; Kritik des neuesten Reaktionsversuchs gegen die freie Philosophie* (1842).
- ENGELS F., *Schelling, der Philosoph in Christo oder die Verklärung der Weltweisheit zur Gottesweisheit* (1842).
- ENGELS F., *Englische Ansicht über die innern Krisen* (1842).
- ENGELS F., *Die innern Krisen* (1842).
- ENGELS F., *Stellung der politischen Partei* (1842).
- ENGELS F.,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1842).
- ENGELS F., *Die Korngesetze* (1842).
- ENGELS F., *Friedrich Wilhelm IV, König von Preussen* (1843).
- ENGELS F., *Briefe aus London* (1843).
- ENGELS F., *Progress of Social Reform on the Continent* (1843).
- ENGELS F., *Umriss zu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 (1844).
- ENGELS F., *Položaj Engleske* (1844).

- ENGELS F., *Die Lage Englands* (članci 1844).
- ENGELS F. i K. MARX, *Die Heilige Familie* (1845).
- ENGELS F.,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1845).
- ENGELS F., *Grundsätze des Kommunismus* (1847).
- ENGELS F., *Der ungarische Kampf* (1849).
- ENGELS F., *Der demokratische Panславismus* (1849).
- ENGELS F., *Der deutsche Bauernkrieg* (1850).
- ENGELS F., *Deutschland und Panславismus* (1855).
- ENGELS F., *Die Bakuninisten an der Arbeit* (1873).
- ENGELS F.,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1878).
- ENGELS F., *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 (1883).
- ENGELS F., *Marx i "Nove rajnske novine"* (1884).
- ENGELS F., *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es* (1884).
- ENGELS F., *Prilog historiji saveza komunista* (1885).
- ENGELS F., *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1886).
- ENGELS F., *Seljačko pitanje u Francuskoj i Njemačkoj* (1894).
- ENGELS F., *Einleitung zu Marx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1894).
- ENGELS F., *Dialektik der Natur* (pisano 70-ih god., obj. 1925).
- ERNANDES HESUS, *Republikanska Španija i SSSR* (1953).
- Ernst Blochs Revision des Marxismus* (1957).
- FANON FRANTZ, *Die Verdammten dieser Erde* (1961).
- FEDOSEEV P. N., *Marksizm v XX veke* (1972).
- FETSCHER IRING, *Stalin über den Diamat* (1956).

- FETSCHER I., *Von Marx zur Sowjetideologie* (1957).
- FETSCHER I., *Die Sowjetgesellschaft und das Problem der Entfremdung* (1963).
- FETSCHER I., *Der Marxismus. Seine Geschichte in Dokumenten*, I – III (1962 – 1965).
- FETSCHER I., *Karl Marx und der Marxismus* (1967).
- FEUERBACH LUDWIG, *Gedanken über Tod und Unsterblichkeit* (1830).
- FEUERBACH L., *Zur Kritik der Hegel'sehen Philosophie* (1839).
- FEUERBACH L., *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 (1841).
- FEUERBACH L., *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 der Philosophie* (1843).
- FICHTE J. G., *Grundlage der gesamten Wissenschaftslehre* (1794).
- FICHTE J. G., *Die Grundzüge des gegenwärtigen Zeitalters* (1806).
- FICHTE J. G., *Die 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 (1808).
- FILIPOVIĆ FILIP, *Razvitak društva u ogledalu historijskog materijalizma* (1924).
- FILIPOVIĆ F., *Seljački pokret i agrarno pitanje u Jugoslaviji* (1929).
- FILIPOVIĆ MUHAMED, *Lenjin. Monografija njegove misli* (1968).
- FIORI GIUSEPPE, *Vita di A. Gramsci* (1966).
- FISCHER ERNST, *Von der Notwendigkeit der Kunst* (1959).
- FISCHER E., *Kunst und Koexistenz* (1966).
- FISCHER LOUIS, *Das Leben Lenins* (1964).
- FISCHER RUTH, *Stalin und der deutsche Kommunismus* (1948).
- FITZGERALD C. P., *Revolution in China* (1952).
- FLECHTHEIM O. K., *Die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48).
- FLEISCHER HELMUT, *Marx und Engels* (1970).
- FOCHT IVAN, *Istina i biće umjetnosti* (1959).

- FOCHT I., *Mogućnost, nužnost, slučajnost, stvarnost. Hegelovo učenje o odumiranju umjetnosti* (1961).
- FOGARASI BELA, *Logika* (1951).
- FOMINA V. A., *Filosofskie vzgljady G. V. Plehanova* (1955).
- FÖRDER HERWIG, *Marx und Engels am Vorabend der Revolution* (1960).
- FOUCAULT MICHEL, *Les mots et les choses* (1966).
- FRIEDRICH ENGELS (kol. aut. 1970).
- FRITZHAND MANFRED, *Philosophie und Ökonomie beim jungen Marx* (1960).
- FRITZHAND MAREK, *Etička misao mladog Marxa* (1961).
- FROMM ERICH, *Über Methode und Aufgabe einer analytischen Sozialpsychologie* (1932).
- FROMM E., *Bekstvo od slobode* (1941).
- FROMM E., *Čovjek za sebe* (1947).
- FROMM E., *Zdravo društvo* (1955).
- FROMM E., *Marx's Concept of Man* (1961).
- FROMM E., *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 (1962).
- FROMM E., *Umijeće ljubavi* (1962).
- FROMM E., *The Heart of Man* (1964).
- FROMM E., *Socialist Humanism: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kol. autora 1965).
- FROMM E., *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 (1973).
- FRY JOHN, *Marcuse. Dilemma and Liberation* (1974).
- GALL LUDWIG, *Was könnte helfen?* (1825).
- GARAUDY ROGER, *Les Sources françaises du Socialisme scientifique* (1948).
- GARAUDY R., *Grammaire de la Liberté* (1950).

- GARAUDY R., *La théorie matérialiste de la connaissance* (1953).
- GARAUDY R., *L'humanisme marxiste* (1958).
- GARAUDY R., *A propos d'un livre d'Henri Lefebvre: Initiation au marxisme ou initiation au revisionisme* (1958).
- GARAUDY R., *Perspectives de l'homme* (1959).
- GARAUDY R., *Rapport* (1962).
- GARAUDY R., *Le Dieu est mort* (1962).
- GARAUDY R., *D'un réalisme sans rivages* (1963).
- GARAUDY R., *Karl Marx* (1964).
- GARAUDY R., *Marxisme du 20^e siècle* (1966).
- GARAUDY R., *Pour un modèle français du socialisme* (1968).
- GARAUDY R., *Le grand tournant du socialisme* (1969).
- GARAUDY R., *Toute la vérité* (1970).
- GARIN EUGENIO, *Cronache della filosofia italiana 1900 – 1943* (1955).
- GAY PETER, *Das Dilemma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1952).
- GEORGI ELSBETH, *Theorie und Praxis des Generalstreiks in der modernen Arbeiterbewegung* (1908).
- GERLACH ERICH, *Karl Korsch und der Marxismus* (1963).
- GERLACH E., *Karl Korsch's Undogmatic Marxism* (1964).
-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I – VIII (1966).
- Gespräche mit Georg Lukács* (izd. T. Pinkus 1967).
- GEYER KURT., *Sozialismus und Rätssystem* (1919).
- FOLDMAN J. i K. KOUBA, *Privredni rast u ČSSR* (1967).
- GOLDMANN LUCIEN, *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 et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1947).
- GOLDMANN L., *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 et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1947). (Oba su članka objavljena s drugim studijama u knjizi *Recherches*

- dialectiques*) (1959).
- GOLDMANN L., *Sciences humaines et Philosophie* (1952).
- GOLDMANN L., *Le Dieu caché* (1955).
- GOLDMANN L., *Structuralisme, Marxisme, Existentialisme* (1966).
- GOLDMANN L., *Za sociologiju romana* (1964).
- GOLDMANN L., *Lukács et Heidegger* (1973).
- GOLUBOVIĆ ZAGORKA, *Čovek i njegov svet* (1973).
- GORKI MAKSIM, *Erinnerungen an Zeitgenossen* (1928).
- GORSKI D. P., *Logika* (1958).
- GORTER HERMANN, *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Für Arbeiter erklärt* (1909).
- GORTER H., *Der Imperialismus, der Weltkrieg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1915).
- GORTER H., *Offener Brief an den Genossen Lenin. Eine Antwort auf Lenins Broschüre: Der Radikalismus eine (sic!) Kinderkrankheit des Kommunismus* (1920).
- GORTER H., *Die Weltrevolution* (1918).
- GORTER H., *Der Opportunismus in der niederländische Kommunistischen Partei* (1921).
- GORTER H., *Die Klassenkampf-Organisation des Proletariats* (1921).
- GORTER H., *Die Moskauer Internationale* (1922).
- GORUPIĆ DRAGO, *Izbor radova* (1963).
- GORUPIĆ D., *Samoupravna organizacija poduzeća* (1969).
- GORZ ANDRE, *Stratégie ouvrière et neocapitalisme* (1964).
- GORZ A., *Le socialisme difficile* (1967).
- GORZ A., *Fondaments pour une morale* (1977).
- GOTTSCHALCH WILFRIED, *Strukturveränderungen der Gesellschaft*

- und politisches Handeln in der Lehre von Rudolf Hilferding* (1962).
- GOTTSCHALCH W., *Parlamentarismus und Rätedemokratie* (1968).
- GRAMSCI ANTONIO, *Sindikati i savjeti* (1919).
- GRAMSCI A., *Sindikalizam i savjeti* (1919).
- GRAMSCI A., *Sredstvo rada* (1920).
- GRAMSCI A., *Fabrički savjeti* (1920).
- GRAMSCI A., *Intelektualci i organizacija kulture* (1949). Ovaj rad, kao i dalje navedeni, pisani su u zatvoru između 1929. i 1935.
- GRAMSCI A., *Književnost i nacionalni život* (1949).
- GRAMSCI A., *Bilješke o Machiavelliju, o politici i o modernoj državi* (1952).
- GRAMSCI A., *Uvođenje u studij filozofije i historijskog materijalizma* (1955).
- GRAMSCI A., *Kritičke bilješke uz jedan pokušaj popularnog oglada sociologije* (1955).
- GRAMSCI A., *Neki problemi u proučavanju filozofije prakse* (1955).
- GRAMSCI A., *Filozofija B. Crocea* (1955).
- GRIMM TILEMANN, *Mao Tse-tung in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 (1968).
- GRLIĆ DANKO, *Umjetnost i filozofija* (1965).
- GRLIĆ D., *Zašto?* (1968).
- GRLIĆ D., *Estetika* (I 1974, II 1976).
- GROPP R. O., *Die marxistische dialektische Methode und ihr Gegensatz zur idealistischen Dialektik Hegels* (1954).
- GROPP R. O., *Zur Fragen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und des Dialektischen Materialismus* (1959).
- GROSSMANN HEINZ i NEGHT OSKAR, *Die Auferstehung der Gewalt, Springerblockade und politische Reaktion in der Bundesrepublik* (1968).

GROSSMANN HENRYK, *Zakon akumulacije i sloma kapitalističkog sistema* (1929).

GROSSMANN H., *Promjena prvobitnog plana izgradnje Marxovog "Kapitala"* (1930).

Gründungsdokument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Izdao Bert Andréas) (1969).

GRUPPI LUCIANO, *P. Togliatti e la via italiana al socialismo* (1974).

GUESDE JULES, *Essai de catéchisme socialiste* (1878).

GUESDE J., *Collectivisme et socialisme* (1879).

GUESDE J., *État morale et politique de classe* (1901).

GUEVARA ERNESTO CHE, *Der Partisanenkrieg* (1960).

GUEVARA E. CHE, *Guerillakrieg - eine Methode?* (1963).

GUEVARA E. CHE, *Der Sozialismus und der Mensch auf Cuba* (1965).

GUEVARA E. CHE, *Brandstiftung oder Neuer Friede?* (1969).

GUEVARA E. CHE, *Ökonomie und neues Bewusstsein* (1969).

GUSTAFSSON BO., *Marxismus und Revisionismus. E. Bernsteins Kritik des Marxismus und ihre ideengeschichtlichen Voraussetzungen* (1972).

HABERMAS JÜRGEN,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1962).

HABERMAS J., *Theorie und Praxis* (1963).

HABERMAS J., *Nachwort zu: Hegel, Politische Schriften* (1966).

HABERMAS J.,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1968).

HABERMAS J.,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1968).

HABERMAS J., i N. Luhmann,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 (1971).

HADŽI-VASILEV MITO, *Odraz - izraz* (1959).

HAHN ERICH, *Theoretische Probleme der marxistischen Soziologie*

- (1974)
- HALDANE J. B. S., *The Marxist Philosophy and the Science* (1938).
- HALLER v. C. L., *Restauration der Staatswissenschaft* (1816 – 1834).
- HANNAK JACQUES, *Karl Renner und seine Zeit* (1965).
- HAUPT GEORGES, *La Deuxième Internationale 1889 – 1914* (1964).
- HAVEMANN ROBERT, *Dialektik ohne Dogma* (1964).
- HEGEL G. W. F.,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1807).
- HEGEL G. W. F., *Wissenschaft der Logik* (1812).
- HEGEL G. W. F., *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1817).
- HEGEL G. W. F.,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1821).
- HEGEL G. W. F., *Begriff der Religion* (Iz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 der Religion, 1832).
- HEGEL G. W. F.,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1833 – 1836).
- HEGEL G. W. F. – D. NEDELJKOVIĆ, *Dijalektika* (1939).
- HEIDEGGER MARTIN, *Sein und Zeit* (1927).
- HEINE HEINRICH, *Französische Zustände* (1833).
- HEINE H., *Zur Geschichte der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 (1834).
- HEINTEL PETER, *System und Ideologie (Der Austromarxismus im Spiegel der Philosophie Max Adlers)* (1967).
- HÉLVETIUS C. A., *De l'Esprit* (1758).
- HÉLVETIUS C. A., *De l'Homme* (1772).
- HESS MOSES, *Die heilige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von einem Jünger*

Spinozas (1837).

HESS M., *Europäische Triarchie* (1841).

HESS M., *Die politischen Parteien in Deutschland* (1842).

HESS M., *Sozialismus und Kommunismus* (1843).

HESS M., *Philosophie der Tat* (1843).

HESS M., *Die Eine und ganze Freiheit* (1843).

HESS M., *Über die sozialistische Bewegung in Deutschland* (1845)

HESS M., *Über das Geldwesen* (1845).

HILFERDING RUDOLF, *Financijski kapital* (1910).

HILFERDING R., *Revolutionäre Politik oder Machtillusionen* (1920).

HILFERDING R., *State Capitalism or Totalitarian State Economy*
(1940).

HILFERDING R., *Das historische Problem* (1954).

HILLMANN GÜNTHER, *Marx und Hegel* (1966).

HILLMANN G., *Selbstkritik des Kommunismus* (1967).

Historija međunarodnog i socijalističkog pokreta (kol. aut., 1952).

HOBSBAWM E J., *Primitive Rebels* (1959).

HOBSBAWM E J., *The Age of Revolution* (1962).

HOFMANN WERNER, *Ideengeschichte der sozialen Bewegung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 (1962).

HÖHLE THOMAS, *Franz Mehring. Sein Weg zum Marxismus*
(1956).

HOLBACH PAUL., *Hrišćanstvo razgoličeno* (1761).

HOLBACH P., *System de la nature* (1781).

HOMMES JAKOB, *Der Technische Eros* (1955).

HOOK SIDNEY, *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 (1933).

HOOK S., *From Hegel to Marx* (1936).

HOOK S.,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Scientific Method* (1955).

HORKHEIMER MAX, *Bemerkungen über Wissenschaft und Krise* (1932).

HORKHEIMER M., *Materialismus und Methaphysik* (1933).

HORKHEIMER M., *Zum Problem der Voraussage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 (1933).

HORKHEIMER M., *Bemerkungen zur philosophischen Anthropologie* (1935).

HORKHEIMER M., *Philosophie und kritische Theorie* (1937).

HORKHEIMER M., *Der neueste Angriff auf die Metaphysik* (1937).

HORKHEIMER M., i TH.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1947).

HORKHEIMER M., *Pomračenje uma* (1947).

HOROWITZ IRVING LOUIS, *Radicalism and the Revolt against Reason. The Social Theories of Georges Sorel* (1961).

HORVAT BRANKO, *Ekonomaska teorija planske privrede* (1961).

HORVAT B., *Privredni ciklusi u Jugoslaviji* (1969).

HORVAT B., *Ogled o jugoslavenskom društvu* (1969).

HORVAT B., *Ekonomaska politika stabilizacije* (1976).

HRUŠČOV NIKITA, *Izveštaj na XX kongresu KPSS* (1956).

HRUŠČOV N., *Texte Intégral du Rapport secret de M. Khrouchtchev* (1956).

HUBERMAN L. i P M. SWEEZY, *Cuba, Anatomy of a Revolution* (1961).

Humanizam i socijalizam, I – II (kol. aut., 1963).

HYPOLITE JEAN, *Études sur Hegel et Marx* (1955).

IHLAU O., *Die Roten Kämpfer* (1969).

Imperialismus heute (kol. aut., 1965).

Istoričeskij materializm (red. F. V. Konstantinova) (1950).

- Istoria vsesojuznoj kommunističeskoj partii (boljševikov)* (1938).
- Istorija Kommunističeskoj partii Sovetskogo Sojuza* (red. B. N. Ponomarev) (1959).
- Istorija Kommunističeskoj partii Sovetskogo Sojuza* (red P. N. Pospelov) (I 1964, II 1966).
- JAKUBOWSKI F., *Ideologischer Überbau in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1936).
- JAURÈS JEAN, *De la Réalité du monde sensible* (1891).
- JAURÈS J., *Affaire Dreyfus* (1898).
- JAURÈS J., *L'Action socialiste* (1899).
- JAURÈS J., *Etudes socialistes* (1902).
- JAURÈS J., *L'Histoire socialist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1901 – 1908).
- JAY M.,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1973).
- JOKA MILE, *Paul Lafargue* (1974).
- JORDAN Z. A., *Philosophy and Ideology* (1963).
- JORDAN Z. A., *Marxistischer Revisionismus in Polen* (1968).
- JOVČUK M. T., *Leninism, filosofskie tradicii i sovremennost* (1970).
- JUŠKEVIČ P. S., *Materializm i kritičeskij realizm* (1908).
- KABAKADZE Z. M., *Ekzistencialnyi krizis i problema otčuždenija* (1967).
- KAEGI PAUL, *Genesis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1965).
- KALIVODA ROBERT, *Demokratisierung und kritisches Denken* (1968).
- KAMMLER JÖRG, *Politische Theorie von Georg Lukács* (1974).
- KANDELJ E. P. i KARPUŠIN V. A., *Još jednom o historijskoj sudbini misli mladog Marxa* (1964).
- KANGRGA MILAN, *Etički problem u djelu Karla Marxa* (1963).

- KANGRGA M., *Etika i sloboda* (1966).
- KANGRGA M., *Smisao povijesnog* (1970).
- KANGRGA M., *Čovjek i svijet* (1975).
- KANT IMMANUEL,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1781).
- KANT I.,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1788).
- KARDELJ EDVARD, *Razvoj slovenačkog nacionalnog pitanja* (1939).
- KARDELJ E., *Narodnooslobodilački odbori moraju postati istinski privremeni nosioci narodne vlasti* (1941).
- KARDELJ E., *O narodnoj demokratiji u Jugoslaviji* (1949).
- KARDELJ E., *Deset godina Narodne revolucije* (1951).
- KARDELJ E., *Socijalistička demokratija u jugoslavenskoj praksi* (1954).
- KARDELJ E., *Govor u Saveznoj narodnoj skupštini 7. dec. 1956* (1956).
- KARDELJ E., *Problemi socijalističke politike na selu* (1959).
- KARDELJ E., *Socijalizam i rat* (1960).
- KARDEU E., *Novi ustav Socijalističke republike Jugoslavije* (1962).
- KARDELJ E., *Društveno-ekonomski zadaci privrednog razvoja u narednom periodu* (1964).
- KARDELJ E., *Raskršća u razvitku našeg socijalističkog društva* (1969).
- KARDELJ E., *Radnička klasa, samoupravljanje i naučno tehnički progres* (1969).
- KARDELJ E., *Protivurječnosti društvene svojine u suvremenoj socijalističkoj praksi* (1972).
- KARDEU E., *Pravci razvoja političkog sistema socijalističkog samoupravljanja* (1977).

- KAROL K. S., *La deuxième révolution chinoise* (1973).
- Kategorii materialističkoj dialektiki* (kol. aut., 1956).
- KAUTSKY BENEDIKT, *Geistige Strömungen im österreichischen Sozialismus* (o. J.).
- KAUTSKY KARL, *Thomas More i njegova utopija* (1887).
- KAUTSKY K., *Ekonomska učenja Karla Marxa* (1887).
- KAUTSKY K., *Klasne suprotnosti u razdoblju Francuske revolucije* (1889).
- KAUTSKY K., *Das Erfurter Programm in seinem grundsätzlichen Teil erläutert* (1892).
- KAUTSKY K., *Preteče novijeg socijalizma* (1894).
- KAUTSKY K., *Agrarno pitanje* (1899).
- KAUTSKY K., *Ethik und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1906).
- KAUTSKY K., *Sozialismus und Kolonialpolitik* (1907).
- KAUTSKY K., *Nationalität und Internationalität* (1907 – 1908).
- KAUTSKY K., *Porijeklo kršćanstva* (1908).
- KAUTSKY K., *Der Weg zur Macht* (1909).
- KAUTSKY K., *Parlamentarismus und Demokratie* (1911).
- KAUTSKY K., *Der politische Massenstreik.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Massenstreikdiskussion innerhalb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1914).
- KAUTSKY K., *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1918).
- KAUTSKY K., *Terrorismus und Kommunismus* (1919).
- KAUTSKY K., *Demokratie oder Diktatur* (1919).
- KAUTSKY K., *Von der Demokratie zur Staatssklaverei* (1921).
- KAUTSKY K.,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I, II 1927).
- KEDROV B. M., *Engels i estestvoznanie* (1947).

- KEDROV B. M., *Postepennost kak odna iz form perehoda ot starogo kačestva k novomu kačestvu* (1954).
- KIDRIČ BORIS, *Diskusija na VI kongresu KPJ* (1952).
- KLAGES HELMUT, *Technischer Humanismus, Philosophie und Soziologie der Arbeit bei K. Marx* (1964).
- KLAUS GEORG, *Moderne Logik* (1958).
- KLAUS G., *Kibernetik in philosophischer Sicht* (1961).
- KLAUS G., *Spezielle Erkenntnistheorie* (1965).
- KNIRSCH PETER, *Die oekonomischen Anschauungen Nicolai I. Bucharins* (1959).
- Književne sveske* (kol. aut., 1940).
- KOCH HANS, *Franz Mehrings Beitrag zur marxistischen Literaturtheorie* (1959)
- KOFLER LEO, *Die Wissenschaft von der Gesellschaft* (izd. pod pseudonimom S. Warinski 1944).
- KOFLER L., *Zur Geschicht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1948).
- KOFLER L., *Das Wesen und die Rolle der Stalinistischen Bürokratie* (1952).
- KOFLER L., *Marxismus und Sprache* (1952).
- KOFLER L., *Geschichte und Dialektik* (1955).
- KOFLER L., *Marxistischer oder ethischer Sozialismus?* (1955).
- KOFLER L., *Die drei menschlichen Tragödien des XX Jahrhunderts* (1960).
- KOFLER L., *Perspektiven des revolutionären Humanismus* (1968).
- KOLAKOWSKI LESZEK, *Die Intellektuellen und die kommunistische Bewegung* (1956).
- KOLAKOWSKI L., *Wovon leben die Philosophen* (1956).
- KOLAKOWSKI L., *Aktuelle und nichtaktuelle Begriffe* (1957).

KOLAKOWSKI L., *Von der Richtigkeit der Maxime "der Zweck heiligt die Mittel"* (1957).

KOLAKOWSKI L., *Vertantwortung und Geschichte* (1957). (Svi ti članci su objavljeni u knjizi *Der Mensch ohne Alternative* (1960), a dva slijedeća članka u knjizi *Filozofski eseji* (1964).

KOLAKOWSKI L., *Karl Marx i klasična definicija istine* (1959).

KOLAKOWSKI L., *O teološkom nasljeđu u suvremenom mišljenju* (1959).

KOLB EBERHARD, *Die Arbeiterräte in der deutschen Innenpolitik 1918/1919* (1962).

Kollektiv i ličnosti (kol. aut., 1968).

KOLLONTAJ ALEKSANDRA, *Die Arbeiteropposition* (1921).

Kommunizm i kuljtura (kol. aut., 1966).

KORAĆ MILADIN, *Problemi teorije i prakse socijalističke robne proizvodnje u Jugoslaviji* (kol. aut., 1965).

KORAĆ VELJKO, *Marx i savremena sociologija* (1962).

KORSCH KARL, *Was ist Sozialisierung?* (1919).

KORSCH K., *Grundsätzliches über Sozialisierung* (1920).

KORSCH K., *Das sozialistische und syndikalistische Sozialisierungsprogramm* (1919).

KORSCH K., *Die Sozialisierungsfrage vor und nach der Revolution* (1919).

KORSCH K., *Sozialismus und soziale Reform* (1920).

KORSCH KARL, *Arbeitsrecht für Betriebsräte* (1922).

KORSCH K., *Der Standpunkt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1922).

KORSCH K.,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1923).

KORSCH K., *Der gegenwärtige Stand des Problems "Marxismus und*

- Philosophie*" (1930).
- KORSCH K., *Karl Marx* (1938).
- KORSCH K., *Zur Philosophie Lenins* (1938).
- KORSCH K., *10 Thesen über Marxismus* (1950).
- KORSCH K., *Schriften zur Sozialisierung* (1969).
- KOSIK KAREL, *Dijalektika konkretnoga* (1963).
- KOSIK K., *Die Krise unserer Gegenwart* (1968).
- KOSOLAPOV R. J., *Kommunizm i svoboda* (1965).
- KREŠIĆ ANDRIJA, *Dijalektika politike* (1968).
- KREŠIĆ A., *Političko društvo i politička mitologija* (1968).
- KREŠIĆ A., *Kraljevstvo božje i komunizam* (1975).
-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heute, 100 Jahre "Kapital"* (kol. aut., 1968).
- KRIEGEL ANNIE, *Aux Origines du Communisme français 1914 - 1920, I, II* (1964).
- KRIEGEL A., *Les Communistes français* (1968).
- KRLEŽA MIROSLAV, *Dijalektički antibarbarus* (1939).
- KRLEŽA M., *Govor na Kongresu književnika u Ljubljani* (1952).
- KUMPMANN WALTER, *Franz Mehring als Vertreter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1966).
- LABRIOLA ANTONIO, *En mémoire du Manifeste du parti communiste* (1895).
- LABRIOLA A., *Le Matérialisme historique* (1896).
- LABRIOLA A., *Discorrendo di socialismo e di filosofia* (1898).
- LABRIOLA A., *A propos de la crise du Marxisme* (1899).
- LABRIOLA A., *Da un secolo all'altro* (1925).
- LABRIOLA ARTURO, *Karl Marx (L' économiste, Le socialiste)* (1923).

- LACAN JASQUES, *Ecrits* (1966).
- LADEMACHER HORT (Hrg), *Die Zimmerwalder Bewegung. Protokolle und Korrespondenz* (1967).
- LAFARGUE PAUL, *Pravo na lijenost* (1883).
- LAFARGUE P., *Ekonomski materijalizam K. Marxa* (1885).
- LAFARGUE P., *Neposredno poslije revolucije* (1887).
- LAFARGUE P., *Komunizam i ekonomska evolucija* (1892).
- LAFARGUE P., *Francuski jezik prije i poslije revolucije* (1894).
- LAFARGUE P., *Idealističko i materijalističko shvaćanje historije* (1895).
- LAFARGUE P., *Postanak i razvitak svojine* (1895).
- LAFARGUE P., *Ekonomski determinizam Karla Marxa* (1909).
- LAMONT CORLIS, *Humanism as a Philosophy* (1949).
- LANG RIKARD, *Međunarodna saradnja i ekonomski razvoj* (1955).
- LANGE F. A.,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1865).
- LANGE M. G., *Marxismus, Leninismus, Stalinismus* (1955).
- LANGE OSKAR, *Uvod u ekonometriju* (1948).
- LANGE O., *Teorija statistike* (1952).
- LANGE O., *Über einige Probleme des polnischen Weges zum Sozialismus* (1957).
- LANGE O., *Political Economy I* (1959).
- LANGE O., *Entwicklungstendenzen der modernen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1964).
- La révolte étudiante. Les animateurs parlent* (kol. aut., 1968).
- LASCHITZA A. i G. RADEZUN, *Rosa Luxemburg. Ihr Wirken in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1971).
- LASIĆ STANKO, *Sukob na književnoj ljevici 1928 – 1952* (1970).
- LASKI K., *Nacrt teorije socijalističke reprodukcije* (1965).

LASSALLE FERDINAND, *Philosophie des Herakleitos des Dunklen aus Ephesos* (1858).

LASSALLE F., *Franz von Sickingen* (1859).

LASSALLE F., *Das System der erworbenen Rechte* (1861).

LASSALLE F., *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litzsch, oder Kapital und Arbeit* (1864).

LAUFENBERG HEINRICH, *Der politische Streik* (1914).

LEFEBVRE HENRI, *Morceaux choisis de K. Marx* (1934).

LEFEBVRE H., *Le Nationalisme contre les Nations* (1937).

LEFEBVRE H., *Hitler au pouvoir. Bilan de cinq années de fascisme en Allemagne* (1938).

LEFEBVRE H. et N. GUTERMAN, *Morceaux choisis de Hegel* (1938).

LEFEBVRE H. et N. GUTERMAN, *Chairs de Lénine sur la dialectique de Hegel* (1938).

LEFEBVRE H., *Le 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 (1939).

LEFEBVRE H., *L'Existentialisme* (1946).

LEFEBVRE H., *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I 1947, II 1961).

LEFEBVRE H., *La Logique formelle et la Logique dialectique* (1947).

LEFEBVRE H., *La Pensée de K. Marx* (1948).

LEFEBVRE H., *La Pensée de Lénine* (1957).

LEFEBVRE H., *Marksizam i francuska misao* (1957).

LEFEBVRE H., *Problèmes actuels du marxisme* (1958).

LEFEBVRE H., *La Somme et le reste* (1959).

LEFEBVRE H., *Introduction à la Modernité* (1962).

LEFEBVRE H., *Le langage et la société* (1966).

LEFEBVRE H., *Position: contre les technocrates* (1967).

LEFEBVRE H., *Sur une interprétation du marxisme* (1967).

- LEFEBVRE H., *Le Droit à la ville* (I 1968, II 1973).
- LEFEBVRE H., *Révolution urbaine* (1970).
- LEFEBVRE H., *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1972).
- LEFEBVRE H.,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1974).
- LEFEBVRE H., *De l'Etat. I. L'Etat dans le monde moderne* (1976).
- LEICHTER OTTO, *Otto Bauer* (1970).
- LENIN VLADIMIR ILJIČ, *Čto takoe "druzja naroda" i kako oni vojujut protiv socialdemokratov?* (1894).
- LENIN V. I., *Ekonomičeskoe sodержanie narodničestva i kritika ego v knige g. Struve* (1895).
- LENIN V. I., *Razvitie kapitalizma v Rossii* (1899).
- LENIN V. I., *Čto delat?* (1902).
- LENIN V. I., *Šag vpered, dva šaga nazad* (1904).
- LENIN V. I., *Dve taktiki social-demokratii v demokratičeskoj revoljucii* (1905).
- LENIN V. I., *Predislovie k rus. per. broš. "K. Kautski, Dvižuščie sily i persp. ruskoj revoljucii"* (1907).
- LENIN V. I., *Predislovie k russ. perevodu broš. : "V. Libkneht, Nikakvih kompr., nik. izb. soglošenij!"* (1907).
- LENIN V. I., *K ocenke ruskoj revoljucii* (1908).
- LENIN V. I., *Materializm i empiriokriticizm* (1909).
- LENIN V. I., *Zametki publicista* (1913).
- LENIN V. I., *O narušenii edinstva, prikryvaemom krikami o edinstve* (1914).
- LENIN V. I., *O prave nacij na samoopredelenie* (1914).
- LENIN V. I., *O lozunge Soedinennyh Štatov Evropy* (1915).
- LENIN V. I., *Socializm i vojna* (1915).

- LENIN V. I., *Opportunizm i krah II Internacionala* (1916).
- LENIN V. I., *Socialističeskaja revoljucija i pravo nacij na samoopredelenie* (1916).
- LENIN V. I., *Voennaja programma proletarskoj revoljucii* (1917).
- LENIN V. I., *Imperializm, kak vysšaja stadija kapitalizma* (1917).
- LENIN V. I., *Pismo v CK, MK, PK i členam sovetov Pitera i Moskvy boljševikam* (pisano 1917, obj. 1921).
- LENIN V. I., *Sovety postoronnego* (pis. 1917, obj. 1920).
- LENIN V. I., *Pismo k tovariščam boljševikam, učastvujuščim na oblastnom sjezde sovetov Severnoj oblasti* (pis. 1917, obj. 1925).
- LENIN V. I., *Pismo k tovariščam* (1917).
- LENIN V. I., *Pismo k členam partii boljševikov* (pis. 1917 obj. 1927).
- LENIN V. I., *Krizis nazrel* (1917).
- LENIN V. I., *Pismo členam CK od 24. okt. 1917* (obj. 1924).
- LENIN V. I., *Rezoljucija CKRSDRP (b) po voprosu ob opozicii vnuti CK* (pis. 1917, potpuno obj. 1932).
- LENIN V. I., *Uljtimum boljšinstva CKRSDRP (b) menjšinstvu* (pis. 1917, obj. 1922).
- LENIN V. I., *Proekt položenija o rabočem kontrole* (1917).
- LENIN V. I., *Rezoljucija po povodu otkaza "levyh kommunistov" vojti v CK* (1918).
- LENIN V. I., *Zaključiteljnoe slovo po doklade o vojne i mire* (pis. 1918, obj. 1919).
- LENIN V. I., *Strannoe i čudoviščnoe* (1918).
- LENIN V. I., *Vystuplenija na zasedanii CKRSDRP (b)* (1918, potpuno obj. 1928).
- LENIN V. I., *Očerednye zadači sovetskoj vlasti* (1918).

- LENIN V. I., *Gosudarstvo i revoljucija* (1918).
- LENIN V. I., *Proletarskaja revoljucija i renegat Kautski* (1918).
- LENIN V. I., *Reč pamjati J. M. Sverdlova na ekstrennom zasedanii VCIK* (1919).
- LENIN V. I., *Doklad o partijnoj programme* (1919).
- LENIN V. I., *Doklad o rabote v derevne* (1919).
- LENIN V. I., *Reč pri otkritii Kongresa 2 marta* (1919).
- LENIN V. I., *Tretij Internacional i ego mesto v istorii* (1919).
- LENIN V. I., *Velikij počin* (1919).
- LENIN V. I., *Detskaja boleznj "levizny" v kommunizme* (1920).
- LENIN V. I., *Naše vnešnee i vnutrennee položenie i zadači partii* (1920).
- LENIN V. I., *Pervonačalnyj nabrosok tezisov po nacionalnomu i kolonijalnomu voprosam* (1920).
- LENIN V. I., *Doklad o meždunarodnom položenii i osnovnyh zadačah kommunističeskogo internacionala* (1920).
- LENIN V. I., *O professionalnyh sojuzah, o tekuščem momente i ob ošibkah Trockogo* (1921).
- LENIN V. I., *Krizis partii* (1921).
- LENIN V. I., *Zaključiteljnoe slovo po otčetu CKRKP (b)* (1921).
- LENIN V. I., *Pervonačalnyj projekt rezoljucii X sjezda RKP (b) o sindikalistkom i anarhistkom uklone v našej partii* (1921).
- LENIN V. I., *O prodovoljstvennom naloge* (1921).
- LENIN V. I., *Ešče raz o profsojuzah, o tekuščem momente i ob ošibkah tov. Trockogo i Buharina* (1921).
- LENIN V. I., *Političeskij otčet CKRKP (b) na XI kongr.* (1922).
- LENIN V. I., *O značenii vojnstvujuščego materializma* (1922).
- LENIN V. I., *Pismo k sjezdu. K voprosu o nacionalnostjah ili ob "av-*

- tonomizaciji" (1922, obj. 1956).
- LENIN V. I., *Kak nam reorganizovat Rabkrin* (1923).
- LENIN V. I., *Lušče menjše, da lušče* (1923).
- LENIN V. I., *Filosofskie tetradi* (glavni dio pisan 1914 – 1916, objavljeno 1929 – 1930).
- LENIN V. I., *Izabrana pisma* (1956).
- LENIN V. I., (biogr., 1960).
- Leninskaja teorija socialističeskoj revoljucii* (kol. aut., 1972)
- LEO HEINRICH, *Die Hegelingen* (1838).
- LEONHARD WOLFGANG, *Die Dreispaltung des Marxismus. Ursprung und Entwicklung des Sowjetmarxismus, Maoismus und Reformkommunismus* (1970).
- LEONHARD W., *Am Vorabend einer neuen Revolution?* (1975)
- LEONOV M. A., *Očerk dialektičeskogo materializma* (1948).
- LEONTJEV L. A., "Kapital" K. Marksa i sovremennaja epoha (1968).
- LESER NORBERT, *Zwischen Reformismus und Bolschewismus* (1968).
- Les Marxistes répondent à leurs Critiques catholiques* (kol. aut., 1957).
- LEVI PAUL, *Unser Weg. Wider den Putschismus* (1921).
- LÉVY BRUHL LUCIEN, *La morale et la science des moeurs* (1903).
- LÉVY BRUHL L., *Les Fonctions mentales dans les Sociétés inférieurs* (1910).
- LÉVY BRUHL L., *La mentalité primitive* (1922).
- LÉVY BRUHL L., *L'Ame primitive* (1927).
- LEVY HYMEN, *Social Thinking* (1945).

- LÉVY-STRAUSS CLAUDE, *Triste tropique* (1955).
- LÉVY-STRAUSS C., *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 (1958).
- LÉVY-STRAUSS C., *La pensée sauvage* (1962).
- LIBERMAN J., *Plan, dobit, premija* (1962).
- LICHTHEIM GEORGE, *Marxism. 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 (1961).
- LICHTHEIM G., *Marxism in Modern France* (1966).
- LIEBKNECHT KARL, *Militarismus und Antimilitarismus* (1907).
- LIEBKNECHT K., *Klassenkampf gegen den Krieg* (1919).
- LIEBKNECHT K., *Studien über die Bewegungsgesetz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1922).
- LIEBKNECHT WILHELM, *Wissen ist Macht – Macht ist Wissen* (1872).
- LIEBKNECHT W., *Zur Grund – und Bodenfrage* (1876).
- LIEBKNECHT W., *Geschichte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1890).
- LIEBKNECHT W., *Robert Owen* (1892).
- LIEBKNECHT W., *Karl Marx zum Gedächtnis* (1896).
- LIEBMANN MARCEL, *Le Léninisme sous Lénine* (1973).
- Lire le Capital* (kol. aut., I, II 1965).
- LISENKO T. D., *O stanju u biološkoj nauci* (1948).
- LANDAU RUDOLF, *Franz Mehring zu seinem 100 Geburtstag* (1946).
- LOBKOWICZ N., *Marxismus-Leninismus in der ČSR* (1961).
- LOUIS PAUL, *Histoire du socialisme en France* (1946).
- LÖWITH KARL, *Vom Hegel zu Nietzsche* (1941).
- LUDZ PETER Chr., *Soziologie und Marxismus in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I, II* (1972).
- LUKÁCS GEORG, *Die Seele und die Formen* (1911).

- LUKÁCS G., *Die Theorie des Romans* (1916).
- LUKÁCS G.,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1923).
- LUKÁCS G., *Lenin, Studie über den Zusammenhang seiner Gedanken* (1924).
- LUKÁCS G., *N. Bucharin: Theor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1925).
- LUKÁCS G., *Moses Hess und die Probleme der idealistischen Dialektik* (1926).
- LUKÁCS G., *Mein Weg zu Marx* (1933).
- LUKÁCS G., *Fortschritt und Reaktion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1947).
- LUKÁCS G., *Goethe und seine Zeit* (1947).
- LUKÁCS G., *Der junge Hegel* (1948).
- LUKÁCS G., *Existentialisme ou marxisme?* (1948).
- LUKÁCS G., *Beiträge zu Geschichte der Aesthetik* (1954).
- LUKÁCS G., *Probleme des Realismus* (1955).
- LUKÁCS G., *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 (1955).
- LUKÁCS G., *Današnji značaj kritičkog realizma* (1957).
- LUKÁCS G., *Postscriptum* (1957).
- LUKÁCS G., *Prolegomena za marksističku estetiku* (1957).
- LUKÁCS G., *Pismo o staljinizmu* (1962).
- LUKÁCS G., *Ästhetik, Teil I. Die Eigenart des Ästhetischen, I, II* (1963).
- LUKIĆ RADOMIR, *Opšta teorija države i prava* (1956).
- LUKIĆ R., *Društvena svojina i samoupravljanje* (1964).
- LUNAČARSKI ANATOLI, *Profile der Revolution* (1919).
- LUPORINI CESARE, *Filosofi vecchi e nuovi* (1947).
- LUPORINI C., *La mente di Leonardo* (1953).

- LUPORINI C., *Voltaire e le "Lettres philosophiques"* (1955).
- LUPORINI C., *La consapevolezza storica del marxismo* (1955).
- LUPORINI C., *Verità e libertà* (1960).
- LUPORINI C., *Appunti per una discussione tra i filosofi marxisti in Italia* (1962).
- LUPORINI C., *Il circolo concreto-astratto-concreto* (1962).
- LUPORINI C., *"Rovesciamento" e il metodo nella dialettica marxista* (1963).
- LUPORINI C., *Realtà e storicità* (1966).
- LUPORINI C., *Introduzione a L'ideologia tedesca* (1968).
- LUXEMBURG ROSA, *Die industrielle Entwicklung Polens* (1898).
- LUXEMBURG R., *Socijalna reforma ili revolucija* (1898 – 1899).
- LUXEMBURG R., *Organisationsfragen in der russischen Sozialdemokratie* (1904).
- LUXEMBURG R., *Massenstreik, Partei und Gewerkschaften* (1906).
- LUXEMBURG R., *Nationalfrage und die Autonomie* (1908 – 1909).
- LUXEMBURG R., *Akumulacija kapitala* (1913).
- LUXEMBURG R., *Akumulacija kapitala ili šta su epigoni učinili od Marxove teorije. Antikritika* (1913).
- LUXEMBURG R., *Die Krise der Sozialdemokratie* (1916).
- LUXEMBURG R., *Der Anfang* (1918).
- LUXEMBURG R., *Die Nationalversammlung* (1918).
- LUXEMBURG R., *Nationalversammlung oder Räteregierung* (1918).
- LUXEMBURG R., *Die Wahlen zur Nationalversammlung* (1918).
- LUXEMBURG R., *Was will der Spartakusbund?* (1918).
- LUXEMBURG R.,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pis. 1918, obj. 1922).
- MACCIOCCHI M. A., *Per Gramsci* (1974).
- MACKEY J. H., *Max Stirner,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1898).

- MALLET SERGE, *La nouvelle classe ouvrière* (1963).
- MAN DE HENRIK, *Zur Psychologie des Sozialismus* (1926).
- MAN DE H., *Der Sozialismus als Kulturbewegung* (1926).
- MAN DE H., *Der Kampf um die Arbeitsfreude* (1927).
- MAN DE H., *Die sozialistische Idee* (1933).
- MANDEL ERNEST, *Traité d'économie marxiste* (I, II 1962).
- MANDEL E., *La formation de la pensée économique de Karl Marx* (1967).
- MANDEL E., *Kritik des Wachstumstheorie im Geiste des "Kapitals"* (1968).
- MANDEL E., *Leçons de Mai* (1968).
- MANDEL E., *Spätkapitalismus* (1972).
- MANDIĆ OLEG, *Od kulta lubanje do kršćanstva* (1954).
- MANNHEIM KARL, *Ideologie und Utopie* (1929).
- MAO CE-TUNG, *O klasama kineskog društva* (1926).
- MAO CE-TUNG, *Referat o ispitivanju seljačkog pokreta u provinciji Hunan* (1927).
- MAO CE-TUNG, *Iz iskre može da bukne požar* (1930).
- MAO CE-TUNG, *Strategijska pitanja revolucionarnog rata u Kini* (1936).
- MAO CE-TUNG, *O protivrječnostima* (1937).
- MAO CE-TUNG, *O praksi* (1937).
- MAO CE-TUNG, *Nova faza* (1938).
- MAO CE-TUNG, *O dugotrajnom ratu* (1938).
- MAO CE-TUNG, *Pitanja strategije u partizanskom ratu* (1938).
- MAO CE-TUNG, *Kineska revolucija i komunistička partija Kine* (1939).
- MAO CE-TUNG, *Kineska nova demokracija* (1941).

- MAO CE-TUNG, *O koalicionoj vladi* (1945).
- MAO CE-TUNG, *Današnja situacija i naši zadaci* (1947).
- MAO CE-TUNG, *O diktature narodnoj demokratii* (1949).
- MAO CE-TUNG, *O ispravnom tretiranju suprotnosti u narodu* (1947).
- MARCUSE HERBERT, *Beiträge zu einer Phänomenolog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1928).
- MARCUSE H., *Zum Problem der Dialektik* (1932).
- MARCUSE H., *Neue Quellen zur Grundlegung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1932).
- MARCUSE H., *Hegels Ontologie und die Grundlegung einer Theorie der Geschichtlichkeit* (1932).
- MARCUSE H., *Über die philosophischen Grundlagen des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sbegriffs* (1933).
- MARCUSE H., *Der Kampf gegen den Liberalismus in der totalitären Staatsauffassung* (1934).
- MARCUSE H., *Philosophie und kritische Theorie* (1937).
- MARCUSE H., *Zur Kritik des Hedonismus* (1938).
- MARCUSE H., *Um i revolucija* (1941).
- MARCUSE H., *Eros i civilizacija* (1955).
- MARCUSE H., *Soviet Marxism* (1958).
- MARCUSE H., *Čovjek jedne dimenzije* (1964).
- MARCUSE H., *Repressive Toleranz* (1965).
- MARCUSE H., *Carstvo slobode i carstvo nužnosti. Jedno preispitivanje* (1969).
- MAREK FRANZ, *Philosophie der Weltrevolution* (1966).
- MARKOS P., *Šta je to o čemu se diskutira* (1968).
- MARKOVIĆ MIHAJLO, *Revizija filozofskih osnova marksizma u SSSR-u* (1952).

- MARKOVIĆ M., *Formalizam u savremenoj logici* (1957).
- MARKOVIĆ M., *Dijalektička teorija značenja* (1961).
- MARKOVIĆ M., *Marksistički humanizam i problem vrijednosti* (1962).
- MARKOVIĆ M., *Humanizam i dijalektika* (1967).
- MARKOVIĆ M., *Preispitivanja* (1972).
- MARKOVIĆ SIMA, *Princip kauzaliteta i moderna fizika* (1935).
- MARKOVIĆ SVETOZAR, *Pariska komuna i Internacionala* (1871).
- MARKOVIĆ S., *Srbija na Istoku* (1872).
- MARKOVIĆ S., *Realni pravac u nauci i životu* (1873).
- Marks i savremenost* (I 1963, II 1964, III 1966).
- MARTINET GILLES, *Le Marxisme de notre temps* (1962).
- MÄRZ EDUARD, *Die Marxsche Wirtschaftslehre im Widerstreit der Meinungen* (1959).
- MARX KARL, *Wilde Lieder* (1841).
- MARX K., *Differenz der demokratischen und epikureischen Naturphilosophie* (pis. 1840 – 1841, obj. 1902).
- MARX K., *Debatten über die Pressfreiheit und Publikation der Landständischen Verhandlungen* (1842).
- MARX K., *Das philosophische Manifest der historischen Rechtsschule* (1842).
- MARX K., *Der leitende Artikel in Nr. 79 der Kölnischen Zeitung* (1842).
- MARX K., *Der Kommunismus und die 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 (1842).
- MARX K., *Debatten über das Holzdiebstahlggesetz* (1842).
- Marx K., *Bemerkungen über die neueste preussische Zensurinstruktion* (1843).
- MARX K., *Aus de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Kritik des*

- Hegelschen Staatsrechts* (261 – 313) (pis. 1843, obj. 1927).
- MARX K., *Zur Judenfrage* (1844).
- MARX K., *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Einleitung* (1844).
- MARX K.,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pis. 1844, obj. 1932).
- MARX K., *Pruski kralj i socijalna reforma. Od jednog Prusa* (1844).
- MARX K., *Thesen über Feuerbach* (pis. 1845, obj. 1888).
- MARX K., und F. ENGELS, *Die deutsche Ideologie* (pis. 1845 – 1846, obj. 1932).
- MARX K.,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1847).
- MARX K., und F. ENGELS,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1848).
- MARX K., *Najamni rad i kapital* (1849).
- MARX K., *Klasne borbe u Francuskoj od 1848 – 1850* (1850).
- MARX K. i F. ENGELS, *Adresa centralne uprave Saveza komunista* (1850).
- MARX K. i F. ENGELS, *Revolucija i kontrarevolucija u Njemačkoj* (1851 – 1852).
- MARX K., *Osamnaesti brumaire Louisa Bonaparta* (1852).
- MARX K.,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ss zu Köln* (1853).
- MARX K.,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 (pis. 1857 – 1858, obj. I 1939, II 1941).
- MARX K.,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1859).
- MARX K., *Gospodin Vogt* (1861).
- MARX K., *Instrukcije delegatima privremenog Generalnog savjeta o pojedinim pitanjima* (1866).

- MARX K., *Kapital* (I 1867, II 1885, III 1894).
- MARX K., *Zweite Adresse über den Deutsch-Französischen Krieg* (1871).
- MARX K., *Erster Entwurf zum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pis. 1871, obj. 1934).
- MARX K., *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1871).
- MARX K., *Opći statut Međunarodnog radničkog udruženja* (1871).
- MARX K., *Rede über den Haager Kongress* (1872).
- MARX K. et F. engels, *L'Alliance de la Démokratie Socialiste et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1873).
- MARX K., *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 (pis. 1875, obj. 1891).
- MARX K., *Nadnica, cijena i profit* (pis. 1865, obj. 1898).
- MARX K., *Pisma Kugelmannu* (obj. 1902).
- MARX K., *Teorije viška vrijednosti* (1905 – 1910).
- MARX K. und F. ENGELS, *Briefwechsel, I – IV* (1913).
- MARX K. und F. ENGELS, *Briefe an Bebel, Liebknecht, Kautsky und andere* (1933).
- MAR X K. i F. ENGELS, *Odabrana pisma* (1956).
- Marxism and Democracy* (kol. aut., 1965).
- Marxism and Alienation* (kol. aut., 1965).
- Marxisme et existentialisme. Controverse sur la dialectique* (1962).
- Marxistische Philosophie* (kol. aut., 1967).
- MASARYK THOMÁŠ, *Die philosophischen und soziologischen Grundlagen des Marxismus* (1899).
- Materialien zur Revolution* (kol. aut., 1968).
- MATTHIAS ERICH, *Kautsky und der Kautskyanismus* (1957).
- MATTICK PAUL, *Kritik an Herbert Marcuse – Der Eindimensionale Mensch in der Klassengesellschaft* (1969).

- MATTICK P., *Marx and Keynes* (1969).
- MAYER GUSTAV, *Friedrich Engels*, I – II (1934).
- Mc LELLAN DAVID, *Karl Marx. Life and Thought* (1973).
- MEHNERT KLAUS, *Maos zweite Revolution* (1966).
- MEHRING FRANZ, *Lessing-Legende* (1893).
- MEHRING F., *Über den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1893).
- MEHRING F.,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I – IV (1897 – 1898).
- MEHRING F., *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 Marx, F. Engels und F. Lassalle*, I – IV (1902).
- MEHRING F., *Wesen und Zeitbedingtheit der Philosophie* (1904).
- MEHRING F., *Sozialistische Ethik* (1906).
- MEHRING F.,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1910).
- MEHRING F.,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Ausgang des Mittelalters* (1910 – 1911).
- MEHRING F., *Karl Marx* (1918).
- MERKER NICOLAO, *Le origini della logica hegeliana* (1961).
- MERLEAU – PONTY M., *Les Aventures de la Dialectique* (1955).
- Mésaventures de l'anti-marxisme* (kol. aut., 1956).
- MICHELS ROBERT, *Geschichte des Marxismus in Italien* (1907).
- MICHELS R., *Zur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 (1911).
- MIKECIN VJEKOSLAV, *Suvremena talijanska filozofija* (1966).
- MIKECIN V., *Marksisti i Marx* (1968).
- MILIĆ VOJIN, *Sociološki metod* (1965).
- MILOSAVLEVSKI SLAVKO, *Sojuzot na komunistite na Jugoslavija vo sistemot na socijalističkata demokratija* (1965).
- MILLS C. W.,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1951).

- MILLS C. W., *The Power Elite* (1956).
- MILLS C. W.,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1959).
- MISCH JÜRGEN, *Die politische Philosophie Ludwig Woltmanns* (1975).
- MITIN, JUDIN, RAUCEVIČ, *O novyh zadačah marksistko-leninskoj filosofii* (1930).
- MITIN M., *Za dejstviteljniju razrabotku leninskogo filosofskogo nasledstva* (1930).
- MITIN M., *Naši filosofskie raznoglasija* (1930).
- MITIN M., *K itogam filosofskoj diskusii* (1931).
- MITIN M., *Stalin i materialističeskaja dialektika* (1933).
- MITIN M., *Akseljrod "Idealističeskaja dialektika Gegela i materialističeskaja dialektika Marksa"* (1934). Ti članci objavljeni su i posebno u zborniku s drugim radovima pod nasi. "Boevye voprosy materialističeskoj dialektiki" (1936).
- MODZELEWSKI K. i J. KURON, *Offener Brief an die "Vereinigte Polnische Arbeiterpartei"* (1968).
- MONDOLFO RODOLFO, *Il materialismo storico in Federico Engels* (1912).
- MORIZET ANDRÉ *Chez Lénine et Trotsky* (1922).
- MOSZKOWSKA NATALIE, *Das Marxsche System. Ein Beitrag zu dessen Ausbau* (1929).
- MOSZKOWSKA N., *Zur Kritik moderner Krisentheorien* (1935).
- MOSZKOWSKA N., *Zur Dynamik des Spätkapitalismus* (1943).
- MOUGIN HENRI, *La Sainte famille existentialiste* (1947).
- MOUNIER EMANUEL, *Le Personalisme* (1949).
- MÜHSAM ERICK, *Von Eisner bis Leviné* (1929).
- MÜHSAM E., *Befreiung der Gesellschaft vom Staat* (1932).

- MUJBEGOVIĆ VERA, *Komunistička partija Njemačke u periodu poslijeratne krize 1918 – 1923* (1968).
- MÜLLER RICHARD, *Was die Arbeiterräte wollen und sollen* (1919).
- MUMINOVIĆ RASIM, *Filozofija Ernesta Blocha* (1973).
- Nachrichten aus ČSSR* (1968).
- NAEF E., *Zur Geschichte des französischen Syndikalismus* (1953).
- NATORP PAUL, *Sozialpädagogik, Theorie der Willensbildung auf der Grundlage der Gemeinschaft* (1899).
- NATORP P., *Sozialidealismus* (1920).
- Naučnij komunizam* (kol. aut., 1965).
- NAVILLE PIERRE, *Psychologie, Marxisme, Matérialisme* (1946).
- NAVILLE P., *De l'Aliénation à la Jouissance* (1957).
- NAVILLE P., *Le Salaire socialiste* (2, 3 1970, 4 1974, 5 1972).
- NEDEUKOVIĆ DUŠAN, *Ideološki sukob demokratije i fašizma* (1938).
- NEDEUKOVIĆ D., *Anti-Bergson* (1939).
- NEDELJKOVIĆ D., *Komentari Hegelovoj Logici* (Dijalektika 1939).
- NEDELJKOVIĆ D., *Humanizam Marksove dijalektike i dijalektika humanizma danas* (1968).
- NEDEUKOVIĆ D., *Dijalektika na delu* (1976).
- NETTL J. P., *Rosa Luxemburg, I-II* (1966).
- Očerki po filozofii marksizma* (kol. aut., 1908).
- OERTZEN v. PETER, *Betriebsräte in der Novemberrevolution* (1963).
- OJZERMAN T. I., *Formirovanie filozofii marksizma* (1962).
- OJZERMAN T. I., *Problemy istoriko-filozofskoj nauki* (1969).
- O nekim problemima privrednog sistema* (kol. aut., 1963).
- OPPOLZER ALFRED, *Entfremdung und Industriearbeit* (1974).

- Oslobodilački rat naroda Jugoslavije* (1941 – 1945) (I – II, 1957 – 1959).
- Osnovy marksističkoj filosofii* (red. F. V. Konstantinova, 1958).
- OSSOWSKI STANISLAW, *Osnove estetike* (1949).
- OSSOWSKI S., *Marksizam i naučna djelatnost u socijalističkom društvu* (1957).
- OSSOWSKI S., *Klasna struktura u društvenoj svijesti* (1957).
- OSSOWSKI S., *O specifičnosti društvenih nauka* (1962).
- Ot socializma k komunizmu* (kol. aut., 1962).
- PALMIER JEAN MICHEL, *Marcuse et la nouvelle gauche* (1973).
- PANNEKOEK ANTON, *Umwälzungen im Zukunftstaat* (1906).
- PANNEKOEK A., *Ethik und Sozialismus* (1906).
- PANNEKOEK A., *Der Kampf der Arbeiter* (1907).
- PANNEKOEK A., *Marxismus und Darwinismus* (1909).
- PANNEKOEK A., *Die taktischen Differenz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 (1909).
- PANNEKOEK A., *Klassenkampf und Nation* (1912).
- PANNEKOEK A., *Massenaktion und Revolution* (1912).
- PANNEKOEK A., *Die Entwicklung der Weltrevolution und die Taktik des Kommunismus* (1920).
- PANNEKOEK A., *Der neue Blanquismus* (1920).
- PANNEKOEK A., *Lenin als Philosoph* (1938, njem izd. 1969).
- PANNEKOEK A., (P. AARTSZ), *De Arbeidersraden* (1946).
- PANNEKOEK A. i H. GORTER, *Organisation und Taktik der proletarischen Revolution* (1969).
- PANTIĆ VLADAN, *Radnička veća u Nemačkoj 1917 – 1920* (1972).
- PAPI FULVIO, *Il pensiero di Antonio Gramsci* (1961).
- PASCAL BLAISE, *Pensées* (1670).

PASCHUKANIS E. B., *Allgemeine Rechtslehre und Marxismus* (1924).

PAŠIĆ NAJDAN, *Klase i politika* (1968).

PAVIČEVIĆ VUKO, *Uvod u etiku* (1962).

PAVLOV TODOR, *Teorija odraza* (1936).

PAVLOV T., *La Philosophie matérialiste dialectique et les Sciences particulières* (1956).

PAŽITNOV L. N., *U istokov revoljucionnogo perevorota v filosofii* (1960).

PEČUJLIĆ MIROSLAV, *Klase i savremeno društvo* (1967).

PEČUJLIĆ M., *Susret svetova* (1976).

PEJOVIĆ D., *Protiv struje* (1965).

PEŠIĆ-GOLUBOVIĆ ZAGA, *Antropologija kao društvena nauka* (1967).

PETRINOVIĆ IVO, *Partija radničke klase u koncepciji Antonija Gramscija* (1967).

PETRINOVIĆ I., *Koncepcija Komunističke partije Italije o talijanskom putu u socijalizam* (1969).

PETRINOVIĆ GAJO, *Filozofija u SSSR-u od oktobarske revolucije do 1938* (1952 – 1953).

PETRINOVIĆ G., *Filozofski pogledi G. V. Plehanova* (1957).

PETRINOVIĆ G., *Filozofija i marksizam* (1965).

PETRINOVIĆ G., *Mogućnost čovjeka* (1969).

PETRINOVIĆ G., *Filozofija i revolucija* (1973, I njem. izd. 1971).

PFAFF DIETER, *Die Entwicklung der sowjetischen Rechtslehre* (1968).

PIAGET JEAN. *Introduction à l'Epistémologie génétique* (1950).

PIJADE MOŠA, *O tridesetgodišnjici Komunističke partije Jugoslavije*

(1949).

PJANIĆ ZORAN, *Problem stanovništva u ekonomskoj teoriji* (1957).

PLEHANOV G. V., *Socializam i političeskaja borba* (1883).

PLEHANOV G. V., *Naši raznoglasija* (1885).

PLEHANOV G. V., *K voprosu o razvitii monističeskogo vzgljada na istoriju* (1895).

PLEHANOV G. V.,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1896).

PLEHANOV G. V., *O materialističeskom ponimanii istorii* (1897).

PLEHANOV G. V., *K voprosam o roli ličnosti v istorii* (1898).

PLEHANOV G. V., *Još jednom materijalizam* (1898).

PLEHANOV G. V., *Pisma bez adresa* (1899 – 1900).

PLEHANOV G. V., *O knjizi Masaryka* (1901).

PLEHANOV G. V., *Francuzskaja dramatičeskaja literatura i francuzskaja živopis XVIII v. s točki zrenija sociologii* (1905).

PLEHANOV G. V., *Predislovie perevodčika ko 2-mu izdaniju broš. F. Engelsa "L. F. i kraj klas. nem. fil."* (1905).

PLEHANOV G. V., *Filosofskaja evoljucija Marksa* (predav. 1906).

PLEHANOV G. V., *Predgovor trećem izdanju zbornika "Za dvadeset godina"* (1908).

PLEHANOV G. V., *Osnovnye voprosy marksizma* (1908).

PLEHANOV G. V., *Materialismus militans* (1908 – 1910).

PLEHANOV G. V., *Iskusstvo i občestvennaja žiznj* (1912 – 1913).

Plate-forme de l'opposition de gauche (1927).

POKROVSKI M. N., *Povijest Rusije* (1920).

POLITZER GEORGES, *Fin d'une parade philosophique: le bergsonisme* (1929).

POLLOCK FRIEDRICH, *Automation in U. S. A. Betrachtungen zur*

- zweiten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1955).
- POPITZ HEINRICH, *Der entfremdete Mensch* (1953).
- POPOVIĆ MIHAJLO, *Problemi društvene strukture* (1967).
- POPOVIĆ MILENTIJE, *Šta državni kapitalizam znači u društvenom razvitku* (1953).
- POPOVIĆ M., *Društveno-ekonomski sistem* (1964).
- PRAGER THEODOR, *Wirtschaftswunder oder keines* (1963).
- Pregled historije Saveza komunista Jugoslavije* (1963).
- PRENANT MARCEL, *Biologie et marxisme* (1935).
- PREOBRAŽENSKI E. A., *Ot Nepa k socializmu* (1922).
- PRÉOBRAJENSKY E. A., *La Nouvelle Économique* (1926).
- PRICA OGNJEN, *Suvremena filozofija i prirodne znanosti* (1937).
- PRICE M. PHILIPS,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Erinnerungen aus den Jahren 1917 – 1919* (1921).
- Privredni sistem i ustavna reforma* (kol. aut., 1973).
- Problemi provođenja društveno-ekonomske reforme* (kol. aut., 1969).
- Programm der Kommunistischen Arbeiter – Partei Deutschlands (KAPD)* (1920).
- Program Saveza komunista Jugoslavije* (1958).
- Programma Komunističeskoj partii Sovetskogo Sojuza* (1962).
- PROUDHON JOSEPH, *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1840).
- Proudhon J., *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1846).
- Proudhon J., *Banque du peuple* (1848).
- Proudhon J., *Solution du problème social* (1848).
- Proudhon J., *La banque d'échange* (1848).
- Proudhon J., *Philosophie du progrès* (1853).
- Prva Internacionala* (1950).
- RADEK KARL, *Die Entwicklung der Weltrevolution und die Aufgabe*

-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1920).
- Radnički i nacionalno-oslobodilački pokreti*, I (1968).
- RAGONERI E., *P. Togliatti* (1973).
- RAPHAEL MAX, *Proudhon, Marx, Picasso* (1933).
- RAPHAEL M., *Teorija duhovnog stvaranja na osnovi marksizma* (u prvom izd. naslov: *Zur Erkenntnistheorie der konkreten Dialektik*, 1934).
- RAPHAEL M., *Prehistoric Cave Painting* (1945).
- RAPHAEL M., *Prehistoric Pottery and Civilisation in Egypt* (1947).
- RAPHAEL M., *Arbeiter, Kunst und Künstler* (1975).
- RASCH WILHELM, *Bertolt Brechts marxistischer Lehrer. Aufgrund eines ungedruckten Briefwechsels zwischen Brecht und Karl Korsch* (1963).
- RATKOVIĆ RADOSLAV, *Politička teorija austromarksizma* (1965).
- Razmatranja o socijalističkoj ekonomici* (Karel Kouba i kolektiv 1968).
- RAYNAL GUILLAUME, *Histoire philosophique et politique des établissements et du commerce des Européens dans les deux Indes* (1780).
- Rebellion der Studenten oder die neue Opposition* (kol. aut., 1968).
- REED JOHN, *Deset dana koji su potresli svijetom* (1919).
- REICH WILHELM, *Dijalektički materijalizam i psihoanaliza* (1929).
- REICH W., *Der Einbruch der Sexualmoral* (1931).
- RENDTORFF TR. und TÖDT H. E., *Theologie der Revolution* (1968).
- RENNER KARL, *Socijalna funkcija pravnih instituta* (1904).
- RENNER K., *Marxismus, Krieg und Internationale* (1917).
- RENNER K., *Die Wirtschaft als Gesamtprozess und die Sozialisierung* (1924).
- RENNER K., *Wege der Verwirklichung* (1929).
- RENNER K., *Mensch und Gesellschaft* (1952).

- RENNER K., *Wandlungen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1953).
Revolution gegen den Staat? (izd. Hans Dollinger 1968).
- RIBAR VELJKO, *Principi dijalektike* (1922).
- RICARDO DAVID, *Načela političke ekonomije i oporezivanja* (1817).
- RICHTA RADOVAN i kol., *Civilizacija na raskršću* (1966).
- RICHTA R. i kol., *Za jedan novi model socijalizma* (1968).
- RIESMAN DAVID, *The Lonely Crowd* (1960).
- RITTER G. A., *Die Arbeiterbewegung im Wilhelminischen Reich* (1959).
- RITTER JOACHIM, *Hegel und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1957).
- RJAZANOV D., *Marx i Engels* (1922).
- ROBINSON JOAN, *An Essay in Marxian Economics* (1942).
- RODIN DAVOR, *Aspekti odnosa između Hegelove i Marxove dijalektike* (1967).
- RODIN D., *Marxova misao zajednice* (1974).
- ROLL ERIC, *Povijest ekonomske misli* (1953).
- ROLAND-HOLST H., *Generalstreik und Sozialdemokratie* (1905).
- ROLAND-HOLST H., *Joseph Dietzgens Philosophie gemeinverständlich erläutert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das Proletariat* (1910).
- ROLAND-HOLST H., *Rosa Luxemburg* (1935).
- ROMANO DI SALVATORE FRANCESCO, *Gramsci* (1965).
- ROSDOLSKY ROMAN,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Marxschen "Kapital" I – II* (1968).
- ROSENBERG ARTUR, *Geschichte des Bolschewismus von Marx bis zur Gegenwart* (1932).
- ROSSI MARIO, *"Rovesciamento" e "nucleo razionale" della dialettica hegeliana secondo Marx* (1957 – 1958).
- ROSSI M., *Marx e la dialettica hegeliana* (I 1960, II 1963).

- ROUSSEAU J. J., *Contrat social* (1762).
- ROZENTAL M. M., *Marksistkij dialektičeskij metod* (1947).
- RUBEL MAXIMILIEN, *Pages choisies pour une éthique socialiste* (1948).
- RUBEL M., *Karl Marx, essai de 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 (1957).
- RUBEL M., *Marx Critique du Marxisme* (1974).
- RÜHLE O., *Erziehung zum Sozialismus. Ein Manifest* (1919).
- RÜHLE O., *Die Revolution ist keine Parteisache!* (1920).
- RÜHLE O., *Das kommunistische Schulprogramm* (1920).
- RÜHLE O., *Grundfragen der Organisation* (1922).
- RÜHLE O., *Von der bürgerlichen zur proletarischen Revolution* (1924).
- RÜHLE O., *Karl Marx. Leben und Werk* (1928).
- RUS VOJAN, *Hegelova i marksistička dijalektika o istovetnosti i razlici* (1963).
- RUS V., *Dijalektika čoveka i sveta* (1969).
- RUS V., *Etika in socializem* (1976).
- RUSCONI G. E., *La teoria critica della società* (1970).
- SADE MARQUIS de, *Histoire de Juliette* (1797).
- SAHAROV A. D., *Razmyšlenija o progresse, mirnom sosuščestvovanii i intellektualnoj svobode* (1968).
- SAINT-SIMON C. H., *Nouveau christianisme* (1825).
- SANDOR PAUL, *Histoire de la dialectique* (1945).
- SANTARELLI ENZO, *La revisione del marxismo in Italia* (1964).
- SARTRE JEAN PAUL, *La Nausée* (1939).
- SARTRE J. P., *L'Être et le Neant* (1944).
- SARTRE J. P., *Les Chemins de la Liberté* (1945 – 1949).
- SARTRE J. P., *Le fantôme de Staline* (1957).

- SARTRE J. P.,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1960).
- SAUERLAND KURT, *Der dialektische Materialismus*, I (1932).
- SCHAFF ADAM, *Zu einigen Fragen der marxistischen Theorie der Wahrheit* (1952).
- SCHAFF A., *Uvod u semantiku* (1960).
- SCHAFF A., *Sprache und Erkenntnis* (1964).
- SCHAFF A., *Marxismus und das menschliche Individuum* (1965).
- SCHAFF A., *Essay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Sprache* (1968).
- SCHAFF A., *Geschichte und Wahrheit* (1970).
- SCHAFF A., *Strukturalismus und Marxismus* (1974).
- SCHAPIRO LEONARD, *Die Geschichte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r Sowjetunion* (1960).
- SHELLING F. W. J., *Ideen zu einer Philosophie der Natur* (1797).
- SHELLING F. W. J., *System des transcendentalen Idealismus* (1800).
- SHELLING F. W. J., *Darstellung meines Systems* (1801).
- SCHICKEL JOACHIM, *Dialektik in China. Mao Tse-tung und die Grosse Kulturrevolution* (1967).
- SCHIWY GÜNTHER, *Der französische Structuralismus* (1969).
- SCHLEIFSTEIN JOSEPH, *Franz Mehring. Sein marxistisches Schaffen 1891 – 1919* (1959).
- SCHMIDT ALFRED, *Der Begriff der Natur in der Lehre von Marx* (1962).
- SCHMIDT A., *Geschichte und Struktur* (1971).
- SCHMIDT A., *Zur Idee der kritischen Theorie* (1974).
- SCHORSKE E. CARL,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 – 1917).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Schism* (1955).
- SCHRAM R. STUART, *Die permanente Revolution in China* (1963).

- SCHRAM R. S.,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1963).
- SCHRÖDER KARL, *Vom Wesen der Neuen Gesellschaft* (1920).
- SCHRÖDER K. i F. WENDEL, *Wesen und Ziel der Revolutionären Betriebs-organisation* (1920).
- SCHUMPETER JOSEPH,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1942).
- SCHWAN GESINE, *Leszek Kolakowski* (1971).
- SEBAG LUCIEN, *Marxisme et Structuralisme* (1964).
- SELEKTOR M., *Dialektičeskij materializm i teorija ravnovesija* (1934).
- SELSAM HOWARD, *Sozialismus und Ethik* (1943).
- SELSAM H., *Philosophy in Revolution* (1957).
- SERING PAUL (RICHARD LÖWENTHAL), *Jenseits des Kapitalismus* (1947, II izd. 1977).
- SÈVE LUCIEN, H. *Lefebvre et la dialectique chez Marx* (1958).
- SILONE IGNAZIO, *Fašizam* (1934).
- SIROTKOVIĆ JAKOV, *Problemi privrednog planiranja u Jugoslaviji* (1961).
- SITNIKOV E. M., *Problema "ot č uždenija" v buržoaznoj filosofii i faljsifikatory marksizma* (1962).
- SHELL L. KURT, *The Transformation of Austrian Socialism* (1962).
- SMIRNOV G. L., *Sovetskij čelovek. Formirovanie socialističeskogo tipa ličnosti* (1973).
- Smisao i perspektive socijalizma* (kol. aut., 1965).
- SMITH ADAM, *Istraživanja o uzrocima i prirodi bogatstva naroda* (1776).
- SNOW EDGAR, *Red Star over China* (1937).
- Socijalizam i humanizam* (kol. aut., 1963).

- Socialist Humanism* (izd. Erich Fromm 1965).
- SOMBART WERNER, *Der proletarische Sozialismus* (1924).
- SOMBART W.,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1927).
- SOMERVILLE JOHN, *Soviet Philosophy. A Study of Theorie and Practice* (1946).
- SOMERVILLE J., *Philosophy of Peace* (1949).
- SOREL GEORGES, *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 (1906).
- SOREL G., *La Décomposition du Marxisme* (1908).
- SOREL G., *Les Illusions du progrès* (1908).
- SOREL G., *Matériaux d'une théorie du prolétariat* (1919).
- SOTELO IGNACIO, *Der historische Ort des Marxismus in Lateinamerika* (1969).
- Sovremennyy pravij revizionizm* (kol. aut., 1973).
- Spartakusbriefer* (1958).
- STALIN J. V., *Anarhizm ili socializm* (1906 – 1907).
- STALIN J. V., *Marksizm i nacionalni vopros* (1913).
- STALIN J. V., *Ob osnovah leninizma* (1924).
- STALIN J. V., *Oktjabrskaja revoljucija i taktika russkih kommunistov* (1925).
- STALIN J. V., *K voprosam leninizma* (1926).
- STALIN J. V., *Na hlebnom fronte* (1928).
- STALIN J. V., *O pravoj opasnosti v VKP (b)* (1928).
- STALIN J. V., *O pravom uklone v VKP (b)* (1929).
- STALIN J. V., *God velikogo pereloma* (1929).
- STALIN J. V., *K voprosam agrarnoj politiki v SSSR* (1929).
- STALIN J. V., *Golovokruženie ot uspehov* (1930).
- STALIN J. V., *Otvjet tovariščam kolhoznikam* (1930).
- STALIN J. V., *Itogi pervoj pjatiletki* (1933).

STALIN J. V., *Otčetnyj doklad XVII sjezdu partii o rabote CKVKP (b)* (1934).

STALIN J. V., *O proekte konstituciji Sojuza SSR* (1936).

STALIN J. V., *O dialektičeskom i istoričeskom materializme* (1938).

STALIN J. V., *Otčetnyj doklad na XVIII sjezde partii o rabote CKVKP (b)* (1939).

STALIN J. V., *Otnositeljno marksizma v jazikoznanii* (1950).

STALIN J. V., *Ekonomičeskie problemy socializma v SSSR* (1952).

STAMMLER RUDOLF, *Wirtschaft und Recht nach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1896).

STAMMLER R., *Sozialismus und Christentum* (1920).

STANOVNIK JOŽE, *Zemlje u razvoju u svjetskoj privredi* (1965).

STAUDINGER FRANZ, *Die Gesetze der Freiheit* (1887).

STAUDINGER F., *Ethik und Politik* (1899).

STAUDINGER F., *Wirtschaftliche Grundlagen der Moral* (1907).

STAUDINGER F., *Die Konsumgenossenschaft* (1908).

STAUDINGER F., *Kulturgrundlagen der Politik* (1914).

STEIN v. LORENZ, *Sozialismus und Kommunismus des heutigen Frankreichs. Ein Beitrag zur Zeitgeschichte* (1842).

STEINBERG H. J., *Sozialismus und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1967).

STERNBERG FRITZ, *Der Imperialismus* (1926).

STERNBERG F., *„Der Imperialismus“ und seine Kritiker* (1929).

STERNBERG F., *Der Faschismus an der Macht* (1935).

STERNBERG F., *Kapitalismus und Sozialismus vor dem Weltgericht* (1951).

STERNBERG F., *Wer beherrscht die 2. Hälfte des 20. Jahrhunderts?* (1961).

- STIPČEVIĆ NIKŠA, *Književni pogledi A. Gramšija* (1967).
- STIRNER MAX, *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 (1845).
- STOJANOVIĆ SVETOZAR, *Savremena metaetika* (1964).
- STOJANOVIĆ S., *Između ideala i stvarnosti* (1969).
- STOYANOVITCH K., *La Philosophie du Droit en U. R. S. S. (1917 – 1953)* (1965).
- STRAUSS DAVID FRIEDRICH, *Das Leben Jesu* (1835).
- STROGOVIĆ M. S., *Logika* (1949).
- STUCKE H., *Philosophie der Tat* (1963).
- STUČKA P I., *Revolucionnaja rolj gosudarstva i prava* (1921).
- STUČKA P I., *Klassovoe gosudarstvo i graždanskoe pravo* (1924).
- STUČKA P I., *Leninism i gosudarstvo* (1925).
- STUČKA P I., *Moj put i moji ošibki* (1931).
- SUHANOV N., *Zapiski o Revoljucii* (1922).
- SUPEK RUDI, *Materijalni, socijalni i personalni osnovi socijalističke kulture* (1953).
- SUPEK R., *Ispitivanje javnog mnijenja* (1961).
- SUPEK R., *Radničko samoupravljanje i humanizacija rada i potrošnje* (1963).
- SUPEK R., *Omladina na putu bratstva* (1963).
- SUPEK R., *Sociologija i socijalizam* (1966).
- SUPEK R., *Participacija, radnička kontrola i samoupravljanje* (1974).
- SURET-CANALE J., *La méthode de H. Lefebvre* (1958).
- SUTLIĆ VANJA, *Bit i savremenost* (1967).
- SUTLIĆ V., *Praksa rada kao znanstvena povijest* (1974).
- SWEEZY P. M., *Teorija kapitalističkog razvoja* (1942).
- Syndikalisme et socialisme* (kol. aut., 1908).

- ŠEŠIĆ BOGDAN, *Dijalektički materijalizam Josepha Dietzgena* (1957).
- ŠIK OTA, *Oekonomie, Interessen, Politik* (1962).
- ŠIK O., *Zur Problematik der sozialistischen Warenbeziehungen* (1964).
- ŠIK O., *Plan und Markt im Sozialismus* (1965).
- ŠIK O., *Der dritte Weg* (1972).
- ŠIK O., *Für eine Wirtschaft ohne Dogma* (1974).
- ŠIŠKIN A., *Osnovy kommunističeskoj morali* (1955).
- TADIĆ LJUBO, *Filozofske osnove pravne teorije H. Kelsena* (1962).
- TADIĆ LJ., *Proletarijat i birokratija* (1962).
- TADIĆ LJ., *Poredak i sloboda* (1967).
- TADIĆ LJ., *Tradicija i revolucija* (1972).
- TEYSSÉDRE BERNARD, *Lukács et les fondements d'une esthétique marxiste* (1961).
- THALHEIMER AUGUST, *Einführung in den dialektischen Materialismus* (1928).
- THEIMER WALTER, *Der Marxismus* (1950).
- Thesen über die kollegiale und die Einmannleitung* (Osinski N., T. Sapronov, V. Maksimovski, 1920).
- THIER ERICH, *Anthropologie des jungen Marx* (1950).
- TITO JOSIP BROZ, *Zadatak narodnooslobodilačkih partizanskih odreda* (1941).
- TITO J. B., *Politički izvještaj CKKPJ na V kongresu* (1948).
- TITO J. B., *O radničkom upravljanju privrednim preduzećima* (1950).
- TITO J. B., *Borba komunista Jugoslavije za socijalističku demokraciju* (1952).

- TITO J. B., *Govor pred aktivom komunista iz Istre* (1956).
- TITO J. B., *Zadaci Saveza komunista u vezi sa međunarodnom situacijom i unutrašnjim razvojem socijalističke izgradnje Jugoslavije* (1958).
- TITO J. B., *Četrdeset godina revolucionarne borbe Komunističke partije Jugoslavije* (1959).
- TITO J. B., *Izgradnja socijalizma i uloga i zadaci Socijalističkog saveza radnog naroda Jugoslavije* (1960).
- TITO J. B., *Uloga Saveza komunista u daljoj izgradnji socijalističkih društvenih odnosa i aktuelni problemi u međunarodnom radničkom pokretu i borbi za mir i socijalizam u svijetu* (1964).
- TITO J. B., *SKJ u novoj etapi razvoja socijalističkog samoupravljanja* (1976).
- TODOROVIĆ MIJALKO, *Oslobođenje rada* (1965).
- TOGLIATTI PALMIRO, *L'intervista a "Nuovi Argomenti"* (1956).
- TOGLIATTI P., *Rapporto all VIII Congresso del 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 (1956).
- TOGLIATTI P., *Problemi del movimento operaio internazionale 1956 - 1961* (1962).
- TOGLIATTI P., *Die marxistische Konzeption der politischen Partei der Arbeiterklasse* (1963).
- TOGLIATTI P., *Promemoria sulle questioni del movimento operaio internazionale e della sua unità* (1964).
- TOGLIATTI P., *Nella democrazia e nella pace verso il socialismo* (1966).
- TOGLIATTI P., *Ausgewählte Schriften* (1967).
- TOGLIATTI P., *Antonio Gramsci*.
- TORMIN W., *Zwischen Rätediktatur und sozialer Demokratie. Die Geschichte der Rätebewegung in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 1918 - 1919*

- (1954).
- TRAN-DUC-THAO, *Phénoménologie et Materialisme dialectique* (1951).
- TROCKI LEV DAVIDOVIČ, *Ergebnisse und Perspektiven* (1906).
- TROCKI L. D., *Naša revolucija* (1906).
- TROTZKI L., *Terrorismus und Kommunismus. Anti Kautsky* (1920).
- TROTZKI L., *Die Neue Etappe. Die Weltlage und unsere Aufgaben* (1921).
- TROTZKI L., *Zwischen Imperialismus und Revolution* (1922).
- TROTSKY L., *Cours nouveau* (1923).
- TROCKI L., *Literatura i revolucija* (1923).
- TROCKI L., *O Lenine* (1924).
- TROTSZKI L., *Mein Leben* (1929).
- TROTZKI L., *Geschichte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 I – II* (1931 – 1932).
- TROTSKY L., *La révolution permanente* (1930).
- TROTZKI L., *Eine geschichtliche Information zur Frage über die Theorie der "Permanenten Revolution"* (1933).
- TROTZKI L., *Sozialismus in einem Lande* (1933).
- TROTSKY L., *La Révolution trahie* (I 1936, II 1937).
- TROTSKY L., *In Defens of the Sovjet Union* (1937).
- TUGARINOV V. P., *Sootnošenje kategorij dialektičeskogo materializma* (1956).
- TUGARINOV V. P., *Ličnost i obščestvo* (1965).
- Über Walter Benjamin* (kol. aut., 1968).
- ULLRICH HORST, *Der junge Engels* (I 1961, II 1966).
- UNTERMANN ERNST, *Die logischen Mängel des engeren Marxismus* (1910).

Uzroci i karakteristike privrednih kretanja u 1961. i 1962 (kol. aut., 1963).

VALENTINOV V., *Filosofske postroenija marksizma (1908).*

VALIANI LEO, *Histoire du socialisme au XX^e siècle (1946).*

VARGA EUGEN, *Die wirtschaftlichen Probleme der proletarischen Diktatur (1921).*

VARGA E., *Die wirtschaftliche Weltlage (1924).*

VARGA E., *Promjene u ekonomici kapitalizma uslijed drugog svjetskog rata (1946).*

VLAHOVIĆ VELJKO, *Pojam i suština proleterskog internacionalizma (1958).*

VLAHOVIĆ V., *Program SKJ i "zaoštrenje" ideološke borbe (1958).*

VLAHOVIĆ V., *Idejna kretanja na sadašnjem stepenu našeg razvoja i dalji zadaci Saveza komunista Jugoslavije (1964).*

VLAHOVIĆ V., *Revolucija i stvaralaštvo (1973).*

VOLOŠINOV V. N., *Frojdizam (1927).*

VOLPE della GALVANO, *Logica come scienza positiva (1950).*

VOLPE della G., *Critica del gusto (1960).*

VORLÄNDER KARL, *Kant und der Sozialismus (1900).*

VORLÄNDER K., *Kants Leben (1911).*

VORLÄNDER K., *Kant und Marx (1911).*

VORLÄNDER K., *Marx, Engels und Lassalle als Philosophen (1920).*

VORLÄNDER K., *Von Machiavelli zum Lenin (1926).*

VORLÄNDER K., *Karl Marx,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1929).*

VRANICKI PREDRAG, *O nekim pitanjima marksističke teorije u vezi sa Ždanovljevom kritikom Aleksandrova (1950).*

VRANICKI P., *O problemu općeg, posebnog i pojedinačnog kod klasi-*

- ka marksizma* (1952).
- VRANICKI P., *Misaoni razvitak Karla Marxa* (1953).
- VRANICKI P., *Filozofske studije i kritike* (1957).
- VRANICKI P., *Historija marksizma* (1961).
- VRANICKI P., *Čovjek i historija* (1966).
- VRANICKI P., *Marksističke teme* (1973).
- VRANICKI P., *O nekim kontroverzama u marksizmu* (1976).
- WAGNER H., *Thesen über den Bolschewismus* (1932).
- WALLON HENRI, *De l'acte à la pensée* (1942).
- WALTER GÉRARD, *Histoire du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1948).
- WEBER HERMANN, *Von Rosa Luxemburg zu Walter Ulbricht* (1959).
- WEBER HERMANN, *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Eine Dokumentation* (1966).
- WEBER H., *Die Wandlung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 Die Stalinisierung der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 II 1969).
- WEIL ERIC, *Hegel et l'Etat* (1950).
- WELLS HARRY, *Pragmatisme – Philosophy of Imperialism* (1954).
- WETTER GUSTAV, *Der dialektische Materialismus* (1948).
- WINDELBAND WILHELM, *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1891).
- WINDELBAND W., *Präludien, I – II* (1911).
- WITTFOGEL K. A., *Die Wissenschaft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1922).
- WITTFOGEL K. A., *Die Geschicht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1924).
- WITTFOGEL K. A.,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1931).
- WOLTMANN LUDWIG, *System des moralischen Bewusstseins* (1898).

WOLTMANN L., *Die Darwinische Theorie und der Sozialismus* (1899).

WOLTMANN L., *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1900).

WEITLING WILHELM, *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iheit* (1842).

WOLFE B. D., *Lenin, Trotzki, Stalin* (1948).

WOLFFHEIM FRITZ, *Betriebsorganisation oder Gewerkschaften?* (1919).

ZAGORIA D. S., *The Sino-Sowjet Conflict 1956 – 1961* (1962).

ZANARDO ALDO, *Il "Manuale" di Bukharin visto dai comunisti tedeschi e da Gramsci* (1958).

ZANARDO A., *Forme i problemi suvremenog marksizma i odjek misli mladog Marxa* (1962).

ZIHERL BORIS. *Književnost i društvo* (1958).

ZINOVJEV G. E., *Geschichte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Russlands-Bolschewiki* (1923).

ZINOVJEV G. E., *Izveštaj o djelatnosti Egzekutive* (V kongres K. I. 1924).

ZINOVJEV G. E., *Leninism* (1926).

ŽDANOV A. A., *Referat o časopisima "Zvijezda" i "Lenjingrad"* (1946).

ŽDANOV A. A., *O međunarodnoj situaciji* (1947).

ŽDANOV A. A., *Vystuplenie v diskusii* (povod. knjige Aleksandrova) (1947).

ŽIVKOVIĆ LJUBOMIR, *Nauka o društvu* (1958).

ŽIVKOVIĆ LJ., *Društvena nadgradnja* (1960).

ŽIVOTIĆ MILADIN, *Pragmatizam i savremena filozofija* (1966).

ŽIVOTIĆ M., *Egzistencija, realnost i sloboda* (1974).

ŽUPANOV JOSIP, *Samoupravljanje i društvena moć* (1969).

YVON M., *Ce qu'est devenu la Révolution Russe* (1937).

ČASOPISI I NOVINE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Alternative, Annali (Inst. G. Feltrinelli),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Argument, Anthenäum, Autogestion, Black and Red, Bolševik, Borba, Brazda, Bremisches Konversationsblatt, Cahiers du communisme, China Quarterly, Critica marxista, Critica sociale, Danas, De Tribune, Der Freie Arbeiter, Der Kampf, Der Kampftruf, Der Klassenkampf, Der Kommunist, Der Sozialist, Deutsche Jahrbücher,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Devenir Social, Die Aktion, Die Einheitsfront, Die Glocke, Die Internationale, Die Neue Zeit, Die Rote Fahne, Die Wage, Dijalektika, Études de marxologie, Filosofija, Frankfurter Beiträge für Sozialforschung, Gesellschaftsspiegel, Gledišta, Hallische Jahrbücher, Hochschulinformation der Zentralstelle für Gesamtdeutsche Hochschulfragen, Hongqui, Humanité, Il Contemporaneo,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Journal, Internationale Presse-Korrespondenz, Iskra, Izraz, Jugoslavenski časopis za filozofiju i sociologiju, Književna republika, Kommunismus, Kommunistischer Arbeiter, Kommunistische Arbeiter-Zeitung, Königsberger Zeitung, Kursbuch, L'Arc, L'Égalité, L'Ère Nouvelle, L'homme et la société, La nouvelle critique, La Pensée, Leipziger Volkszeitung, Leningrad, Leningradska Pravda, Les lettres nouvelles, Les Temps Modernes, Lichtstrahlen, Literarne novine, Literatura, Living Marxism, Marxismus in unserer Zeit, Marxismusstudien, Marxstudien (Blätter für Theorie und Politik des wissenschaftlichen Sozialismus), Mitternachtzeitung für gebildete Leser, Mlada kultura, Mondo operaio, Modern Quarterly, Monthly Review, 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Leser, Myśl Filozoficzna, Naša stvar-

nost, Naše teme, Neue Kritik,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Nova literatura, Novaja žiznj, Nuovi Argomenti, Ordine Nuovo, Partisans, Past and Present, Plamen, Pod znamenem marksizma, Pečat, Peking Review, Pogledi,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Po prostu, Pravda, Praxis, Pregled, Preussische Staat-Zeitung, Problemi del Socialismo, Raboče delo, République Française, Revoljucija Prava, Rheinische Zeitung, Rivista storica del socialismo, Schweizerischer Republikaner, Science and Society, Socialist Courier, Socijalizam, Sociologie du travail, Sodobnost,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Stožer, Studi Gramsciani, 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 The New Left Review, The New Moral World, The Northern Star, Teorija in praksa, Umjetnost i kritika, Voies Nouvelles, Volkstaat, Voprosy filosofii, Voprosy istorii, Vorbote, Vorwärts, Vpered, Wigand's Vierteljahrschrift,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Znanost i život, Zvijezda.

主要译名对照表

(本表中页码为外文原书页码,即中译本边码)

A

- Abbagnano, N. 阿巴尼亚诺,尼 199
Abendroth, W. 阿本德罗特,沃 109
Adler, M. 阿德勒,麦 106
Adorno, Th. 阿多诺,泰 43, 44, 56 - 63, 70 - 73
Adžija, B. 阿季亚,博 234
Agazzi, E. 阿加齐, E. 199
Alatri, P. 阿拉特里, P. 199
Althusser, L. 阿尔都塞,路 132, 170 - 174, 192
Ancel, I. 安策尔,伊 230
Aptheker, H. 阿普特克尔, H. 213
Aragon, L. 阿拉贡,路 160
Arfe, G. 阿尔菲, G. 199
Arhimed 阿基米德 11
Arnauld, A. 阿尔诺, A. 153
Augustin, A. 奥古斯丁, A. 162

Axelos, K. 阿克塞洛斯,科 168,169

B

Babić, I. 巴比奇, I. 236

Baby, J. 巴比, J. 32

Baće, M. 巴切, 马 253

Badaloni, N. 巴达洛尼, N. 199

Bajt, A. 巴伊特, A. 302

Bakarić, V. 巴卡里奇, 弗 269 - 271, 303, 310

Balibar, E. 巴里巴尔, E. 170

Bandinelli, R. B. 班狄涅里, R. B. 199

Banfi, A. 班菲, 安 183, 184 - 187

Baran, P. A. 巴兰, 保·A. 207 - 213

Barcos, de M. 巴尔科斯, 马·德 153

Bartsch, G. 巴尔奇, 君 109

Bartok, B. 巴尔托克, B. 71

Bartoli, H. 巴尔托利, 昂 168

Basso, L. 巴索, 列 177, 199

Batista, F. 巴蒂斯塔, 富 216

Bayle, P. 培尔, 比 134

Beethoven, L. V. 贝多芬, 路·万 71

Bell, D. 贝尔, D. 213

Belleville, P. 别勒维尔, 皮 174

Benjamin, W. 本雅明, 瓦 44, 77

Berg, A. 贝尔格, A. 71

Bergmann, V. 贝尔格曼, V. 114

Bergson, H. 伯格森, 昂 234

Bernal, J. 贝尔纳, J. 204

Bettelheim, C. 贝特尔海姆, 查 8, 167

- Bigo, P. 比果, 皮 168
- Bihalji-Merin, P. 比哈里 - 梅林, 普 235
- Bilandžić, D. 比兰季奇, D. 247
- Birnbaum, M. 比恩鲍姆, M. 213
- Bloch, E. 布洛赫, 恩 43 - 56, 77, 108, 128, 276
- Blondel, M. 勃龙德尔, 莫 120
- Blumer, G. 布卢默尔, 乔 34, 36, 37
- Bobbi, N. 博比, N. 199
- Bocca, G. 博伽, 卓 195
- Bochenski, J. M. 博欣斯基, J. M. 108
- Bogdanović, M. 波格丹诺维奇, 米 235
- Bošnjak, B. 博什尼亚克, B. 295, 312
- Botigelli, E. 博提格利, E. 168
- Bottomore, T. 博托莫雷, T. 204, 205
- Boudin, L. 布丁, L. 205, 206
- Bourdet, Y. 布迪特, 约 167
- Brahm, H. 布拉姆, 海 32
- Bravo, D. 布拉沃, D. 219
- Brunschvicg, L. 布伦希维克, L. 120
- Buharin, N. I. 布哈林, 尼·伊 202
- C**
- Calvez, J. Y. 卡尔维茨, 让, 伊 168
- Campesino, El. V. 坎佩西诺, El. V. 274
- Camus, A. 加缪, A. 134
- Candeloro, G. 康德洛罗, G. 199
- Cantoni, R. 康托尼, R. 199
- Caracciolo, A. 卡腊齐奥洛, A. 199
- Casanova, G. 卡桑诺瓦, 加 119

- Casanova, L. 卡桑诺瓦, L. 275
- Cases, C. 卡塞斯, C. 199
- Castoriadis, C. 卡斯托里亚迪斯, 科 167
- Castro, F. 卡斯特罗, 菲 215 - 218, 219 - 221, 223, 225
- Caveing, M. 卡维因, M. 163
- Cenić, M. 策尼奇, 米 230
- Ceroni, U. 切罗尼, U. 199
- Cesarec, A. 策萨雷茨, 阿 235
- Chambre, H. 夏姆布尔, 昂 168
- Charrière, J. 夏尔里埃, J. 8
- Chauvey, D. 肖维, 丹 167
- Chen, J. 陈, 杰罗姆 8
- Chibús, E. 切瓦斯, E. 215, 216
- Cogniot, G. 克瓦纽, G. 163, 275
- Cohen, F. S. 科恩, F. 斯 213
- Cohn-Bendit, D. 科恩 - 本迪特, D. 114
- Cohn-Bendit, G. 科恩 - 本迪特, G. 114
- Cole, G. D. H. 科尔, G. D. H. 205
- Colletti, L. 科莱蒂, L. 188
- Collotti-Pischel, E. 科莱蒂 - 皮舍尔, E. 34
- Cornforth, M. 康福斯, 莫 204
- Cornu, A. 科尔纽, 奥 167
- Croce, B. 克罗齐, 贝 187, 189, 191
- Cuvillier, A. 库维利埃, 阿 168
- Cvijić, S. (Štefek) 茨维伊奇, 斯(什特费克) 233
- Čalić, D. 查利奇, D. 302, 310
- Čang, Kaj-šek 蒋介石 9, 11, 14, 19, 26
- Čer, Tu-sju 陈独秀 9, 11

- Černe, F. 切尔奈, F. 302
 Čobeljić, N. 乔贝利奇, N. 310
 Čolaković, R. 乔拉科维奇, 罗 233, 235, 245
 Čopić, V. 乔皮奇, 弗 233
 Ču, De 朱德 12, 13
D
 Dabčević-kučar, S. 达普切维奇 - 库查尔, S. 302
 Damnjanović, M. 达姆尼亚诺维奇, M. 295
 Darwin, Ch. 达尔文, 查 7, 214
 Debray, R. 德布雷, 雷 218, 219, 221
 Dedijer, V. 德迪耶尔, 弗 245
 de Leon, D. 德, 莱昂, 丹 205 - 207
 Desanti, J. T. 德桑蒂, J. T. 163, 167
 Descartes, R. 笛卡儿, 勒 125, 139
 Desroches, H. 德斯罗切斯, H. 168
 Dewey, J. 杜威, 约 7, 65
 Diderot, D. 狄德罗, 德 125, 134
 Dilthey, W. 狄尔泰, 威 77
 Dobb, M. 多布, 莫 202 - 204, 212
 Dollinger, H. 多林格尔, 汉 114
 Donnithorne, A. 唐尼梭恩, A. 8
 Dortikos, O. 多尔蒂科斯, 奥 224, 226
 Dragičević, A. 德拉吉切维奇, A. 302, 310
 Dragović, R. 德拉戈维奇, 腊 230
 Draper, Th. 德雷珀, Th. 216
 Driesch, H. 德里施, H. 7
 Duclos, J. 杜克洛, J. 275
 Dunham, B. 丹汉姆, 巴 213

- Durkheim, E. 涂尔干,埃 155
- Duteuil, J. P. 杜泰伊尔, J. P. 114
- Dutschke, R. 杜奇凯,卢 109, 114
- Đilas, M. 吉拉斯,米 279
- Đurić, Mih. 久里奇,米 294
- E**
- Engelmann, H. 恩格尔曼,霍 55
- Engels, F. 恩格斯,弗 160, 162, 164, 167, 171, 188, 189, 192, 204, 233, 252, 256, 259, 277, 285
- Establet, R. 埃斯塔布列特, R. 170
- F**
- Fabre, J. 法布雷, J. 167
- Fang Čih-min 方志敏 13
- Fanon, F. 法农,弗 219 - 221
- Feltrinelli, G. 费尔特里涅利,贾 199
- Fetscher, I. 费切尔,伊 108, 109
- Feuerbach, L. 费尔巴哈,路 47, 193
- Fiamengo, A. 菲亚门哥,阿 294
- Fichte, J. G. 费希特,约·哥 160, 162, 170
- Filipović, F. 菲力波维奇,菲 233, 234
- Fischer, E. 费舍,恩 44, 109 - 112
- Fitzgerald, C. P. 菲茨格腊尔德, C. P. 8
- Fleischer, H. 费赖舍尔,赫 109
- Flores Ole, V. 弗洛雷斯·奥莱亚, V. 224
- Foa, V. 福阿,维 177, 199
- Focht, I. 福希特, I. 295
- Förster, J. 费尔斯特尔,约 55
- Förster, W. 费尔斯特尔,沃 55, 56

- Foucault, M. 福柯, M. 169
- Fougeyrollas, P. 福格罗拉斯, 皮 167
- Fourastier, J. 福拉斯梯尔, J. 168
- Freud, S. 弗洛伊德, 西 75, 82, 94 - 97, 100
- Friedmann, G. 弗里德曼, 若 168
- Friedrich, M. 弗里德里希, 曼 108
- Fromm, E. 弗洛姆, 埃 43, 94 - 106, 212, 213
- Fry, J. 弗雷, 约 93
- G**
- Gallup, G. H. 盖洛普, G. H. 65
- Galogaža, S. 加洛加日阿, 斯 235
- Garaudy, R. 加罗迪, 罗 111, 119, 127, 128, 142, 157 - 165
- Geismar, A. 盖斯马尔, A. 114
- Gentile, G. 金蒂雷, 卓 187
- Gerratan, V. 杰拉丹, V. 188
- Geymonat, L. 杰伊蒙纳特, L. 199
- Gillman, J. M. 基尔曼, J. M. 212, 213
- Gligorić, V. 格利戈里奇, 韦 235
- Goethe, J. W. 歌德, 约·沃 153
- Gogh van, V. 凡·高, V. 275
- Goldmann, L. 哥德曼, 路 147 - 157, 170
- Goldstücker, E. 戈尔德施蒂克尔, E. 111
- Goričar, J. 戈利查尔, 约 294
- Gorupić, D. 戈鲁皮奇, D. 302
- Gorz, A. 高兹, 安 174, 176 - 178
- Grahor, I. 格腊霍尔, 伊 235
- Gramsci, A. 葛兰西, 安 184, 185, 199
- Grimm, T. 格里姆, 蒂 8

- Grlić, D. 格尔利奇, D. 295, 312
 Gropp, R. O. 格罗普, 卢·奥 55, 56
 Grossmann, H. 格罗斯曼, 海 76
 Gruppi, L. 格鲁皮, L. 195, 199
 Guevara, E. Che 格瓦拉, 埃·切 115, 217, 218, 220 - 223
 Gurvitch, G. 古尔维奇, G. 168
 Guterman, N. 古特曼, N. 119, 120

H

- Habermas, J. 哈贝马斯, 于 73 - 76, 93
 Hadži-Vasilev, M. 哈季 - 瓦西列夫, 米 295
 Haeckel, E. 海克尔, 恩 7
 Hajek, J. 哈耶克, J. 111
 Haldane, J. B. 哈耳达奈, J. B. 204
 Han, Suyin 韩素音 8
 Handel, G. 汉德尔, 哥 55
 Hansen, A. H. 汉森, A. H. 205
 Harris, S. E. 哈里斯, S. E. 205
 Hartmann, N. 哈特曼, N. 135
 Haya de la Torre V. R. 阿亚·德·拉·托雷, 维·劳 214
 Hegel, G. W. F. 黑格尔, 乔, 威, 弗 73, 75, 77 - 80, 120, 125, 135, 139, 148, 159, 160, 166 - 170, 187, 188, 190 - 192, 212, 234, 295, 312
 Heidegger, M. 海德格尔, 马 46, 73, 77, 135, 136, 148
 Herold, R. 赫罗尔德, 鲁 55
 Hincker, F. 辛格尔, F. 167
 Hitler, A. 希特勒, 阿 69, 120, 240
 Hobsbawm, E. J. 霍布斯鲍姆, E. J. 204, 205
 Hofmann, W. 霍夫曼, 威 109

- Holbach, P. 霍尔巴赫,保 134
 Holz, H. H. 霍尔茨,汉·海 44
 Homer 荷马 52
 Hommes, J. 霍姆梅斯,雅 108
 Hook, S. 胡克,悉 212
 Horkheimer, M. 霍克海默,麦 43, 44, 56 - 71
 Horn, J. H. 霍恩,约·海 55
 Horney, K. 霍尼,卡 94, 100
 Horvat, B. 霍尔瓦特, B. 302, 310
 Horvatin, K. 霍尔瓦廷,克 233
 Ho Ši, Min 胡志明 220
 Hruščov, N. 赫鲁晓夫,尼 29, 31, 33, 158, 201
 Huberman, L. 休伯曼, L. 216
 Hume, D. 休谟,大 61, 63
 Husserl, E. 胡塞尔,艾 136, 199
 Huxley, A. L. 赫胥黎, A. L. 65
 Hyppolite, J. 伊波利特, J. 163, 165, 168
I
 Iljenkov, E. V. 伊连科夫, E. V. 188
J
 Jakobson, R. 雅各布逊, R. 169
 Janaček, L. 雅纳契克, L. 71
 Jaspers, K. 雅斯贝尔斯, K. 77
 Jay, M. 杰伊,马 76
 Jeremić, D. 耶雷米奇, D. 295
 Jovanović, D. 约万诺维奇, 乔 235
 Justo, J. B. 胡斯托, J. B. 214

K

- Kafka, F. 卡夫卡, 弗 111, 160
- Kanapa, J. 卡纳帕, 让 163
- Kandelj, E. P. 康捷尔, 叶·P. 193
- Kangrga, M. 康格尔加, M. 296, 312
- Kant, E. 康德, 伊 58, 60, 61, 73, 75, 139, 153, 162, 170, 191
- Kardelj, E. 卡德尔, 爱 28, 243, 245, 246, 254, 255, 258, 264, 265, 269, 271 - 273, 287, 303, 310
- Karol, K. S. 卡罗尔, K. S. 34
- Karpušin, V. A. 卡尔普申, V. A. 193
- Karst, R. 卡尔斯特, R. 111
- Kelsen, H. 凯尔森, H. 295
- Keršovani, O. 克尔绍万尼, 奥 234
- Keynes, J. M. 凯恩斯, 约·梅 205, 208
- Kidrič, B. 基德里奇, 鲍 265, 268
- Kierkegaard, S. 克尔凯郭尔, S. 139
- Kikić, H. 基基奇, 哈 235
- Klages, H. 克拉格斯, H. 109
- Knjazeva, S. 克尼亚泽瓦, S. 295
- Kofler, L. (S. Warinski) 科夫勒, 列 44, 106, 107
- Korać, M. 科拉奇, 米 302
- Korać, V. 科拉奇, 维 230, 294
- Korsch, K. 科尔施, 卡 77, 276
- Kreft, B. 克雷夫特, 布 235
- Krešić, A. 克雷什奇, A. 295, 312
- Kristan, E. 克里斯坦, 埃 230
- Krleža, M. 克尔莱日阿, 米 235, 236, 274, 276
- Krupić, S. 克鲁皮奇, 萨 234

L

- Labriola, Antonio 拉布里奥拉,安 185
- Lacan, J. 拉康, J. 169
- Lang, R. 兰格, R. 302, 310
- Lange, M. G. 朗格, 麦·格 108
- Lasić, S. 拉西奇, 斯 236
- Leduc, V. 列杜克, V. 163
- Lefebvre, H. 列菲伏尔, 昂 119 - 135, 159, 163, 170
- Lefevre, W. 列菲伏尔, W. 114
- Lenk, K. 连克, K. 109
- Lenjin, V. I. 列宁, 弗·伊 8, 80, 120, 125, 127, 133, 171, 180, 181, 183, 192, 210, 232, 233, 236, 239, 252, 256, 285, 329
- Leonhard, W. 列昂哈尔德, W. 109
- Leonov, M. A. 列昂诺夫, M. A. 248
- Leontijev, L. A. 列昂节夫, 列·阿 248
- Lerner, A. P. 勒纳, A. P. 205
- Levy, H. 勒维, 赫 204
- Lévy-Bruhl, L. 列维 - 布留尔, L. 155
- Lévy-Strauss, C. 列维 - 施特劳斯, C. 168 - 170
- Lewis, J. 刘易斯, J. 204
- Ley, H. 莱, 海 55
- Lichtheim, G. 里希特海姆, 乔 120, 213
- Li Li-San 李立三 11, 14
- Lin Piao 林彪 33, 37
- Li Ta-čao 李大钊 9
- Liu šao-či 刘少奇 32, 33, 38
- Lombardo Radice, L. 洛姆巴尔多·拉狄塞, 拉 199
- Longo, L. 隆哥, L. 198

- Lopes Kamara, F. 洛佩斯·卡马拉, F. 224
- Lukács, G. 卢卡奇, 捷 77, 106, 107, 111, 128, 147 - 150, 152, 189, 276
- Luhmann, N. 卢曼, 尼 75
- Lukić, R. 鲁基奇, R. 294
- Luporini, C. 卢波里尼, 切 188, 191, 193
- M**
- Macherey, P. 马舍雷, P. 170
- Magri, L. 马格利, 卢 177
- Mallet, S. 马勒, 赛 174 - 176
- Malraux, A. 马尔劳克斯, A. 154
- Manacorda, G. 马纳科尔达, G. 199
- Mandel, E. 曼德尔, 恩 178 - 180
- Mandić, O. 曼迪奇, 奥 294
- Mao Ce-tung 毛泽东 7 - 40, 171
- Marck, S. 马尔克, S. 106
- Marchisio, H. 马尔希西奥, H. 8
- Marcuse, H. 马尔库塞, 赫 43, 77 - 94, 107, 128, 210, 212
- Marek, F. 马列克, 弗 109
- Mariátegui, J. C. 马里亚特吉, 何·卡 214, 215
- Markos, P. 马科斯, 庞 219
- Marković, M. 马尔科维奇, M. 277, 295, 300, 312
- Marković, Sina. 马尔科维奇, 西 234
- Marković, Svet. 马尔科维奇, 斯 230
- Marti, J. 马蒂, 何 215, 216
- Martinet, G. 马丁涅特, 吉 174
- Marx, K. 马克思, 卡 28, 45, 47 - 49, 51, 70, 76 - 81, 92 - 95, 99, 106, 107, 109, 118, 120, 121, 125, 130, 131, 133, 135, 139, 140,

- 145, 148, 149, 154 - 156, 160 - 162, 164, 166, 167 - 171, 173, 178, 185 - 188, 190 - 193, 199, 201 - 204, 206, 208, 209, 211 - 215, 233, 236, 253, 256, 259, 261, 265, 277 - 279, 285, 296 - 298, 311, 312, 315, 321, 323, 325, 328, 329
- März, E. 默尔茨, 爱 109
- Masleša, V. 马斯列沙, 维 234
- Mattick, P. 马蒂克, 保 109, 213
- Meek, R. 梅克, R. 204
- Mehnert, K. 梅纳特, 克 34
- Mende, G. 门德, 格 55
- Merker, N. 梅尔克耳, 尼 188, 189
- Merlau-Ponty, M. 梅洛 - 庞蒂, 莫 163
- Mikecin, V. 米克辛, 维 187
- Milić, V. 米利奇, V. 294
- Mill, J. S. 穆勒, 约·斯 7
- Mills, W. 米尔斯, W. 213
- Milosavlevski, S. 米洛萨夫列夫斯基, S. 294
- Molotov, V. M. 莫洛托夫, 维·米 250
- Montaigne, M. 蒙台涅, 米 134
- Moore, B. 莫雷, B. 90
- Morhange, P. 莫昂热, P. 119
- Mougin, H. 穆任, 昂 119
- Mounier, E. 穆尼埃, 埃 118, 119
- Mozart, A. 莫扎特, A. 61
- Müller-Hegemann, D. 弥勒 - 赫格曼, 迪 55
- Münzer, T. 闵采尔, 托 45, 162
- Musset, A. 缪塞, A. 125

N

Naville, P. 纳维勒,皮 167

Nedeljković, D. 内德利科维奇, D. 234, 312

Negt, O. 内格特,奥 76

Neni, P. 南尼, P. 199

Nicole, A. 尼古拉,阿 153

Niemeyer, G. 尼迈耶尔,格 108

Nietzsche, F. 尼采,弗 58, 60, 75, 78

O

Oppolzer, A. 奥波尔泽尔,阿 109

Orcel, J. 奥尔塞尔, J. 163

Orcibal, J. 奥尔西巴尔, J. 153

Osinski, N. 奥辛斯基,恩 202

Ostrovitjanov, K. V. 奥斯特罗维特扬诺夫,康·瓦 248

P

Paci, E. 帕齐,恩 199

Palmier, J. M. 帕尔米埃尔,让·米 93

Papi, F. 帕皮,福 187

Parmenid 巴门尼德 59

Pascal, B. 帕斯卡尔, B. 125, 152, 153

Pašić, N. 帕什奇,纳 294, 310

pečujlić, M. 佩丘伊利奇, M. 310

Pejović, D. 佩约维奇, D. 296

Pelagić, V. 佩拉吉奇,瓦 230

Peng Čen 彭真 33

Peng Teh-huaj 彭德怀 32, 33

Pesenti, A. 佩森蒂, A. 199

Pešić-Golubović, Z. 佩什奇-戈卢博维奇,扎 312

- Petrinović, I. 佩特里诺维奇, 伊 195
 Petrović, G. 彼得洛维奇, G. 277, 296, 297, 312
 Plaget, J. 皮亚杰, J. 148
 Picasso, P. 毕加索, 帕 61, 160, 275
 Pico de la Mirandola 皮科·德·拉·米 162
 Pietranera, G. 彼特拉涅拉, G. 199
 Pijade, M. 皮雅杰, 莫 233, 235, 243
 Pjanić, Z. 皮雅尼奇, Z. 302
 Platon 柏拉图 58, 59, 66
 Plehanov, G. V. 普列汉诺夫, 格·瓦 189, 233, 277
 Poincaré, H. 彭加勒, 昂 155
 Politzer, G. 波利泽尔, 若 119
 Polck, F. 波洛克, 弗 76
 Popitz, H. 波皮茨, 海 108
 Popović, D. 波波维奇, 杜 230
 Popović, J. 波波维奇, J. 235
 Popović, Mih. 波波维奇, 米 310
 Popović, Mil. 波波维奇, 米 280, 281, 302
 Prager, Th. 普拉格尔, 泰 109, 212
 Preobraženski, E. A.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叶·阿 202
 Prestipino, G. 普雷斯蒂皮诺, G. 199
 Preti, G. 普雷蒂, G. 199
 Prica, O. 普里察, 奥 234
 Procacci, G. 普罗卡齐, G. 199
- R**
- Rabehl, B. 拉贝尔, B. 114
 Rabelais, F. 拉伯雷, 弗 125
 Racin, K. 拉津, 克 235

- Racine, J. B. 拉辛, 让, B. 152, 153
- Ragioneri, E. 拉卓涅里, E. 195, 199
- Rancier, J. 兰西埃尔, J. 170
- Ranković, A. 兰科维奇, 亚 251, 313
- Recabarren, L. E. 雷卡瓦伦, L. E. 214
- Reich, W. 赖希, 威 100
- Reichelt, H. 赖歇耳特, 赫 109
- Rendtorff, T. 连德托尔夫, 特 109
- Révaj, J. 列瓦伊, 伊 274, 275
- Ribar, V. 里巴尔, V. 234
- Richtmann, Z. 里希特曼, Z. 236
- Rickert, H. 李凯尔特, 亨 106
- Riesman, D. 里斯曼, D. 213
- Ristić, M. 里斯提奇, 马 235
- Robbe-Grillet, A. 罗伯-格里莱特, A. 154
- Robespierre 罗伯斯庇尔 60
- Rochhausen, R. 罗赫豪森, 鲁 55
- Rodin, D. 罗丁, D. 312
- Rossanda, R. 罗桑达, 罗 199
- Rossi, M. 罗西, 马 188, 189
- Rousseau, J. J. 卢梭, 让·雅 46, 134
- Rozental, M. 罗森塔尔, 马 248
- Rubel, M. 卢贝尔, M. 156, 167
- Rus, V. 鲁斯, V. 295, 312
- Ruschoni, G. E. 鲁斯科尼, 贾·恩 76
- Russel, B. 罗素, 贝 7, 59
- Rycher, M. 里舍尔, M. 44
- Rereni, E. 塞雷尼, E. 199

S

- Sade, M. de 萨德, 马·德 58, 60
- Saint-John, Perse 圣-约翰·培尔瑟 160
- Saint-Juste 圣茹斯特 60
- Salinari, C. 萨里纳里, C. 199
- Samardžija, M. 萨马尔季亚, M. 302
- Sandino, A. 桑迪诺, 奥 215
- Sandor, P. 山多尔, P. 168
- Sanial, L. 萨尼亚尔, L. 205
- Sarraute, N. 萨劳特, N. 154
- Sartre, J. P. 萨特, 让·保 118, 131, 134 - 147, 154, 163 - 166, 170
- Saussur, F. de 索绪尔, F. 德 169
- Sauvageot, J. 索瓦热, J. 114
- Schaff, A. 沙夫, 亚 295
- Scheler, M. 舍勒, 麦 77, 135
- Schelling, F. W. 谢林, 弗·威 120
- Schickel, J. 席克尔, 约 34
- Schiwy, G. 席维, G. 170
- Schmidt, A. 施米特, 阿 69, 76
- Scholem, G. 朔莱姆, G. 44
- Schönberg, A. 勋伯格, A. 51, 70 - 72
- Schram, R. S. 施拉姆, R. 斯 8, 29
- Schubardt, W. 舒巴特, 沃 55
- Schulz, R. 舒尔茨, 罗 55
- Schumpeter, J. 熊彼特, 约 213
- Schwartze, H. 施瓦策, 亨 55
- Sebag, L. 塞巴格, L. 170

- Selsam, H. 塞尔森,霍 212,213
- Selz, J. 泽尔茨, J. 44
- Sereni, E. 塞雷尼, E. 199
- Sève, L. 赛维,路 127,167
- Sirotković, J. 西罗特科维奇, J. 302
- Smith, A. 斯密,亚 7
- Snow, E. 斯诺,埃 8
- Sombart, W. 桑巴特,威 106
- Somerville, J. 桑默维勒,约 212,213
- Sotelo, I. 索特洛,伊 214
- Spencer, H. 斯宾塞,赫 7,214
- Spengler, O. 斯宾格勒,奥 51
- Spinoza, B. 斯宾诺莎,巴 167
- Spriano, P. 斯普里阿诺, P. 199
- Springer, A. 施普林格尔, A. 115
- Staljin, J. V. (Džugašvili) 斯大林,约·维(朱加施维里) 9,19, 26,29 - 32,39,69,136,158 - 160,171,174,194,195,197,198, 232,233,235,248 - 250,252,256,266,268,276,287,329,330
- Stanovnik, J. 斯塔诺夫尼克, J. 302
- Stipetić, V. 斯蒂佩蒂奇, V. 302
- Stojanović, R. 斯托亚诺维奇, R. 310
- Stojanović, S. 斯托亚诺维奇, S. 295,312
- Stojković, A. 斯托伊科维奇, A. 295
- Strachey, J. 斯特腊奇,约 205
- Štajner, R. 什塔伊奈尔, R. 302
- Strunik, D. 斯特鲁尼克, D. 213
- Sullivan, H. S. 沙利文,哈·斯 94
- Sun Jat-sen 孙中山 7 - 9,16,18,19

- Supek, R. 苏佩克, 鲁 277, 294, 296, 299, 310
- Suret-Canale, J. 苏勒-卡纳累, 让 127
- Sutlić, V. 苏特利奇, V. 296, 312
- Sweezy, P. M. 斯韦齐, 保·M. 202, 205, 207-213, 216
- Šešić, B. 舍什奇, B. 295
- Šnajder, M. 什纳伊德尔, M. 234
- T**
- Tadić, Lj. 塔迪奇, 柳 294, 295, 298, 312
- Teng Hsiao-ping 邓小平 32, 33
- Teslić, V. 特斯里奇, V. 18
- Theimer, W. 泰默尔, 瓦 108
- Thier, E. 梯尔, E. 108
- Tito, J. B. 铁托, 约·布 230-233, 240, 242, 245, 251-253, 257, 258, 262, 263, 287, 302, 303
- Troqueville, A. C. 托克维尔, 阿·C. 62
- Todorović, M. 托多罗维奇, 米 310
- Tödt, H. E. 特厄特, 海, 爱 109
- Togliatti, P. 陶里亚蒂, 帕 193-198
- Toynbee, A. 汤因比, 阿 51
- Tran-Duc-Thao 陈德道 167
- Trentin, B. 特连亭, 布 176, 199
- Trocki, L. D. (L. Bronstein) 托洛茨基, 列·达(列, 勃朗施坦) 9, 10, 174, 180, 202
- Tucović, D. 图措维奇, 迪 230
- V**
- Valéry, P. 瓦勒里, 保 139
- Veblen, T. 维布伦, T. 213
- Vigier, J. P. 维吉埃尔, J. P. 163, 165

- Vinci, L. da. 芬奇,列,达 191
 Višinski, A. 维辛斯基,安 275
 Vitello, V. 维特洛, V. 199
 Vlahović, V. 弗拉霍维奇,维 288, 304, 305
 Vlaškalić, T. 弗拉什卡利奇, T. 302
 Volpe della, G. 沃尔佩,德拉,加 184, 187 - 191
 Voltaire (F. M. Arouet) 伏尔泰(弗,玛,阿鲁埃) 134, 191
 Vranicki, P. 弗兰尼茨基,普 277, 295, 296, 300, 312
 Vujović, R. 武约维奇,腊 233

W

- Weber, M. 韦伯,麦 150, 152, 155
 Webern, A. 韦伯恩, A. 71
 Wells, H. G. 威尔斯, H. G. 213
 Wetter, G. 韦特尔,古 108
 Wolff, K. 沃尔弗, K. 213
 Wolff, R. P. 沃尔弗, R. P. 90

Z

- Zagoria, D. S. 扎戈里亚, D. S. 32
 Zanardo, A. 扎纳尔多,阿 193, 199
 Zihlerl, B. 季赫尔,鲍 294
 Ždanov, A. A. 日丹诺夫,安,亚 21, 245, 248, 274, 275
 Železnikar, F. 热列兹尼卡尔,弗 230
 Živković, Lj. 日夫科维奇,柳 294
 Životić, M. 日沃蒂奇, M. 312
 Županov, J. 茹潘诺夫, J. 310